生与死

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

鄭 念 著
鄭 凱 譯

敦煌書局

作者簡介

鄭念，於一九一五年生於北平。一九三五～八年就讀於倫敦經濟學校，畢業後嫁給一位中國政治家，從一九四一到一九四八年，僑居澳洲坎伯拉市。在中國共產黨解放大陸之後，至一九五七年因癌症去世爲主，她的先生一直擔任上海蜆殼公司的總經理，而從一九五七至一九六六年，她則成爲蜆殼公司的管理顧問。——一九八〇年離開中國，現在居住在華盛頓特區。

校訂者簡介

馬海玲，一九五七年生，湖南省籍，畢業於文化學院大陸問題研究所。

目錄

作者簡介

鄭念，於一九一五年生於北平。一九三五～八年就讀於倫敦經濟學校，畢業後嫁給一位中國政治家，從一九四一到一九四八年，僑居澳洲坎伯拉市。在中國共產黨解放大陸之後，至一九五七年因癌症去世為主，她的先生一直擔任上海蜆殼公司的總經理，而從一九五七至一九六六年，她則成為蜆殼公司的管理顧問。——一九八〇年離開中國，現在居住在華盛頓特區。

校訂者簡介

馬海玲，一九五七年生，湖南省籍，畢業於文化學院大陸問題研究所。



目錄

第三部　爲正義而戰

前言

從一個被壓迫的中國產生了一份令人注目且扣人心弦的證言。一位不平凡的生還者——一位受過高深教育的女性曾經進入政界及商業圈，現在，卻發現自己陷入了時代的大動亂。鄭念敘述她在文革期間六年半的隔離囚禁，及多年未曾間斷的監視，到最後的復職。這是鐵幕內最好的文學作品，同時也揭露了許多中國政治動亂和派系鬥爭的眞相與過程。

鄭念，是一位熱情的親英派人士，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在毛澤東當政時任職於上海的蜆殼石油公司，於一九六六年紅衞兵抄家時被捕入獄。所有試圖迫她承認是英國間諜的不實指控都失敗了，鄭念堅定的拒絕了審問者開出的條件。當她出獄時，有人告訴她女兒已經自殺身亡，事實上，梅萍是被毛澤東手下的紅衞兵給活活打死的。

這位作者具有旺盛的求生意志並決心爲世人作見證，敏銳的政治頭腦及清晰的表達能力使她的書成爲令人激賞的作品。她對談話內容的記憶力，驚人的觀察力及描述，還有她的幽默感及同情心，在在都證明她是一位天生的作家。「四人幫」雖早已被人淡忘，而「生與死」這本書將歷久彌新。

第一部　革命風潮

第一章 獵巫

我永遠也忘不了這段往事……。現在，我又回到一九六六年七月一個炎熱的夏夜、回到上海老家的書房，我的女兒睡在她的臥房裏，僕人們也休息了，我獨自待在書房中。再一次，我聽到天花板的風扇那種緩慢的轉動聲，我還看到書桌上白色乾隆花瓶中白色的康乃馨搖曳在暑氣中。眼前依牆排列的書櫃中擺滿了中英文書籍，褪色的枱燈照出半屋子的陰影，在昏暗中，紅絲緞靠墊映得白色沙發更加醒目。

一位英國友人曾說：這間書房是單調上海市中一處舒適優雅的綠洲。其實，我的房子並不是什麼華屋巨廈，但照西方標準來看，它是相當現代的。我花了不少心思使它成爲我們母女的家與天堂，即使這個城市瀰漫著無產階級主義的氣氛，我們還能享受高格調的生活。

在共產黨統治中國十七年之後，在這一億人口的城市裏祇有十幾戶人家同我們一樣還能保有舊時的生活方式：守住他們的故居並僱用原有的一羣僕人。一九四九年，共產黨的軍隊進駐上海後，我們『不能』解僱家中佣人！因爲這會加重失業問題。政治鬥爭使許多原本富裕的人家窮困潦倒，當他們無路可走時仍必須付出大筆的罰金。許多工業家在他們的工廠被遷移出上海之後，跟他們的家人都被送到內地去了。我沒有主動改變生活方式，不僅是因爲

我有能力維持生活水準，也因爲上海市政府待我尙稱禮遇，無論如何，我和女兒生活得相當舒適。我們認爲革命是無法避免的，所以，我們已準備好跟它一起前進。

我之所以不斷提起一九六六年七月三號午夜前的幾個小時，不僅是因我非常懷念那段跟女兒一塊生活的時光，更因爲那是我多年正常生活中的最後幾個小時。

即使在夜晚，熱氣仍然沉沉的盤據著上海，我的臉及手臂被汗水濡濕，上衣也黏貼在背上，書桌上攤滿了報紙，報上猛烈的抨擊性言論象徵一個政治性運動的開始。這些由黨員選出的活躍分子所執筆的文章暗示這次運動的目的以及它可能的暴虐。由於以往我從不曾捲入過任何政治運動，所以絲毫感覺不出這迫在眉睫的大難。然而跟別人一樣，這些宣導文章的激烈言詞也使我不安。

我的僕人老趙已在咖啡桌上留下一壺冰茶，喝茶時，我的目光落在先夫的遺照上。他去世已近九年，但他死後在我心中留下的空虛仍無法塡平。當我爲政治局勢感到不安時，總覺得空乏無助，也更需要他。

第一次遇到外子是在一九三五年，當時他在倫敦攻讀博士學位。一九三九年，我們結婚後便回到重慶，他成爲國民黨政府的官員。一九四九年，共產黨進入上海時，他是國民政府外交官。當共產黨代表章漢夫，接替了他的職位時，章希望他在這段轉換時期內，留在新政府裏充當新上任的上海市長——陸軍將領陳毅的外交事務顧問。其後，他獲准離開人民政府，並接受蜆殼國際石油公司的聘請成爲上海分公司的總裁。而因爲蜆殼公司是唯一肯留在中國大陸的大石油公司，所以巴望與西方世界貿易的高幹對我們禮遇有加。

一九五七年，外子因癌症去世。一位英國人奉命接替他的職位。此後蜆殼公司請我擔任他的管理顧問一直到一九六六年。

繼任的英國總裁希望我能使公司避開許多資本家在中共境內常會遇到的陷阱。我必須設法解決問題而不致損傷公司的尊嚴或讓中共幹部有失顏面。我的工作是管理職員，扮演總裁與蜆殼勞工聯盟的傳話人，分析聯盟的要求並居中協調。更重要的是，我代表公司與中共政府代表溝通。當總裁離開上海時，我便代表他。我覺得自己很幸運能成為上海唯一聞名世界的公司中享有崇高地位的女性。

一九六六年春，在與中共政府代表簽署「資產與負債協定」之後，蜆殼公司關閉了上海的分公司。我們交出在中國大陸的資產，中共同意接收職員，繼續僱用他們並給付退休金。身為管理人員，我並不包含在這份協定之中，它祇限於蜆殼勞工聯盟的員工。

當這項協定簽訂時，我那在上海影片攝影場當演員的女兒，正在北方演出。我想等她回來後到香港一趟，但在等她回來之際，文化大革命爆發了，我的女兒及其他團員被影片攝影場公司緊急召回上海以便參加文革。因為我知道在政治運動期間，政府官員大多不願做決定，而且政府部門的作業也會緩慢下來，甚至完全停頓，所以我不願冒險再申請前往香港的旅遊許可。一次拒絕會形成警察挾持你個人的資料，所以我留在上海，心想文革不會超過一年。

茶使我冷靜了不少。我起身走到隔壁的臥室，雖然很熱，我還是沉沉的睡着了。不久，我的女傭陳媽輕輕把我推醒，床旁的時鐘才六點半，但是太陽已經發出威力，室內的溫度也

漸漸升高了。

「季先生跟另外一個從公司來的人要見你！」陳媽說。

「有事嗎？」我懶洋洋的問她說。

「他們沒說，但是樣子很奇怪。他們直接闖進客廳而且坐在沙發上，不像公司關閉以前一樣在前廳等候。」陳媽回答。

我走向浴室時隨口問道另外一個人是誰。季，我知道是我們公司在上海勞工聯盟的副經理，我經常跟他進行交涉。他是一個好人，明理又溫遜。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他以前沒來過，我想他可能是個警衞，長得又高又瘦。」陳媽說。

從陳媽的敍述，我想這人是蜆殼聯盟的活躍分子之一。我們並沒有黨員，從聯盟中這些活躍分子的行動看來，他們是被上海勞工聯盟鼓動在我們公司裏當把風的看門狗。我和這些大部分做警衞或清潔工的積極分子並沒有直接的接觸，主要是從部門主管那裏認識這些人的。

有人敲門。老趙遞給陳媽一個托盤，並從半開的門中說道：「他們要太太快一點。」

「好的，老趙。」我回答，「告訴他們我馬上來。給他們一些冷飲和香煙。」

可是我並沒有立刻下樓。我需要一些時間來準備面對一切可能發生的事。這兩個人一大早來訪是很不尋常的，然而，在中國不論是參加演講或是政治訓話，很少有人事前被通知。幹部認為每一個人在接到通知時都會放下一切事情。我猜想這兩個人是來叫我去參加他們的

政治訓話，我知道上海勞工聯盟正在組織蜆殼公司以前的員工，準備讓他們以低廉的薪資爲政府機構做事。

吃早餐時，我回想導致公司關閉的因素並檢討自己在與中共政府進行交涉時的行爲。雖然我陪著總裁參加所有的會議，但並不參與決策，我的工作僅止於觀察並在回到公司後給總裁一些意見。我打算如果被問及有關蜆殼公司的情況，便藉口寫信到倫敦打聽消息來拖延時間。

客廳中兩個男人手脚張開躺在沙發上，桌上的橘子汁沒有動過。當季看到我的時候，他習慣性的站了起來，但是，當他看到那個激進分子仍然坐著，他的臉立刻漲得通紅並趕緊坐下。而後者在我進入客廳時仍然坐著，顯然有挑釁的意味。一九四九年，在共產黨的軍隊進入上海後不久，這位負責我住處地區的新警衛做了他第一次週期性的突擊拜訪。他在前門與老趙擦身而過，大步邁進客廳而且在地毯上吐痰。從那時起，我才瞭解到黨裏一些小幹部經常用誇大無禮的姿態來掩飾自卑的心理。

我無視於季的迷惑以及那傢伙的魯莽，坐進右手的椅子，然後鎭靜問道：

「什麼事情使二位一大早來？」

「我們來請你去參加集會。」季說。

「你這麼慢，我們太概要遲到了。」右一個人站了起來。

「爲什麼集會？誰召集的？誰派你們來的？」

「不用問那麼多！如果沒有命令我們不會到這裏來。所有蜆殼公司的職員都必須參加這

次集會，這是很重要的。」這個活躍分子說道，然後又用一種憤怒的口氣接著說：「難道你不知道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開始了嗎？」

「文革和我們有什麼關係？我們是替商業公司做事，又不是替文化機構做事。」我答道。

「毛主席說每個人都必須參加文化大革命。」季說。

然後他們兩人耐不住性子了：「快要遲到了，我們馬上得走。」

季也站了起來，壁爐前掛鐘的指針指著八點十五分。陳媽拿著我的手提袋和藍色絲陽傘等在大廳。我從她手中接過東西時向她笑了笑，但她並沒有笑，反而眼中充滿了焦慮，我安撫的告訴她我會回來吃中飯，她點點頭不作聲。老趙站在敞開的大門旁，他看起來也非常著急，但只沈默的在我們身後把門關上，其實僕人們的態度是不難理解的，我們都知道毛澤東統治的十七年內，無數人被召去參加政治鬥爭後一去不回。

有一羣年輕男女聚集在技術學院前面。當他們看到我們從公車站走來時，一些人跑進大樓裏大叫：「他們來了！他們來了！」有一個人走出來，很生氣的對我的『護衛』說：「你們怎麼就擱那麼久？集會是八點鐘開始的。」

會議廳裏早已擠滿了人。我看到蜆殼公司的物理工程師和其他資深的職員坐在前排的長板櫈上，後面坐著的有司機、警衛、電梯操作員、清潔工和辦事員，跟一羣可能是學生的年輕人。有不少人站在走道和大廳後面。熾熱的陽光透過窗櫺曬進悶熱的屋裏，但是沒有幾個人用扇子。屋內的氣氛令人緊張。

我懷疑自從蜆殼分公司關閉之後，這些人是怎麼過的。他們是這次「資產與負債協定」眞正的受害人。幾乎所有的人都在蜆殼待了大半輩子，大部份均已屆退休的年齡。協定上答應他們都會在中國機構裏獲得工作，但却沒有說他們會得到和以前一樣的工作，他們祇被僱爲辦事員或翻譯員，得到微薄的薪水及爲數可鄙的退休金。沒有人敢反對這項協定，因爲這是毛共政權強迫他們接受的。前總裁和我曾努力改善這情況，但是他們說公司每一位員工都很滿意這次協定。

後面突然興起一陣騷動。有幾個身穿短袖襯衫和寬鬆棉褲的人從後面走出來，其中一位走到前面一張鋪著白布的小桌子，其餘的人就坐在他後面的椅子上。在中國大陸，已經沒辦法從一個人的穿著來判斷他的生活狀況，因爲每個人都穿得像無產階級。對中國人民而言，看起來很窮是既安全又時髦，因此，我無法看出這個集會負責人的身分，我猜想他一定是上海勞工聯盟的高級幹部。

「同志們！」他說：「毛主席親自領導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開始了。在我們偉大能手的領導下，我們會毫無阻礙的朝向勝利。現在，正是我們無產階級的大好時候！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我們更徹底的學習毛思想的大好機會，這樣我們的政治警覺才會更敏銳，我們也才能眞正分辨出誰是人民誰是敵人。社會主義的敵人非常狡猾。有些人舉著紅旗反紅旗，有的人是笑裏藏刀。他們跟外國的帝國主義和國內的資本家聯手破壞社會主義，要把咱們人民推回以前的悲慘境地。我們能讓他們成功嗎？當然不！不！一千個不！上海人民被解放已經十七年了，但是，直到最近，外國公司還留在城裏。他們的公司佔據著繁榮

地段，他們的車子在我們的街道上橫衝直撞。外國人跟一些數典忘祖爲他們工作的中國人在咱們地盤上大搖大擺。我們都知道這些公司是帝國主義的特務，他們想要繼續壓榨中國人民，我們不能忍受這種情形，所以把他們的大門關起來，把外國人趕出去！大部分的中國人已經被污染，思想也被混淆，我們必須認清他們有些人是右派的反動分子！我們要以毛主席的偉大政策來教育他們、改造他們。幾個月來，我們已經對他們進行政治訓話。但是，假如他自己不面對事實、承認自己的過錯，他是不能改造成功的。自我批判和自白是改造的第一步！一個人必須靠別人的批評來完成自我批判，今天的集會是爲了聽聽他的自我批判。」

「每個人都認識陶方。三十五年來他一直是蜆殼石油公司的忠實走狗，這家規模龐大的國際公司把觸爪伸到世界各角落去汲取利益。這個，根據列寧的說法，是資本主義企業最糟糕的地方，要知道，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水火不容。陶方不能一面爲英國公司的利益工作，一面又做個社會主義的好國民，長久以來，我們一直幫助他認清眞相……」

我很訝異我們公司會計的陶方，竟會是今天集會的靶子，因爲我一直認爲黨會照顧他，他的長子曾在五〇年代到蘇聯和捷克公費留學，後來這個年輕人便加入黨。我知道一個學生如果被選派到外國，黨一定會徹底調查他的背景，包括他父親的個性、職業和政治立場。陶方在他兒子被送到國外去時，一定通過了考驗，我不明白爲什麼現在他會被扭出來鬥爭。

從共黨政權一開始，我就仔細閱讀有關馬克斯主義的書籍以及中國共產黨領導者的宣言。在我看來，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仍值實驗階段，這些國家尚未決定它發展的路線。我想，這就是爲什麼政府的政策一直像鐘擺似的左搖右擺。當走進死胡同、問題產生時，北京才會

採取改正措施，然後這些修正措施發展得太過分了又得被修正，眞正的困難是國家控制的經濟使生產僵化，北京的經濟計畫又忽略了地方的情況也抹煞了生產的誘因。

當以上的政策改變時，價値觀也隨之轉換，昨天是對的到今天却變成錯的，因此，共產黨基層幹部的言行都祇有幾天是對的，我判斷我參加的集會並不重要，這個發言人也祇不過是黨裏一個小幹部罷了，文革在我看來是左傾的，毛澤東相信政治鬥爭是社會進步的動力。所以我想文革祇是中國大陸人民必須學習忍受的動亂之一。

我一邊聽著演說者的長篇大論，一邊環顧四週，這時我才注意到牆上貼著「打倒帝國主義走狗陶方」的標語，他的名字被畫上紅色的大叉表示他被貶爲敵人，剛進屋裏時我沒注意到這張標語，因爲牆上掛滿了無數文革的口號，口號在中共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它們擁護毛澤東、黨、社會主義及黨要人們相信的任何事；它們告誡人們要努力工作，學習毛思想和服從黨。有政治鬥爭時，它們便謾罵敵人。自從文革一開始，各處的口號便成千上萬的增加，一個人根本不可能唸完他看到的口號。

這個人正說到陶方腐敗的生活是因爲長期接觸資本主義。他的罪好像是因爲外遇，酗酒，不知節制，又愛享受美食……一切黨不悅的放縱行爲。這些指控並沒有嚇倒我，我知道當一個人被公開抨擊時，他會被講得一無是處，任何行爲上的過失都被歸咎於資本主義。雖然他使用了苛責的言詞，不時還提高聲音喊叫，但其態度却悠閒從容，常常停下來喝水或看稿子。他知道他的聽衆已經被控制，在集會進行中沒有一個人敢離開。每個黨裏的幹部，不論階級有多低，都是黨的代表，他說話就是黨在說話，如果不做出專心的樣子，後果將不堪設

想。他已經講了很長一段時間，屋內熱得教人無法忍受，聽衆也愈來愈不耐煩。我看看錶發覺已經十二點了，或許演說者也是又累又餓，因爲他忽然停下來告訴我們集會一點半繼續。他話還沒說完，每個人都站起來走向出口。外面正午的陽光無情的曬在炎熱的街道上，我看到不遠處有輛三輪車停在樹蔭下。

奔向三輪車，給車伕住址後答應給他雙倍的價錢，我要他趕緊帶我離開。早上帶我進屋的人衝出來，叫我停住，留在學校厨房吃東西，免得又遲到了，因爲他急著留住我，所以一直抓住三輪車不放。我一再向他保證我一定會準時回來，他才讓我走。

再回到集會廳，遲到了一會兒，但絕不是最後一個到的，我找了個第二排靠柱子的位置，這樣，累的時候就能靠在上面。大廳逐漸聚滿了人，兩點一到，同樣的人站上講台，擺好姿勢。發言人向後頭示意。看到陶方被帶進屋裏，頭上還戴著一頂寫著「牛鬼蛇神」的圓錐形紙帽，我嚇了一跳。如果不是他面上煩惱的表情，他看起來會很滑稽。

「牛鬼蛇神」是中國神話裏能變化人形作亂的妖怪，被眞人認出是妖怪時，他們就會化成原形。毛澤東首先用這句話來形容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的知識分子。他說知識分子都是化成人形的惡魔，假裝要支持共產黨。當他們批評黨的政策，他們就現出怪物的原形。從那時起，毛的話很快被採用，黨裏的幹部用這個名詞套在任何被認爲政治詐欺的人頭上。文革期間，它被用來泛指所謂的九大敵人：在一九五〇到五二年土地改革運動時被貶的地主；在一九五五年農村合作運動時被貶的富農；一九五〇年壓迫反革命鬥爭和一九五五年消滅反革命鬥爭的反革命分子；自從共產黨得勢後不時被逮捕的「壞分子」；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

時的右派分子；叛徒（那些被黨裏的幹部懷疑他們被國民黨囚禁時洩露黨的機密）；間諜（跟外國人有關連的男女）；走資本主義路線的人（黨裏那些不嚴格遵守左派政策，並採行資本主義路線的幹部）；還有中產階級家庭出身的知識分子。

陶方的樣子完全變了，當年我們同在一間辦公室工作，他總是充滿自信。現在，他看起來很緊張，而且頹廢不堪了。他瘦骨嶙峋，而且比幾個月前蒼老不少。我身後的年輕人在竊笑。當陶被帶上台時，後面的人爭著看個清楚都站了起來，還踢倒了一些板櫈。看到這情形，前面一位就把一張椅子推到台上，叫陶站上去。當陶帶著他的高帽子卑屈的站在椅子上時，竊笑變成不可收拾的大笑。

角落裏一位顯然是刻意安排在羣衆的傢伙站了起來，高舉著毛語錄（每個人身旁都有一本）帶領羣衆呼口號：「打倒陶方！」「打倒資本主義的走狗陶方！」「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資產階級！」「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偉大的毛主席萬歲！」當大家對犯人的憤怒和不滿稍微平息之後，他被准許從椅子上下來。沒想到他一低頭，紙帽掉了，年輕的學生又哄堂大笑起來。陶眼中佈滿恐懼的看著集會的負責人，顯然害怕被說成他是故意把帽子弄丟的。直到帽子被人撿起來放到桌上，他才放心的嘆了一口氣。

負責人叫公司其他職員——包括早上到我家去的那兩位，還有陶方會計部門裏的小辦事員——到前面來講話。他們一個接一個走到台前，表示憤怒與不滿，並重複早上負責人對陶方的指控。我知道，批鬥的範圍與程度是由高級幹部設定的。中國人民由經驗中知道黨會更信任、更喜歡他們，如果他們不爲自己著想且乖乖重複黨交待他們的話。其他職員對陶方進

行了長時間的批鬥。被准許發言的都是工人和小職員，公司資深的職員一個也沒有參與，他們低著頭，坐在位置上一句話也不說。

最後負責人又接著發言，他告訴觀衆經過幾個禮拜的再教育及激進分子的「協助」，陶終於承認是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受害者。對著陶，這人以一種嚴厲的老師抓到學生犯錯時的語調盤問道：「是不是這樣？是帝國主義的高薪把你變成奴隸！你出賣自己爲他們做一些髒事，是不是這樣？」

全場肅靜下來等陶答腔，沒有戲劇性痛哭流涕的悔恨認錯，他祇是點頭，看起來比先前更沮喪。

「陶方現在要自我批判。」那個人看也不看觀衆的阿諛道。陶方從口袋裏拿出幾張紙，開始用不帶任何感情的低沈語調宣讀一份事先準備好的告白。他謙卑的承認演講者列擧的罪名，並接受他的墮落是因爲他沒有足夠的社會主義警覺。他表示後悔替一家外國公司工作了三十五年，又說他糟蹋了一輩子；他宣佈他很慚愧被資本主義蒙蔽，讓蜆殼給他的優渥待遇給奴役了。他請求無產階級原諒他，給他改過的機會；他提到他兒子是黨員並曾公費留學；他說他自己腐敗的生活是對人民政府的恥辱；他向大家保證認清反中共的資本家及帝國主義的詭計，並會盡全力揭發他們的技倆以表示他眞心悔改。他還說他正在寫一份他曾爲蜆殼公司做下的罪行詳細表，然後交給共幹幫助他再教育。

這是一段自我詆毀和誇張的長篇敍述。有時他的聲音顫抖，有時張嘴說不出一個字。在翻頁時，他雙手發抖，我不相信他的緊張完全是由於害怕，他一定知道他沒有犯罪。畢竟蜆

夠能在中國立足也是經人民政府同意的——甚至是被強迫留下來的！我知道公司一直謹慎的遵守政府的規定，陶一定也知道。我想他最大的問題是心理和生理上的疲勞。爲了讓他屈服並確定他會順從，我肯定那些「幫助」他的人一定花了好幾天，甚至是幾個禮拜的輪流盤問，不讓他睡覺。在當時，這是很常見的事，受害者會累倒，在屈服於瀕臨崩潰時。共產黨稱這種不仁道的手段爲「疲勞轟炸」！我認識很多人（包括我自己的兄弟），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時都有這種經驗。黨員退居幕後操縱那些激進分子，當發生暴力致人於死時，黨員便推卸責任而宣稱這是因爲「羣衆狂熱」而導致的意外事件。

我當然不認爲自己重要到勞師動衆來爲我一個人舉行這場表演，但如果眞是這樣，它並沒有嚇到我。我第一次參加「鬥爭大會」的感覺是厭惡及不齒，這種對人類同胞的野蠻行徑竟會發生在我深愛的、有著五千年文化的祖國，身爲炎黃子孫我感到悲哀。

又一次呼口號，但是大家已經起立向大門移動。那個不讓我回家吃中飯的人等在通道，他告訴我：「你能不能到這裏來一下？有些同志要跟你說話。」我跟著他走到一間教室，學生的桌椅都堆到角落去了。集會負責人跟台上另外一個人坐在講桌旁。那裏有張空椅子，他們叫我坐在那裏。

「集會上的每件事你都聽到了吧？」集會負責人問我，我點頭。

「你覺得這次集會怎麼樣？我相信這是你第一次參加這種集會。」

很明顯的，我既不能說出我對集會眞正的感想，可是我也不想撒謊奉承他，所以我問：

「我可以請教你幾個我想了一整天的問題嗎？」

他看起來很生氣：

「說啊。」

「你代表什麼組織？你有什麼權力能召開這樣的集會？除了蜆殼以前的職員，到場的還有什麼人？」我說。

他顯然憎恨我這樣質詢他。他極力控制自己，然後說：

「我們代表無產階級。這次集會是由負責督導上海文化大革命的委員會授權的。」

我請他解釋一下文革的目的，他說文革是爲了肅清社會主義成長的障礙。他重述毛澤東經常被引用的話：「如果毒草不拔除，香花就不能生長。」他還說每個中國人都得參加文革。

「你必須用更誠懇的態度，努力效法陶方，盡全力去改造。」他說。

「我做錯了什麼？」我十分驚訝。

「或許在你把事情想過以後，你就會改變你的態度，」第二個人說：「如果你替帝國主義掩護，後果將不堪設想。」

「有什麼需要掩護的？每一次帝國主義者的舉動都清楚的記載在史書裏。」我回答。

這個人提高音調說：

「你說什麼？我們不在乎以前發生的事，我們談的是現在，是你服務的公司！陶已經承認了每一件事，我們知道上海蜆殼公司『掛羊頭賣狗肉』！我們也很清楚你在他們的髒把戲裏擔任重要的角色，你不要把我們當傻瓜。」

「我完全不知道你說的是什麼！」我說：「就我所知，我服務的公司從沒有做過任何犯法或不道德的事，人民政府擁有這麼優秀的警力，如果眞有任何事錯了，他們一定老早就發現了。」

兩個男人都瞪著我，幾乎同時喊出來：

「你在試圖替帝國主義掩護！」

「你們誤會了。我祇是說出所知道的事。我爲什麼要替他人掩護？」我生氣的說：「蜆殼的上海分公司已經關了，英國總裁是走了，可是你還在這裏，你知道的跟他一樣多。你丈夫擔任總裁那麼多年！他死後你加入公司，你一定知道它的每件事。」

「說得好聽！英國總裁是走了，英國總裁也走了，沒有人需要我的掩護。」

「正因爲我知道蜆殼上海分公司的每件事，所以我知道它沒有做錯任何事。」我說。

另外一個人插嘴進來：「我建議你現在回家然後把事情想清楚！我們要再跟你談話時會叫你來，你家電話號碼幾號？」我給了他我的號碼便離開房間。

當我走過第一醫學院時，我看到我的朋友溫妮從半掩的大門走出來，身後跟著一羣同事。我們彼此打招呼後一塊兒走回家。（她就住在我家附近。）

「怎麼那麼晚了你還在外頭走？」溫妮問我。

「我剛參加了鬥爭大會，他們叫我加入文化大革命。」

「蜆殼的上海分公司不是關了嗎？告訴我這件事。」

「我會的。你能跟我一道吃晚飯嗎？」我問她。

「好的，我在你家打電話好了！這些天亨利很晚才回家。一有政治鬥爭，身爲教授的他就得付出很大的代價。教授好像永遠都是槍靶。」溫妮說。

亨利是她先生，在同濟大學教建築。

「亨利有麻煩了是不是？」我替她著急。

「沒有，到目前還沒有，感謝上帝。」溫妮回答，然後從手提袋裏拿出梳子來梳頭。「你的傭人要是看到我蓬首垢面的去你家吃飯，一定會嚇一跳。」

在上海沒有幾個人眞正了解馬克斯主義、毛澤東或中國共產黨，幾乎沒有人知道一九四二年在延安實施對知識分子的迫害，或者週期性在共黨和軍隊裏逮捕國民黨和帝國主義間諜。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國知識分子對中共的唯一消息來源是一些溜進共黨地區的西方記者和作家寫出來的報導。中國知識分子誤信這些宣傳，認爲中國共產黨是眞心誠意的。

在共黨軍隊接收上海以後，女人被鼓勵出外工作。溫妮在一九五〇年便成爲醫學院的老師，往後幾年，毛澤東急於將各大學納入黨的控制，開創了思想改造運動，溫妮跟亨利才開始痛苦的醒悟，雖然他們並沒有受到什麼傷害，他們却大受羞辱，被迫批判自己的家庭背景、他們在海外的教育、以及他們在建築設計和教學方法上表現出來的生活觀，中國傳統作品和西方建築設計都被叱爲封建腐敗。

一九五一年思想改造運動結束以後，黨書記被任命爲大學中的各級行政管理。他們控制了教職員生活與工作，即使他們大部分都沒有受過什麼教育，也從沒當過老師。溫妮和亨利住在他們配給的房屋，拿他們付的薪水，照黨書記要求的方式教書。這兩個受良好教育、活

潑、愛幻想的年輕人，對共產制度充滿了希望，却因爲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懷疑和虐待，而淪爲教書的機器。但是他們已經夠幸運了，中國其他大學的人沒有這麼好的待遇，有的人被送到勞改營，有的則被集體的趕出大學。

一九五六年，毛澤東發動「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運動。每個組織的黨書記，連毛本人，都鼓勵人民對共產黨給予坦白而又有建設性的批評。數以萬計的知識分子與各階層的中國人以爲共黨眞的要改進它的工作，吐露出他們的牢騷和建議。但是溫妮跟亨利沒有說出來，一九五七年毛澤東動搖政策並開始反右派鬥爭時，他們逃過了迫害。毛把那些提出批評的人劃歸「右派分子」，許多人失去了工作，不當人看待的被送到勞改營；其他的人被減薪降級。毛澤東反覆誘人誠實說出建設性的批評，然後殘酷懲罰那些說眞話的人，這種詭計嚇壞了中國的知識分子，因此，中國的文化自此便永遠停滯了。

當溫妮跟我回到家，還沒按鈴，大門便打開了。老趙著急的站在那裏，告訴我說我女兒打電話回來說她不回家吃晚飯。

「你去告訴厨子，黃太太要留下來吃飯。」我跟老趙說，然後帶溫妮到樓上我的浴室。老趙擺好兩人份的歐式餐桌、舖上白色綉花的亞麻桌巾，還在桌子中央放了一盆白色康乃馨。

我們坐下來後，溫妮看著名畫家林風眠一幅淡藍色的女性肖像說：「你有沒有聽說？林風眠有大麻煩了。」我很訝異。我知道這位畫家替人民政府賺了大筆的外滙，人民政府廉價買下他的畫，然後以二十倍或三十倍的價碼在香港出售。「他被控提倡西方的頹廢藝術。還

指控他跟國外的人保持聯絡、提供消息給上海的外國船長。他那激進分子的鄰居說看到外國人走進他家。」

「實際上我知道外國船長是去向他買畫的。」

「許多畫家也好不到那兒去，你的老師—龐小姐也被批鬥。說她有一次畫了枝向下垂而不是向上長的梅花，要象徵共產黨的失敗。」（註：在中共統治大陸初期，仍承認梅花為其國花。）

我放下叉子對溫妮說：「他們瘋了。老派大師的畫裏，梅花總是垂在懸崖下，這又不是她創造的。」

「黨幹部也許從沒有看過以前大師的畫。負責藝術的共幹不需要知道水彩跟石版畫的不同。而且他們也都不知道。」

我們在客廳喝茶的時候，我告訴溫妮剛去參加的鬥爭大會。喝完茶後，她說：「既然蜆殼已經關閉上海的分公司，你可能免不了要步我們的後塵，只是在中國以外，沒有人會知道你發生了什麼事。」

「你想他們叫我去參加集會是為了什麼？」我問她。

「當然是要恐嚇你。」

「我不是輕易會被嚇倒的。」

「我想他們不知道這點。他們祇知道你是一個生活舒適的富婆，也從不參加任何政治運動。他們大概以為你很容易被嚇倒。他們低估了我們的勇氣。」

「你怎麼會以爲他們要嚇我？」

「這個時候很難說。不管怎樣，要提防不幸。提高警覺，閉上嘴巴！不管他們怎麼樣，千萬不要落人口實。」

「你呢？你們過得怎麼樣？」我問她。

「我累壞了，我們花了所有的時間去參加集會或是寫大字報，課都被停了，有些教授跟醫學家已經受到抨擊。情況比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剛開始的時候更嚴重。」

「亨利呢？」

「我很擔心他。我想他會跟其他教授一樣，當成『牛鬼蛇神』被鬥爭。』溫妮無助的說，然後閉上眼睛，嘆了一口氣。

老趙進來把茶杯倒滿：「廚子在回家前，想跟您說幾句話。」

「請他進來。」我吩咐他。

廚子隨老趙進來後道：「蜆殼勞工聯盟的副主席季先生在您回家前又來了一趟，他要我們傳話給您。」廚子說。

「他怎麼說？」

「他要我們告訴您跟幹部講話時要小心。他說你離開集會以後，他們埋怨你對他們無禮。季要你知道幹部已經生氣了。」

「季是個好人。」老趙揷嘴道。

「好人？你們應該看看他在鬥爭大會上罵陶方的那種嘴臉！」

「他也沒有辦法。他是奉命行事啊，如果他不是個好人，他又何必麻煩來這裏警告您。」老趙替季辯護。

「你說得對，老趙。我會當心的，謝謝你們提醒我這件事。」我對他們說。

僕人離開後，溫妮說：「他們說得不錯，你一定要小心。在政治鬥爭的時候惹翻了直接負責你的幹部是很不智的，如果他們要送你去勞改營，你就完了。」

「送我到勞改營？我既不替政府工作，又沒有犯法！」

「別傻了！他們要怎麼做根本不要什麼道理！」溫妮起身告辭，我送她到前門。

又累又沮喪，我回到臥室準備就寢。當我躺在床上，白天的景象在我眼前閃過，使我無法入眠，在輾轉反側時梅萍回來了：「媽咪！媽咪！」她像十幾歲時一樣，三步併作兩步的奔上樓梯。我喊說我在臥房裏。陳媽用托盤帶了一杯牛奶跟三明治，隨後走進房裏。

「天哪！我餓死了！從早飯後我就沒有吃任何東西。」她拿起杯子喝下牛奶。我看到她手指頭沾滿了墨水。

「瞧你的手！你要用沾了墨水的手指頭拿三明治吃是不是？都二十三歲了，還像十歲似的。在以前，你這種年紀的女孩早結婚，孩子都生了兩、三個。」陳媽數落著她說。因爲陳媽從梅萍稚幼時就跟著我們，她的身分在這個家庭是受肯定的。

我的女兒梅萍是個聰明美麗的少女，因爲生長在中共控制的時代，富裕又教育良好的條件已被一個不平等的「假平等」社會給粉碎了，由於優越的家庭背景，反使她年輕的生命中備受艱辛，舉例來說，要考進一所好的中學，她必須考八十分才行，而工人跟農人的小孩祇

需考六十分。「太不公平了！」當時我大叫，對我的孩子受到歧視感到非常憤怒。「是什麼理由要立下這種不公平的規定？」

「別擔心，媽，我行！我可以考到八十分，那並不難。」

「不公平！」我仍然很生氣。

「可是，媽，老師說工人跟農人的小孩放學後還得做家務事或煮晚飯，而且他們的父母也不會替他們做功課，想想你就會覺得我受的待遇是公平的！」

她想做的每件事都有差別待遇，當受到歧視時，她會為自己的家庭背景感到愧疚，她和其他像她一樣的小孩，必須比工人、農人的小孩更加努力。他們從小就知道共產主義的階級社會有一套比可鄙的資本主義社會更嚴格的階級制度，一個人靠自己的努力就能從低下階層升到上流階層，因為我女兒很努力，所以做得很好，在有名的市立第二女中，她是學生領袖而且獲得很多榮譽和獎品。她似乎適應得很好也交了許多朋友，其中有些還是勞動階級的子女，雖然她秉性博愛，但我想多半是共產黨深植在她心中那種富人壓榨窮人的罪惡感，使她興起了幫助這些小孩的念頭。她會把他們帶回家來分享她的食物，幫他們做功課，有時，甚至還到他們家裏去幫他們做家事。我認為她的行為是值得稱讚的，陳媽却大不以為然，尤其是她把衣服借給其她女孩，然後把一堆髒衣服帶回家給陳媽洗的時候。

雖然我們生活在週期性的政治動亂之中，一些朋友和鄰居的不幸遭遇使我們悲傷，但我從不擔心我的女兒。我認為她進入一流大學是理所當然的，優異的成績會讓她在畢業後找到一份好工作，然後嫁給一個優秀的青年。她的薪水恐怕會微不足道，但是可能的話，我可以

資助她的收入，就像中國其他的父母一樣。

我希望畢業後她能被分派在上海工作，這樣她就可以住在家裏，但是對這件事我沒有把握。我知道像她這種出身的年輕人經常故意被送到偏遠地區，那裏的生活情形既落後又貧窮，這種事曾發生在我朋友的小孩身上。我眼看自己的女兒由細瘦的小女孩長成妙齡女郎，不禁猜想她心裏想些什麼。然而樂觀時，我就想把家裏的三樓改建成自給自足的寓所給她和她的家人住。含飴弄孫對我將是一大安慰。我憧憬著，也幾乎能感受到懷中小生命的體溫。

當我從她口中得知有兩個知名的女影星（現在是新成立的上海影劇學校的老師），建議她以資賦優異生的身分去參加入學考試時，我嚇了一跳；我明白她被選上後一直沾沾自喜，但是我希望她能做些別的事。

「影劇學校在虹橋路上靠近舊高爾夫俱樂部，我可以在週末早點回家。那兩個老師告訴我所有的畢業生都會在影片攝影場工作，這所學校實際上是攝影場的分校，它派有才華的星探到全國各地去選拔學生參加入學考試，反應一定會很熱烈的，因爲大家都想住在上海。」梅萍說。

「你眞的要做一個女演員嗎？」我問她。

「那不重要，反正我會做好的！」

「我相信你會做好，只是，你一定要走這條路嗎？」我想這才是重點，一個人做自己想做的工作才會快樂。」

「我從沒有想過要做什麼。反正政府會派給我工作，想也沒用，一直巴望自己想去做的

事會教人失望。我的朋友也沒有人這麼想。」她說：「我祇要做好政府要我做的事。如果我努力把工作做好，我想我會喜歡它的。」

我想我女兒的態度在這種環境裏是相當正常的。但是，一個被分配以挑糞爲終身職業的人，努力工作就會讓自己喜歡這個工作嗎？

「所以你決定要去參加考試？」我問她。

「是的，如果你同意的話。老師已經下達了這個通知，不好拒絕，而且，我喜歡在上海工作。我不想把你一個人留在這裏，祇有過年時才能回家幾天。」我女兒說。

「想得也對，我的確不喜歡你到內地去工作。」我衷心的同意她。所以她進入影劇學校，三年後畢業，被派到文化部電影局經營的上海影片攝影場做事。

她一面嚼著三明治，一面告訴我今天在她攝影場發生的事：「我花了一整天的時間爲文革寫大字報。人家告訴我們說大字報寫得愈多，愈能表現一個人的革命熱誠。所以大家寫了又寫，直到告示牌跟局裏所有的牆上都被貼滿了。」

「你怎麼不回家吃晚飯？」

「我們放棄午餐和晚餐來表現我們的革命熱誠。實際上大家都餓了，但是沒有人要第一個離開。」

「你們寫些什麼？」

「唔，口號跟抨擊那些被稱作牛鬼蛇神的人，以及中國所有的敵人，比如臺灣、日本、英國、美國跟蘇聯。」

「你怎麼知道該寫些什麼？你是不是揑造事實？」

「有些人是這樣，但我想這不太好。從領導同志那裏拿到資料後我專門寫敵國。領導同志准許我這麼做，因爲他認爲我既然是在國外出生的，對其他國家的事應該知道得更多。我不想寫有關個人的，我對那些被批判的人的生活又不瞭解，而且我也不想說謊。老一輩的女演員、男演員、導演和編劇都得寫自我批判，他們還有很多人都被鬥爭呢，常常要在太陽下，頭低低的站著或跪著。」

「好可怕！」我叫了出來。

「可不是！我聽說他們以前大多是江靑的敵人，我還聽說毛主席授權江靑來處置這些藝術界的人。」我女兒說。

「她不是正在演現代戲嗎？」

「對，但好像她跟文化部高幹的不和已經有一段時間了。無論如何，我聽說以前那些得到比她更好的角色的資深女演員都已經收拾好包袱準備上勞改營。她眞是又善妒又狠毒，唉，還是別談她吧。」

「這實在太過份了！現在她是第一夫人了爲什麼要去在意那幾個老演員？」

「也許他們知道太多她過去的生活吧！他們說在她到延安嫁給毛主席以前，有一大堆愛人，不下幾百個。」

「毛主席也有好幾個太太，爲什麼她不能有好幾個丈夫？她聽起來就像一個好萊塢電影明星一樣。」我好笑。「你在中國長大的，所以把這種事看得很嚴肅。告訴我，你自己怎麼

樣？你會不會被批鬥？」

「媽，你別傻了，我沒有那麼重要，我祇是羣衆裏的一份子。當然，我的家庭背景和我在國外出生可能會被批判，幸好我是生在澳洲而不是在美國或英國。」

「當然沒有人敢說澳洲是個帝國主義國家。」

「不，影片攝影場裏大部分的人都認爲它還是一個被英國壓榨的殖民地，他們不知道澳洲人是英國人後裔，祇有袋鼠才是眞正的土著。」梅萍開心的笑了。

吃完三明治後，她起身回房時隨口問說：「你整天都做了些什麼，媽？」

「我被叫去參加批鬥公司以前會計師的鬥爭大會，看來我也必須加入文化大革命，我可能會成爲被攻擊的目標。」我告訴她。

「天啊！你怎麼不早點告訴我？」梅萍被我的消息嚇壞了。她又坐了下來，要我告訴她每一件事。我講完白天的經過之後，她變得非常擔心。她問：「你的公司還好吧？它有沒有做錯什麼？」

「沒有，當然沒有。」

「他們爲什麼會抓會計師？是不是他違反了外滙規定？還是你沒有付稅？」

「我們沒有漏稅！也一向遵守外滙規定。」

母女倆人都找不出理由來。沒頭緒的猜測於事無補，我催促她上床去，她靜靜的待了一會兒，才道晚安，在離開房間的一霎她似乎比進來時老了許多。

熄了燈後我仍一直醒著，我擔心我們母女倆生平第一遭的文化大革命會對她產生什麼影

響，不知過了多久，臥房的門被輕輕推開。

「媽，我睡不著。我可不可以下樓去彈一會兒鋼琴？」梅萍穿著睡衣站在門口問我。

「我跟你一起下去。」我起床跟她下樓。弗拉非，梅萍的波斯貓，臥在外面的陽台上看到我們時，也叫著要進來。我推開紗門，梅萍跨出去把牠抱進她的書房去。

放下弗拉非，打開琴蓋，彈了幾節和弦後她問我：「要我彈些什麼嗎？」我說什麼都好，就是不要革命歌曲。於是她開始彈奏蕭邦的夢幻曲，然後低聲問我：「還好嗎？」我發出同意的聲音。

弗拉非在鋼琴下躺在梅萍的脚邊，如果不是有種看不到的威脅飄在空中，這眞是一幅家庭和樂的景象。

第二章　風暴前

在第一次集會後的幾個禮拜，我被同樣的幹部叫去面談了好幾次，我們談話內容跟第一次談的沒什麽不同，有一回，他們要我提供一份所有我認識的美國人和歐洲人的名單，以及他們的職業跟我遇見他們的地點與場合。還有一次，他們要我寫下有關公司的活動情形，但是當我把寫好的報告交給他們時，他們卻看也不看一眼。雖然他們勸我毀謗我以前的僱主，但却又問不出任何確切而具體問題，他們一直暗示蜆殼做錯了事而我也是那罪行中的一部分。

這些人是在拖延時間，好等待上級進一步的指示。事實上，我和其他中國人一樣，不知道這次運動之所以遲遲不能蓬勃發展，是因爲中國共產黨領導者之間激烈的鬥爭，爭鬥的重點是誰應該領導文化大革命：是黨已有的機構？抑是由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指派的特別委員會？後來在八月初，一次中央委員會的會議上，毛澤東寫下一張標題爲「砲轟司令部」的大字報。他在大字報上很不尋常的指控政府的行政部門（由『人民政府』主席劉少奇領導）、黨書記處（以總書記鄧小平爲首）是中國資產階級的大本營，因爲他們的政策保護並幫助資產階級的利益。這是對中共所有的黨組織和政府機構一項非常嚴厲的鬥爭，毛敢指控劉和

鄧，是因爲毛澤東經由他的親密戰友林彪（也就是國防部長），控制了軍隊。當時爲了鞏固他的地位，劉少奇做了一份形式上的自我批判，說他允許農民擁有自耕地的經濟政策以及爲了配合城市居民的需要而開放的自由市場，不僅促使資本主義在中國復合，也是在社會主義道路上開倒車。也許劉少奇認爲這樣可以保住毛的面子，然而，事實證明劉少奇的經濟政策挽救了中國從毛澤東在一九五八到六〇年推行大躍進失敗後造成的經濟崩潰。無論如何，劉坦白認錯造成一個策略上的錯誤，情況變得對他非常不利，而且也讓毛的黨徒逮到機會，加強對他及其手下的鬥爭。

毛在中央委員會上的勝利促成了指定一個由左翼毛派組成的特別委員會去督導文化大革命。以後，黨和政府組織受到紅衞兵跟革命分子的鬥爭而癱瘓，這個委員會就成了政府的最高機構，它的成員，包括毛婆江青，享有至高的權力，而且全部進入中央政治局。文革時，江青利用她是毛的愛人的地位，變成他的發言人和代表，表面上傳達毛的命令，背地裏卻又是爲所欲爲的一套。幾十年來，這個無情又有野心的女人一直無法進入中國政壇，現在，沒有人能跟她作對。成千上萬的黨徒，藝術家，作家，科學家，和普通老百姓在她的懷疑之下受到嚴酷的迫害，其中有幾百人死在她信任的革命分子手中。

在這次八月中央委員會上，國防部長林彪成爲毛最忠心的支持者。他對毛的稱讚被記錄在會議最後的公報，並且登在報紙上。林推崇毛是這個時代最偉大的馬克斯主義者，一下子就把毛捧成是列寧眞正的繼承人，遠勝過蘇俄包括史達林在內的領導者。在整整十年的文革期間，卽使林彪已經被貶，毛的黨徒却仍一直如此讚揚。

中央委員會的公報公佈後不久，有一天，先夫的一位朋友胡先生來找我。由於中國男人交友的哲學是不包含朋友的妻子的，所以從我先生死後，他的朋友就不再登門拜訪，祇有胡先生還會在農曆過年時到家裏做禮貌性的拜訪。他通常祇待一會兒，向我跟我女兒問好，並祝我們身體健康、新年快樂，也總會提起我先生，還告訴我有多尊敬他，多珍惜他的友誼，然後起身告辭，在桌上放下一個給僕人當小費的紅包。在共產黨佔據中國之後，祇有一些保守的人才會遵行這種舊風俗。我很高興他來訪，也覺得他有點特殊又很多愁善感。

胡先生曾經營一家製造油漆的工廠，他的產品享譽中國大陸而且還外銷到香港和東南亞。共軍接收上海之後，他在共黨政府的監督下繼續經營工廠。一九五六年，資本企業社會化的時候，他的工廠被人民政府接收，中央答應所有的資本家在十年內根據企業的估價付給他們每年七釐的利息。然而，政府對他們企業的估價祇是眞正價值的一小部份，資本家別無選擇祇有接受。因爲他的技術，政府聘請胡先生留在廠內擔任總工程師跟助理，此後命幹部同志擔任書記及經理的職務來經營他的工廠。

「我聽說你被捲入文革，不知情況如何？」胡先生解釋他爲什麼來訪。

「上海分公司正在被調查，我也被叫去問話，還得去參加鬥爭公司以前會計的鬥爭大會。」我告訴他：「跟我談話的人好像暗示公司有違規的事情，但他們也不說出眞正意思。我眞搞不懂，我又從來沒參加過什麼政治活動！」

老趙把一個托盤放在沙發前的桌上，這時廳裏的電話響起，他出去接，然後很快的回來

「又是那幫人！他們叫你馬上過去面談。」我要他告訴對方我很忙，明天再去，但之後我聽見他在電話裏跟對方大吵。不一會兒他又回來了：「他們一定要你馬上就去，還說有要緊事。」

「我可以請問一下是誰打來的嗎？如果重要的話，不要因爲我在這裏誤了事兒。」胡先生說。

「是那些審問我的幹部。」

「那你快去呀！那些人叫你去，你怎麼能不去呢？快點吧，我留在這裏等你。千萬記着，那些人卑鄙得很，你千萬不要惹火他們。」他看起來非常著急。

我很高興他要等我，因爲我很想知道他對文革以及最近的中央委員會有什麼意見。我離開家時剛過四點，當八點回到家時，胡先生還在，他從客廳迎出來，放心的笑了一下。

「很抱歉我去了那麼久。」

「坐下來休息。告訴我，事情怎麼樣？」

老趙端了杯熱茶給我，喝茶時，我告訴胡先生，那邊除了原來的兩個人之外，又多了一個好像上級的人物，或許，爲了給這個人一個強烈的印象，他們比先前更火，當我走進房間時，其中一位嚴厲的問：「你爲什麼不來？」

「我很忙。今天早上你應該先打電話來。」

「我們不是在辦酒席，我們是在調查，我們要跟你談話的時候，你就得馬上就到。」他冷笑道。「看看這張你的外國朋友的名單有多長！你怎麼會認識那麼多外國朋友？你一定是

個崇洋的女人。」他瞪著我，又繼續說：「你說他們對中國和中國人都很友善，有的人還是在這裏出生，在這裏渡過童年。你說他們心儀中國文化，也講中國話。可是，你知不知道他們的祖先是靠賣鴉片發財的。他們覇用我們的工廠、倉庫、船——每一樣東西，現在，他們什麼都沒了，對人民政府有好感？簡直騙鬼！不錯。國民黨在的時候大概是，現在可不啦！又說到那些外交官對中國有好感，這更可笑！那些外交官被他們的政府派到這裏來搜集情報、圖謀不軌，怎麼可能對我們友善？你往他們臉上貼金，也不能把他們變成慈眉善目的菩薩。他們是我們的敵人，但是，他們是你的朋友。現在，你的處境已經相當明顯了，是不是？」

「我不是刻意去結交這些人的。這些人是我先生在當外交官，或是在他負責外交部上海辦事處時認識的。」

「反動的國民黨政府在上海的外交部辦事處！你先生是反動的國民黨政府裏的資深官員，後來又成了外國資本公司的總裁！」他諷刺的說：「你先生的事業沒啥了不得的。」

「他做蜆殼上海分公司的總裁，是得到人民政府上海工商部的許可的，至於你說在國民政府裏當官的事，一九四九年他留在上海，而沒有跟隨國民政府到台灣去，這不是表現他支持共產革命而且歡迎人民政府的建立嗎？」

「他留下來也許另有原因。我們待會兒再處理他的案子。現在，我們要你揭穿英帝的眞面目，而且坦承你這位忠心特務爲蜆殼幹下的每一件事。」

「我爲蜆殼做的每一件事都符合人民政府的法律和規定。」我強調。

新來的那人不停的抽煙，房間裏瀰漫著一股低級煙草的臭味。這時，他把煙蒂丟在地上，用脚踩熄，狠狠的盯著我，然後首次開口：「你這一輩子，一直跟外國人往來，尤其是英國人。你敢講你從來沒有做錯或說錯任何事嗎？」

「不論我做錯或說錯什麼事，我確信我從沒有做出違背人民政府的事。」我堅定的說。

「那要由我們來判斷。至少你現在承認你可能做錯或說錯事。」他獰笑道。

「胡說！我不承認這種話。」

這個新來的人似乎比另外兩位更具城府，雖然他用平靜的聲音說話，而不大喊大叫，但我肯定他是在伺機行動，這時候他改變了話題：「把你們公司的活動扼要的說一下。」我簡短的敘述一下我們在公司的工作。我說完時，這個人說：「你剛剛告訴我們的和你寫的幾乎一模一樣。我相信你一定花功夫去背牢你寫的東西。爲什麼要這麼謹愼？」

「我說的跟我寫的一樣，是因爲事實就是這樣，不管你怎麼講。」我回答。這次的談話已經進行了很久。我想到胡先生在家等着，就看了看手錶。

「你急著要走麼？或許，你覺得這次的談話很不舒服？」這個人沾沾自喜的，爲了配合他的目的一直胡纏不已。

「我想你是在浪費你的時間。」我說。

「我們不怕浪費時間。我們很有耐心。共產黨雖無花了二十年的時間才推翻國民政府，但是最後還是勝利了，別忘了！我們一向是爲達目的不擇手段的。」

房裏一片死寂。事情鬧僵了，鬥爭大會上的那個人忽然又回到他以前的把戲，他大叫道

：「我們不會讓你得逞的！你必須交給我們一張你所做錯和說錯的事情清單，以表現你改變自己立場的眞誠。不然的話，後果會很嚴重。我們確定你是英國的間諜！」這是他第一次用「間諜」這個字眼，到目前爲止，他們祇有暗示而已。也許在那時，這個人超出了他們的暗示，因爲另外兩人訝異的看著他。

我嘲笑他們的突然發作，然後鎭靜的說：「你錯了，我跟你一樣都不是什麼間諜。」

新來的接口：「也許有一些事你說過或做過就忘了。你爲什麼不回家去想一想？不能怕麻煩！寫下每一件你說過跟做過的事！我們會給你充裕的時間，兩個禮拜可以吧？」

「兩年也一樣，我不想編故事。」我告訴他們。

「兩個禮拜，就這麼說定了，承認錯誤是很痛苦，但是，你一定要做。我們偉大的毛主席把自白比成手術，手術很痛苦，但是手術完成後，一個人會煥然一新。你要做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好國民，不是嗎？那麼你絕不能比別人落後。我們要你坦白，不是因爲我們不知道眞相，而是希望給你一次表現誠意的機會。」

我想告訴他他瘋了，但卻閉上嘴巴保持沈默，不希望延續這種無意義的對話。他把我的「沈默」當成「默認」，所以放我回去：「已經很晚了，回家去把我所說的想一想。兩個禮拜後我們會傳你。」我走出大樓，心裏燃燒著怒火。外頭一輛三輪車也沒有。在公車站等了老半天，我祇得走路回家。

胡先生靜靜的聽完我的事，老趙進來說晚飯好了，吃飯時，我們不談文革這種不愉快的話題，而談談彼此的兒女。我們都很高興也很驕傲我們的下一代在社會主義中國做得不錯，

雖然他們有家庭背景的困擾。回到客廳，我請教胡先生一個我在被審問時一直想的問題：「這些人讓我覺得即使是我揑造的自白，他們也會要。事情是這樣的嗎？」

「不錯！他們才不管那是那是不是眞的，那是他們的把戲。」

「爲什麼？如果每個人都給假自白，對他們又有什麼用？」我眞的不懂。

「他們的工作就是要得到自白。如果他們沒做到，就可能被指爲不支持運動。所以了，很多人在政治風暴中被鬥爭，做了許多自白。等動亂一結束，整頓工作後，有些處置錯誤的人可能會復職。」

「要多久才能復職呢？」

「也許一兩年。也許永遠都不會。每個機構裏有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的人必須被說成是『敵人』，因爲這是毛主席在一次演說中提到的百分比。」

「太可怕了！」我叫道。

「對，眞的很糟糕。根本沒有這麼多反對人民政府的人。爲了塡滿他們的名額，黨裏的幹部常常把眼中釘、那些不滿的人跟惹麻煩的人，列入敵人的名單中。不管壓力有多大，你絕不能做假自白。」胡先生愼重的說。他一直看著我，好像是要確定我眞的明白他的意思，又接著說：「那是我經歷多次政治運動時的心得，你知道，有時，當一個人瀕臨崩潰時，爲了滿足審問者和免除那種教人無法忍受的壓力，他會被迫寫下一些不實的事。黨裏的幹部永遠不會滿意這份口供。一旦一個人開始招供，他們就會要求你承認更多的罪，到最後，萬劫不復！我看過這種事發生在一些人身上。」胡先生一直採以客觀者的語氣道出，而不說「你

絕不可以」。

「我被說成是一個間諜，只因爲他們以爲我跟英國人很熟？」

「這祇是他們愚弄大衆的藉口。其實他們會攻擊每一個他們不信任的人，也許他們就認爲這是對付你的好時機。」胡先生起身告辭，並說只要我想跟他們討論事情時，隨時打個電話給他。最後，他勸我：「幾乎所有低階的共黨幹部都有自卑感。他們藉著羞辱我們，來肯定自己。你在被問話時，要得體。別弄火了他們。他們全是你惹不起的小人。」

「我不是那麼容易擺佈的！但還是謝謝你的忠告。我會記着。」我說。

胡先生又認命的說：「我已經加入工人階級。我的老工作被別人接了。我把辭職書交給書記時，我告訴他以前資本家的階級使我不合適做經理。」知道他現在在他自己的工廠裏當個普通工人使我嚇了大跳，他卻不以爲苦。「還不致於那麼糟。」他說：「在蘇聯，當共產黨接收後，幾乎所有的資本家都被槍斃了，而我還活着，我請書記派給我一份最不需要技術、最不起眼的工作，所以，現在我是個苦力，不是推原料桶就是運煤，沒有人會對一個做這種工作的人用心機。當我跟他要求做這種工作時，書記同志好像爲我感到很難過，我們以前一直處得很好。」

「你不是替書記做了所有的事嗎？」

「不錯，我花了大半輩子來建設這家工廠。一九三〇年開始起步時，我祇有幾個工人，一九五六年我把工廠交給政府時，有一千五百個工人，我們還爲年輕的技師設立了實驗室和訓練中心。」

「你爲什麼要做苦力呢？以你的學問和經驗，如果你一定要做工人，也可以做更有用的工作呀。」

他浢了個否定的手勢：「在這種時候，做個苦力也不差。我們苦力在工廠外頭工作，睡在倉庫裏。如果出了什麼錯，沒有人會指控我們毀損廠內的機器。在政治活動時每個人都神經兮兮的，以前是資本家的永遠列在嫌犯名單前面。」說完這些大道理後他告辭了。當他和我握手時，他說：「多保重自己，活得久些，說不定你能看到時局的變遷！」

後來的幾天風平浪靜，使我恢復了好心情。我女兒的生日是八月十八號。我決定爲她舉辦一次小小的晚宴來慶祝生日，同時驅散家中的鬱悶。我建議她邀請幾個朋友，然後，我打電話給我的老朋友李珍來參加。

當共黨軍隊向上海進軍時，蘇雷—李珍的丈夫，高聲歡呼宣佈一個誠實的政府和國家復興的新紀元要出現在中國了。他拒絕跟隨國民黨到台灣去，也勸他的朋友留下來，而且熱烈的歡迎共產黨的「接收」。一九五〇年在大學裏進行思想改造運動時，李珍丟了她在音樂學校鋼琴系主任的工作。蘇雷很訝異派來接替她的職位的黨員竟然看不懂樂譜。一九五三年還有一個更重大的抨擊，當時毛澤東發動反貪污與反賄賂的「三反五反」運動，針對上海的工業家以及像蘇雷這種曾經在國民政府的經濟部門裏服務的官員。儘管一切證據都證實他很忠心，蘇雷仍然成爲靶子。他被拘禁在他的辦公室裏，幹部輪流向他問話，還舉行鬥爭他的鬥爭大會。

像蘇雷這種人，不是一般的中國共產黨所能理解的，他們認爲渴望革命性的改變是窮人

和被壓迫的人才有的特權。但是因爲韓戰以及美國對中國的聯合抵制，人民政府急於跟香港發展貿易，蘇雷在英國殖民地的富親利用這個機會，直接跟北京方面談判，把他救了出來。當北京同意對他家的要求讓步時，上海當局別無選擇，祇好准許他帶著兩個小孩離開上海到香港。

李珍回到上海時，城裏食物嚴重的短缺，這是毛澤東在一九五八年發動大躍進造成空前經濟衰敗所遺留的後果。一大清早，人們就大擺長龍在上海公安局前面等候申請離國的出境許可。這種情況讓上海當局相當難堪，所以他們把李珍從富饒的香港回到挨餓的上海看成是宣傳的大好時機。我在地方報上看到李珍回來的消息。報紙通常祇報導高幹或外國高官的來訪—上海政府稱讚她是一位眞正的愛國人士，並任命她爲政治協商會議的代表，這個組織是由政府選出的藝術家、作家、宗教領袖、顯赫的工業家和國民黨以前的官員所組成的，它的功用在附合並表示支持當時的政策，爲其他背景相近的人樹立榜樣，還要協助建立共產政策受到社會各階層的普遍支持的假象。爲了回報，政府授予這個組織的會員一些特權，例如較好的住家，與能使用一家不受配給票限制的特級餐廳。

雖然共黨幹部常談論一個人的品德，但是他們總是因一個人的利用價値給予獎勵，而不是因爲他的品德。李珍加入政治協商會議六年半，中國遭遇到嚴重的經濟困境和食物缺乏，現在，這些都是過去的事了，李珍對共黨當局已經沒有利用價値了，況且，黨喜歡人民卑躬屈膝和稱讚政策，李珍兩者都不會。事實上，她告訴我說她覺得參加會議非常無聊，每當別人希望她對毛的音樂及教育政策表達敬意時，她都保持沈默。她對分派到政治協商會議的職

務缺乏熱情，使高級幹部們非常憤怒。

八月十八日清晨我起床後，陳媽已經不在屋子裏。她是個虔誠的佛教徒，每年今天她都會到清安寺去替梅萍祈福，她以爲我這個基督徒可能會不贊成到廟裏拜拜，總是一早溜出去，偷偷回來，而我也假裝不知道這件事。這天我在餐廳裏插花時，她回來了，我聽到她在廚房裏生氣的跟廚子講話，當她走進客廳時，我看到她用手帕在擦眼睛。

「發生什麼事了，陳媽？」她靜靜的走到我這兒。「廟裏發生什麼事了？」我問她。她坐在椅子上就哭了出來。「他們在拆廟。」她邊哭邊說。

「誰在拆廟？一定不是政府吧！」

「年輕人，大概是學生，他們說毛主席告訴他們要禁止迷信；他們又說和尚是反毛主席的反革命分子。」

「和尚做了些什麼？」我問。

「什麼也沒有。學生把他們包圍起來，有的和尚還被打，我到那兒時，看到他們倒在院子裏的地上，有一大群人看熱鬧，有一個人告訴我學生們要拆廟，還要燒佛經，就像他們在別地方做的一樣，我眞的看到有些學生爬上屋頂把瓦片扔下來。」

這時廚子走進來埋怨說一些舞會要用的食物根本買不到。他接著說在菜市場的時候，他跟其他的廚子因爲替富有人家工作而受到嘲笑。

「我想他們是不喜歡看到你買了那麼多他們買不起的東西，不要爲這個煩心。至於舞會，用你在市場買得到的東西就行了。我相信你能爲梅萍的生日做出一頓好菜。」我說。

六點時，李珍到了。雪白的頭髮和寧靜的微笑，使她具有學術大師的風範，安靜又高貴。祇有我這種老朋友才知道在她平靜的外表下有著如此豐富的感情，一般人無動於衷的事都會使她沮喪或興奮。老趙替我們端上冰茶後，我問她：「你在學校裏還好吧？」

「不好。」她難過的說。「所有的課都停了。我們得把全部的時間都投入文革。每個人都要寫大字報，我們教授也得寫自我批判，唸別人罵我們的大字報。」

「很多人反對你嗎？」我焦急的問。

「反對教授的大字報寫得比別人都多。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比別的教授多，不過到目前爲止，沒有安排鬥爭我的鬥爭大會。我的個人歷史相當簡單，除了在音樂學校教書之外，我從沒有做過別的工作。」

「你想會不會有事？」

「我又沒有反對過共產黨，我完全與政治無關，從音樂學校畢業後，我到英國留學，回國後，我又回到音樂學校教書。我的事黨沒有不知道的。我想我應該沒事，但是我不知道以後會怎麼樣，這次的政治活動好像跟以前有些不太一樣。」

「有什麼不同？」

「高幹的態度。以往的政治運動，他們都很有自信，他們做事大膽，充滿信心，這一次，不知在提防什麼，他們祇攻擊已經被貶的人，我想可能是他們不想擴大攻擊範圍。也許在毛澤東的大躍進失敗後，高級幹部不再相信靠政治運動會得到什麼進步。」

「大字報是怎麼罵你的？」

「還不是批評我在英國受教育、把小孩送到澳洲，還有我的教學方法。當我們跟蘇聯親善時，人家催我們教西方音樂和訓練學生學習國際作品，但我們跟蘇聯絕裂後，毛主席開始批評西方音樂。我們祇能教中國作品，我花了一半的時間去找教學材料，要繼續當老師已經夠難了，現在學生又跟我作對。你知道嗎？他們有人背地裏告訴我他們必須寫反對我的標語來保護他們自己。」

「別在意吧。不要讓它傷害你！那些可憐的年輕人是被逼的。」

「我感到很難過。我這一輩子好像都白過了。」李珍嘆了口氣。

「不要灰心！一九五八年大躍進的時候，梅萍學校裏資產階級家庭出身的學生全部得批判他們的家庭背景，我告訴她不要怕，儘管去批評我，她做了，老師和她的同學都爲她鼓掌。這祇是一種形式。不過是演戲罷了。」

「我恐怕不能像你一樣的一笑置之。」李珍說。

「太不公平了！政治協商會議代表的這種身份有沒有給你一點保障？」我問她。

「我聽說毛的黨羽要廢除那個機構。他們說它是蘿蔔組織，外紅內白。他們說所有的代表講起話來好像是在支持黨，其實是在反對黨。」

「眞的嗎？」

「誰知道？說眞心話的處罰太嚴厲了，沒有人知道別人心裏在想些什麼。」

我很同意她的話。事實上，在中共住了那麼多年，我瞭解到允許言論自由的民主政府的優勢之一是政府知道誰支持它，誰反對它，而專制政府反倒不知道人民眞的在想些什麼。

「眞洩氣！有時想自己再也支持不下去了。」李珍說。

「爲什麼你不要求退休呢？很多人爲了避開，而在六十歲以前退休，寧可少拿些退休金。」

「等文革結束後，我也許會這樣做。」

我女兒帶著四個年輕朋友回來了：孔，電影工作坊一個英俊的男演員，他爸爸是三〇年代很有名的電影導演；市立管弦樂團裏一位姓張的小提琴家；孫凱，技術學院的數學老師，也是梅萍要好的男朋友；還有我的教女何安，她是梅萍童年在澳洲的朋友。他們對音樂都很有興趣，經常聚在我家聽唱片。

李珍和我走進花園，小提琴協奏曲動人的樂聲從窗戶傳了出來，我深深的坐進椅子裏，看著夏夜的星光。

「也許你不該從香港回來。」我說。

「當時，那似乎是最值得的事。我非常喜愛音樂學校，你是知道的，我在那裏受訓也在那裏工作，除了孩子之外，它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東西，很多我的同事是當年一塊上課的同學，他們都寫信給我，學生也寫信給我，黨書記也寫信給我，每個人都說學校需要我，所以我就回來了。」

「蘇雷的家人對你希望回來這件事有什麼表示？」

「蘇雷死後，他們對我不太關心，現在多半都定居在澳洲。他們的家庭傳統嚴謹，叔伯們認爲蘇雷的小孩應該跟家裏住，而不該跟我。當然，如果我不能靠自己賺錢維生，他們會

照顧我，但是，我總覺得有點兒寄人籬下的味道。」

李珍最後幾個字忽然被街上傳來的鼓聲和歌聲所淹沒。老趙走進花園說：「有一列學生的遊行隊伍經過我們屋前。」

年輕人來到外頭，孔站在陽台上說：「可能是紅衞兵，幾天以前，江青在北京大禮堂接見他們的代表，看來，毛主席滿贊成紅衞兵的。」

「是誰發起組織他們的？我從沒聽過叫紅衞兵的組織。」我問。

「是文革的新產物，我聽說是受到江青的鼓勵。有人跟我說，她悄悄組織清華中學的一些學生，然後假裝這是學生一時的念頭。因爲她是毛主席的愛人，當然順理成章啦，現在，她以主席代表的身份，正式承認紅衞兵。」孔說。

第二天，我在報上看到在八月十八日毛澤東檢閱北京紅衞兵第一分隊。第一版上有一大張照片是毛穿著人民解放軍軍官的卡其制服，戴著一枚紅色臂章，上面有他親筆寫的「紅衞兵」三個字。在天安門廣場的陽台上，他微笑著揮手，接受聚集在下面的年輕人如雷的喝采。他給紅衞兵的特殊任務：把文革的火炬傳到中國遠方的角落，並且貫徹革命目標，全中國的年輕人把這任務當成動員令，早期的文化大革命，公佈的靶子衹有「資產階級」，紅衞兵就把他們的攻擊集中在這些人身上。

那天晚上，一群又一群的年輕學生不斷的通過我家，又打鼓、又唱歌、又呼口號的。梅萍和她的朋友走出來看遊行；李珍和我則回到書房。街上的吵鬧弄得我們講不成話。注意聽時，好像聽到紅衞兵叫嚷的口號中有一句「保護毛主席」。梅萍一個人走進來，她跟我們說

學生舉著毛的畫像大喊「保護毛主席」或者「我們要以我們的生命保護毛主席。」

「誰會去威脅他呢？」我問。我們都想不出答案。因爲在他經過神化的崇高地位上，他幾乎超出了凡人所能觸及的範圍。李珍、梅萍和我站在書房裏無言的覷著對方。我們非常害怕，因爲中國的每個人，包括我們在內，都受到毛反覆無常的擺佈。

「我送李阿姨回家。」梅萍說：「街道被遊行的人阻塞得沒法子讓車子走。」李珍和我互道晚安後跟梅萍走了，梅萍推著脚踏車走在她旁邊。我站在那裏看著他們，直到遊行的年輕人擋住我的視線。

那是我最後一次看到我親愛的老朋友。一個月後，她在鬥爭大會上受到羞辱後，自戕了。當時紅衞兵把一根離地四呎的柱子橫在音樂學校的大門上，命她從下面爬過去，爲的只是因爲她在英國受教育，所以她是「英帝國主義的走狗」，接著又舉行鬥爭大會要她招認她「喜愛西方音樂」。第二天，人家發現她死了，坐在鋼琴前，瓦斯是開著的。她留下的遺言祇有一句話：「我爲學生盡了全力」。

僕人們都去休息了，我獨自在樓下等女兒回來。她回來後，我們一塊兒沈默的步上樓梯。在樓梯口，她擁著我，跟我道晚安。我有許多話想跟她說，一些關愛與保證的話，但是一種莫名的悲哀和恐懼感使我說不出話來。

我的心裏祇有兩個人。一個已經死了，活著的那一個生命正要綻放。「好好照顧自己跟梅萍，我很難過這麼快就得離開你們。」我還能聽到我先生以微弱的聲音說出這些話之後，陷入一陣昏睡，從此再也沒醒過來。

在古老的中國，死了丈夫的女人也失去他們的身份，她們不再屬於常人之列，而成了鄰居嘲諷的對象。雖然人民政府在一九五二年通過的新婚姻法保障一般的婦女，也禁止歧視，但對寡婦和老處女的偏見還是存在。中國社會對獨立又自力更生的女人十分不齒。

當我開始在蜆殼分公司工作時，資深的中國職員不滿一個沒有管理經驗的女人要來管他們。我必須一再的證明我自己以贏得他們的尊敬和信賴。這輩子，再也沒有比文化大革命更教我疑惑的了。我知道當一位中國同胞被任命爲外國公司的高級職員時，必須要上海市政府的工商部同意才行，公安局既有每個人的個人檔案，政府應該知道有關我的每件事，不該沒有正當的理由忽然來指控我。溫妮、李珍和胡先生也都認爲我可能會成爲迫害的目標，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祇有堅持不肯寫假自白，因爲我知道那樣必然會導致我和高級幹部之間的衝突，這種衝突的下場會是什麼呢？會不會影響我女兒的生命。

在毛澤東檢閱紅衛兵北京第一分隊，並且祝福他們之後幾天內，上海紅衛兵佔領了街道。報紙宣佈紅衛兵的任務是要破中國的「四舊」——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和舊思想。「舊」並沒有明確的定義，全由紅衛兵來決定。首先，他們把街名改了。紅衛兵還辯論是否要改變交通號誌系統，因爲他們認爲紅應該表示前進和不停止，所以當時，交通號誌就停止使用了。

他們搗毀花店和古董店，因爲他們說祇有富人才有餘力花在這種無聊的事上。其他的商店也都被勒索，他們認爲違反或不適合社會主義社會的貨物就該砸壞或充公。他們的標準非常嚴格，像他們覺得社會主義的人不應該坐沙發，所有的沙發就成了禁品。其他如彈簧墊，

蠶絲、天鵝絨，化粧品和印有西方商標的衣服，全被扔到大街上等著載走或燒掉。自從紅衛兵把展示在商品櫥窗中的東西掏空後，毛的畫像就擺在那裏。走到購物區，讓人不僅會對成排店名一樣的商店感到迷惑，也會有一種被上百張毛的臉監視的可怕感覺。

白天，僕人向我報告紅衛兵這些教人無法置信的行爲。我很好奇，決定自己冒險出去看看。街上永遠都有活動，到處都有紅衛兵，也有許多懶散的觀衆。在文革時代，資產階級才是敵人，所以大部分的人都覺得很安全。對他們而言，紅衛兵的舉動很有意思，街上遊蕩看熱鬧的人絡繹不絕。

成群的紅衛兵向路人解釋文革的目的。我聽了一會兒，很奇怪也很驚訝的聽到紅衛兵告訴人們可藉文革而獲得釋放。一九四九年共產黨接收中國以後，人民不是就已經被解放了嗎？是不是那次解放不夠好，所以人民還得再被解放一次？在我聽起來，共產黨好像在做自我批判，但那不是太荒謬了？

另外一些紅衛兵擋住公車，散發傳單，向乘客演講，並懲罰穿著「不當」的人。大部分的自行車把手上都吊著毛語錄，沒這麼做的騎士被攔下來，還被警告一番。街道上，紅衛兵領導人們呼口號。一群群紅衛兵都高舉著毛的巨幅畫像，同時擊鼓唱歌。在許多街角，擴音機不時播放著革命歌曲。穿著舊襯衫和寬長褲，無產階級的模樣使我混在人群裏並沒有引起特別的注意。我直直的走向銀行的方向，忽然間，我驚訝的看到正前方的紅衛兵抓住一個漂亮的年輕女人。一個人抓住她，另一位脫掉她的鞋子，第三位把她的褲腳割開。紅衛兵叫道，「你爲什麼穿尖頭的鞋子？你爲什麼穿窄褲腳的長褲。」

「我是個工人！我不是資產階級分子！放我走！」這個女孩掙扎著抗議。掙扎時，紅衞兵把她的長褲整個脫了。圍觀的人深覺有趣，路人又笑又駡的。一個紅衞兵打了她一巴掌令她不准再掙扎。她坐在地上，臉埋在手裏，啜泣着說：「我不是資產階級！」一個紅衞兵打開她的手提袋，拿出她的工作通行證來檢查，然後他們把她的通行證和長褲丟給她，她趕緊套上長褲，也不等他們把鞋子還給她，便穿著襪子跑開了。

幾乎是同時，同一個紅衞兵抓住一個年輕人，大叫：「你頭髮爲什麼抹油？」

在我離開家以前，我已經想過要領出多少現金。這兩個到期的存款分別是六千元和兩萬元。在中國的生活費和薪水一樣低。在一九六六年，六千元是一大筆錢，兩萬元就是一筆小財富了。銀行是政府的部門之一，在政治運動期間，出納員有權拒付存款人大筆金額，即使存款已經到期了。有時他們會要求存款人工作處的同意書來證明提款的理由。爲了避免提款遭到拒絕，我決定領出金額較少的六千元，把兩萬元再存入一年。出納員不說一字，把錢拿給我，我還沒數完這些鈔票時，她就開始打毛衣。

當我再一次步上太陽烘烤的街道時，開始後悔自己太膽小、不敢領出較大筆的錢，同時也慶幸自己沒有遇到困難。我向家走去，轉到街角時，差點被一群激動的紅衞兵撞倒，他們用一段長繩拖著一個老人，大喊大叫外還用根棍子打這個可憐人。我趕緊向後退，靠在牆上讓他們通過。突然間，這個老人倒在地上好像累得走不動了。他的襯衫被撕破了，幾綹白髮蓋在半閉的眼上。紅衞兵扯著繩子，他還是不起來時，他們就踩在他身上，老人痛苦的呻吟。「齷齪的資本家！工人的壓榨者！你該死！」紅衞兵大叫。

離開忙碌的購物區眞教人鬆了口氣。住宅區安靜多了。當我走進自家街道時，我看到家門前有一大群人。他們正在看貼在對街鄰居大門上的大字報。這家原屬瑞士的公司，在幾年前被人民政府接收了。住在裏面的人仍是現在上海鋁公司的總工程師，工廠的工人在他家大門上貼標語罵他是瑞士帝國主義的走狗。海報旁邊還有一張小孩的筆跡，那是我那可憐鄰居的兩個小孩的簽名，他們已經加入抨擊他們的父親，並發誓跟他脫離關係。這張由十一歲和十歲的小孩寫下的逆倫標語是人們圍觀的理由。老趙替我開門時，我問他有關這張海報的事。老趙告訴我鄰居的佣人跟他講那是他們爸爸的主意，以免他們遭到迫害。

日以繼夜，城裏鼓聲和歌聲響徹雲霄。全城裏掠奪和搜家的消息由不同的來源傳到我這裏。我想用電話聯絡胡先生都不成功，我也找不到其他的朋友，紅衞兵的暴行似乎已經擴大了。我聽說許多人被羞辱、恐嚇，而且經常在抵抗時被殺。報上的文章以及主要幹部的言論都鼓勵紅衞兵，並祝賀他們的蠻橫。他們被說成是無產階級革命眞正的繼承人，人家還勸他們不要害怕，要克服困難、瓦解舊世界，建立以毛教條爲根本的新世界。

爲了照料僕人，我決定在紅衞兵到家裏來之前，立刻把我從銀行裏領來的六千元給他們。開始時，他們拒絕收下這筆錢，一直說要留下來照顧我和梅萍。他們也建議把我的首飾跟有價值的東西藏到他們家裏。爲了不牽累他們，我拒絕了，我把陳媽、老趙跟廚子叫到書房裏，跟他們討論怎樣把錢分給他們三個。因爲園丁不是全天候雇員，偶爾才來一次，我決定祇給他四百元。陳媽說她不要多，因爲她說：「他們還有老婆孩子！」

我告訴僕人，如果他們害怕的話，他們隨時都可以離開。等文革結束後，如果我經濟許

可，我會另外給他們錢的，因爲他們已經跟了我很久了。
辦完這件事以後，我等著紅衞兵的到來。

第三章　紅衛兵

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展開之際，有關政治思想改革的夜間會議經常在各機構裡召開，八月三十日晚上，紅衛兵前來劫掠時，我女兒就正在她的影片攝影場參加這類會議。那時，我正獨自在家裏讀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那是倫敦一家書店寄來最後一批書裏頭的一本。）這些年來，我一直在蜆殼石油公司上班，因此我打算讓這家書店寄來的包裹送到公司裡—因為上海的書刊檢查員通常不會檢查送到機關行號的書籍，而且，由於政府當局正好接到大量的科學性文學作品，準備發送到各個機構去，所以我的小包裹沒太引起注意。

房裏出奇的安靜。一如平日，我知道老趙就坐在窗口，陳媽在她自己房裡，可能張著兩眼躺在床上，房裡沒半點聲音，彷彿所有東西都正屏氣、無望的等著毀滅。

我書房的窗子敞著，花園裡玉蘭花清冽的香氣和晚風中夾雜的溼意和涼沁，瀰漫了整個花園，暗示秋的訊息。街頭上，重機車「噠！噠！」的聲響由遠而近，我豎著耳朵傾聽，等待它快離開，但這機車竟然慢下來，最後還停住了，我知道左鄰正等待紅衛兵的到來，於是把書擱在膝上，慢慢坐起身來細聽，想知道究竟是那一家將要淪為被批鬥的對象。

突然，門鈴聲大作，立刻有許多憤怒的拳頭不停的打在門上，且伴隨著歇斯底里的叫吼聲。這嘈雜的聲音告訴我，等待的時間已然過去，現在我必須面臨紅衞兵及抄家的威脅。老趙上氣不接下氣的跑上樓，雖然他早知道紅衞兵會來，並且和我一樣一直等待，而此刻他的臉仍不免慘白一片。

「他們來了！」他顫抖的聲音裡夾雜著恐怖。

「老趙，冷靜一下，快開門，不要多說話，帶陳媽到你房間待著。」我吩咐他。

老趙的房間在停車場的另一頭。我不希望他們兩個在這裡爲了忠心而說些激怒紅衞兵的話。

外面的囂嚷聲愈來愈大。「開門！快開門！你們都死光了嗎！爲什麼不來開門？」我聽到有些人邊踢門邊咒罵著。

老趙奔下樓，我起身將書放回書架，這時我拿著醒目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抓起桌上早預備好的一把鑰匙，也跟著下樓。

這一刻可能發生的各種狀況，雖然我已想像過無數次但仍心驚膽跳，幸而多年的歷鍊讓我看來很冷靜，當跨下最後一層階梯時，我已決定承受一切命運的安排。

就在這時候，紅衞兵撞開門闖了進來。大約有三、四十個年紀在十五到二十歲之間的高中生，由兩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帶領衝進來，這三個人顯然比這群高中生大許多，雖然穿著紅衞兵制服，不過我想可能是這群學生的老師。在他們湧進大廳時，其中有個人打落了高脚凳上的一盒茉莉，輕柔的小白花散落滿地，繼而被一雙雙浮躁雜亂的脚蹂躪得慘不忍睹。

這群紅衛兵的領頭是個看起來很凶暴的青年，他張著一雙怒目走向前來對我吼：「我們是紅衛兵，今天要對你採取革命行動！」

雖然我知道現在做任何努力都將白費，但仍高舉著那本「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以平靜的口吻說：「沒有搜查證擅自闖入民宅是違憲的！」

領頭的紅衛兵一把搶過那本書，將它狠狠的摔在地上，瞪著那對噴火的眼睛道：「這本憲法已經廢除了，這是黨內的修正主義者所寫的文件，而我們只服從偉大的領袖—毛主席的指示。」

「只有『人民代表大會』有權力修改憲法。」我說。

「就算我們廢除它！你能怎樣？」他兩腿張開，擺出一副攻擊姿態。

一個女孩走上前來說：「你到底還有什麼把戲？還是快投降吧！這是你唯一能做的，否則只有多受痛苦。」邊說邊在我鼻子前揮舞拳頭。

後壁有一個黑櫃，上面好好的掛著一面鏡子，但另一個年輕的紅衛兵卻毫無理性的拿起棍子猛力一擊，鏡子的碎片紛紛掉落在櫃上那個康熙年代的花瓶裡，這下牆上只剩下鏤花鏡框光禿禿的掛在鈎子上。接著他又拆掉鏡框向欄杆擲去，隨即，從另一個紅衛兵手上接過一個小黑板掛了上去，上面有一段毛語錄：「帶著槍的敵人雖被殲滅，那些沒有槍的敵人卻仍存在，我們不能忽視這些敵人。」

這些紅衛兵大聲唸這段語錄，愼重如宣誓般，後來，他們也叫我讀它，其中一個對我叱道：「沒有槍的敵人就是你！把鑰匙交出來！」

我把鑰匙擺在櫃子上，其中一位紅衛兵拾起它，接著所有人分散到屋內各個角落去，一個女孩把我推進飯廳並且反鎖。

我坐在飯桌旁，仔細端詳着飯廳，我知道過了今晚，它將面貌不復，奇怪的是，以前竟從不曾發現它是這麼漂亮。黑木桌較往日更亮麗，象牙色亮漆屏風佇立在飯廳一角，誇示著十分精巧的手藝，珍奇的瓷器也都妥貼的擺在黑木架上，展現它們無與倫比的美，甚至帘子也都比平日順眼，看來沒有一絲褶痕。玻璃橱櫃裡有幾樣白瓷，一只玫瑰色的香爐，和一些我平日收集的奇石、飾品，這些都經過手藝嫻熟的藝術家精心雕刻，而今却要和它們告別。聽說畫家林風眠也成了壞分子，我想牆上他那張「憂鬱的女人」也將逃不過無情的摧殘，同理，另一張齊白石的水墨畫會是怎樣的下場呢？他是個具備傳統風格的偉大藝術家，因爲早年做過木匠，所以受到共產黨的大力褒揚，而現在紅衛兵會放過他的畫嗎？我凝視著一幅寫蓮的珍品。蓮象徵純潔，一直是中國藝術家最愛取用的題材，周敦頤在他有名的「愛蓮說」中就曾以蓮比做君子，而有「蓮花出淤泥而不染」的名句。

我不斷吟誦著，心裡却產生疑問，難道眞有人不爲污濁的環境所玷染？這和馬克斯「環境塑造人類論」的主張實是大相逕庭！這時，我聽到外邊傳來紅衛兵的笑聲，突然爲周敦頤感到悲哀，這些人似乎爲其破壞工作興奮不已，自信正在爲心目中的上帝—毛澤東—效命，他們的言行正是共產社會教育下的成果，但教育阻斷了他們能自由思想的機會。

樓上一陣碰撞聲打斷了沉思，我可以聽到他們在外面走動和玻璃破裂的聲音，這些聲音愈來愈響，這幫傢伙似乎不僅搶掠財物，簡直要拆了我們的房子似的。我害怕極了，決心非

遠離這個房間不可。

我在門上敲了敲，但是外面吵得天翻地覆，沒人能聽到我的敲門聲，再度用力捶了幾下，直到外面傳來脚步聲，我忍不住的大喊：「開門呀！」

把手轉動了，接著露出一條門縫，一個紮著馬尾的女紅衞兵探進頭來問我要幹什麼，我告訴她我想上洗手間，一再承諾我不會妨礙他們的行動之後，她終於答應放我出去。

那些紅衞兵把我父親那些裝書籍和筆記的大箱子全都從貯藏室裡翻了出來，而且試著用鉗子扳開它們，經過畫室的時候，我看到一個女孩站在梯子上拆窗簾。畫室中央併著兩張桌子，上面堆滿著紅衞兵們從各個房間裡搜出來的相機、時鐘、手錶和望眼鏡，這些就是他們準備獻給國家的「禮物」。

一上樓，我幾乎傻了眼，幾個紅衞兵把我平素收集的瓷器統統翻出來，其中一個年紀較輕的還將一組康熙年代的酒杯排在地上，竟然還踩在上面！當我趕到時，剛好聽到瓷器破裂的『咔嗜』聲，那聲音和矛戟一般尖銳的刺進了我的心臟。看見他舉起脚準備碾碎另一只杯子，我毫不猶豫的衝上前去擋住他的脚，只見他身體向前一傾，和我倒成一堆，我急着探視其他酒杯有沒有被他壓碎了，因此沒注意到他早已站起身，一脚踢向我的臉頰。當下，我痛得叫出聲來，而其他的紅衞兵却包圍過來，憤怒的對我吼叫。那群人中的女老師站出來維持了一下秩序，然後一把拉起我說：「你在做什麼？你是不是還妄想保護你的財產？」

「想要什麼，你儘管拿去好了，但是請千萬不要毀壞這些瓷器。它們都是古董，都是無價之寶。」我的臉頰不時因痛而抽搐著，這幾句話說得十分困難。

「閉嘴！」他們譁然的吼聲淹沒了我微弱的請求。

「偉大的毛主席說過：『呈現事實，陳述理由』。」我聲嘶力竭的喊。

女老師舉手示靜：「我們會給你機會呈現事實，陳述理由的。」此刻，所有的紅衛兵都凝視著我。

拿起一個酒杯放在手掌上，我語重心長的告訴他們：「這只酒杯大約有三百年的歷史了。你們却只喜歡那些照相機、手錶，難道不知道每年都會有更多、更好的被製造出來，却再沒有一個人能做出這樣的酒杯嗎？這是中國文化的遺產，每一個中國人都該以它爲榮。」

那個踢我的青年激憤的走向前說：「住嘴！這些東西都是舊文化，它們只不過是封建帝王和現代資產階級無用的玩物，怎麼比得上實用的相機、望遠鏡？毛主席指示：『沒有破壞，就沒有建設。』，舊文化應該被揚棄，爲新的社會主義文化舖路。」

「文化大革命的意思就是要消滅舊文化，你不能阻止我們！」另一個紅衛兵也振振有辭的說。

當我正急著搜索一些足以服衆的言論，來停止這次無意義的破壞行動時，卻看到另一位青年拿著一尊觀音雕像下樓。我驚惶的叫住他：「你要做什麼？」

他把觀音拿在空中揮舞說：「迷信，我要把它丟到垃圾桶裡！」

這是明代福建名家的雕刻作品，它的美是難以言喩的，精巧的乳白身軀、栩栩如生的面部表情，以及自然飄動的長衫……，平時我都小心的將它收藏在一個印花盒子裡，僅在某些見聞廣博的朋友來訪時，才應他們的要求拿出來展示。

「不，求你不要這樣！」我的聲音因激動而顫抖。

他無視於我的哀求，將佛像夾在兩指之間繼續揮舞。

我告訴自己，利用外交手腕的時候到了，否則讓紅衛兵覺得我一味牴觸他們，那怎這尊佛像勢必會保不住，其實，這尊佛像我早不視爲己有，更不在乎它今後落入誰人之手，只求它不被毀壞就行了。

「請相信我，我並不是反對，你們今天代表偉大的毛主席來這裡，我怎麼會反對呢！我知道文革的目的，你們看，我不是心甘情願的奉上鑰匙了嗎？」我說。

「這倒是眞的。」女教師點點頭，其他人靠攏過來，怒氣似乎平息了一點。

受到鼓舞，我繼續說：「這些舊東西的確該被淘汰，但並不一定得馬上破壞。你別忘了，這些並不是資產階級的產物，而是前人心血的結晶，你們難道不該尊重前人的成就嗎？」

站在人群後面的一個紅衛兵不耐煩的喊道：「不要被她騙了，她是想混淆我們、保護她的財產。」

我立刻轉向他：「不，你們今天來，已經讓我對社會主義有了一層的認識。我知道保有私產是不對的，它們應該爲人民所共享，我希望你們能將這些東西送到上海博物館，你們可以詢問裡面的專家，如果他們建議弄壞這些東西，你們再做也不遲。」

「上海博物館已經關門了，專家們也正在接受調查。反正他們都是知識份子。毛主席說：『資產階級是皮，知識份子是皮上的毛，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現在我們要打倒資產階級，自然，知識分子也要一起打倒。」一個女孩子振振有辭的說。

「那你們可以去問一個你們可以信賴，而且有權勢的人，如上海副市長之類的。」我說。

「你這愚蠢的階級敵人！你要我們去問其他階級的敵人嗎？還是政府中修正主義的幹部？告訴你，我們的一切行爲只遵循這本書。」說著，那青年從口袋裡拿出一本「毛語錄」：「只有毛主席的指示才是最正確而有效的方針。」

「我曾經看過一張告示上寫著『無產階級世界革命萬歲』你們會將毛主席偉大的紅旗遍佈整個世界，對吧？」我說。

「當然！不過這和你有什麼關係？」她輕蔑道，然後轉向其他人提出警告：「她是一個狡猾的女人，不要聽她瞎扯！」

我開始絕望了：「你們是不相信它們眞的有價值？在香港，這些瓷器很值錢。你們還可以拿這筆錢去支持無產階級世界革命運動呢！」

他們開始對我的話發生興趣了，現在我唯一的機會就是「利誘」，特別是當他們都正沉醉在權勢幻想中時。

「你們可以把這些瓷器賣給博物館或送給他們，以毛主席的訓示爲原則，你們愛怎麼做，就怎麼做！」

「你確定這些都是值錢的東西嗎？那它們大概值多少錢呢？」年長的女教師問。

「它們的價值每個月都在上漲，尤其在國際市場上，粗略的估計，它們至少值一百萬人民幣以上。」

雖然無產階級鄙視資產，但對錢却相當有概念。當他們聽到「一百萬」時，都不由自主的動容。我看見那女老師焦急神情，就跟我要保護那些財寶的情形一樣。

「各位革命伙伴，我們還是回去開會討論一下再決定吧！」女老師說。其他人同意後，就由她帶領下樓到飯廳去。

我蹲下拾起其餘保全的酒杯放回盒裡去。桌上還留著那尊觀音，我拿起盒子跑到三樓平日收藏古玩的櫃子前，才發現所有的盒子都被掏出來，所有的努力全泡湯了，地上散佈著各色各樣瓷器和酒瓶的碎片，我的心忍不住下沉。

三樓所有的房間一片零亂，像剛經過地震肆虐（只差沒有屍體而已）。白色床單染上破玻璃瓶裡濺出的紅酒，看來像血般令人怵目驚心，麪粉、糖和其他食物灑在一疊疊他們從櫃子、抽屜裡翻出來的衣物上，我的幾件皮衣和晚禮服也都挨了剪刀，衞生紙更是滿地狼籍。

所有家具很明顯的都被動過了。桌椅橫七豎八的歪躺在地上，地毯上則灑滿了樟腦粉，一只背包裡塞了我的羊毛背心和內衣，似乎是某位紅衞兵動過竊念，想據爲己有。

客房裡一架收音機停在專門播放政策性革命歌曲的頻道上，一個女聲高唱著：「馬克斯主義可以用一句話歸結：『造反有理。』」她的聲音裡有種強迫聽衆注意的磁性，我想關掉，却又無力越過這片狼籍踱到那裏。

茫然瞪著這片淒愴的景象，雖然不能預見未來，却也不願回顧過去，我想：那些紅衞兵今晚一定會帶著狡黠的微笑入夢，是不是人類與生俱來都有破壞的本性呢？如果我還年輕，

也從小被教導去接受毛澤東思想，是不是也會與這些紅衛兵一樣？

我覺得好疲倦，臉頰因痛而抽搐，我得找個地方躺一下，於是回到二樓自己的臥室，結果發現它和三樓一樣的零亂，紅衛兵還在飯廳討論如何處置我的古瓷，所以我也不能動手收拾任何東西。轉而走進我女兒的房間，竟慶幸的發現它並沒被翻過，微風從敞開的窗口輕輕拂動著紗幔，從窗口望下去，我看到花園草地中央有團跳動的火焰，紅衛兵們正圍著它，漫不經心的將我的書一本本的丟進火堆裡。我的心頭猛然一緊，轉身閉上眼睛，如果不是有窗戶讓我倚著，我會倒下去！試圖拋開這幾個小時內發生的一切，我極力平靜自己紛亂的心。

突然，一個女紅衛兵出現在門口，並扭亮電灯：「你在這做什麼？誰叫你到這裡來的？是不是又在動什麼歪腦筋？」一連串的問題像連珠炮似的，沒等我回答她又喊道：「跟我來！」

我跟著她到了書房，看見幾位紅衛兵聚集在我的書桌旁。椅子上坐了個短髮、瘦小女孩，她身上那件褪色的藍色棉質上衣大得可笑。在一個以食物作酬傭的社會裡，那些只靠政府撥下的糧食過活，而不和黑市打交道的人，通常會有這麼一張饑困的面孔，而她就是其中的一個。我一進門時，其他人立刻緘口，那女孩則垂着頭坐在那兒，看來剛經過審問。

「拖把椅子過來坐下！」站在那女孩旁邊的男老師對我說。

我被命令隔著書桌坐在女孩對面。當坐下去時，那女孩抬起頭來，迅速的向我報以緊張的一瞥，眼神中夾雜著恐懼與哀求，書桌上放了我的珠寶盒，上面散置著一些首飾。

「這些都是你的嗎？是不是全都在這兒？」男老師問。

我看了一下，發覺少了一枚戒指、項鍊、和鑲鑽的手錶。

「是不是都在這兒？」那男老師又問了一次。「說實話，我們還會問你的下人！你是不是藏起了一部份？有些資產階級家庭會把珠寶藏在花園的花叢底下。」

現在是個緊張的時刻，我明白是他們懷疑這女孩子趁人不注意偷了一些珠寶——而事實也正是如此。假如爲了護她而說謊，一旦查出來，我就會惹上大麻煩，在别無選擇之下，我只有照實說了。但是看到那女孩可憐的神情，我又實在不忍陷她於罪。

「貴重的都在。只有幾樣首飾不見了，不過都是些不值錢的。」我試著去紓解這女孩的險境。

「丢了些什麼？」男老師不耐煩的問。

「一隻手錶和幾枚戒指、金項鍊。」

「什麼樣的手錶？這個像不像？」男老師伸出胳臂，讓我看他手腕上那只瑞士錶。在大陸，那是種地位的象徵。他以爲我像其他中國婦女一樣，喜歡買男士用品以顯示男女地位的平等。只可惜我並不趕「時髦」。

「不，我的錶比較小，上面鑲了鑽，是 Ebel 出品的法國錶。」

「希望你沒有說謊，咦，怎麼會有這麼不尋常的錶？」他邊說邊示意一個紅衞兵到樓下那堆相機裡，看看有沒有這樣的錶。不久，那紅衞兵回來報告說沒有。

「是我丈夫在一九五七年帶到香港給我的，不信你可以問陳媽，我的事情她都很清楚。」

衆人都不吭聲，這可憐的女孩看來既憂愁又害怕。地板上，尤其是在書桌的四周，衞生紙團、舊雜誌、運動書籍、筆記本堆得幾乎有膝蓋那麼高，我突然心生一計，對著那女孩說：「說不定手錶和戒指就掉在這亂紙堆裡！」

女孩蒼白的臉頓時有了血色，她急忙鑽到桌底下翻尋，其他紅衞兵也立刻緊跟著蹲下去找，男老師仍舊坐在那裡，蹙著眉頭瞪著我，好像看穿了我的心思。孔子說過：「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可惜這句話已不適用於現在的「中國」。每個人的所做所爲，無非以自己的利益爲出發點，或許，這男老師認爲我這麼做是爲了博取紅衞兵的好感吧！

一陣搜索後，他們發現了項鍊和戒指。女孩臉上露出微笑。不過還沒有找到手錶，或許被別人拿走了。

隔壁臥室裡，紅衞兵正拆卸我的家具，我看到其中一個搗毀唱片，立刻跳起來對男老師抗議：「這些都是十八、九世紀歐洲的古典音樂，並不列入舞廳、夜總會那類禁樂！」

「你這個頑固派，難道不知道毛主席說：西樂都是墮落的嗎？只有某些作品的某些段落是好的，並不是整首！」他說。

「段落不是整首作品的一部份？」我喃喃自語。

「住嘴！工人、農人們需要莫札特、貝多芬和柴可夫斯基嗎？當然不，他們需要的是勞動階級的音樂。」

這夜似乎漫無止盡。累得人幾乎站不住脚，我只得向他們請求准許我休息。

「你可以去你女兒的房間，她是一個獨立的攝影工人，靠自己的勞動賺取薪資，她的房

問不包含在我們的革命行動之內！」男老師說。

我躺在女兒床上，不知不覺入睡，醒來時，陽光已灑進房裡，除了收音機裡播報新聞的聲音外，屋裡再也聽不到一點聲響。我發現紅衞兵坐在門外的階梯上吃著學校送來的小饅頭，人數較前晚少了許多，老師也不見了。走進厨房，叫厨師給我弄點咖啡和土司，我就坐在餐桌旁吃起來。

一個長得纖柔漂亮的女孩跨進門，坐在餐桌的另一邊觀察了我一會兒，她端起那杯咖啡聞了聞，然後露出不屑的表情：「這是什麼？」「咖啡。」我回答。「什麼是咖啡？」她又問。

我告訴她，咖啡是一種類似茶的飲料，不過更提神！

「是外國人喝的？」她「砰」的一聲把咖啡杯放下。

「可以這麼說。」我拿起另一片吐司塗上牛油。

她拿起一罐貼有英文標籤的果醬，閃著黑大的眼睛盯著我瞧：「你爲什麼非要喝外國飲料、吃外國東西不可？爲什麼有這麼多外文書？房子裡有這麼多進口的東西，却連一張毛主席的相片都沒有，到過那麼多資產階級家庭，就數你們最壞、最死硬派，你到底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

我對她笑了笑。文革一開始，老趙就勸我掛張毛澤東的相片，但是我走遍大小商店，却找不到半張，最後只好放棄這個念頭。現在，我想該給這個漂亮的女孩看點她喜歡看到的東西。

「喜歡吃蕃茄嗎？」我問。

「當然喜歡。在上海，蕃茄是很普遍的食物，收成好的話，一斤只賣幾分錢！大家都把它當做水果或蔬菜吃。」

「那好。蕃茄也是外國食品，它是由外國人傳進中國的。至於說到外文書，馬克斯不也是德國人嗎？如果大家都不閱讀外國著作，怎麼會有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產生？這個時代，閉門造車是不可能的，我相信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已經知道中國的高中生全被編入紅衞兵。」

「眞的？」她陷入沉思：「你很善於分析，你一定上過大學吧？」

我點點頭。

「我一直希望進入大學。可是現在不可能了，我們都得去當兵。」她沮喪的說。

「現在不會有戰爭，你別擔心。」我試著安慰她說。

她迅速四顧，抓著我的手臂低聲向我警告說：「別這樣說！很危險的！毛主席說過，我們要隨時爲對付美帝、蘇修和台灣的國民黨做好準備。你可千萬不要說這種違背毛主席訓示的話。」

我對她笑了笑，點頭表示同意。這時，厨房門開了，一個男孩子走進來，女孩趕快縮回手，大聲叫道：「你是一個階級敵人，我不想聽你胡扯了。」

她和那男孩一起往外走，走到門邊時，回過頭來給了我甜甜一笑。

「並不是所有的紅衞兵都是年輕的傻瓜呀！」厨師抬起眼來說。我記得他的小兒子正在

唸中學，於是問他兒子是否也參加了紅衞兵組織。

「唉，怎麼能不參加呢！他每天回來，我太太都要搜身，確定他沒有帶回不義之財後才放心。現在呀，紅衞兵偷東西的情形愈來愈嚴重。有些父母甚至還鼓勵自己的孩子去拿呢！」

「哦，那資產階級家庭的孩子怎麼辦？」

「更糟！他們得和父母劃清界限，朋友之間也針鋒相對，所以，因爲受不了這個無情世界而自殺的孩子也愈來愈多。」

走出厨房，我看見一位新來的訪客，從他自信的神情，可知他是個黨員，年紀在四十歲以上。

「我是市政府的聯絡員，」他自我介紹：「我的工作是督導紅衞兵的革命行動。你沒遭到毆打或虐待吧？」

原來上海市政府也對紅衞兵的過分行爲進行考查，我感到既驚又喜，不過，也許這聯絡官自己並不知道，他對我說話時，態度上已經流露出權威性了。

「沒有，這些紅衞兵都嚴守毛主席的訓示，執行他們的任務，我照樣可以正常的吃和睡。」

「好極了。我們可沒有意思要折磨你們，只是想藉著改造思想去拯救你們的靈魂。」文革時期，「靈魂」是常被提及的，林彪就曾幾次站在天安門的臺上，代表毛澤東向台下聚集的紅衞兵發表演說，要他們以革命的心靈去拯救靈魂，並藉以改進自己，但是却沒有一個人

問毛澤東或林彪，到底他們所謂的「靈魂」是什麼。

「你認爲在上海住家用地嚴重短缺的情形下，你和你女兒兩個住在一棟有九個房間、四間浴室的屋裡應該嗎？還有這些羊毛地毯、高級傢俱，甚至用了三個僕人來侍候你！」

我正想跟他爭辯，他又繼續說：「我說過我們不會折磨你，你可以保留夠用的衣物和一些基本的設備，繼續過活。」

他停了一下，看我沒有反應，繼續說道：「冬天就快到了，紅衞兵會帶你到樓上收拾一箱衣物。挑一件暖一點的夾克吧！你不能再享用中央空調設備了，煤是發展工業的必需品，不能讓你們這些資產階級隨便浪費。」

我跟著一個紅衞兵到樓上去打點衣物。一個昨晚還在這兒，今早却不見了的男紅衞兵三步併做二步跑到樓上，對一個女孩子喊道：「你知道我回家發現了什麼嗎？他們竟搜我家！他們怎麼可以這樣做呢？我祖父和我父親都是勞工啊！」

這的確不尋常。我們都停掉了手邊的工作請他解釋。

「都是因我姑姑而起的。在日本入侵期間，日軍的一把火燒了她的家，使她變得一貧如洗，戰後，她向人借錢搭了一個水果攤維持她和孩子們的生活，兩年前，她因爲老得無法經營而將攤子停了，現在他們竟說她擁有私人產業！她的子女都不在上海，所以她就住在我家，就這樣，我家也被抄了！」

這青年說著眼淚都快掉出來了。圍在四周聽這青年講述故事的人愈來愈多，我注意到有些人聽完之後，悄悄的溜回家去了。

破壞工作在中午以前，全部進行完畢。大部分紅衛兵都撤走，只留下不到半數的人在這屋子裡。聯絡員和兩個老師傍餐桌而坐，桌上散放著祖父寫給先父的舊信件。那時父親正在日本留學，母親去世後，他們就夾在家族檔案裡寄到我家來，我後來打開來看過，因爲打算將它們寄到北京哥哥那裡。身爲長子，他才是合法的繼承人。

「你看過這些信嗎？」聯絡員問。

「十幾歲的時候，家父給我看過。」我說。

「你祖父雖然是個大地主，但是很愛國，一九八五年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海軍的受挫，刺激了令祖父送令尊到日本去研習海軍軍事。另外，他也參加了修改憲法運動。你尊敬你的祖父吧？」

這聯絡員眞大胆，知道我祖父是大地主，居然還說他是愛國者。一九五〇年的土地改革運動，大地主被視爲政府的敵人，全部都要被鬥爭死的！

我雖沒見過先祖父，但血管裡流著中國人的血，也繼承了中國人「愼終追遠」的傳統，「我當然敬愛他！」我說。

「那你爲什麼替外國人做事？你不知道他們對我們不懷好意嗎？他們想在經濟上壓榨我們的勞力，在政治上奴役我們。當初，我們提供你到外語學院敎書的機會，而你却選擇了蜆殼公司，爲什麼？」

我不能告訴他我之所以選擇爲蜆殼石油公司，是爲了怕捲入毛澤東發起的新政治運動。一九五七年，在我必須就外語學院敎書或爲蜆殼工作做決定時，反右派人士正肆無忌憚的對

知識分子，尤其是從海外學成歸國的學人進行批鬥。我的許多朋友都因此遭受迫害，有的被送到勞改營，有的則下了獄。所有的大學、研究機構，包括外語學院，都處於混亂之中，假如當時我選擇到外語學院去教書，那無異是自找麻煩。

「你是受高薪所誘吧！」他問，我立刻意識到我處境的危險。在中國大陸，人們相信資產階級會爲了錢做任何事情，包括犯罪。

「不，我已經有很多錢了。我選擇蜆殼，是因爲那兒工作時間短，又有汽車可用。我想我是比較懶一點。」

他站起來看看錶，「我還有很多地方要去。」他說。「你最好仔細想想你所做的事情。我們的政策是要消滅資產階級中講究物質享受的人，而你就需要被改造。難道你不想加入光榮的無產階級行列？如果想，那就必須放棄財產和改變你的生活方式才行。無產階級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形成一個沒有階級區分的社會，每個人都可以平等享用公有財產和勞動果實，沒有一個人高於他人。」

多吸引人的一幅景象啊！當我還是個學生的時候，我也對它深信不疑，但是在共產中國施行了十七年之後，我才知道這樣的社會根本就是一個夢想。那些握權的人很快就成了新的統治階級，控制著人民的生命以及財物的生產與分配。在中共，統治者的新生活被視爲政府的機密，但是每個中國人都知道他們住的是豪華大廈，用的是舶來品，還有許多僕人。他們也用專人駕駛的汽車將他們的子女送到學校去，再遴選一些教師去教導他們。雖然每個人都知道這些統治者的生活，却從沒有一個人敢去談論它。

毛澤東住在前清皇帝的宮殿裡，已經是公開的秘密了。他可以命令紅衞兵拆除機關學校、刼掠民宅，却沒有人敢去反對他。甚至現在這個聯絡員，也能決定我可以擁有多少衣物，我將來要過什麼樣的生活。只要他高興，他可以隨時判我的罪，只因爲他有權，而我沒有。

傍晚時，最後一個紅衞兵終於也走了。老趙和厨師想要收拾屋子，我告訴他們不要亂動房裡的東西，以免東西掉了，紅衞兵會以爲是我們拿走的，於是，他們把每個房間的走道掃乾淨，雜物全掃到角落裡去。

回到臥室，我發現陳媽坐在我的梳粧台上凝視著屋裡零亂的一切。我要她幫忙把破衣服撿起來放在角落裡，好空出一點地方來。床單上滿佈著紅衞兵的脚印，我們把床單翻起來一看，床墊也被割破了。牆上一幅水彩畫的旁邊，有人用口紅寫著：「打倒帝國主義的走狗！」牆的另一面則掛了「無產階級獨裁萬歲！」和「打倒資產階級！」兩張標語。浴室裡，一條條髒毛巾堆在一塊兒。澡盆裡半缸染了色的水，是紅衞兵將整罐藥水倒進去的結果。

突然，門鈴響了。老趙衝上樓來：「又有紅衞兵來了！」他叫道。

我急忙下樓，看見八個穿藍色農人或工人粗劣衣服的紅衞兵在客廳裡。他們的領導同志手裡拿著一根皮鞭站在前面，「我們是紅衞兵，到這裡來對你採取革命行動！」他說。

「你們眞的是紅衞兵嗎？你看起來像是他們的父親呢！」我說。一根鞭子猛然的抽在我的手臂上，疼痛使我咬緊雙唇。這群人似乎很緊張，不時轉頭看看前門。

「鑰匙拿來！我們沒有時間和你囉嗦！」領頭的喊道。

「鑰匙已經被昨晚來過的紅衞兵拿走了。」

「少騙我！」那人舉起鞭子想再給我一鞭，最後又緩緩垂下來。

「他們把所有的東西都拿走了嗎？」另一個人焦急的問。

「不是全部。」我說。

他們中的一個把我和僕人推進厨房裡鎖起來，然後站在外面把守大門，讓其他的人在屋裡搜索財物。他們離開得很匆忙，以致忘了幫我們打開厨房的門。厨師只好由窗子跳出去，經由花園幫我們開門。

陳媽回到臥房去幫我整理床舖。我坐在餐桌旁喝著厨師爲我準備的茶。

「接下來不知道還會發生什麼事？」厨子說。「這簡直無法無天！任何人只要穿著紅色軍裝，自稱是紅衞兵，就可以隨便進入民宅大肆掠奪。哼！」

「紅衞兵在門口貼了一張大字報，要不要我去看看上面寫些什麼？」老趙問。

「好，幫我去看看。」我說。

老趙回來報告我已被控「與外人同謀」，也就是「外國間諜」的意思。在中國大陸，只要是不經由官方管道和外國人有來往，就是一項罪行。這時，梅萍開門進來了。

我起身迎接她，並刻意裝出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她一看見我，就立刻衝進我懷裡。

「媽咪！哦，媽咪！你沒事吧?!」她喃喃的問。

「不要難過。」我佯裝愉快的說。「文革結束後，我們會有一棟新房子，和現在的一樣漂亮。哦，不，比現在的更漂亮。」

「不，媽咪，不可能再有像現在這樣的房子了。」她頹弱的說。

我陪她上樓看了一下。下來時，晚餐已經備妥。這時才知道自己多麼疲倦與饑餓。吃飯時，梅萍告訴我，除了派聯絡員去監督紅衞兵外，上海市政府已經通過了「十項改革計畫」，強調保護文化遺產的重要，以及禁止劫掠民宅。老趙和陳媽顯然被這則消息寬慰了不少。然而，昨晚紅衞兵的所作所爲以及他們談到有關修正改革的情形，使我不禁懷疑這「十項改革計畫」的可行性。

我知道女兒焦慮等著我的反應。爲了寬她的心，我告訴她中日戰爭時，我在重慶失去所有家產的往事。

「一九四一年的夏天，在我和你祖父準備隨軍退到大後方避難的前兩天，一顆炸彈投在我們屋前的網球場上，房子倒塌了一大半兒！」

「哇！那時你們在那裡呢？媽咪！」女兒問。

「我們在防空洞裡。重慶的防空洞挖得很深、很安全的。」

「房子裡的東西呢？是不是全被炸光了？」

「還好我們在轟炸前就把收拾好的箱子放在樓梯底下，轟炸時，樓梯倒下來把箱子埋在下面，我們只能挖出其中三只。到了香港，一切只有再重新添置了。」我接着又說：「已經隔了那麼久，要不是這次紅衞兵打劫，我幾乎都忘了。」

「哦，媽咪，你怎麼能忘得了這麼可怕的事情。你失去了所有的一切呀！」

「我眞的忘了，但那是在戰時，轟炸事件每天都有，當你發現你並不是唯一的受害者時

，可怕的經驗就不再那麼教人難以忍受了。」

「我永遠也忘不了今天的事，永遠不會！」

「梅萍，錢財不重要，想想那些美麗的瓷器吧！它們經過長期的戰亂、天災纔到我的手上，現在，它們就要爲別人所享有了。生命是短暫的，錢財又算得了什麼呢！」

「媽咪，我眞高興你這麼看得開。」我看見她回到家後，首次露出笑容：「雖然我們將一無所有，但我們還彼此擁有對方，我們還是一樣可以快樂的生活在一起。」

「我們並非一無所有。我說過我在海外還有些資產，我們比大部分生活在中國的人好得多了。梅萍，瞧你累得連眼眶都黑了，去休息吧。」

梅萍靜靜地在那兒坐著，陷入沉思中，過了一會兒，她突然站起來說：「媽咪，我們會度過這次風暴的。我對我們國家的未來有信心，事情會改觀的，黨內仍然有好的領導者，像周恩來總理，和其他一些人。」

「但是我懷疑現在他們到底在做什麼？讓這麼多無辜的百姓受苦。」

「不要灰心，媽咪，時候到了，他們就會有所作爲的。我愛中國！無論它是好，是壞，我都愛我的國家。」她堅定的說。

我眼中淌著淚水。即使我因爲階級關係而遭到下放，我也仍然深愛著這片祖先居住過的土地，只是，因爲我的階級成分，我却成了一名無所依歸的異類。

第四章　拘禁

一陣滂沱大雨驚醒了我，一會兒，雨勢漸轉變爲迷濛的細雨。濡溼的花園裏，散置著丢棄的垃圾和未被燒盡的書籍，這是一幅令人感傷的景象。我站在陽台上，看著這幅令人沮喪的畫面，心中茫然無主。

整個早晨慢慢流逝了，沒有一個紅衞兵出現。我在屋裡漫無目標的走著，在我的書房內，佔據整個牆壁的書架上只剩下四本薄薄的毛澤東選集及一本毛語錄，我也無法做任何縫補或編織衣服的事情，因爲紅衞兵攪亂了我一切的東西，我不曉得我的毛線及針、線放在何處。我更無法寫信或畫畫，因爲所有的紙張及信封都被撕毁，而且我也找不到我的鋼筆；就連收音機都沒辦法聽，因爲屋內的收音機被視爲貴重物品鎖了起來。我只能呆坐在那兒看著那一堆堆零亂的雜物。

下午雨停了。有些旅行的隊伍經過我的家門，卻沒有一個紅衞兵再回來。老趙爲我帶來今天的上海自由日報，它雖然名爲日報但總是下午才發行。在第一版上轉載了北京人民日報的重點文章，我知道這篇文章的重要性，因此仔細研讀它。這篇文章是用激昂的革命語句所寫成，似乎膚淺的想凝聚對資產階級所有的仇恨，糾合群衆參加文化大革命的活動。文中並

說：革命群衆必須找出這些敵人，因爲偉大的毛主席相信：「革命群衆的眼睛是雪亮的。」

這篇文章警告革命群衆：資本主義階級是狡詐的，他們在家中儲藏黃金和秘密武器，以便在國外勢力進攻中國時能和敵人合作，成爲敵人的第五縱隊。文章中讚譽紅衞兵的革命行動，稱他們爲「紅小將」。此文的總結提到當前有一股反潮流正與文化大革命、紅衞兵對抗，並且警告每一個人須注意這股反潮流，勿受其影響。這些和修正主義者有相同企圖的走資派試圖要保護資產階級，將會被革命群衆淸掃成歷史的灰燼。

這篇文章相當不負責任，對於誰是掌生殺大權的革命群衆及待罪羔羊的走資派沒交待。我深信：毛澤東及這些爲領導文化大革命所特別挑選的委員意圖擴大打擊面，文中陰冷、尖峭的語氣絕不能不注意。自從這麼重要的文章出現在人民日報後，就被革命群衆爲聖旨，文化大革命在上海的情勢立卽高昂，而黨書記與市政府並沒能順利的執行十項解決方案。我希望紅衞兵更有敵意更不妥協，如此我方能順利的使僕人離開我家，返回自己的家園。

廚子告訴我，既然他不再受僱，那他更可以自由來去我家，除非是紅衞兵命他離開爲止。老趙說：「我並不害怕留下來。您需要有人替你去市場買食物，而且您出去也不安全。我家是種田的，兒子是軍人也是黨員，我是眞正的無產階級。這些紅衞兵已經把這兒弄得一乾二淨了！還想怎麼樣？如果他們要我走，我才走，否則，我要一直留下來。」陳媽哭著說她要留下來陪我的女兒。

在這個非常時期，僕人們的忠心讓我深深感動了，我不再堅持他們離開，畢竟有他們在，總比我一個人單獨對付紅衞兵要好得多。無論如何，我還是寫了封信給陳媽住在省鄰的女

兒，而這張紙是我的廚師去市場帶回來的。在信中我告訴她來接她母親回家。我覺得對陳媽該比廚師及老趙負更多的責任。

女兒回家後告訴我，市政府的辦公大樓被紅衞兵包圍，紅衞兵要求盡快撤消十項解決方案，並抨擊此方案是在保護資產階級，對於這個消息我並不感到驚訝。她並且告訴我，毛婆江青的助理被任命領導整個上海市的文化大革命活動。

「他的名字叫張春橋。一個在我們影片攝影場工作的人告訴我，三十年代江青還是個女演員的時候，他在上海幹記者。而過去曾經認識他們的攝影場同仁，現在都怕得要死，他們其中有些人已整好行李準備去坐牢了呢，他們相信張春橋會監禁他們，這麼一來就能防止他們討論他和江青在三十年代的事情了，媽，你覺得這些無辜的男女演員眞的會去坐牢嗎？」我女兒對於她在攝影場所聽到的感到困惑而驚恐。而我對於三十年代上海的事物沒什麼概念，我不知道江靑、張春橋爲什麼怕別人知道他們的過去。

「你今晚會待在家裏嗎？」我問她，希望能夠有個寧靜的夜晚和她討論當前的情勢。

「恐怕不能喔，我趕回來看你，順便看看那些紅衞兵有沒有回來，其他的人都只留在攝影場裡，今晚有個緊急的會議，要討論人民日報上一篇重要的文章，我聽說這篇文章是毛主席身邊的人寫的，所以它不僅重要而且能代表毛主席的觀點。」她急忙說著，並不時看她腕上的錶，「老天，我得用跑的回去了。」

老周端來一碗麪，說：「吃點麪吧，已經有點冷了，你總不能不吃東西就走啊！」

女兒拿起筷子，吃了些麪，邊吃邊對老趙說：「謝謝你，不過我眞的得走了！」

她給了我一個擁抱，然後慌慌張張離開了，我有很多話想和她說，却連一點時間都沒有。

老趙拿了收音機來，我開始聽晚間新聞，每個我所收聽的電台都在報導人民日報的重要文章。播報員的語調興奮而高昂，（這種語調在以後幾年中已非常熟悉。）我讓收音機開著，希望能聽些其他的新聞，但却一無所獲。直到進入夢鄉，我已聽了無數遍，幾乎都能背下來，而在睡夢中仍然焦慮。

隔天早晨，厨子告訴我一個消息，市場的食品嚴重短缺，因爲農民們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加入革命群衆的行列，獻身文化大革命，而這些鄰近鄉鎮的農民，正是過去帶蔬菜、魚蝦進城的生力軍。他們大批擁入都市並佔據上海商業區域的幾棟大樓，而當領導同志們向飯店的經理要到免費的食物及服務，及有關自來水、彈簧床、地毯的豪華消息傳回公社時，農民們攜家帶眷到都市來尋求一個不花錢的假期。同時，從北京及其他北方城市的紅衛兵亦抵達火車站來與上海的紅衛兵交換革命經驗，這個時候，上海市的紅衛兵亦遠赴北平，希望能得到毛主席的校閱。紅衛兵命火車及船隻停止正常運作，只爲他們服務，因此火車站和碼頭呈現癱瘓狀態。但沒有人敢反對紅衛兵，自從人民日報所刋的重要文章中提及「走資派」，行政幹部便形同虛設。

紅衛兵對十項解決方案的抨擊使上海市政府擺出防禦的姿態，爲了避免落得紅衛兵抱怨的口實，上海市政府供應了免費的食物給來來去去的紅衛兵，車站及碼頭上設滿了食物供應站。所有的商店都在做饅頭；而已改爲官方所有的自製麪包店也動員生產麪包。故意找上海

幹部碴兒的紅衞兵們批評麪包店所做的麪包是「西餐」，拒絕進食。同時，工廠工人們組織他們自己的文化大革命團體，決定參加革命群衆的行列。爲了找上海高級幹部的碴兒，他們並做了過份的經濟要求；而爲了自保及贏得工人的支持，高級幹部們認可了薪資津貼，且將利益雨露均霑的分給工人們。沒過幾天，當地銀行的準備金消耗殆盡。這些工人們並不滿足，最後還是激怒了這些老祖宗，幕後主使者張春橋在和平飯店策畫攻擊市政府所有的革命活動，而和平飯店成了毛派領導人在上海市臨時指揮所。

我女兒的一些老師朋友，因爲戴了紅臂章，所以登門造訪沒有引起太大的注意。老趙在紅衞兵「來訪」的空檔裏，利用機會去看朋友，並和街頭的群衆混在一起，厨子的兒子來看他，並告訴他工作的情形，從這孩子口中說出來的事情讓人震驚不已，上海市的黨部及政府部門的幹部門竟不願執行他們本身職務之情形也如此不尋常，我開始懷疑文化大革命除了揭示：消滅資產主義階級的剩餘敵人和淨化幹部及知識分子的目的外，是否還有其他的意義呢？

有一天，梅萍的朋友小徐—他是個老師—來我們家找梅萍，可是梅萍在影片攝影場還沒回家。他告訴我：紅衞兵拆掉了像上海路標的天主敎大敎堂的雙子塔。當晚，紅衞兵還闖入上海市立圖書舘，摧毀許多珍貴的書籍，他們甚至到歷史博物舘，可惜因無法破壞大門而作罷；（因此他們惱羞成怒）轉往博物舘負責人的家中，將這個無辜的老人從病床上拉去開鬥爭大會。

「這個老人現在待在醫院裏，但是有些人說他已經死了，這些紅衞兵愈來愈不像話，我

想你該帶梅萍設法逃到香港去。」他說。

「你認為梅萍願意走嗎？」我反問他。因為有一次我要去香港旅行，他正好也在舍下，他們兩人都說：絕不去香港這殖民地做二等公民。

「現在情況不同啦，文化大革命過後，沒有工人家庭背景的年青人們在中國沒有未來可言。在過去，如果我們比工人階級更勤奮工作，而且沒有什麼野心的話，我們還可以有一個合理、快樂的生活。但從今以後，我們會像印度的賤民一般，子子孫孫要遭殃。唯一的方法就是—逃，你在外國不是有許多朋友嗎？為什麼你不帶梅萍走呢？」他催促著我。

「現在逃太遲了吧，你知道企圖逃亡香港的刑罰是非常嚴酷的，好像要關十年或二十年。」我說。

「不會太遲，我調查過了。整個鐵路系統現在亂得很，沒人用車票或通行證，紅衞兵就是搭火車到各地串連。而且沒有人會問你任何問題，火車站和碼頭我都去過了，都沒有收票員，根本就沒有人管嘛。」

「我想一旦我上了火車，我一定會被認出來，到時不是被拉下火車，就是被毒打一頓。」

「你們可以化妝成紅衞兵，我會給你一些紅布當臂章，在上面寫好紅衞兵三個字！」

「我當紅衞兵？太老了些吧。」

「你只要把頭髮剪短，拿本毛語錄在手中，假裝唸它就可以了。你甚至可以戴頂帽子遮住頭髮，如果任何人查問你，你就說你是老師。至於梅萍，她就更容易混過那些紅衞兵了。

」他焦急的說。

當我再一次搖頭，他說道：「連嘗試一下都不肯，太傻了吧！無論如何，等梅萍回來，你跟她商量看看。」

（在一九八〇年，當我離開中國大陸時，在香港碰見了小徐。他告訴我：當年他坐火車快抵達香港時，在邊界又轉回去了，不過後來他游泳逃到澳門。幾年來，他在香港辛勤工作，並且存了些錢。到了一九八〇年他已是九龍一家玩具工廠的股東，這家工廠外銷玩具到世界各地。）

當我在浴室時，聽到疾驟的敲門聲，我下樓梯走到一半，迎面碰到一個十五歲左右的年輕女孩，他穿著一件卡其制服，戴著一頂帽子，手上還帶了一根皮鞭。

「你就是住在這間屋子的階級敵人？看你吃得多好！你的臉蛋如此的柔滑而你的眼睛是如此明亮。你那腦滿腸肥，全是農民和工人的血汗，不過現在情況不同了，你必須爲你的所作所爲付出代價，跟我來！」聽她的口音，我想她是從北平來的紅衞兵。

我隨她下樓，幾個和她裝扮相同的男孩和女孩在餐廳門邊的大廳裏。我跟著她走進了餐廳。

「跪下！」其中一個男孩喊，同時用木棍打我的背，另外一個男孩敲擊櫥櫃的玻璃門，玻璃門破裂了，他繼續揮舞著木棍，敲我膝蓋骨。到底我該服從這跪下的命令？還是反抗？我頹然的崩潰在地板上。

「現金在那裏？」其中一個問我。

「先前來的紅衞兵已拿走了。」

「他們全部拿走了？」

「沒有，他們留下幾百元給我生活用。」

「那些錢在那兒？」

「在我書桌的抽屜裏。」

這個男孩在上樓時，踢了我一腳，其他人和他一起上樓。只有那個拿皮鞭的女孩留下來看守我。她揮舞著皮鞭，好幾次都差點打到我。其他的人帶著抽屜下樓了，並將錢幣擲在餐桌上。他們命我轉過去面對牆壁，我可以聽到他們數鈔票的聲音。

我聽到很多人進屋的聲音，我想可能大門敞開著，其時，我聽到一個男人的聲音命令老趙傳令陳媽及廚子到大廳去。

「就是她！」有人說。

「你們可以走啦，我們自己會處理她的。」剛才講話的那個男人說。

我聽到這些紅衞兵離開了屋子，他們離開時並用木棍及鞭子敲打著牆壁及家具。他們關門時因太用力而弄得整個屋子在搖動。

「站起來！過來！」那個男的喊道。

我站起來面對這些新的入侵者，方才講話是個中等身材的碩壯男子，臉上還架著一副淺色眼鏡。另外還有兩個男的，一個女的，臂章上綉了三個字：「革命派。」

他們排成半圓形面對站著的我坐著。那個男的說：「你是屬於這房子的階級敵人。你的

罪名是藉外國勢力圖謀不軌，這些都寫在你家門口的大字報上，你能否認這些指控嗎？」

「我當然否認！你們到底是誰？又到底要做什麼？」

「我們是無產階級革命者。」

「沒聽過。」我說。

「你將會聽到許許多多有關我們的事，我們是代表勞工階級的革命者，而勞動階級是中國的統治階級。」他趾高氣昂的說。

「誰道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不代表勞工階級嗎？」我問。

「閉嘴！我們不必向你解釋或證明什麼。你這個頑劣的階級敵人！你根本沒有權利來討論在中國誰代表勞工階級，我們是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參加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就夠啦。」那個女的說。

「你是階級敵人，是英美帝國主義的走狗。你在北平美國大學唸書，然後又到倫敦的英國大學去，所以早就被訓練好為帝國主義作倀。」那個男的說。

我保持沉默，和他們說話似乎是無意義的。

「不說話是不是覺得慚愧啦？」那個女的問我。

「我為什麼要慚愧？多少燕京大學的畢業生成為共產黨的領導幹部，我是燕京大學的學生並不代表我是任何人的走狗，而倫敦財經學院是英國費邊社會主義者所創立的左派學院。事實上，在那兒我首次閱讀到馬克斯．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我告訴她。

「哈哈！眞是個笑話！一個階級敵人，帝國主義的走狗竟讀過共產黨宣言，下一句話準

備要說：你要參加共產黨吧！」戴淺色眼鏡男子譏諷道。

「列寧批評費邊社會主義者只是改革者，」女的接口：「他們不是眞正的社會主義者，因爲他們不支持暴力革命。別再迎合我們了，你唯一可做的便是淸淸楚楚的自白。」

「我是個守法的公民。我替一家外國公司工作，根本沒有機會接觸國家機密。」我說。

「你不必這麼激動，所有外國企業的高級職員都是間諜，並不只有你。」另一個男子插進這些話。

「爲什麼外國政府要相信我？」我問他們，「對於我們這些住在中國的人們，他們要如何控制我們呢？」

「喔！你們都把錢存在國外，你不否認在國外存了錢吧？」那個男的問。

「這樣就能控制你們啦！他們可以沒收你們的錢。」那個女的說。

「你們不瞭解，海外的政府不能干涉銀行，他們不能沒收任何人的存款。」我告訴他們。

「那你爲什麼把錢存放在外國？爲什麼一個安份的中國人會將錢存放在外國呢？」

「到香港旅行，我得付膳食費、旅館錢，而且你也知道，我不能帶中國錢出境，我們有外滙管制。每次出境，我只能帶五塊錢美金。另外，入境時我也須在華僑商店買煤和別的東西。」我解釋說：「我有錢在海外，但我更有無價的在上海——這棟屋子及我唯一的孩子，她也是共青團的成員，爲什麼我要反對共產黨及人民政府呢？」

「即使你女兒是共產黨員，你也會反對共產黨，這是你的階級性。」那個戴眼鏡的男子

說。

接著幾個男女進入餐廳，而我的僕人尾隨在後。那個戴眼鏡的男人看著他們，這些新到的人則搖搖他們的頭，明顯的，從我的僕人身上，他們沒有得到他們想要的。

那個戴眼鏡的男人用一種嚴厲的語調問我：「你的黃金和武器藏在那裏？」

「什麽黃金？什麽武器？」這個問題令我驚訝，直到我想起人民日報的那篇重要文章。它指控資產階級分子隱藏黃金和武器，以便在外國勢力入侵中國時，組織第五縱隊。

「你最好坦白些！」

「我沒有，紅衞兵已經來過這兒了，他們查遍了整個屋子，沒有發現任何黃金、武器。」

「你很聰明，你藏了起來。我們偉大的領袖告訴我們，階級敵人匿藏黃金及武器，他是不會錯的。」

「如果你不坦白，我們會去找那些黃金和武器，到那個時候，你會遭到更嚴厲的懲罰。」領頭的說：「它們一定藏在這屋子裏的什麽地方。」

我懷疑他們是眞的相信那篇文章呢，還是必須表現出相信它的樣子。事實上，一九四八年共產黨佔領大陸後，私人不能擁有槍砲，擁有者須得交給政府，而且對警察的入屋搜索不能表示異議。過去國民政府的軍警人員均被送往勞改營中接受「改造」，他們的家人都被掃地出門，因此，一九六六年還會有人敢把武器藏在家中嗎？

他們撕開我的床墊，割開椅子及沙發的布套，爬進壁爐裏掏煙囱，撬開地板，爬上屋頂

，撈吊在天花板下的水箱、趴在地板下檢查水管，在這之中還不斷注意我和僕人們的臉色。

不曉得現在幾點了，但當他們決意要挖花園時，黑夜已緩緩來臨，他們開了陽台的燈，並且要老趙拿他的手電筒來；到了煤屋，他們叫我的僕人和我將煤搬運至已被搜查過的花園中。潮濕、覆滿垃圾的草地已被踐踏成一片泥濘。他們甚至將花木從花盆中拔起來。他們、僕人們和我身上都沾滿了泥土及汗水，依然一無所獲。

最後，筋疲力竭戰勝了革命熱誠，他叫我們回到屋中，並因爲找不到任何東西而怒氣沖沖，我知道除非我想辦法挽回他們的面子，否則他們將會遷怒於我。如果我能拿出一些像金子之類的物品——譬如戒指、手鐲，我記得我的珠寶密封在梅萍的書房裏。

「那些紅衞兵將我的金戒子和手鐲放在密封的房間裏，如果你們能打開房間，就能拿走它們。」我告訴那個女子。

「別裝了！我們找的是金條。」她說。

我們都站在大廳中。那名戴眼鏡的男人將眼鏡除下，露出充滿血絲的雙眼。他瞄了畏縮在廚房門邊的僕人一眼，然後看看圍繞在他身邊的革命的夥伴，接著他瞪著我，突然大叫：「你的金子和武器藏在那裏？」他威脅性的向我逼近一步。

我是如此的疲倦，幾乎站不住了，盡全力說：「這兒根本沒有黃金和武器。如果有的話，你們不早已經找到了嗎？」

他無法忍受這個證明他錯了的事實，用一種充滿仇恨的眼光瞪著我，他說：「未必，我還沒有敲開牆壁呢！」

他站得如此接近我，我可以清楚得看到他輕蔑的表情，雖然我對他極端厭惡，避之猶恐不及，但我沒有退後，不願讓他以為我怕他。我只是說得很慢，用一種平常、友善的語氣，告訴他：「你必須明理些，假如我藏任何物品在牆裏，我不可能單獨一個人做，我需要一個泥水匠將牆壁糊好，而所有的工人均在國家控制的行業裏工作，他們一定會報告他們的黨書記他們做過這樣的工作。」

這傢伙氣瘋了，因為我暗示他不理智。他臉色鐵青而嘴唇抖動著，我可以看見他太陽穴上筋脈賁張，他揚起手臂要打我。

在那電光火石之間，梅萍養的猫弗拉非穿過廚房門，從背後一躍咬住他的小腿，使他痛得叫了起來，單脚猛烈的跳躍著，意圖將猫甩掉。其他的人也想抓住牠，但這隻敏捷的猫咪像閃電一般從法式門窗竄出這屋子，我們也都跑了出去……。弗拉非牠正坐在牠最喜歡的玉蘭樹上。在那個安全的位置上，弗拉非凝視著我們「咪咪」的叫着。那個受傷的男人幾乎瘋了，他奔向那棵樹，想把猫搖下來。但牠躍向另一端更高的枝頭，回眸之際用種輕視的目光瞟向我們，然後躍上鄰居的屋頂，消失在夜空中。

大家再次進入屋內。到了畫室，那個男的坐在被紅衞兵破壞及他本人撕裂的沙發上。我向陳媽要紅藥水及碘酒，陳媽說紅衞兵早就將所有的東西倒得一乾二淨啦。

這些革命分子因他們領導狼狽的表現而顯得相當難堪，他正用手巾擦拭腿上的血，整個人像鬥敗的公雞。僕人們聰明的溜進了廚房，而我卻必須留下來看他的狼狽像。其中一個女的將我推出去，說：「別猫哭耗子假慈悲啦！你養了一隻凶殘的動物攻擊革命同志，你會嚐

到後果的，至於那隻猫嘛，我們會叫街坊委員會處死牠，如果你以爲縱猫傷人會使我們放棄，那你就大錯特錯啦。我們一定要找出黃金和武器的下落。」她把門鎖住，我又再度被幽禁在餐廳裏。

他們眞的以爲我有黃金和武器嗎？我懷疑。還是他們只是執行毛主席的訓令而已？如果他們是我推算的後者假設，他們已經盡力了。

我聽到花園裏老趙悄悄的叫我，我走向窗口。

「厨子已到影片攝製場叫梅萍今晚不要囘家，沒有關係吧？」

「謝謝你，老趙。你眞週到！」

突然，大門又響起了敲門聲。老趙趕緊去開門。囘來告訴我說：那些曾經抄我們家的紅衞兵又囘來了。

「你帶陳媽到房間去避一下。」我心裏想：麻煩又上門了。

有許多人上上下下樓梯的聲音內夾雜著尖囂，激烈的爭吵似乎在上頭爆發了，接著是打架，對於家可能被攪得天翻地覆，我只有認命的份兒，將三隻椅子靠在一起，我躺了下來，我是如此的疲倦，儘管囂聲大作，我還是昏睡過去。

等到天亮，幾個紅衞兵及革命份子打開了門。似乎他們的爭論已經解決了，一個女孩對我大叫：「起來！起來！」

一個女革命同志叫我快些吃些東西，然後上樓去做些勞動工作。我到樓下的盥洗室洗手。在面盆上的鏡子，我驚訝的看到自己蓬鬆的頭髮及腫脹蒼白的臉，前額及下巴都沾上了汚

泥，退後一步看鏡子，我的衣服也都是斑斑點點的泥土。事實上，我看起來像個女屍，就像個女屍，就像我在抗戰時期日軍空襲後，自重慶街上的廢墟挖掘出來的女屍，我告訴自己要振奮起來。文化大革命是個洗刷我罪名的戰爭，我必須振奮起來，像花崗石一樣堅實，無論多少打擊，我依舊得屹立不搖，因爲我長時期未喝水，臉浮腫得很厲害。又因爲我的腎臟功能不太正常，所以我得立刻治療它。

在廚房裏，吃老趙爲我準備的飯菜前，我先喝了兩杯開水，食物的補充使我恢復了精力，也鼓舞了心志。我覺得非常充沛。

一名紅衞兵開了廚房門大叫：「你還在吃飯嗎？你要吃多久啊！快點！快點！」

老趙和我隨著紅衞兵上樓去，陳媽也加入我們。那些紅衞兵及少數剩下的革命分子正需要我們幫忙打包，好把我所有的物品帶走。他們是如此急於離開這間屋子，而我也手脚極快，因爲這些紅衞兵及革命分子比起我財物的損失，更令我無法忍受。

在紅衞兵及革命分子的眼中，老趙不是階級敵人，他們還以爲他是被誤導或是缺乏社會主義者的警覺才會爲我工作的。他們和交談當中，我可以看得出來，老趙也盡量表示友善。

當我們坐在地上整理那些散落的東西時，我聽到那些紅衞兵談著即將到來的北京之行，他們爲接受毛的檢閱而興奮不已。少數曾參加八月十八日北平天安門廣場校閱的紅衞兵驕傲的述說經驗。他們提及軍方組織在北平的歡迎會，供應他們住宿及卡其制服，且訓練他們如何接受校閱。他們所喊的標語及口號也是軍方人員安排的。我對他們所說的極感興趣。似乎軍方在幕後支持及策畫紅衞兵的活動。

當東西都打包好了，卡車來了。令我相當失望的是卡車雖然走了，但紅衞兵沒走。一個女同志告訴我：「你留在這屋裏，不准離開！同志們會輪流監視你。」

我既震驚又憤怒：「你們有什麼權力把我監禁在這兒？」我因失望而顫抖不已。

「我們有無產階級革命派的授權。」

「我要看命令狀。」盡量控制自己發抖的聲音。

「你想出去？想去那裏？你這種反動分子出去會被打死，我們是爲你好才這麼做。老趙可以留在這裏爲你買東西，你知道現在外面怎麼樣嗎？有個大規模革命在進行。」

「我並不是想出去。這只是原則問題。」

「什麼原則？如果你不出去還爭什麼？你待在這兒直到我們決定怎樣處置你！」

她很快的離開了，我雖惱怒却沒輒兒。

他們給我床上的彈簧墊—舖在地上睡覺用。一些換洗衣裳和背心吊在空蕩蕩的櫥櫃中。一口裝著冬衣的手提箱及裝着被單和毯子的帆布袋均放在房屋的一角。除了厨房原有的桌椅，還留給我兩張椅子和一只小咖啡桌。監視我的紅衞兵就坐在房間外的兩張椅子上，所以我只能坐在地板的彈簧墊上。他們其中一個會隨時進來看看我在幹什麼。我唯一有隱私的地方便只剩下浴室。

梅萍被准許住在她自己原有的房間，但在她返家時我不准去那兒，也不可與她說話，而她也很少回家，愈來愈多夜晚她都待在影片攝影場，以便參加文化大革命的活動。到了傍晚我輕輕推開房門，希望當她上樓時能夠看她一眼。許多她回家的夜晚，我們總設法去看看對

方，這樣我會覺得安心些，一般而言，要見到梅萍，當夜我就會睡得比較安穩。

老趙去市場買菜，但他和我女兒都不准與我共餐。紅衞兵也有他們的輪値表，所以他們可以回家吃飯，晚上，一、兩個紅衞兵睡在我屋外地板臨時搭設的床上。

自我被軟禁的第二天，陳媽的女兒來接她。我們彼此淚眼相送，陳媽要留給我一件她親手織的羊毛上衣，但紅衞兵叱責她沒有階級意識，不准她將毛衣送我。「冬天她沒足夠的衣服，而且她身體一向不好。」陳媽向紅衞兵解釋。

「難道你不明白嗎？她是你的階級敵人。你爲什麼要去關心她有沒有衣服？」紅衞兵說。陳媽的女兒似乎害怕紅衞兵，催促陳媽離開，但是陳媽說：「我必須和梅萍道別！」她老淚縱橫。其中一個紅衞兵不耐煩了。她面對陳媽，一副要打人的樣子說：「你待在這個房子還不夠久嗎？她是階級敵人的女兒。你跟她道什麼再見？」

當我最後擁抱陳媽時，她忍不住大哭了起來。紅衞兵拉開我的手，將陳媽及她女兒推出門外，老趙拿著陳媽的行李跟他們一起出去，我聽到他叫了一部三輪車給她們坐。

爲了想知道外界的狀況，我飢渴的閱讀老趙每天留在厨房桌上的報紙。一天傍晚，我到厨房去用膳時，看到椅子上一張粗糙的紅衞兵新聞報，大標題是「打倒反擊的階級敵人」，這引起了我的興趣，我熱切的想知道更多，但是沒什麼可看的，所以我拾起這張小報藏於口袋中，躲進寂靜的浴室裏讀了它。從此，我一直注意紅衞兵留下的撖報紙。這些紅衞兵所製的傳單全置對資本主義階級及修正主義者的誇張語調，但其中也有一些事實，那就是某些黨內領導幹部的心態依舊不明，特別是上海市政府某些幹部及黨書記忽視或破壞毛澤東的命令

，更讓我感到興趣。這些在黨內領導階級因為政策歧異所導致的紛爭，其程度之激烈超過我的想像。這些紅衛兵的刊物及傳單還透露了黨內領導階級的權力鬥爭導致共產黨神話的破滅—黨內為革命獻身的領導階級，並不是團結在一個共同目標下。

一個禮拜後，我問紅衛兵這種不見天日的日子還要過多久，准不准我去花園，他們打了電話後，准許我到花園走走或在走廊的階梯上坐坐，還可以讓梅萍的猫偎在我的膝上。這些年輕的紅衛兵對於咬傷革命派領導人的罪狀似乎並不重視，他們也常逗弄牠。

很快的，梅萍知道早上我經常去花園，只要她回來，她一定會丟張條子到花園中，翌日一早當我下樓去作例行的活動時便可以撿拾了。而九月份的天候夜間經常下雨，因此打開紙球時常是濕爛一團。她無法在小紙條上寫太多話，但她的訊息如：「媽，我愛你。」「好好照顧你自己。」「親愛的媽媽，我們要一齊勇敢的度過難關。」……等等。這些話平息了我那種孤立無援的感覺。

進餐時，如果老趙湊巧在廚房，紅衛兵就會緊跟着盯梢，不許我們交談，但老趙會和紅衛兵交談。譬如，他問一個紅衛兵：「你經常打你的老師嗎？」我相當震驚，八月三十日紅衛兵來抄家時，他們似乎和他們的老師很友善的呢，於是我屏住氣息等待下文……。

這個紅衛兵只用一種平常的口氣說：「我們發現他們有資本主義的思想或他們不准我們展開革命活動時，我們會揍他們一頓。他們有些人大概不太瞭解文化大革命進行的重要性，他們依舊說讀書重要，但我們偉大的毛主席告訴我們：『從游泳中學習游泳』，我們要從參加革命活動中學習。我們再也不需要那些老式的學堂了，這些依舊深信書本的老夫子顯然反

對我們偉大的毛主席，所以他們成了我們的敵人。」

從老趙與紅衞兵的談話及他們的傳單和宣傳品，我得到一個印象，那就是每天有成千的革命分子加入紅衞兵或工人組織；無論是爲個人利益、或是怕被認爲政治思想不夠前進，群衆被迫成爲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部份。

抄資產階級的家、攻擊知識分子刺激了紅衞兵及革命分子對暴力的慾求，似乎毛派領導人想利用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將憤怒和精力傾注在上海黨書記及市政府裡！他們雙方都互控對方保護資產階級和反對毛澤東的政策。敍述多年來毛的指令已被技巧的當成放屁！上海黨書記及市政府的幹部們並非政治遊戲的新手，他們是經歷無數政治風暴和整肅的老共產黨員了，自然也洞悉毛澤東的技倆，毛澤東利用群衆，他們照單全收。他們迅雷不及掩耳的組織了他們自己的紅衞兵及革命同志參加文化大革命。他們與毛派的紅衞兵及革命同志爭取對上海的控制權。爲了勝利，雙方都必須在行動及宣傳上更紅、更專，因而要去辨別某一方是那個團體，經常是相當困難的，甚至要血濺五步後方能知曉。所有的資產階級及知識分子還會雙方競爭，兩派競相使用殘酷的手段以驗證己方貨眞價實。

在暴力昇高、打擊面擴大，增加愈來愈多的階級敵人時，一句新製的宣傳口號強調資本主義家庭的子女亦是討伐的對象，口號的內容是「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的兒子會打洞。」一簡言之，父母是資產階級，子女自然也是資產階級。一個遵崇馬克斯唯物主義的國家竟只著眼於遺傳學，眞令人驚訝。而我沒有心情也沒有時間去仔細想它。口號發表沒多久，我的女兒梅萍從群衆中被拉出來，安置到牛欄。所有影片攝製場中的「階級敵人」，也都統統集

中於此處。而牛欄得名的由來是毛澤東曾稱階級敵人爲牛鬼蛇神。在牛欄中，所有的人都必須不斷寫自白書和自我批評，以洗滌他們違逆毛澤東教條的反動思想。在老趙與紅衞兵的談話中，我明白了情況。那天，在我臥房外，老趙大聲的問紅衞兵可否拿被褥衣物去影片攝製場裏，給牛欄中的梅萍，因爲她不能回家來。一會兒，我去廚房吃晚餐（我吃不下但我假裝吃），以便知道我女兒的處境。老趙技巧的待我一坐下即對那個未起疑的紅衞兵談梅萍。

「當我拿東西到影片攝製場時看見了她，她看來還不錯，她告訴我：她在寫關於她自己及階級成分的自我批判，還說所有牛欄中的人都非常友善。不過，我不明白，她寫什麼自我批判呢？她是共青團的成員，還立那麼多功，她對無產階級是同情的啊，有一次，她甚至救了一個窮農婦，那個女人生了疾病，她划着船載那名農婦去看醫生！」

「她出生在國外，又有這種家庭，她當然必須寫自我批判。」那個紅衞兵告訴老趙。「她可能是個蘿蔔—外紅內白，無論怎樣，共青團已經解散了，共青團總書記胡耀邦是個修正主義者。」

過了沒多久，從影片攝影場來的一群革命分子搜查她的房間，並帶走她剩下的東西。我對於事件的新轉變非常不快。當箭頭指向我時，我能將自己超脫於多外，但當我的女兒成爲迫害的對象，深深的憂鬱便摧殘著我的心。

九月二十七日的下午，紅衞兵、革命同志帶我到七月時曾到過的學校大樓。群衆已在那兒等待着我們，這次我是鬥爭大會的目標，參加的人們不只是到過我家的紅衞兵及革命同志，還有從前蜆殼石油公司的同事及那個曾質問過我且負責「教育」的男子——那個戴眼鏡的。

這房子的佈置與先前不大一樣，座椅被排成扭曲的弧形，我站在中間，紅衛兵分佈在兩旁。那個戴眼鏡的男人眞是個會講話的傢伙，他從鴉片戰爭開始，生動的描述英軍艦艇入侵並砲轟中國海岸。他的說辭漏洞百出，目的是要群衆增加對我的仇恨，讓我獨自承擔一百多年以前英國人攻擊中國的錯誤。他講得好像是我率領英國艦隊沿珠江而上的，然後他說：蜆殼公司是跨國企業，分支網遍佈全球。他說：列寧曾罵這種公司是社會主義最可怕的敵人。他告訴群衆：蜆殼很早以前就派船員假裝賣煤油給農民，深入中國內地，蒐集對帝國主義者有利的情報。他報出一個數字，說那是蜆殼公司在中國經商所得到的巨額利益，並稱也是對中國人民的經濟剝削。他告訴群衆：英帝走狗比美帝走狗更狡猾。當美國公開反對人民政府並保護在台灣的國民黨時，英國給了人民政府外交上的承認，却在聯合國內與美國一致投票反對人民政府獲取代表中國的席位。

他換了話題，談我的家庭背景，告訴群衆我是大地主的後代；市政府的聯絡員曾說我祖父是個愛國者，他却避之不提，口沫横飛的告訴群衆我祖父是個骯髒的大地主、是封建主義的支持者，爲的是我祖父在其所寫的歷史書籍中稱讚了幾位帝王。而且，他說，留下的文件證明我祖父是漢冶萍鋼鐵公司的創立者及股東，漢冶萍鋼鐵公司包括安陽煤礦—毛曾在此組織工人對抗資本家。這段控詞意圖將先祖父與毛對立。事實上，這兩個人本不是同一個時代的人。他又說：我父親是北京政府時代的高級官員，且在青年時代留日多年。他提醒大家，日本入侵中國的罪惡及在八年內殺害一千多萬無辜的男女和孩童。他小心的避免提及家父是這個世紀初（早在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中國之前）到日本去的，另外他製造一個假象—強調

家父的留日，却淡化日本對中國的所作所爲。他指著我說：我二十歲就去英國，然後在他們的大學被訓練成「一隻忠實的走狗」，而已故的外子被描述成國民黨政權的殘渣，幸好外子已魂歸九泉，否則我看他也難逃鬥爭的命運。

整個演講中，群衆喊口號以表示他們的贊同及支持。一些人指控我是間諜，讓外國勢力圖謀不利中國，其他人只抨擊我是英國的「走狗」。

當他結束演講，曾帶領其他人到我家的那個紅衛兵，對麥克風誇張著我家的豪華、奢侈。另一個紅衛兵說：我保存舊文化來對抗他們。而一個革命分子提到我驕傲、自大，並控訴我畜意養猛獸在家，咬傷了革命同志。

蜆殼公司以前的同事被叫起來，以提供更多的證據攻擊我。我可以清楚地看見他們是多麼害怕，我猜想他們已做過了一些調查。那些站起來預備講話的男子們，臉色發白，雙手顫抖，沒有一個人住我這兒瞧。他們自手稿中唸出來的毫無實質意義，一味在我與上海的英國人有深厚的情誼的話題上打轉兒，一個電梯操作員說：英國的經理坐電梯時總先讓我進去，另一位司機也作証：當經理和我共坐一部車時，我總是先上車。說它顯示出我對英國帝國主義者的價值和重要性，因爲在中共，男性上級絕不會讓一個女助手先乘車或先上電梯的。

其他的工作人員提到經理辦公室旁的檔案室，只有經理和我可以進入使用。一位在蜆殼公司工作多年的資深員工說：有關中國石油蘊藏區域地圖必定放在辦公室，因爲這些對帝國主義者而言十分重要。另外一個唸了一段摘錄，依其所述這是一位蜆殼分公司經理自一九四六——一九四九年的中國內戰期間，從國共二軍隊陷於艱苦戰鬥的報告中摘錄下來的。報告中

還提到雙方的軍隊佈署，他說這話的目的是否定我說蜆殼公司只對商業有興趣的話。

先夫亦遭受嚴厲的批判。所有的敍述摻雜了事實與虛構，這些誇大不實的言辭只是意圖誤導那群易受騙的無知心靈罷了。

這場大會久久拖延未決，暗夜早已降臨到這個都市，但我個人這場不幸的悲劇却這般引人入勝，沒有一個紅衞兵離開。我想大多數的人以為發現了眞正的國際間諜，而其他人只是假裝相信這些陳述而已，我看到主持大會的那個同志正為勝利而洋洋得意。

幾年後，我才知道鬥爭大會的日期一再延期，是因為大會的那些人希望我女兒也加入鬥爭行列。儘管他們施的壓力很大，我的女兒始終沒有就範。但「國慶日」快到了，毛派的領導者為了在一種勝利的氣氛下慶祝頒令上海的革命分子製造些實質的成果出來，為了應付上級，負責我的案子的人只好決定召開沒有我女兒在場的鬥爭大會。

戴眼鏡的同志審視現場群衆的情緒已至最高潮，大口稱讚那些鬥爭我的男女，還為他們高度的社會主義者的警覺喝采，他並誇獎那些前蜆殼公司的員工，宣稱他們之中的絕大多數已從再教育中洗鍊出更清楚的腦袋。但他警告那些「死硬派」的分子們，呼籲他們加倍努力自我批判以擺脫資本主義的束縛。輪到我了，他說：「你的罪証如山，你對中國人民所犯的罪是極端嚴重的。只有完全的坦白、告訴我們你如何與英帝國主義陰謀破壞人民政府，才能被改造。你承不承認？」

「我沒有做任何不利人民和政府的事。是政府要蜆殼石油公司留下來的。那道命令還是國務院發佈，周總理簽署的。它對中國及中國人民十分友好，而且也遵循著法令和規章，蜆

殼公司並沒有涉及中國的政治……。」我說。

雖然我用嘹亮而清晰的聲音，但在場者沒有一個能聽到我完整的句子，因爲群衆的怒吼淹沒了我的話，他們高喊著：「坦白！坦白！」和「階級敵人不許爭辯！」同時，這些歇斯底里的紅衞兵威脅的圍攏我，對著我的臉揮舞著拳頭，拉扯我的衣服、啐唾沫在我的夾克上，又喊著：「骯髒的間諜！」「下流的走狗！」。好幾次他們用力推我的時候，我都必須支撑自己堅定的站穩。

這場大混亂進行時，台上的人歪著嘴笑，而那個戴眼鏡的似乎很高興我在群衆手中受苦。我能怎麼樣？解釋是徒勞的，而且比不抵抗更糟，如果我動一動，這些暴民會湧向我，我只好站在那兒，直直的望著眼前遠方的牆，希望他們的憤怒會自然平息。

最後，聲浪終於降低了一點。那個男的說：「別逼我們判你死刑，給你一個改造自己的機會，快承認吧！」

每一個人虎視眈眈的瞪著我。我已站在此地忍受他們這麼久的糟蹋，我該對他們充滿著恨意才對。但我所強烈的情緒只化成一股深沉的悲哀。同時，我好想看看我的女兒。我悲哀的是我無法令這些繞在我身邊的人們明白我是無辜的；溯自一九四九年共軍接收上海後，他們所接觸、吸收有關階級鬥爭的宣傳已在我們之間築了一道牢不可破的牆，而這並不是虛弱的我能瓦解的。

在那個男的注視了我幾秒鐘，發現我沉默不語，便做手勢叫群衆後頭的一名青年上來。群衆分散開來，讓他經過。他帶著一副閃亮的金屬手銬，並且擎得高高的讓我看見。當他來

到我佇立之處，那個負責鬥爭大會的男子問我：

「你承不承認？」

我用平靜的語氣告訴他：

「我從來未做任何不利人民政府的事情，我與外國政府也沒有任何關聯。」

才說完——

「過來！」這個帶著手銬的青年大喊。

我跟著他離開了大樓到街上去。其他的人們跟在我們的後面。

學校入口處停放著一部上海公安局的黑色吉普車。對上海的老百姓而言，它是熟悉的。每逢政治運動的高潮，他們便看到它拉著尖銳的警報押著受難者從街上呼嘯而過。紅衛兵、革命分子及前蜆殼公司的員工站在吉普車旁，而一些路人則駐足圍觀者。

「你承不承認？」戴眼鏡的男子再次問我。

我默唸著詩篇第二十三章：「耶和華是我的牧者，（在您的帶領下），我必不致……」

「你是啞巴啊？」

「怎麼沒有聲音啦？」

「說話啊！」

「認了吧！」他們怒叱著。

那個戴眼鏡的男子和那名公安局的同志，仔細審視著我。他們誤以為我的沉默是「示弱」——其實，當我在心底默唸過上面那段詩篇後，我覺得好多了，我從沒有如此無懼過。我抬

起頭，用堅定的語氣大聲說：「我沒有罪，我沒有什麼好承認的。」

這次沒有人對我叱責。紅衞兵、革命分子以及一旁的路人或許對這莊嚴的時刻有著敬畏之意。在我說完之後，戴眼鏡的男子做了個手勢，那個公安局同志便將我反手銬起來，我聽見人群中有個老人發出深深的嘆息聲。

驀然，一位女孩推開衆人擠進來，顫抖的說：「承認！快承認！他們要帶你去大牢了！」她那幼稚、年輕的聲音就像銀鈴般劃過了嘈雜街道。這個臉色蒼白、短髮的女孩，就是在紅衞兵抄我家時，坐在書桌旁爲遺失珠寶而心怯的女孩。她衝動的想救我免去牢獄之災，却立即被一名女子拉進學校的大樓裏。

吉普車的司機發動了引擎。

「進去！」那個男的推了我一把。

坐下來眞好，我看著在旁邊看熱鬧的男男女女，且看到前蜆殼員工的眼神裏流露出一種解脫。也許他們想只要我不在，他們就沒有恐懼感了，其他的群衆看起來很興奮。對他們而言，好像看了場驚心動魄的鬧劇，而更有意思的是，他們也參加了演出。

這個從公安局來的年輕人坐在司機旁，而戴眼鏡的男子與我坐在後座，吉普車衝向那幽暗的街道。

第二部　拘留所



第五章　單獨監禁

往常晚上九點過後行人絕跡的上海市街道，竟一反常態的人山人海。在秋涼中，人們成羣結隊出外看紅衞兵如火如荼的搭設的講台，聳動人們加入革命行列。他們忙於鬥爭、在街上亂抓人，在屋外，一陣陣焚書的烟幕從花園的圍牆外升起，路邊停着許多輛卡車，車上滿是自資產階級家庭中搜刮來的家具、用品，而街道上擠滿了人群，公車和脚踏車只能在夾縫中緩慢前進，城市的日常運作都在爲日益擴大的文化大革命舖路。

各街頭的擴音器廣播一些新的革命歌曲，如：「馬克斯主義曾說過：革命是正當的。」「航海靠舵手；實現革命靠毛主席。」。如果只聽到音樂前進的節奏，沒有聽到好戰的歌詞，如果只看到擁擠的人群，沒有犧牲者與紅衞兵，很可能誤認這是秋夜提供人們娛樂的美好景象，而不是政治活動，空氣中充塞了在群衆互相猜忌與階級仇恨的血腥暗流。

因壓力與緊張，我心力交瘁。我不知道要被帶到那裏去，而且我也不敢想像。我爲受到不人道的待遇而憤慨，因爲我從來沒有對不起人民政府。控告我犯罪對不起國家實在很荒謬，那只是一個懲罰我生活舒適的藉口。很明顯，我是個階級鬥爭的犧牲者，正如我的朋友溫妮所說，因爲蜆殼公司關閉了上海分公司，所以在上海的毛派分子會把我降成無產階級。城

裡的人漸漸熟悉了運送我的警車，不管車子何時被迫暫停，總有一群好奇的人爭先恐後窺覷車裡的「階級敵人」，有些爲無產階級又逮捕一個敵人的勝利而喝采；有的只是好奇的看著我；有的躭憂的突然掉頭走開，似乎想遠離這個人類死亡的噩運。

在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大陸，「入獄」所代表的意思與民主國家不同。常有人被定下莫須有的罪，直到他能證明自己清白爲止。被告並不因他們的行爲被判決，而是以祖先過去曾擁有的土地面積來定罪。那些錯誤階級出身的人頭上，總有一大堆犯罪嫌疑。而且，毛曾經宣佈人口的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是社會主義的敵人，爲了證明所判無誤，他發動政治改造運動，無論是政府機關、工廠、學校、大學，一定要找出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的政治犯、反社會主義或反毛澤東思想的異類。這些被發現有罪的人，被送到勞改營或監獄中，在這種情況下，多少無辜的被抓冤獄案件成了家常便飯，入獄不再是背負著道德墮落或違反法律的汚點，事實上，這些人常對政府的誣判表示懷疑；而在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人民，都以同情的眼光來看政治犯。

自從六月初捲入文化大革命而決定不做虛假的自白以來，我一直沒有排除入獄的可能。我知道許多人，包括老練的黨員，在壓力下依慣例承認自己有罪，藉此避免與黨爲敵而求得減輕折磨。還有一些人由於受不了壓迫而精神崩潰，做了不實的自白。當一個政治運動結束，有些人會復原，許多人却得終身受難。在中國大陸偏遠荒涼的省份，例如甘肅、青海的勞改營中，許多無辜男女正服着重刑，只因爲他們供認了不實的罪名。要我莫名其妙的認罪，似乎是一種愚蠢的行爲，所以不論受什麼苦，我都決定面對它。

我知道遭受迫害的日子近了，不管擺在面前的是什麼，我必須讓企圖陷我入罪的迫害者無法得逞。只要他們不殺我，我就不放棄。所以，當坐在吉普車上，我的心情不是害怕或屈服，而是面對事實的勇敢。

吉普車駛入鬧區後，由於人群密集以致車子慢吞吞的沒過幾個路口就被迫停一次。那個戴眼鏡的男人告訴司機打開警報器，令人起雞皮疙瘩、忽高忽低的尖聲，凌駕了革命歌曲，也淹沒了其他的噪音。當群衆讓路給吉普車過時，每個人都好奇的回頭看。司機加速通過不再有阻碍的街道。沒多久，我們停在兩扇黑色鐵門外，兩名武裝衛兵守候著，槍上的刺刀在街燈下閃閃發亮。在大門邊的白色木板上面寫著五個字：一號拘留所。

吉普車駛入大門後，在車灯照射下，我看見夾道兩旁種着些楊柳，再右轉，一邊是籃球場，另一邊一些像死屍的假人綑在柱子上，幾個月後我在被帶到監獄醫院途中藉着白天才看清楚這些原來是監獄衛兵的練習靶。

一號拘留所是上海市一個關政治犯的監獄，它收留過主教、國民黨高級官員、名企業家、名作家和藝術家。最諷刺的是，這不是共產黨政府新建的，而是一九四九年以前國民黨政府用來關共產黨員與其同路人的監獄。

政治犯的拘留所是獨裁政權極其重要的一環。我一直以旁觀者的身份，在舒適的家庭環境中研究中國共產主義，而現在，更有機會從完全不同的角度來研究。眞荒謬，這竟令我興奮，並讓我暫時忘記自身所處的危險境地。

吉普車沿著路走，通過另一扇鐵門，經過監獄警衛的營房，停在大樓前面。進去後，一

名戴著前面有紅徽的卡其帽的女警衛，帶我進入一間空屋，另一個穿制服的女人正在裡面等我。關上門，他把我手腕上的手銬打開，然後說：「脫衣服！」

我脫下衣服放在房裡唯一家具的桌上。這兩個女人非常徹底的檢查我每一件衣物。她們在我長褲口袋中找到一只裝有四百塊人民幣的信封，那是我準備給園丁的。

「你爲什麼帶那麼多錢？」其中一個問。

「那是要給園丁的，可是他沒來。也許有人可以幫我轉交給他。」我說。

她把衣服還給我，除了胸罩—毛派的人認爲它是代表西方頹廢的衣物。我穿好衣服，那個女警衛領我穿過昏暗狹窄通道，來到盡頭的房間。

天花板昏黃的灯光下，一個看來像北方莊稼漢的男人，坐在櫃枱後面。女警衛指著一張面對櫃枱但離櫃枱有幾尺遠的椅子，叫我坐下。她把那個裝錢的信封放在櫃枱上，然後跟那個人講了一些話。他抬頭看我，然後，以意外溫和的聲調，問我姓名、年齡、住址，緩慢的用筆寫在一本書上，似乎不太自在而且記不清每個字的筆畫。我並不驚訝，他顯然識字不多，據我所知，共產黨指派工作是看政治上的可靠性，而不是教育程度。

那個人總算寫完後，說：「在這裡不再用你的名字，而是用一個號碼，警衛也這樣叫你。懂嗎？」我點點頭。

一個帶著照相機和閃光灯的年輕人走進來叫我站起來，從不同的角度拍了幾張相片，然後大搖大擺的走出去。我又坐下來，希望他們快點辦完事，我累死了。

櫃枱那個男人慢吞吞的繼續叮嚀：「一八〇六是你的號碼，以後你就叫一八〇六。記住

。」女警衛指著貼在牆上的一張紙說：「大聲唸！」

那是一份監獄守則。第一條、所有的犯人每天要讀毛澤東的書籍，設法改造思想。第二條、但白認罪，並且揭發其他共犯。第三條、同寢室有違規行爲得向警衛報告，其他規定是關於在拘留所中日常生活的用餐、洗衣等事項。

當我唸完，女警衛說：「不但要背起來而且要做到！」

那個男人叫我用右手大拇指沾印泥捺在登記簿上。印好後，我問他要了張紙擦手。「快點！」女警衛不耐煩的在門口大喊。相反的，這男人脾氣好多了，他打開抽屜，拿出一張皺巴巴的紙交給我。迅速的擦了拇指，我跟著那女人走出去。

這兩個人看來似乎對一個入獄的新人無動於衷，這場入獄手續對他們來說，只是例行公事罷了，但對我而言，跨入監獄門檻卻是生命中另外一個新局面。當經歷過爲生存、爲正義的掙扎後，我的精神更加堅強、政治意念也更加成熟，我花幾個小時獨自檢討我的生活，而自從一九四九年共產黨奪取政權後，在中國所發生的事也使我更能瞭解自己和所接觸的政治關係。雖然，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七日晚上，我在被送到拘留所時無法預知未來，但我並不害怕，我相信正義慈悲的上帝會帶領我走出地獄。

外面是一片漆黑，地面凹凸不平。我跟在女警衛後面，深深吸了口夜的氣息。我們繞著那棟主要的建築物走，斑駁褪色的紅門旁透出微弱的灯光，我們進入一片小庭院，在那兒我看到一棟二樓的建築物，那就是關女犯的地方。

入口附近的房間裡，出現一名打呵欠的女警衛。沒說一句話，我就被交給她了。

「過來！」昏昏欲睡的她帶著我經過一條走廊，整排的門都有閂和掛鎖——這一幕監獄走廊的景象是我永遠無法忘記的，接下去幾年在我的惡夢中不斷的重現。微弱的灯光下，沮喪與無助向我當頭罩來。

當我們到達走廊盡頭，衛兵打開左邊的門，是個空房間。

「進去！」她說。「你有東西嗎？」

我搖搖頭。

「明天一早會通知你家人，叫他們給你送東西來。現在進去吧！」

我問她是否可以上廁所，她指著房間左手邊角落的水泥桶說：「我給你一點衛生紙。」她把門閂插進去，發出很大的響聲，然後上鎖。我聽見她沿著走廊離去。

環顧房間四周，我心灰意冷。蜘蛛網掛在天花板上，一度是白色的牆壁因經不起歲月的流逝而變黃，赤裸的灯泡被塵垢覆蓋，灯光昏黯，坑坑洞洞的水泥地潮濕而發黑。一陣刺鼻的霉味撲鼻而來，令人作嘔。我趕快打開加有銹蝕鐵條的唯一小窗（我必須踮著脚才能碰到它。）當我抓到把手，搖開窗子，剝落的油漆碎片像雨點般掉落在地上。房間裡僅有的家具是三張狹窄的木板床，這輩子從沒想過我有一天會待在這種鬼地方。

警衛帶著幾張粗糙不堪的衛生紙回來，從門口的小方形窗口遞給我，一面說：「拿去，有的時候你要如數還給政府。現在去休息，頭朝門口，這是規定。」

我實在沒辦法讓自己去碰這張滿佈灰塵的床，但我實在需要躺下休息，因爲我的雙腿已經紅腫。把床拉離骯髒的牆壁，然後用衛生紙擦拭，但長年累月的污垢根本擦不掉，最後我

妥協了，勉強在上面躺下來，天花板中央的赤裸灯泡，正好在我的頭頂上，雖然灯光微弱，但仍讓我難眠，環顧四周，怎麼我都找不到開關。

「對不起！」我叫著，一面用手敲門。

「吵什麼！」警衞趕緊過來打開小窗口。

「我找不到電灯開關。」我告訴她。

「我們這裡晚上不關灯，以後，你有話跟警衞說，就說『報告』！不要敲門，不要說別的。」

「你能不能借我根掃帚，裏面很髒。」我要求她。

「荒唐！現在都兩點多了。去睡覺！」她關上小窗，但仍留在外面，從小孔看我，確定我是否照她的話做。

我又躺回床上，把臉轉向骯髒的牆壁，避開灯光。儘管我閉著眼睛，却必須吸入四周的潮氣與塵垢。在遠處，我依稀聽到街上群衆的嘈雜聲漸漸增強，那對我不再有威脅，但我就心梅萍。我希望到拘留所後能使她免於來告發我的壓迫，如果眞的如願，這一切就不再那麼使我難受了。

突然，一群蚊子向我展開襲擊，我坐起身和牠們展開戰鬪，但牠們是如此的兇頑，我被叮得很慘，癢與紅腫加重了我的不適與煩惱。

破曉之前電灯才熄掉。黑暗中，一切的骯髒與醜陋全消失了，我想像置身他處，這是個鬆弛的時刻，但沒多久，天色漸漸轉亮，陽光使房間的醜陋面目再度重現。然而，在這間囚

室的幾年中，這段熄灯後、破曉前的黑暗時刻，却是我恢復尊嚴，感覺重生的時刻，只因爲不在衞兵的監視下，這頃刻之間是珍貴而自由的。

通道傳來腳步聲。「起床！起床！」同樣的聲音在每間囚室門口響起。我可以聽到整棟建築中人們走動的聲音及樓上囚室的耳語及動作聲。

門上小窗口被打開。一個年輕女人說：「水！」然後把水壺嘴伸進來。

當我告訴她我沒有東西可裝水時，水壺又被收了回去，然後小窗口出現一張年輕蒼白的臉龐，當四目相遇那一刻她給了我一個微笑。幾天後，我看見她夾克前面釘著一塊白布，上面寫明她是被判勞改的犯人。後來，只要有機會，我們爲彼此在國家監獄裡相同的痛苦命運而相視苦笑。與她無聲的接觸、還有她那蒼白臉上的微笑是我在拘留所幾年來的莫大安慰。當她走後，我有很深切的失落感，甚至有一段時間非常沮喪。

小窗口又打開了，一個長方形的鋁盒伸進來，一個女人的聲音很不耐煩的說：「過來，過來！」

等我接過飯盒，她說：「以後，吃飯時間站在這裡等。」她給我一雙濕漉漉，而且因用了太久都變細了的筷子。

磨損的飯盒中裝着半滿的溫稀飯，上面只浮著幾片醬菜。我用衞生紙擦飯盒的邊，然後嚐了一口。稀飯不知道怎麼搞的有點焦味，加上鹹死人的醬菜，變得有點苦。食物比我想像的還糟，但我盡力喝掉一半，待那女人再打開小窗子時，我交還她飯盒和筷子。

過了一會兒，來了另一名女警衞，她說：「你爲什麼不吃？」

「我吃不下，我能不能見負責人？」我問她。(中共官員不叫「官員」，除非加上正式頭銜，例如「王部長」或「張局長」，一般來說，公務人員被稱爲「幹部」，正式的漢英字典譯爲 cadres，小的官員經常被稱爲「負責人」，指幹部或辦事員。)

「急什麼！你才剛到！審問人員準備好的時候，會叫你的。現在想想你犯的罪吧。等到叫你的時候，一定要好好自白以表示眞正悔改，才會得到寬容。如果你揭發其他人，會得一些好處。」

「我根本沒犯罪。」我極力聲明。

「剛到這裡的人大部份都這麼說。別蠢啦！想想看，整個城市有一千萬人，如果沒犯罪，爲什麼被帶到這裡來的是你，不是別人？」

跟她爭辯似乎沒有意義，但她的話使我確信將要在這裏待上一陣子。室內汚穢的程度令人無法忍受，如果我要在囚室裏多待一晚，就必須打掃它，而且，我知道勞動可以鎭定神經。我發現自己很難適應囚禁，而且也非常躭心女兒。我問她可不可以借我掃帚掃地。

「只准禮拜天借。不過，你剛來，我就破個例吧。」

不一會兒她從小窗口塞進一把破掃帚。我拖過床站在上頭淸除天花板上的蜘蛛網。當掃牆壁時，整個房間瀰漫著灰土。

小窗口又被打開，一張紙從窗口遞進來。往外看，一名男衞兵站在那裡。

「你身上的錢我們幫你存起來了，這是收據，你可以用它買些衞生紙、肥皀、毛巾啊什麼的。」他說。

「我正好需要它們。現在可以買嗎？」我問他。

「可以呀。」那個人說。

「請幫我買一個洗臉盆、兩個吃喝用的瓷杯、一些縫衣針、線、肥皂、毛巾、牙刷、牙膏和一些衞生紙。還有，我可不可以買點兒冷霜？」

「不行，只能買必需品。」

他很快就回來，帶了一個有兩朵玫瑰花的臉盆、六條彩色條紋的毛巾、一疊衞生紙、六塊廉價洗衣皂、兩個搪瓷杯及杯蓋、一支牙刷、一條牙膏、兩軸粗棉線。他告訴我犯人室內不准有針，但星期日的時候可以跟警衞借用。

衞兵開門給我臉盆。趁開門時，另一名衞兵帶來紅衞兵留在我家的衣物和舖蓋，除此之外還有毛澤東選集和毛語錄。簽收這些東西後，那兩個警衞鎖上門離開了。

小心的檢查了一遍所有的東西，希望能找到女兒給我的字條，但是什麼都沒有，我坐在床邊，因失望、悲傷而厭倦。我是那麼渴望與我的梅萍見面，即使是一張她短短的字條也好，但，什麼都沒有，在頹喪中我掙扎着爲她的安全向上帝禱告，過一會兒，我覺得心平氣和多了。首先！打掃這個髒房間，我需要一些水。

「報告！」我走到門口大聲喊。

另一個女警衞推開小窗口，嚴厲的說：「叫什麼叫！你現在又要什麼？」

我從她的聲調知道可能會被拒絕，爲了把握機會，我很快地背誦了一段毛語錄：「衞生是光榮的；不衞生是可恥的。」然後問她：「能不能給我一些水清洗房間？」

她一聲不響的走開，我等了又等，那個服勞改役的女孩終於送水來了，我裝滿新臉盆及從家中帶來的盒子，迫不及待的將床鋪徹底洗一遍，然後爬上捲起的舖蓋，擦拭滿是塵土的玻璃窗，這樣，光線會好些，在我洗好屋角的水泥馬桶後，我仍有足夠的水洗澡和洗上衣。飲用的熱水分發下來時，我坐在乾淨的床上喝它，第一次我發現白開水竟是這般甘美。

午餐是乾飯和水煮包心菜，我用了點飯做漿糊，把衛生紙沿著床邊貼在牆上，這樣睡覺時，我的床單、棉被就不會碰到骯髒的牆壁了。一切弄好之後，我覺得舒服多了，當警衛來叫我在房間內走動時，我說要還她掃帚。

她打開小窗口接過去，同時看見了貼在牆上的衛生紙。

「不准在房間裏動手脚！」她說。我保持沉默，心想著如果她要我把衛生紙拿掉該如何應付。但她只關上小窗口，我聽到她在樓上一間間的喊著：「運動！運動！」

立即，許多人的脚步聲在我上面踱着，運動時間結束後，警衛叫大家坐下，我聽見許多犯人重重坐在地上的聲音。顯然樓上多人同住的囚房裡沒有床，犯人睡或坐全在地上。我和隔鄰之間的牆太厚，聽不到任何聲音，但是可以很清楚的聽見樓上模糊的喧嚷。上面女犯的說話及動作聲，可以緩和我被隔絕的強烈孤獨感，尤其當警衛都不在附近時。

正常生活中可使感官產生愉悅的顏色、形象與不同聲音的交響，在監獄裡完全消失了，入眼的盡是醜陋的形狀和陰沉污灰的單一色調。除了衛兵那權威、冷漠、不關心的聲音之外，一切都是讓人透不氣來的死寂，在囚室中，我常透過窗上的鐵條凝視獄外的天空，一發呆就是幾個鐘頭。光線和新鮮空氣從窗外透進來，維持我的生機，「窗」成了我和外面世界連繫

的唯一孔道。往常，我的肉體雖坐在囚室裡，心却經由窗口奔向自由。我的監獄生活最生動的記憶之一，就是看著鐵窗在水泥地上移動的影子。從緩慢移動的影子，我看著時間無情的流逝。我一天一天、一年一年的等，有時是等著下一餐，有時是等著下一次審問，除了這一切，我還等待能控制毛派分子權力的政治進展。

日光漸漸消逝，電灯又亮了，我吃了另一份飯和包心菜。夜班警衛換了另一個女人，她給我報紙，並把臉湊在門上小洞口大叫：「房間怎麼弄的？」

「我遵照毛主席在衞生方面的教導，清理過了。」我回答。

「如果你留意過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教訓，怎麼會被關在牢裡？」她大聲說。「毛主席教你犯罪嗎？」

「我從沒犯過罪，他們弄錯了，事情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我說。

「你很會說話嘛！你把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帶到這個地方，是不是？我勸你少講究享受，多想想你的罪。好好考慮，在你被傳訊的時候，一定要完全認罪，這樣才能從寬量刑。」不等我回答，她關上小窗口。

我已厭倦了這種要求認罪的談話。也許是眞的，一個眞正有罪的人可能因自願認罪而減刑，但我無罪啊！

撿起報紙，我就看微弱的灯光閱讀，正如中國大陸其他報紙一樣，上海自由日報的出版與經費完全受人民政府控制。記者也均由黨的宣傳部指派，他們的工作是爲了宣傳目的，經常扭曲新聞並且「選擇性」的刊登國外消息，還有就是頌揚政策。在中國各地，包括監獄，

報紙是用來教育人民的。

中國人民很久以前就學會讀報紙要能讀出言外之意，還要同時注意「省略」的部份。事實上，中國人民的消息來源不是報紙，而是人與人之間低聲交換的政治性耳語。通常，在沒有提到姓名的象徵性語言中，這叫做「小道消息」，意思是說這消息不是公開從大馬路來的，而是從官方走漏的。過去，在共產黨控制政權之前，它的地下組織有效的利用「小道消息」暗中破壞中國人民對國民黨的信心，現在，他們却反受到損害。人民不信任官方的報紙又不能自由的得到新聞，他們自然會更熱切的去聽信政治閒談中得到的任何消息。

在拘留所裡，上海自由日報是我獲悉外界消息唯一來源。我很仔細的讀，有時候同樣的內容反複看上數次，為的是想瞭解文革的進展與評價，及正在進行的政治發展。從他們發佈消息的手法、特殊文章的主題、編者的語氣、特別日子刊登的毛語錄，我可以看出毛派正進行，或不了了之的計畫。無論如何，在我被釋放之後，我完全瞭解共產黨內部權力鬥爭的許多細節。我蒐集未審查過的紅衛兵刊物，而且一有機會就問參加過革命活動的年輕人。

當星期日我向警衛借了縫衣針，連接兩條新買的毛巾做了個水泥馬桶的坐墊，並把幾層衛生紙縫起來做個存水用的臉盆蓋；把一條手帕剪開做成眼罩（晚上蓋眼睛用）。當我借用剪刀時，警衛站在小窗口監視我，等我一用完就拿回去。做點實際的事來改善的日常生活令人釋懷，我發現縫紉眞是一件撫慰人心的工作。

幾天後，我每天要求見審訊者，却沒有結果。一個清朗的早晨，他們通知犯人準備戶外運動。警衛到每一間去叫：「放風！」

渴望陽光與新鮮空氣的我，興奮的跳起來。迫不急待的衝到門口，但在被放出之前我仍需等待一段時間，獄中爲了防止不同囚室的犯人相見，我必須等到隔壁的犯人從轉角消失後，才可以離開牢房。警衛沿著路線站著看守犯人，然後帶她們去運動場。

我被帶進運動場，運動場很大，陰沉斑駁的牆壁內暴露着磚塊，地上是土壤和鬆砂石。我看見在角落裡有綠色的東西，而且發現一叢生機盎然的野草掙扎著求生。在這個冷漠的地方看見富有生機的東西實在是一大喜悅，我過去仔細看，每一根莖上長着粉紅的小花，每朵花有五個比種子還小的花瓣。在砂土中，陽光下，一株孤傲的植物，給這個死寂的荒土帶來了生機。凝視著這朵美麗的小花朵，我的心突然昇華到無極的境界。

「走！低著頭走！不准停下來！」一名警衛在運動場的講台上大聲對我喊。

我開始繞著運動場走，我胸中的抑鬱逐漸鬆弛了，而且呼吸輕鬆。秋天的空氣涼爽乾燥，陽光溫暖、柔和。獄中是度月如年，但在戶外就不同了，甚至在嚴冬，即使衣物無法保暖、寒冷的北風令我發抖，戶外運動的時間對我而言仍嫌不夠。

帶我回房的男警衛沒法立刻找到門口的鑰匙。當他一支一支試時，我再度要求見審問員：

「我已經在這裡很久了。我可以見審問員嗎？」

「很久了？」他轉過身來面向我：「你胡說。我知道你來這裡不到一個月。一個月那算久？有的人在這裡一待幾年案子都沒解決，你怎會那麼沒耐性？你老是要求見審問員，見到他你要說什麼？自白認罪嗎？」

「我要請求審判長調查我的案件，澄清錯誤。」

「什麼錯誤？」他疑惑道。

「把我帶來這裡的錯誤。」我說。

「你在這裡是因爲你違背人民政府而犯了罪，沒有什麼錯誤。不准再講廢話！」

「我一輩子從沒犯過罪。」我堅定的說。

「你要是沒犯罪，會被關起來？你在這裡就證明你有罪。」

他的邏輯推理讓我驚駭。好一個「黨與政府不可能有錯誤」的忠實信徒，我不想爲了指責黨和人民政府而與他爭吵，所以我只說：「眞的，我從沒犯過罪。」

「也許有些事你做過但不記得，犯人通常需要在審問員的幫助和引導下認罪。」

「我想，我不會不知道自己犯罪沒犯罪！」我告訴他。我回想著聽過的案子，審問員一面餵犯人吃東西，一面誘逼犯人自白認罪，所有的內容全被記錄下來，最後用來審判這些犯人。

「或許，犯了罪的時候你並不知道。」他說這話看來很誠懇。

無罪的行爲會被別人視爲叛國罪行？這可能嗎？我是那麼小心的跟隨著中國人民政府政治與經濟發展的腳步前進哪，爲了瞭解事情的眞相，我決定讀不曾讀過的共黨刑罰規章，所以，我告訴守衞：「那麼，我要讀法律的書，看看我是否確實不小心而犯了罪，你能借我看看嗎？」

「啥？你說這話就像文革時期被判罪的資本主義知識分子。你想要那些法律書籍、規定

、條文？對不起！我們是無產階級，沒有像那類的東西！」他看來很火大。

「沒有法律根據，你們如何決定一個人犯罪與否？」

「我們有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訓示，他的話就是我們的準則，只要他說那一種類型的人有罪，而你正是那一型，那麼，你就有罪，這比什麼狗屁法律容易多了。」他說。對他而言，藉毛澤東的話來決定人民的命運是錯不了的，而毛的話時常在某時期內依其特權而改變，又經常含糊不清，以致地方幹部爲所欲爲又無所適從。對毛的話絕對崇拜無疑是盲目信仰的一部分，但是，我懷疑那警衞知不知道究竟誰是這制度下的犧牲者？

他再次把我趕進牢房，我沒有進一步要求見審問員，我決心仔細的研究毛澤東選集，我想知道，他的話如何被用來定我的罪，且是否能用他的話來反駁我的控告者，我該熟背毛語錄，並且在我面對審問員時，能流利的引用出來。

日子一天天流逝，長久的牢禁使我透不過氣來，我渴望得到女兒的訊息，我不但想她而且擔心她。我經常因情緒激動而呼吸困難，有好幾次，我的胃像塡塞了一大塊東西，以致食不下嚥。

獄牆外面，文革似乎愈來愈緊張，鄰近中學的擴音器整天播放的不是革命歌曲，而是對地方幹部和著名學者的批鬥。我注意聆聽，試著在順風時聽清楚每句。在黑暗的牢房裏，每天，我研究毛選數小時，直讀到書上的字在微弱的光線下模糊不清時才停止。

一天下午，我的眼睛疲於看那些印刷字體，便移開視線注視窗子，一隻小蜘蛛順著一根生銹的窗桿往上爬，這小動物沒一顆豌豆大，要是窗框不是黑色的，我根本看不見牠。我看

着牠慢慢穩穩的爬上鐵條頂端，心想，對這隻小東西而言，這是段相當長的行程。當牠抵達目標後，突然搖擺身子，從牠身體織出的絲綫垂下來，一個搖擺，牠又把絲的末端接到另一鐵條上，然後順著絲線爬回原處，往另一方向結一條類似的線。我觀看這小東西辛勤工作反覆的結網。牠似乎很明白自己要做什麼，應該結在那裏一點也不含糊，牠知道牠的工作，有條不紊而且堅信不疑，當均勻、完美、漂亮的網完成，牠便到網中心安頓下來。

我看完這位藝術家的精心建築成果後，心裏滿是疑惑，是誰教牠結的網？這項技術是上帝賦予牠的嗎？讓牠藉着那片精密的網獵取食物，延續牠的種族？這種小生物的腦袋又有多大呢？牠祇是本能的做？或是從哪兒學來結網的常識？有一天，我會問昆蟲學家，那時候我將知道我目睹過一個非比尋常、美麗且令人振奮的東西，不管上帝與蜘蛛間的關係如何，我感謝祂使我看到生命的奇蹟也幫助我瞭解祂安排了一切，毛澤東與其革命派似乎不再那麼邪惡，我覺得心底有一股希望在那兒往上爬昇。

我的牢房面向西南方，當落日迅速西沉地平線之前，餘暉會使那剛結的網轉變成一個彩虹顏色的閃亮圓圖。我不敢走到窗前，深怕嚇跑了牠，我隨後又發現，祂不僅是在那兒等候獵食，也永遠保持警覺，任何時候，風吹壞了網的一角，牠馬上去修補，隨著日子流逝，牠不斷重新結網，有時祇重做一部份，有時甚至孜孜不倦的全部重做。

觀察過牠的活動且得知牠的習慣後，我愛上了這小東西。早上第一件事與晚上最後一件事便是觀察牠。當我確知道牠仍在那兒時，我感覺信心倍增。牠成了我的夥件，那種無邊的孤寂因擁有一個親近的生命而消失了，卽使牠那麼微不足道，又不能明白我的心意。

很快又到十一月了，大地颳起西北風，氣溫隨著每天的陰雨而降低，我焦急的看着那蜘蛛，不忍心關窗趕走牠；牠繼續修補被風吹壞的網，耐心的織着新網。但是，一天早晨醒來時，發現牠不見了，那遺棄的網成了碎線，我很難過，但仍抱著一絲希望打開窗子讓牠能進來。在一次望天花板發獃時，我發現在上頭的小角落中又重新織了一個網，牠就在網中央蹲着，我趕緊關上窗子，爲我的小朋友並沒有遺棄我而滿心狂喜。

十一月底的某天早晨，我因無孔不入的寒氣頭痛得醒來。坐在床邊，我考慮是否要申請一些藥。稀飯送來時，我吞喝完它，希望藉熱湯來趨趨寒氣；中午的乾飯和水煮甘藍菜，被我原封未動地退還給那女人，整個下午，值勤的守衛不時從小孔中監視我，直到晚上，她才突然推開小窗子，說：「你哭了？」

「噢！沒有。」我說。「我感冒了。」

「你哭是因爲不習慣這兒的生活環境，你發現每件事都無法忍受，對吧？我們一直注意，你想改善它們，也因想女兒而哭，你担心她會發生什麼事！」那警衛說。

「不是！我眞的感冒了，我可以吃片阿斯匹靈嗎？」

「要什麼阿斯匹靈！你簡直跟自己過不去嘛！認罪不是一切都沒事了？」她說。

那個晚上，我背向門坐在裏面，試著不流鼻涕或擦眼睛。晚飯我吃了一點，將其餘的倒進馬桶讓水沖走。

第六章　審問

這天早晨天氣晴朗，打開窗子，一陣冷風透入牢裏，冬天的脚步近了。守衞走過一間間牢房，叫裏頭的人拿牀單來洗，這是每個月撿個晴天實施的例行公事，牢房裏有冰冷的流水，可供監禁者用來泡濕被單，在擦上肥皂後，把它們遞出牢房小窗口，由勞改的女人收集到洗衣間洗滌。

我正擦肥皂時，一男守衞打開牢門，叫道：「出來！」

「我在洗衣服！」我說。

「廢話少說，叫你出來就出來！」

值勤的女守衞也來到門口，她說：「你可以待會再做，現在去受審。」

受審？我終於要和敵方正面接觸了，我在乾毛巾上匆匆擦了擦手。

「快點！帶著你的毛語錄。」男守衞不耐煩的說。我跟隨他走出牢門，穿過女牢房的圍牆到圍場後面。來到一棟樓房前，看見上面一塊白色大木板寫著幾個黑字：「對坦白認罪者輕罰，對頑固者嚴懲，對服務有功者褒獎。」

我興奮不已，步伐急切快速。這兒是還我清白和公平審判的地方，我相信一位政府的審

問員不可能與虛偽的紅衞兵或革命派一樣，他必定是個受過訓、負責又能區別罪犯和無辜者的執法人。

幾個守衞懶散的坐在那棟樓入口旁的小房間裏，其中一個領著我走過兩旁有許多偵訊室的走廊，多數的門關著，但我仍可聽到從裏面傳出的低沈聲音和偶爾的怒吼。那守衞在其中一扇門前停下，推開它，喊道：「進去！」

這房間又窄又暗，後牆上有一扇像我的牢房一樣的小窗，兩個穿著鬆垮垮、褪了色的藍色毛裝的人坐在窗下一張木桌後面，面對窗戶約兩碼處有張給犯人坐的長木椅。房裏很陰暗，窗口透入的微光就落在犯人的「座位上」，我注意到牆壁都是灰色的，水泥已又黑又潮濕，木櫃、桌椅已磨損爲淡灰色。

我進去後，其中一個說：「拿起你的書，唸一段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語錄的教條。」他選的那段和紅衞兵當時刦掠我家所讀的相同。

「當有槍的敵人消滅了，沒槍的敵人還在，我們不能忽視這些人。」我用堅決的音調朗誦著，可以感覺出那兩人正緊盯著。我試著不露出任何緊張的表情以免被視爲是畏罪。

「坐下。」那人指著給罪犯坐的椅子說道。

當我轉身坐下時，看到有個小窗子開在受審者座後的牆上，我得到結論：審問時，走廊上必定有人在聽。

我坐下，看著桌後的兩個人，這幾個公務員大概缺乏運動，所以看來臉色蒼白，與帶我來的守衞氣勢上截然不同，不過，這兩人雖然外貌寒酸，但還有股高幹自信與權威的特徵。

他們相當輕鬆自在，當然，審問犯人是他們的例行公事，我確定對我說話的是審問員，而一旁的那位是他的秘書。

我坐定後，審問員對着我後面的小窗子點點頭，這舉動印證了我早先的猜測：確實有人在外面聽我受審。有陣子，我完全失望，這審問員似乎並不是我眞正的「對象」，他祇是個中間人，我希望能親自面對控告我的人，並把他面貌刻入記憶中，永誌不忘！

審問員用一種低沉又近乎不耐的聲音問我的名字和個人資料，然後，他朝上看，提高聲音，堅決的問：「你知道這是什麼地方嗎？」

「我想是監牢或拘留所，因爲每個人都被關著。」

「你說對了，這是第一號拘留所，關政治犯的。這裏專門關那些反革命分子與反人民政府的罪犯。」

「如果是這樣的話，我不該被帶到這兒。」我堅定的反駁。

他不理睬我的話，平靜的繼續說：「你被關在這兒是因爲你犯了反對人民政府的罪。」

「這一定弄錯了。」我說。

「人民政府不會弄錯的。」

「你不是不負責任的紅衞兵，你是政府代表，不能隨便誣告一個人。」

「這不是誣告。」

「你必須拿出證據來證明你說的話。」我非常的失望，長久等待的審問竟與我入獄前參加革命分子的會議沒兩樣，眞敎人洩氣！

「我們當然有證據。」他昧着良心恫嚇我。

「那就拿出來呀！」我諷刺道，我要揭穿他裝腔作勢的卑劣面目：「既然有証據爲什麼不拿出來？那不是不必浪費時間就可以定我的罪嗎？」

「你不要嘴硬，紅衞兵和革命同志能找到我們需要的證據，沒有事情隱瞞得了，這些犯罪的人會供出你們這些人，因爲罪能減輕刑罰而且控告別人也有功。」

「我不相信你能用任何證據來寃枉我，我不是不瞭解無產階級文革的本質或低估人民政府的力量，而是因爲我不認爲你或其他任何人能揑造出根本不存在的東西。我從不犯罪，那會有什麼證據呢？」我說。因爲他扯了謊，所以我佔了上風，這加強了我的自信心。

「找到證據處理你是很簡單的事，不過，這不是我們毛主席的政策。審問的目的是幫你改變思想，給你一個藉坦白認罪而減刑的機會，這樣你才能從犯罪的過去脫胎換骨，而變成一個新生人。」

「我不是個魔術師，我不知道該怎麼去承認壓根沒有的事。」

「或許你還沒準備好，我們可以等。」他盯着我慢慢說著，暗示我長期監禁的威脅將開始。

「一萬年也一樣，沒發生的事就沒有發生，無論等多久，你們都改變不了事實。」我也緩慢、堅決的說，我要讓他知道我沒被嚇著。

「時間會改變一個人的態度，像你這樣的女人在這兒根本活不過五年，你的健康會崩潰，最後，你乞求機會認罪，如果你不肯，你就只有死路一條。」

「我寧可死也不說謊。」

「那我倒要告訴你，好死不如賴活！螻蟻尙且偷生，何況人呢！」

「我將遵循毛主席的教訓，他說：『首先，不怕苦；其次，不怕死。』」

「你不配這段話，那是對解放軍說的。」他憤慨的說。

「林彪將軍說：『毛主席的教訓全世界通行，且通用於各種情況。』」旣然他因說謊而讓我佔了上風，我的心情爲之一變，現在我開始喜歡這種審問，這總比留在暗濕的牢房裏，沒人說話好多了。

一陣靜默後，審問員眼光掠過我停在後面的小窗上然後說：「你胆子不小，不過你鬥不過我們的，你最好是坦誠自白！我的責任是幫你徹底瞭解政府的政策和明白你沒有選擇餘地，只有藉着認錯來表達你悔改的誠意，別低估了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偵訊室就等於人民法庭，你說話最好小心些。」

「難道我不能期望從人民政府得到公正嗎？」

「公正！什麼是公正？那祇是個名詞，一個沒有標準的抽象字眼。對不同階級的人而言，公正有不同的解釋，資本主義者視剝削工人爲公平，而工人則視這種剝削爲不公平。在這種情況下，你是哪一方？當你住在舒適房子裏，而其他人在雪裏顫抖，這就公平了嗎？」

「你把法律的公正跟社會的公平搞混了。我可以告訴你，因爲我丈夫和我希望人民政府能改善中國的情況，所以一九四九年沒跟隨國民黨到台灣而留下來。」我告訴他。

「我們不管公正的抽象觀念。軍隊、警察和法庭都是一個階級用來制裁另一個階級的工

具，這跟公正無關。現在你住的牢房是以前國民黨政府用來關共產黨員的，現在，無產階級獨裁政治用同樣的工具來制裁他自己的敵人。資本主義國家使用『公平』和『自由』這種吸引人的字眼來愚弄人民，並防止他們的革命意識，為確立一個適當的態度，你必須除掉你腦子裏所有的垃圾思想，否則，你會走投無路。」

他所說的話對我或任何自一九四九年之後，住過中國大陸而發生事情的人已不新鮮了，這種論調祇有階級鬥爭的馬克斯主義才會接受。「軍隊、警察和法庭都是一個階級用來制裁另一個階級的工具」是毛澤東在其着述「人民民主專政」中所說的。五十年代，毛澤東和他的宣傳機構用「人民民主專政」來形容中國的共產黨政權，但是，歷史的事實顯示，直到一九七六年毛澤東死亡，中國共產黨的政權是個不折不扣的獨裁組織，根本毫無民主可言。毛的「人民民主專政」是在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發行，以慶祝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的創立紀念。事實上，這篇論文一宣佈就引發了一連串的政治運動，而許多被疑為對新共產黨政權敵視的男女都被捕下獄、勞改。

我想這個審問進行不了，審問員沒問出具體的癥結，所以澄清不了什麼。我覺得馬克斯主義的辯論並沒有意義，一個人如果不相信它，就是不信，沒有中立者。老早以前，我自己的看法和價值觀早已定型，我不相信把人民分成各種階級是對的，也不相信階級鬥爭是促成進步的方法，我確信，在這麼多年戰爭後，中國所需要的是個安定的環境和所有地區的統一，而不是不停的革命。我無法改變這些信念，很不幸，這個審問員不清楚這一點，至少那個時候不是這樣，他只是困惑我，迫我屈服不去反抗，結合威脅和辯論來達到目的。這個會議

冗長乏味，我的頭因感冒而劇痛，我決定讓他一個人唱獨角戲。

一陣沈寂後，他繼續說：「認錯就是承認有罪，你不僅要對人民政府承認你的罪，也要向你自己認罪。認罪就像打開水閘，即使你不承認，但總瞞不了別人你反對人民政府！」

他停頓一下，想看看我的反應，他說我「反對人民政府」，當然，我是反對過人民政府的一些措施，譬如濫捕無辜、因一個人的階級成分就說他是敵人……等等，但我從未對任何人談論過這些事。當然，我也未企圖對它做任何事，我祇希望，當這政權達到成熟和穩定後，這成果是甜美的。他正對我灌輸一種罪惡感，因爲每個國家的每個市民都或多或少不滿政府的一些措施，他想用心理戰術操縱我，但不幸被我看穿了，所以，我祇是面無表情的坐在那兒。

我一直非常支持人民政府在公共衞生方面的改進及給予無家者妥善安頓的措施，也因這種鼓舞我積極擁護共產黨政權。憑藉著這些支持的意念，我應該得以勇敢破解審問者企圖加諸於我的種種罪惡，但是，在獄中那麼多年來，事實証明我的支持毫不值得。

他繼續問：「你該考慮你自己的生活，檢查你的家庭背景，找出你在我們社會主義者的政治與經濟的結構上的正確立場。你站在那邊？是工人？革命者？還是階級敵人？不需要我告訴你，你來自一個擁有廣大可耕地的封建家庭。幾代以來，你的家庭剝削那些佃農，靠他們養活你們，你的祖父、父親和丈夫都與外國帝國主義者合作，剝削人民並與反對共產黨的反動派高級官員交往，你爲外國公司工作，雖然你本來可以去人民學校教書。共產黨解放上海已往十七年了，許多像你們這種背景的中國人都改變自己的生活型態，加入我們的行列，

而你呢？你想逍遙其外？你自傲的過着你的生活方式，穿資產階級的服裝，甚至公開講英文，又和外國人來往！」

「你以爲沒人管得了你嗎？無產階級已經注意你很多年了，毛主席最近說：『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你還想隱瞞我們些什麼？」

「你已經在這兒待了快兩個月，我必須承認，你的適應力令我們驚訝，但是，無論你表現得多不在乎，你必定發現，牢房的生活條件是非常痛苦的，冬天馬上就要來了，到那時候，你就會知道這兒粗糙的食物很難下嚥。至於你女兒呢？你不想念她嗎？你不想知道她現況如何嗎？」

他又停頓下來，但當我仍保持沈默時，他繼續說：「首先，我們要你寫份自傳，在這國家的每個人幾乎都做了，但我們發現，你的檔案裏並沒清楚的寫下每件事，別想掩飾，也別想隱瞞任何事，我們會拿你所寫的和我們已有的資料核對，如果你漏掉了什麼，我們會認爲你不坦誠，按年寫下來，從你的家庭開始。自你所寫的東西，我們會對你政治立場和坦誠重新做個評估。」

作筆錄的那個人起來交給我一卷紙，我接過它後，審問員說：「如果這紙不夠，值勤的守衛會再給你，她會給你筆和墨，不准打草稿，不能把寫錯的紙丟掉，寫完時，連同其餘的一起交來。」

他狠狠的盯着我，說：「好好想想我今天說過的每一句話，等你寫完以後，把它交給值勤的守衛，我們會再提訊你。」

偵訊室的門打開，一位守衛出現，我尾隨他穿過長廊回到牢房，我不知道去了多久，但似乎已過了好幾年，我又餓又累，失望至極。

我把濕被單鋪在當桌子用的床上，拿起那塊肥皂在上面擦，擦完後，我叫值勤的守衛：「報告！」

她來到小窗前，交給我一枝筆和一瓶墨水。

「我的牀單現在可以去洗嗎？」

「洗衣服的時間已經過了，你等下一次。」

「但這是濕的，而且我又上了肥皂，一條濕被單用一整月不衞生的。」我說。

她沒等我說完話就用力關上小窗走開了。

但是，那個下午，她數度向牢房裡窺視，幾次後，她打開小窗問我：「你爲什麼不寫？」

「我怎麼寫？我擔心那條濕被單，它會發霉，我又沒別的被單使用。」

或許爲了讓我盡快寫自傳，她變得寬容了，她叫服勞改役的女人把被單拿去洗，隔天還給了我一條乾淨的。

那守衛動不動就從小洞中探視我。爲了裝出寫字的模樣，我把毛的一本着作放在膝上，擺上一張紙，墨水放在身旁。

動筆前，我必須確定審問員命令我寫自傳是希望達到什麼目的，他拿所有的人寫過自傳當藉口是沒有根據的，雖然沒有人要求過我寫自傳，但我相信在我住處的公安局，已有一份

我詳細的生活記錄，顯然，那名審問員是希望透過自傳，讓我會提供一些他們能曲解並使用來反駁我的資料。

令我困惑的是，我並不是唯一在上海過著舒適生活，穿傳統服飾，有外國朋友的中國女人，爲什麼只有我被送入監獄？無疑的，其他人在紅衛兵手下遭受苦難，而且可能全家都遭搶掠；也許他們遭到毒打，但我不認爲他們全被抓了起來。事實上，在這種情況下，我仍有些神秘之處。坦白的寫出我自己的生活，透露我的思想和立場是不智的，此外，我知道很多人被要求重複寫着自傳，一旦矛盾出現，那些人便陷入萬劫不復的深淵中。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按年代順序寫些我生活上簡單事實記錄，假如我被要求重寫，可以重複相同的敘述。

那天晚上，氣溫驟降，日暮前一陣陣朔風颳得牢房的窗子嘎嘎作響，爲防止冷風從隙縫中鑽進來，我捲了衞生紙塞進去。那時候，我那小蜘蛛朋友的網已經破了，牠不像往常一樣快速結個新網，而從天花板一角順着一條長絲線爬下來，到達地面後，牠慢吞吞的爬過房間，我彎下身仔細看牠打算做什麼，我的小朋友似乎很虛弱，每走幾步就絆倒停下來。牠生病了，還是只因爲冷而已？焦急的盯著牠，我看着牠從一角爬到另一角，可能在尋找一個避風的地方，最後，牠消失在塞衞生紙的牆角，那裂縫處有張小網，不像以前那麼漂亮，但較厚，像個子囊，我想牠已有個好避難處，當我使用馬桶時，更小心的坐在一旁，以免驚擾了牠。

隔天早上，我快速的寫好自傳，到下午完成後，走到窗前叫道：「報告！」與前一天一樣的値勤守衞來到窗前，我把所寫的和剩下的空白紙一併交給她。

「你寫好了？」她眼睛注視我所寫的五張紙，懷疑的問道。

「是的。」我回答。

「看來很少，每件事你都寫了嗎？」

「是的！」

「為什麼這麼短？」

「太短了？無論如何，我眞的寫下每件事。」

她沒再說話掉頭就走，我期待著某種直接的反應，不過，沒事發生，我很愉快。整個下午，我只觀察那隻蜘蛛，因為牠遺棄牠剛織好的網，再次爬過房間，不時的絆倒和停止，最後，直朝我的方向而來，當靠近我的脚時，我懷疑牠是否想爬上我的脚取暖，但牠經過我的脚後，消失在牀底下，幾個小時過了，還是不見牠出現。或許，在牢房的牀底下有個最隱密的地方，我的小朋友已決定在那兒過冬了。

隔天早上，守衛叫我起牀，我謹愼的看着地板，怕不小心踩着了牠，吃早餐時，我的眼睛不斷看著水泥在到牀的那一片地方，希望看到牠再次精力充沛的出現，但沒事發生。我朝天花板看，發現那破網已不見了，小蜘蛛沒留下任何一點痕跡，我可以想像這整件事。可是，當牠在那兒時，牠為工作與生存十分賣力的一再結網，牠遵循求生的自然本能，我也該這麼做，祇要我在一號拘留所，我將盡所能的奮戰到底。

牢門打開的聲音打斷了我的思緒，一個男守衛叫著：「出來！」

我拿起毛語錄跟隨他，想像自己是去赴暴風驟雨，和那位可能跟守衛一樣認為我寫的自

傳沒達其期望的人交談。

我被領到另一個和前次相同的偵訊室門前，那兩個相同的人坐著，祇是他們的制服因裏面的毛領、毛袖而膨脹。房間濕冷，外面奔竄着來自西伯利亞冷冽的西北風，窗子嘎嘎作響，風從縫隙中帶著嘯聲而入，審問員蹙着眉看我，他要我讀毛語錄時眼光銳利得可以劃破任何物體，我知道他正準備威脅我。

我不理會他那幼稚的態度，而用清晰、堅定的聲音讀它：「帝國主義者與其走狗、反動派不承認他們在中國大陸的敗蹟，他們會繼續圖謀並使用各種可行方法來打擊中國人民，就像，他們會派特務來製造問題。」

他問：「你知道這話的意思嗎？」

「我想我知道。」

「你知道什麼？」

「這段話所有中國人民都很熟悉，它是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五日毛主席在北京新政治協商預備會所寫的演講，他警告中國人民要警覺，因爲他相信帝國主義者和國民黨不會接受他們在中國失敗的事實，而將派特務到國內製造問題。」

「不錯！過去十七年的事件已經證明毛主席警告十分正確。」他看了我一會兒，說：「你認爲呢？」

顯然，我不能說毛偏執多疑，也不能同意他所說的，因此，我用外交式的口吻回答：「喔，我祇相信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每句話，他總是對的，不是嗎？」

他看了我好一會兒才說：「坐下！」

我聽到後面小窗的木板蓋被打開，他看我，注意我是否聽見那聲音，我直視他身後的小窗，陷入沈思中，我不想讓他認爲我專心注意任何動靜，從他的行爲，我瞭解他們不想讓我知道走廊上有人正聆聽我的審問。

我寫的自傳擺在他面前，他拿起來說：「你這叫啥自白？」

我無話可說，便保持沈默。

「你寫些洗臉刷牙的廢話，拿流水帳來唬我們？這叫自傳？」他把那些紙朝我這方向扔過來。

「你沒寫過也該看過在你書架上有很多中國人和外國作家的自傳。」他說。

「我是唸過許多偉人傳記，他們無論在那一方面都有很大的成就，而我沒經過任何值得一提的事，除了九年前我丈夫的死，我不過是個家庭主婦而已。」

「家庭主婦？你是嗎？」他諷刺的問：「你花多少時間在縫紉、編織、烹飪上？沒有，你在讀馬克斯，讀我們黨和政府領導者所出版的每一份雜誌與報紙，抄下演講詞，將黨中央委員會議通過的議案整理成檔案，紅衞兵到你家採取革命行動，他們發現你的書架上全是政治書籍，你的抽屜裏也全是手抄筆記，你房裏有一架強力短波收音機，你的佣人說你經常收聽國外的廣播。什麼樣的家庭主婦做這些？一個家庭主婦該關心她的家人和家庭，而你關心政治，從任何角度看來，你絕不是個簡單的家庭主婦。」

「我不認爲家庭主婦關心政治是錯的，我認爲，人民政府和共產黨該鼓勵婦女研究馬克

斯主義，我對政治有興趣，既然中國婦女已被共產黨解放，我祇做認爲是對的事。」我告訴他。

「我們鼓勵婦女在我們的引導指示下研究馬克斯主義，假如你想研究它來提高政治意識，幹嘛不參加敎化課程？我們告訴過你，不得參加任何由你那地區居民委員會的婦女所舉辦的活動，假如你在政治上的興趣是因爲希望成爲好市民，爲什麼當上海人民大會選舉時，遲了兩個小時去投票呢？這是對解放有見地的行爲表現嗎？別往自己臉上貼金，讓別人以爲你是尊無辜的菩薩，爲何不承認你對政治的興趣是爲了其他陰謀？」

「我沒參加訓練祇是因爲我可以自己研究，何況，都是下午舉行，那時我在替蜆殼公司工作，不可能參加，至於投票去遲了，我承認是我的疎忽，我是別人提醒後才去的。我不認爲我那票有多重要，也不知道蜆殼公司的所有職員都得去投票，所以才會這樣。無論如何，一位候選人由黨指派，不管我投不投，他必定會當選。」我解釋。

「你敢輕視人民政府的選舉過程！你認爲那不重要！對你而言，做那些帝國主義者的骯髒工作才重要？」他激動的說。

「這是誣告，是不負責任的！」我搖著頭說。

他又拿起那五張紙。

「我告訴你寫自傳，你寫這些什麼玩意兒？你隱瞞了實情！」

「請告訴我你想知道什麼，我眞的不想隱瞞，只要是關於我的生活，你想知道的，我都很樂意告訴你。」

「那好，這是你自審問開始以來，第一次表現誠懇，我希望你知道你現在四面楚歌，只有坦白一條路可走。」

「你又在打啞謎了，我說我會高興告訴你每一件關於我生活的事，因爲我相信事實勝於雄辯。我相信，當你知道全部事實後，就會知道我是無辜的，也從未做過任何傷害人民政府和共產黨的事。」

「我要一個徹底、坦白的答案，假使你不想受罪，就別隱瞞任何事。」他警告我。

「我答應你不隱瞞任何事，我完全知道人民政府的力量和審問員想得到事實的能力。事實上，我期望你澄清對我不清不白的控告，並還我清白。」我告訴他。

「我接受你的誠懇，現在你可以回房去了。今天下午，希望你能說出你處理英國代理人史考特和歐絲汀的經過，及替蜆殼公司負責介紹白俄的雙重特務給你們總經理的眞相。」

我眞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才張開嘴，但他做手勢要我沈默，站起來。

「不急！今天下午我們會給你足夠的機會認錯。」

一個警衛已站在門口等著帶我回牢房。

我爲審問員所說的話震驚不已，不記得自己是怎麼回去的。

女警衛沒坐在入口處的小房裏，而在寒風中站著等我回來，她雙手插在口袋，聳著肩，不耐煩的踱着步子。從我進門那一刻起，她注意我臉上每種表情的變化，我被關進去後，她仍駐足在小孔隙前觀察我。我從她的行爲知道，她接受了上級指示來觀察我對審問員所言的反應，這就是爲何審問員結束那次面談，把我送回牢房的原因，我雖然訝異聽到他叫我的兩

位英國朋友爲「英國特務」，並提到上海蜆殼公司辦公室總經理的白俄秘書爲雙重特務，但我瞭解，表現自然是很重要的，我身上的任何激動訊號必定會被視爲犯罪的證據。

我倒些水在臉盆裏，洗了臉和手來提神，然後，拿起毛的一本書，坐在靠窗處，低頭閱讀，一副專心的模樣。那守衞在小孔隙前站了許久才離開，但一分鐘後，另一個人來替代她的位置。午餐時間，我因飢餓而囫圇吃完白飯和甘藍菜。從廚房來的女人收走盤子後，我聽見她對警衞說：「全吃光了。」犯人在牢房裏做完例行十分鐘的步行運動後，警衞走過每一間，叫每個人坐下。最後來到我這間，在小孔隙前站定。她雖然很小心的移動，但我在這兒已待得很久，能辨別每種聲響，自然也很容易察覺她的存在，但我假裝不知道她在那兒。我靠著被褥躺下，閉上眼睛，裝作睡覺。白天睡覺是嚴重的違反了規定，經常惹起警衞的憤怒，我經常聽見守衞責罵犯人觸犯這規定，她非常擔心我知道自己被監視，以致不敢叫我起來。

約一小時後，我又被叫到偵訊室，我又再唸一遍上午唸過的那段話。

「我們從M15特物史考特開始吧！你怎麼碰見他的？他來中國前，你認識他嗎？你給他什麼消息？」審問員問道。

「在我告訴你如何碰見史考特前，我認爲我該向你說明，我祇知道他是一位英國外交官。」

「你可以說出任何你喜歡說的事，我們相信與否是另一回事，繼續說吧！」

「我第一次見到史考特是在一九六一年九月的一次晚宴上，我不記得男女主人是誰了。

」我說。

「主人是印度總領事。我們有貴賓名冊，但那不重要，宴會之前你認識他嗎？」

「不認識。」

「之後不久，你去了香港，你又和一位二次世界大戰時任英國空軍官員M15特務接觸。雖然以商人身份掩飾，但他在香港是出名的英國間諜。史考特給過你任何指示嗎？」

「在香港的社交場合上我認識很多人，我不知道有什麼特務，我去香港是認識史考特之前，就早已安排好了，我每兩年到香港一趟，就像你知道的，每個到香港的人需要從警察那兒拿一份旅行許可，我在遇見他之前老早就向警察局申請了。」我說。

「你要我相信你們碰面是偶然的，但事實却不是如此。在你去香港前，史考特來到上海，你一離開，他便回北京，但在你返回上海停留數個月之前，他又回來了。那時你乘的船因爲颱風躭擱，他好幾次乘船去看你，這絕不可能是兩個衹在一次晚宴中有一面之緣的人該有的行爲。而且，他在上海時，你們屢次同進同出。他跟你外出，總是開他自己的車子，而他和別人出去却用司機載送，上海的社交界說你們有感情瓜葛，但被指派去監視你們的人並沒有舉出證據，我們相信，你和史考特的關係是一種政治關係，你刻意製造一種假象來誤導你周圍的人。」

「英國民族性自大傲慢，他的組織規定，不允許代理人對控制地的女人發生感情。事實上，我們很清楚，他在上海時，曾與英國銀行經理的太太有曖昧關係。」

「既然你知道我們對這檔事瞭解多少，還是不願說出眞相嗎？你就承認史考特要你做的

事以及你眞正爲他做的吧！」審問員總結他的控告，坐在那兒瞪著我。

「你在製造一個老掉牙的笑話，」我說。「我常看見史考特，最主要是因爲他過著積極的社交生活，而且經常有娛樂活動，正餐以後，他經常放英國影片招待客人，這很吸引人，因爲我們很少看到那樣的影片，我記得好幾回，他從外交事務局邀請高幹來看這些影片。禮貌上我們也該回請，我喜歡蒐集瓷器，通常就是開個宴會，邀請包括史考特在內的許多朋友來看新到的瓷器。他借了一些唱片回去重錄，紅衞兵必定告訴過你，我有一大堆唱片。他比其他在上海的歐洲人更常自己開車，可能是因爲他會講流利的中文。至於他在我到香港前預先抵達，又在我返回之前再回來，那純粹是巧合；而我所搭乘的船因颱風躭擱時，他到船上來，不是來看我，而是去看船長；那時還有另一個來自上海的旅客在那兒，他是個丹麥商人，他們在一起喝酒聊天，我沒有加入。當外國船隻在水上擱淺時，很多軍官和海關人員留在上面，你何不從他們那兒確定他上船是看船長還是我呢？」我說。

「是你和史考特的關係非比尋常！」他說。

「你的詮釋太牽強了吧！」

他注視著我：「一個中國女人和洋人扯不清，是該入獄藉勞改而重生的。」

中國人常因種族的自傲而受苦，從未踏出國門和他國人接觸的人，通常視其他土地上的人爲洋人，因此對文化不同且風俗迥異的人們，也稱他們「洋人」或甚至「洋鬼子」。在毛澤東的政權統治及黨對資本主義的邪惡面作宣傳時，那種孤立感已在無形中擴大了中國人的自欺心境。當鄧小平對外打開中國大陸的大門後，富裕的「洋人」帶著大量投資的錢和自由

的思想來到中國大陸，人民一時間無法承受這種創傷的覺醒，他們感到羞恥與自責，繼而一心只想摒棄每項祖先流傳下來的文明與文化。

我眞的無法對審問員說什麼，雖然瞭解到除非以間諜身份送出去，否則他絕不會滿意只判我下放勞改。這事很有趣，我問自己爲什麼，自然，在黨挑一個犧牲者來處罰時，它不會太在意用什麼藉口來定罪，的確，有時候，那些藉口是極含糊或「莫須有」的，目的祇是處罰，而我的案例，從審問員的態度判斷，我似乎會被判以「間諜」罪，而不是其他理由，爲什麼呢？直到後來，我才明白過來。

「我看你並不想撒謊，現在坦承你們在一起時史考特對你所說的話。」他問道。

「你不必期望我能記住許多年以前的對話，那根本無意義。我們談論書、音樂、中國瓷器，我們熟悉的地方、家庭等等。」

「一點也沒涉及政治？」

「嗯，有時候，我們可能交換對時事的看法，大部份是國際局勢。史考特是位外交官，他從不想對中國的任何事或甚至一個中國人給予評論。」

所有我碰過的歐洲人，無論其身份爲外交官或商人，對他們而言，在中共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是個謎樣的國家，主要是因爲共產黨的閉關政策神秘的掩飾了一切。也有人到中國來，因爲他們仰慕中國文化，當有機會碰見一位他們能交談的中國人，便很自然的會問一些問題，但這些問題與政治機密無關。身爲一個中國人，我相信，幫助外國人瞭解中國的歷史、文化遺產和精神並不是件壞事，但共產黨激進幹部並不從這觀點看事，他們確信，任何不

反複爲官方宣傳的中國人都敵視這政權，而來到中國的每個外國人都企圖挑剔共產黨的毛病，因此，他們總懷疑那些在外國公司工作和歐洲人有接觸的中國同胞。

文革前，我的安全感全仰賴這事實——我知道在官方世界裏，中國人沒什麼重要地位，也無法知道任何可能被視爲國家秘密的事。當我看見我的中國朋友和親戚，特別是他們成爲黨員時，我小心翼翼的不涉及任何敏感問題。（最後，在文革期間，我的親友被盤詰時，他們坦白的說，我對國家秘密從不感興趣。）

「史考特很聰明，發掘眞相是他的責任，他要你做什麼事？他沒要求你替他找出一些事實嗎？」那審問員重複道。

「沒有！我爲他做什麼呢？我在蜆殼公司工作，不比外國人知道得多。」

「要一個聰明的官員不去蒐集情報，是不可能的。」

「你確定他的確是位聰明的官員？」我問他。

「不要懷疑我們的資料。」

「那你爲何不逮捕他或直接宣布他是不受歡迎的使節，驅逐他離開中國大陸算了？」

「最好他不知道我們瞭若指掌，我們嚴密的監視他，而且掌握他所做的一切，英國人工作不僅是爲自己的國家，也是爲美國，因爲美國人不能公開在這兒，美國密切的和國民黨合作，所以，英國人也幫忙國民黨。」

他提高聲量以壯大他乏味的態度：「一九六二年，史考特二度來到上海時，國民黨正準備攻擊我們，史考特選擇與你取得接觸，因爲你跟國民黨有關係。」

「胡說！我從來沒和國民黨接觸過。」

「不僅你的丈夫是國民黨政府的高級官員，你的階級成分顯示，你同情國民黨，我們偉大領導在階級鬥爭的教導，就像顯微鏡一般鉅細靡遺，遵循毛澤東思想，我們看穿膚淺的現象並發現這事件的癥結。」

我知道，一九六二年北京官方聲稱國民黨將反攻大陸。但是，我從海外得到的報章雜誌沒有一個曾暗示著在台灣有任何武力準備的消息，此外，我確定台灣不會不和美國商議便貿然攻擊大陸，而且，一九六二年，美國不可能准許冒這種險，但那段時間在上海，我倒常聽說中共軍隊的蠢動及自面對台灣的福建省撤走軍人家屬。許多人相信，毛計畫以軍事行動反擊台灣，上海謠傳，唯有毛的大躍進失敗所產生的經濟崩潰才能迫使他擱置攻打台灣的計畫。

當我試著回想，是否有任何外國團體（包括史考特），在那時問過我關於台灣的事，那審問員誤解了我發楞的原因，他注視一會兒後說：「你是否願意認錯，承認有關於你對史考特所說的記錄。」

「在那種情況下，我們不曾談過政治，你是一定知道的。」我告訴他。

「顯然，你不準備直接認錯，你需要時間思考和集中心思，很好！我們會給你時間準備完全坦白的認錯。從今以後，你會知道，逃避是沒有用的。現在，我們談談那女特務歐絲汀，說明你如何應付她。」

「誠如你所知，歐絲汀太太是個商人妻子，我與她接觸純粹是社交關係。我們不過是一

起吃飯、玩玩橋牌。」

「你帶她和一位前國民黨陸軍軍官接觸！」

「什麼！那是誰？」我瞠目結舌的，他看著我，很明顯的放鬆了。

「那位你帶去她公寓的中醫，他開業前是國民黨的陸軍軍官。」

「我不知道他的背景，祇知道他是個很好的中醫，歐絲汀太太信任我，她為不能懷孕看遍了歐洲的醫生，但找不出什麼毛病，我替她難過，所以去問那醫生，看看中藥能否幫她忙。由於他說沒看到她不能確定，所以我就介紹他們認識，不相信你可以去問！」

「那大夫在紅衞兵開始鬥爭他的革命行動後不久，就自殺了。」

紅衞兵因為他和一位英國人接觸就對他用刑嗎？天啊！我怎麼要介紹他們認識呢？我多笨啊！竟然不明瞭在毛之下的生活複雜性。對別人的好心與同情經常替人惹麻煩，難怪中國人有句諺語說：「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為什麼我沒想到這句話呢？

「除了帶她看醫生，你還和她一起遊北京，你到那兒做什麼？碰見誰？」

「一九五九年，明萬曆皇帝的墓剛開放，一九六〇年我們去參觀，因為陪伴外國人旅遊我可以住好旅館，你知道，中國老百姓祇能住三級客房。所以我與歐絲汀太太和另一個英國好朋友一起去。對她們而言，這樣很方便，因為我小時候一直住在那兒，會講那兒的話，對北京很熟。」

「在北京，你還介紹她給些什麼人？」

「沒有，在北京，我熟人不多！」

「你弟弟呢？我們知道他到旅館看過你。」

「我弟弟來那天，她們兩個自己到鳩德教堂，我弟弟不想見她們。」

我身後輕響一聲，那審問員的視線掃過我肩膀，然後看他的錶，他對作筆錄的人耳語一陣後起身說：「你可以回牢房去。下回你問話的時候，我們要談你那個骯髒的工作跟你辦公室雇用白俄女特務爲秘書的理由，到時候我不相信你還能否認她和蜆殼的關係。」

停頓片刻後，他繼續說：「仔細想想你和史考特的關係，記住！我們已經知道他利用你收集資料，而且，我們對你告訴他的事也很清楚。」

「我一無所知，他怎麼利用我？」

「嗯！我們認爲他到上海是爲了看你，假如不值得他這樣做，他是不會來的。」

一位警衞打開門，審問員告訴我可以走了。我知道，當小窗外的人離開後，他根本懶得繼續審問。

回牢後依舊被監視，我很內疚，因爲我覺得對那可憐醫生的死有責任。我希望別再碰見史考特或歐絲汀。他們眞是英國的特務嗎？即使是，這也不能解釋我現在爲什麼入獄，在上海的外國居民和爲外國公司工作的中國人都被自己的僕人監視著，也被工作的其他職員看守著，公共場合不僅有警察和穿制服的哨兵，而且爲警察工作的便衣特務和熱心活動者都愛打小報告，在世界上其他城市存在的個人隱私權於上海全都蕩然無存。假使人民政府早懷疑我和史考特與歐絲汀的關係，那早幾年，上海警察就該採取行動了。的確，在這種狀況下，有很多我還不瞭解的地方，那審問員必定看過我所有外國朋友的所有名册，並且聲稱他們是秘

密特務，歐絲汀和史考特祇不過是兩個用來恫嚇我的名字，我明白自己已陷入絕路，日後，必須留意每一步路，以免愈陷愈深。

我被帶進第一拘留所後，一直懷疑自己爲何會被捕？這是難以理解的，誰要逮捕我呢？他們眞懷疑我犯了罪，還是希望我因害怕而承認那些他們用來反對我的假口供呢？溫妮早告訴過我，由於蜆殼公司結束上海的分公司，下一步該輪到我受罰。她對嗎？

我坐在牢裏回想與審問員的會戰，不禁想起所有被判入獄和勞動的無辜男女，我原來的氣勢消失殆盡，我眞的害怕了，並非因爲有罪，而是害怕我承受不了加在身上的重担。

那天晚上，我每日例行禱告調息自己，但那審問員嚴厲的聲音却不時在我耳邊廻旋。我感到迷失、不快樂，好像上帝已離我遠去。

夜裏，我做了入獄以來第一個惡夢，夢見自己正站在斷崖的狹長岩石上，狂嘯的海浪朝我湧來，愈來愈高、愈來愈大，幾乎要呑噬我，天氣如魑魅臨空，我全身無力、欲振乏力，我覺得自己快死了。

我的罪赤裸裸的顯露在臉上，在幾乎衝口驚叫的一霎那，我睜開眼睛發覺電燈昏黃的光正投向我，我的眼罩滑到地上。想起那守衞會在外面窺視，我恐懼得呆住了，但是，樓上某處一記門栓放下的沉重聲告訴我，這監獄裏又添了一個新囚犯。

第七章　一月革命與軍事統治

我等著審問員再次傳訊我，然而，幾天過去了，却沒有一點動靜。我可以隱約感覺到一種緊張的氣氛，衞兵們進出長廊之時，顯得那麼的匆忙、憂慮，我敢肯定，外面的世界一定有什麼重大的事情發生。我常傍門而立，希望能聽到警衞們在長廊的另一頭說些什麼。通常，他們的聲音裡都帶有一種異常興奮的語調，有時，他們也壓低了聲音，像是爲了什麼事在爭吵。雖然牢中一片死寂，我仍聽不清楚他們說話的內容。對於眼前這種一觸即發的氣氛，我感到茫然與恐懼。

十一月初，在我第一次審訊結束後不久，他們停止供應我報紙，這是極不尋常的——報紙一向被他們視爲改造犯人思想的重要工具，這些衞兵也常告訴我們要仔細的閱讀。幾天過去，我向他們要求恢復報紙的供應，「你不知道革命正在進行嗎？」一個衞兵不耐煩的說。

未到十一月中旬，冬季就以最猛烈的攻勢正式登陸。刺骨的北風掃過上海市，整座城都籠罩在零度的氣溫下，寒風陣陣吹襲著我的牢門和窗子，將我塞在縫間擋風的衞生紙落在地上。雖然我穿上所有的毛衣和棉夾克，仍耐不住那種椎心刺骨的冷，冷得嘴唇發白，全身發抖，我只好藉著不停的走動與搓揉雙手，來保持腳趾和手指血液的循環。當守衞叫我們準備

好到外面做活動時，我想他們也一定很不情願在這種鬼天氣裡，離開火爐到外面去。

除了風勢稍強之外，外面的確比潮濕的牢房要溫暖一些，何況，走路還能幫助血液循環。狂風將沙土捲起，打在臉上，使我幾乎睜不開眼睛。

突然，我看見所有的衛兵都衝出看守臺，而後消失蹤影，同時，街上的嘈嚷愈來愈大，好像有幾千名的暴民要衝進拘留所似的，在我旁邊的一個女囚犯以一種低但能使所有犯人聽到的聲音說：「一定是紅衛兵！他們想救那些被市政府關在牢裡的同志！」

這時，一個女孩的聲音從操練場上傳來：「放我出去！我是紅衛兵，毛主席萬歲！」叫喊聲中伴著厚重而急促的擊門聲。

拘留所門前的暴動持續著，直到我聽見一聲槍響，暴動的聲音才逐漸平息。一會兒，守衛們回來了，他們顯得十分疲困，顯然，這次紅衛兵的暴動給他們帶來不小的震撼。

接下來幾天，我發現這些守衛的舉動有了明顯的改變：他們常不在自己的崗位上，有時幾個小時都見不到人影。還好，廚房仍繼續送來食物和熱開水。警衛值班時，他們通常都集聚在小房間熱烈的討論，從我偶爾聽到的幾段話來判斷，他們好像牽連進文革的亂局中，而且正組織自己的革命陣容，以期能加入日益龐大的革命行列。

自從報紙被停了之後，我開始在牆上刻痕計日。聖誕夜的晚上，過了平日的就寢時間，衛兵竟還沒催我們去睡覺。在冷颼的牢房裡等著，突然，我聽到樓上傳來「平安夜」的歌聲，初時試探性的哼著，繼而大膽的以女高音唱了起來，清晰而美妙的歌聲迴盪在黑暗的長廊上，緊緊的攫住我的靈魂。以前曾在聖誕節的音樂會上聽這首歌，但從未像現在這般的感

動，牢中一片靜寂，所有的人都沈浸在這短暫的詳和氣氛中。
就在這女孩唱出最後一個音符的同時，守衞進來了，他們挨著牢房一間間問：「誰？」、「是誰在唱歌？」、「是誰破壞了規定？」沒有人回答。
新年過後不久的某一天，牢房的擴音器被打開了，守衞命我們坐著注意聽一個重要的宣佈。
一陣男聲讀著「上海工人革命司令部」發出的文告：「紅衞兵和同志們在北京的文化革命小組支持下，已於一月四日推翻了走修正主義路線的上海市政府和黨書記。」
據報導，這次政變的英雄人物是一個紡織廠的安全首長王洪文，他將分散各地的革命組織集合起來，組成了以他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司令部」，他的背後有江青的長期合作夥伴張春橋撐腰，張春橋同時也是北京文化革命小組的代表，最後，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和一位著名的左派作家姚文元結成了一道堅強的政治聯盟，就是有名的「四人幫」。
擴音器中接著播放一段國務院的宣告，承認了這次的反叛行動，也同時敦促勞工們不要忽略生產，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對這次叛亂事件表示贊同，眞令我震驚，一直到出獄後，我才知道當時激進派以要他退位為威脅，而他為了顧全大局，證明他支持毛的計畫，而設法維護文革，更為了保護黨內的舊幹部，不得已才這樣做。
政變消息公佈的幾天後，衞兵遞給我一份和以往編排方式不同的「上海解放日報」，紅色的標題報導著「紅衞兵和革命份子在長時間的爭鬥後，已於十一月二日接管這份報紙，做擊倒市政府的第一步。」

仔細閱讀過這份報紙後，我發現，如果沒有市政府的兩名高級幹部投向革命派，這次政變不可能成功，在一次公開批鬥前任上海市長及黨書記的集會上，這兩個叛徒爲了表示對毛的效忠，竟出手摑他們前任上司的面頰，後來，他們在四人幫的支持下統治上海，直到毛澤東死後，四人幫潰敗爲止。一九八二年，他們被控謀殺，又以四人幫黨羽的罪名入獄，其中一人也因此發了瘋。

上海市政府的被推翻，粉碎了我期盼盡快被釋放的美夢。我知道，我的案子一定要等到新政府的各部門重新組織起來後，才會有個定案，然而，重整的過程相當費時，尤其是在各地反對勢力紛起的情況下，我可以感覺到，紅衞在其他各地遭到的阻礙，遠比在上海要大得多。

一九六七年春天，「解放日報」刋出了毛澤東要徵召軍隊去支持左派的消息，毛明白的指出：「人民解放軍不只是軍事的，同時也是政治的組織。」這段話顯示，紅衞兵和革命派已經無法獨力佔領各地方政府了，然而，軍隊的干涉也沒有造成預期的結果，往往，這些軍隊甚至不能辨認出毛派革命組織和那些由黨幹領導的組織，因爲他們雙方都堅稱自己是奉行毛的政策，還有一些從新疆、西藏等地來的軍事將領，在宣稱自己爲左派分子後，就將槍桿轉向紅衞兵和革命分子。

無論如何，這次的軍援行動大大提升了軍隊的威望，也使得國防部長林彪的聲望往前推進了一大步。此後，各種他和毛澤東同行、並坐的照片，便到處可見，各界人士開始稱他爲「毛主席的親密戰友」。由一張毛澤東走在前，林彪居中，周恩來殿後的照片看來，林彪在

黨內的地位已經超過了周恩來。

在上海，紅衞兵與革命分子開始佔領了城市內一個個的附屬機構，每天，報上的報導都顯示他們不只要對付各地的反抗勢力，他們內部也因爭權奪勢而鬥得四分五裂，每天都有戰爭發生，各機構也頻繁的易主統治，整座城市處在一片動亂之中，街上不時傳來暴民激憤的喊叫聲。我眼前驀的升起一片充滿死亡、悲慘的可怕景象，我愈來愈爲女兒的安全擔心了。

對於流血暴動的發生，叛黨領袖非但沒有阻止，甚至還加以鼓勵。有一天，我讀到一段「手染敵人鮮血的時刻到了！」的文章，幾天後，報上又出現一段獻給林彪的文字：「革命免不了流血，所以我們不必誇大現狀的嚴重性。雖然每天都有人自殺或被殺，但這些死亡人數絕比不上抗戰期間和一九四九年的內戰，甚至天然災害傷亡的人數，所以，在這次革命中，我們獲得的比失去的要多。」這些報導使我寢食難安。我因爲擔憂女兒的安危而病倒。

一天晚上，我再度絕食後，一個女守衞打開窗子探頭進來：「你怎麼啦？是不是生病了？」

「我擔心我的女兒，你們可不可以把她帶進來和我待在一起？」

「當然不行！她又沒犯罪，我們怎麼可以把她關進牢裡呢？」她答道。

「我也沒犯罪呀！我還不是一樣被關在這裡。」

「你有沒有犯罪我不知道，事實上，我也分不清什麼是有罪，什麼是無罪，不過，既然已經在這裡了，你就隨遇而安、聽天由命吧！有一天會有人來處置你的。何況，你在這裡也

不算壞，有飯吃，還有八小時的睡眠時間，我們工作後還得去參加集會，一天也睡不到八小時呢！」說完她就關上窗子走開了。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位守衛表露出正常的情緒。她的語調顯得極爲沮喪無奈，我想，黨內權位的爭鬥一定帶給這些守衛不少衝擊，當他們看到其上級幹部不再爲共產主義的理想效命，轉而致力於資本主義的復活行動，他們開始對自己的工作心灰意冷，任由囚犯們叫囂、哭喊、打鬥也不聞不問。

我開始仔細的去觀察這些守衛，而發現，自從一群著紅色革命軍裝的年輕衛兵出現後，許多警衛都變得悶悶不樂。那些年輕的紅衛兵常趾高氣昂的在牢裡晃進晃出，不只對囚犯高聲怒罵，對其他的守衛也以命令的口吻說話。

一九六七年，整個上海市呈現無政府狀態，拘留所內的警衛也分裂成兩派，互相傾軋、出外勞動時，我看見牆上貼滿了內戰標語；在牢房裡，也不時可聽到衛兵和女囚犯的爭吵聲，他們爭吵的重點大多放在「毛澤東的政策到底是什麼？」以及「誰是該被打倒的資本主義者？」

不久，牢裡的守衛工作就交由監獄行政員及審問員來接任—由於被冠上「知識分子」的帽子，他們從革命組織中被踢除了。文革期間，所有的知識分子，無論他是黨員與否，都被視爲「臭老九類」，其他的八類是：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叛徒、特務、頑固不化的走資派，以及壞分子——在傳統的中國社會裡，知識分子一向以其儒雅的儀態及卓越的知識受到人們的敬重，而他們也多以此爲傲，現在革命分子稱他們爲「臭老九」，就是

想藉此表示他們對知識分子及傳統士大夫觀念的輕蔑。

第二年冬天，我患了重感冒。當感冒變成支氣管炎後，我的身體常因咳嗽而不停的顫抖，尤其是在深夜，冷風侵襲時，益發抖得厲害。一天夜裡，我躺在床上，穿上兩件毛衣及一雙長毛襪，却仍抵不住寒風的吹襲而咳個不停。

爲了使喉嚨舒服一點，我喝光杯裡剩下的一點水，沒想到，冷水使我更不舒服，我用棉被緊緊的蓋住頭，希望能感到暖和一點。

這時，我聽到窗子被打開的聲音，「到這邊來！」有個男人的聲音輕聲喊道。我從床上爬起來，披上夾克，走到窗前向外一看，原來是我以前的審問員站在那裡，手上還拿著一個熱水瓶。

「你有沒有杯子？拿過來！」他說。

我把杯子放在窗口上，他倒了一些熱水進去。

一年多來，我一直等著他來繼續審理我的案件，在一陣咳嗽之後，「你什麼時候才能了結我的案子啊？」我問。

猶豫了一下，他說：「時機一到，他們就會來傳訊你，現在有許多更重要的案件堆在那裡，你必須耐心等待。來！喝下這杯熱水，會使你舒服一些，明天我去報告醫生，他會給你一些藥。」

他似乎在暗示他已經不再負責審理我的案件了。我很想知道他是否仍然認爲我有罪，或者他曾經這麼認爲，突然，我想到在如此的局勢下，做一個審問員是多麼困難啊！有時，他

明知一個人是無辜的，但因爲職責却逼著他必須去揑造這個人的罪行。我迅速的喝下那杯熱水，隨即又被一陣猛咳攫住。

「不要緊！我再給你一些熱水。」說著，審問員再次打開窗子幫我倒水，這時連指揮也走了過來。

「我可以借一支拖把來擦地嗎？」我問。

「明天再擦吧！地板很髒呀？除了水以外，還會有其他的東西嗎？」連指揮問。

其實，他很瞭解牢獄中食物的匱乏，畢竟，在紅衞兵還沒把他貶爲守衞之前，他曾是這間拘留所的指揮高幹啊！

他們走了之後，我回到床上想：文革帶來了一些奇怪的現象，像指揮高幹和審問員這種饒富人情味的設置，居然發生在被視爲「以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拘留所內，或許是紅衞兵與革命分子在擴展革命行動之際，有意將知識分子打成敵對吧！

第二天早上，醫生給了我一些藥片，但夜裡我仍因不停的咳嗽而無法入睡，隔天清晨，我聽到有人在我門外竊竊私語，雖然她們壓低聲音，但我仍聽出是值班的女守衞和我對面的女囚犯在談話，從她們的對話中，我驚訝的發現這女囚竟是公安局的幹部，並且和這女守衞曾是「公共安全幹部學校」裡的同學，她們談論有關江青指示紅衞兵去破壞安全、阻撓訴訟的進行以及破壞法律的執行力量後，上海公安局內部所發生的暴力鬥爭。她們也談及誰被打死、誰被送往醫院這類的事情，很明顯的，公安局現在已經癱瘓且失去作用了。

聽完她們的談話後，我知道文革在短期內是不可能結束的，目前似乎是激進派較佔優勢

，不過，除非罷黜的高幹都死光了，否則他們還會再等待時機進行反擊的。

幾天後的一個晚上，守衞進來要我們靜靜的坐在地上聽廣播，透過擴音器，一個男人的聲音宣佈了拘留所被軍隊佔領的消息。

「所有的囚犯聽著，革命進行得非常順利，毛主席和他親密的戰友－林副總司令－毛主席的眞實擁護者，已經佔領了整個上海市，我們正準備進一步佔領全國，舊社會的汚穢將被丟進歷史的灰燼中，我們的成就是了不起的，有人說我們在製造混亂，但毛主席說過：『革命不像一個晚宴，或寫一篇論文，畫一幅畫那樣處處要求精美、溫和、絢爛，革命是一種暴動，一種以一個階級用暴力打倒另一個階級的行動。』我們製造混亂去混淆敵人是正確的。有人說我們殺了太多人，眞是荒謬，抗戰時被殺的人還不止這些呢！事實上，我們還沒殺夠，還有些敵人躲在黑暗的角落裡，我們會把他們抓出來。我們是革命分子，我們不怕混亂和流血，這些都是革命必然的結果，它是要使敵人喪膽，而我們，甚至連天踢下來都不怕。」

「我們敬愛的革命夥伴江靑告訴我們要『搗毀安全和一切法律的機關』，我們做到了！現在，上海安全局以及它的附屬機構，包括拘留所在內，都被我們控制了，我們對這裡的犯人受到這麼好的待遇感到驚訝。你們一天吃三餐的米飯，生活比貧農還好，這證明安全局的修正主義者愛反革命分子甚於愛農民，因爲他們自身也是反革命分子。從現在起，你們不需要勞動，一天只能吃兩餐，並且以地瓜和其他穀物代替米飯。你們不會餓死的，就算眞的死了，對我們的革命也不會有什麼損失。」

「我們知道有些人一直想從這裡逃出去，在這裡先警告你們，如果眞有人這麼想，無產

階級獨裁的鐵拳將會毫不留情的打在他的身上！」

「毛主席的政策是『對安分的犯人寬容，對頑固分子施以嚴懲，對告密者予以獎勵』。今晚，我們要處理一些案子，以貫徹毛主席的政策。」

停了一會兒，他依次喊出一些人的名字，再報告他們的年齡、職業、家庭背景，及所犯的罪行。這些罪行無非都是「反革命」、「詆毀江青、林彪、毛澤東」之類的。接著他又叫道：「拖出去，立刻處決！」

他殘酷且無人性的咆哮聲令我戰慄。

我的名字被列在判處終生監禁或二十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嚴懲」名單內，這些人大多被指為對承認自己的罪行不夠徹底，最後他唸出一張「從輕發落」的名單，這些人不但完全認罪，而且還提供密告，有一個女人因為供出幾個人預備逃到香港去的計畫，而獲得當場釋放。

擴音器關掉後，那男人威脅性的聲音始終縈繞在我耳際，我開始對未來的命運感到恐懼，今夜，似乎更冷了。

長廊的另一頭傳來關門聲，我聽見皮靴的聲音從長廊上傳來，長廊兩旁牢房的窗子開了又關。「怎麼樣？」、「承認了嗎？」聲音愈來愈近，我勉強打起精神，等著這不速之客的來訪。腳步聲停在我的牢房外，小窗子被打開了。「就是這一個。」一個男守衛說。

「過來！」守衛的聲音比以前更嚴厲，可能是為了討好新來的幹部。

從開著的那扇小窗子望出去，我只能看見一個著空軍制服幹部的下半身和他的一雙黑皮

靴，但看不到他的臉。不過我想他一定有一張佈滿「橫肉」的悪棍臉，中國人相信，人的面相可以反映出他的脾氣與個性。所以，這麼一個凶殘的人，毫無疑問的一定有一張佈滿橫肉，令人作嘔的臉。如此想著，增加我不少勇氣，我想無論他說什麼，我都可以應付自如。

「你爲什麼還不承認？」就是擴音器中那個男人的聲音。

「我又沒犯罪，要我承認什麼？」我說。

「胡說！你是帝國主義的間諜，你想被槍斃嗎？」

「我希望新當權者能查明事實，發現我是無辜的，早日釋放我。」

「簡直做夢！你以爲我們是傻子嗎？如果你不認罪，你永遠也不會被釋放，你沒看到其他不認罪的案例嗎？他們都死啦！」他咆哮喊道。「死啦！你聽見沒有？」然後，他向守衞說了幾句話，守衞就將門打開。

「出來！」

我跟著他們邁出牢房，走向長廊的盡頭，走了幾步，聽見上面有人高喊：「報告！」、「報告！」、「快來呀，他在流血呢！」。

長廊在昏暗的燈光下，被包裹在重重的黑影之中，男衞兵轉過頭來，把我推回牢房。上了鎖後，就趕緊到樓上去了。

樓上一陣紛沓的脚步聲，「拖她出去！」空軍高幹叫道。「你竟敢用自殺來威脅無產階級的獨裁統治！你以爲這樣就可以不必認罪了嗎？你這樣做，只會更證明你有罪，你會遭到更嚴厲的處罰。」

接著，我聽見一個女孩的啜泣聲，和許多人穿梭移動的聲音，然後又恢復了平靜。我似乎在這次的意外事件中被遺忘了。如果那女孩不是剛好在這一刻自殺，那我又將遭遇到怎樣的審判呢？雖然這女孩自殺未遂，但是，已反映出了她內心的絕望，實際上，在拘留所內自殺成功的例子並不多，我聽過唯一成功的例子是上海市副市長的兒子，他是一位醫生，因爲受不了他們強迫他批鬥其父所施予的折磨，而將牙刷的柄在地上磨尖，然後刺進動脈血管，當場斃命。

第二天，快接近中午時，才有人送來一碗和紅蘿蔔一起烹煮的乾飯進來，晚餐則是一碟煮甘藷。後來，甚至只吃到地瓜湯了。一段日子以後，我們已經習慣了飢餓，也就不再覺得它是那麼令人難以忍受，慢慢的，我的身體衰弱，視力也開始模糊，每天只敢做洗衣服之類的簡單活動。

一些警衛漸漸消失了，由一群著紅色革命軍裝的紅衞兵來代替他們，每天早上、中午、晚上，我都會聽到他們高喊幾聲「毛主席萬歲」，有時也背誦毛語錄，報上刊出一項必須由全民共同奉行的新儀式：「早晨輔導，中午反省，晚上報告。」當然，這些儀式都必須在毛主席的肖像前舉行。事實上，所謂的輔導，就是閱讀一本紅色小册子中的段落，反省也不過是再讀一遍，而晚上的報告也是依舊重複同樣的事，簡單的說，就是除了嬰兒之外，所有的中國人民都要一天閱讀毛語錄三次，報上還談論到星期日在家時是否也要照常活動？結論是：即使你生病躺在床上，這種例行工作也一樣不能免，唯一倖免的是這種群衆的例行活動在牢裡不被允許。

軍隊接管後，警衞間不再有打鬥或爭吵的事情發生，但是，他們不再像從前一樣聚在一起聊天了，當兩個警衞在一起執行工作時，彼此似乎都在防衞對方，害怕對方隨時會向上級打自己的小報告。

除了吃飯時間更改外，牢裡還有其他幾項新的措施，每天早上，犯人得依規定聽上一段由北京中央廣播電台或上海廣播站播報的新聞，接著，高幹們會經由擴音器向犯人發表演說，同時，一份「懲戒」、「處決」的新名單也會在同時被讀出，以鼓勵其他的犯人俯首認罪，爲了抗拒這種精神虐待，我向守衞借來一把剪刀，偷偷剪下兩片衣角，做成兩個小布團充作耳塞，每當演說開始時，我就將它塞進耳朵裡。

這段期間內，我經常被叫到偵訊室做特別的思想改造，他們指謫我爲「農民的剝削者」或「帝國主義的走狗」，他們也攻擊我的家庭背景、我在蜆殼公司的工作，以及我的不認罪、拒絕接受「再教育」，他們會用一連串的問題向我炮轟，而不等我回答，就又威脅我會立刻被槍決或是遭到終生監禁。

我很快就瞭解在偵訊室裡，除了「聽」之外，我什麼事都不必做，也最好不要做，經過幾次會審後，我發現他們所做的這一切都只是爲了想證明他們是革命派，而我，只不過是他們手中的一具玩偶罷了。雖然他們外表看起來那麼有自信，但是當他們看見長久以來掌權的幹部，如今却突然被指控爲「舉著紅旗反紅旗」的「共產主義的潛在敵人」時，內心也會被文革所造成的不安所感染，而嚴重的缺乏安全感。

一天，犯人們特別被允許到戶外活動，走出牢房，我看見連指揮和其他幾個人正在翻掘

花壇，我想起幾天前報上登過毛澤東的一段話「花和裝飾性植物都是溫情主義的產品，容易腐化大衆的革命心靈」，據說，毛澤東所住前清宮殿的花園裡，就只種蘋果樹和向日葵這類具高經濟價值的植物，在文革期間，只要是毛澤東的命令，全國就必須立刻施行，反過來講，如果沒有他的指示，任何事都不能著手去做。

遠處，我看到一些人在掃馬路，從他們的外表和笨拙的動作來看，一定得要是一群正在接受勞改的知識分子，毛澤東說過：一個人書讀得愈多，就變得愈保守，除非能藉身體的勞動來改造自己，幾年後，我才知道文革期間有上百萬的男女被迫放棄城市的工作，而被送到鄉間去勞改，接受再教育。留在城市裡的知識分子則在他們所服務的機構中從事一般勞動的工作，諸如藥劑師在醫院裡清理病床，大學教授在學校裡掃廁所之類的事，同時，他們還要去參加鬥爭大會和政治思想訓練課程，這一切對知識分子的迫害說明了毛澤東蓄意破壞中國傳統對知識分子的尊崇，在這段期間內，如果有人被發現閱讀毛語錄以外的書籍，那他很可能被冠上「反毛」的罪名。

到了操練場，警衛要我徒手拔去地上的草，在這嚴寒的一月，沒有任何工具而只靠雙手去拔草，實在是件很困難的事，當守衛回來檢查時，他將那一小堆拔起來的雜草踢到我腳上叫道：「你全部就只拔這些嗎？你甚至連根都沒有拔起來呢！」

「我沒有工具可以挖根呀！」

「你有手啊！你可以用手指頭把根挖出來，笨得要死！」說著，他再次將那堆草踢向空中。

回到牢房，我發現我的牢門是敞開的，一個女警衞正在搜查我的東西，床單、枕頭、帆布袋裡的一些東西都被丟在地上，她看到我後，朝我身上打量一番，然後叫道：「把夾克脫掉！」

接過夾克，她把我推到牆角面對著牆。我站在那裡，邊發抖，邊咳嗽。

「褲子脫掉！」她檢查完了夾克後喊道。

「請先讓我穿上夾克，好嗎？我得了重感冒。」

「你還是這麼嬌啊？牢獄生活沒能改變你嗎？我不相信夾克和褲子一脫掉，你就會凍死。脫掉！」

檢查完褲子，她開始搜我的身體，我站在那裡不停打噴嚏、咳嗽，臨走前，她將牢裡惟一未被動過的衞生紙從牆上扯下來灑了滿地，然後昂然走出，接著，我聽到她走到隔壁打開牢門的聲音。「出來！」她叫道。

自此以後，不定期的搜檢牢房成了例行公事，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有一次臨檢，然後我就必須重新收拾牢房一次。

經過整晚的咳嗽、頭痛、失眠，第二天，我幾乎無法下床，勉強走到窗口：

「報告——」我乏力的喊。

一個溫和的警衞打開窗子。

「我八成是病了，我可不可以看醫生？」我問。

她把一支溫度計放進我嘴裡，過了一會兒，她取出溫度計看了一下說：「你發高燒了！

」於是，她給了我兩片阿司匹靈，還叮嚀我要多喝開水。我想等醫生來看病，但他沒吭。不得已，我只好再問一次。

猶豫了一下，她說：「醫生已經到鄉下參加勞改了，不曉得什麼時候才會回來。你如果覺得不舒服，就躺下好了。」說完，她又給了我兩片阿司匹靈。

我躺在床上，身體因寒顫而痙攣，我知道我的體溫一直在上升。

晚上換衞兵的時候到了。兩個衞兵交換性的喊了一句「毛主席萬歲」後，夜間值班的守衞就踱進牢房裡巡視。

「什麼？你已經上床了！你倒挺懂得享受的。起來！現在還不到睡覺的時間。」守衞巡視到我的牢房時叫道。我聽出她就是昨天到我牢房來進行搜檢的那個女警衞。

「我生病了。是剛才那個女守衞叫我躺在床上的。」我說。她也懶得進來把我拖起來，就走到別的地方去了。

第二天，一位年輕醫生進來探視我的病情。我告訴他我發燒，而且已經咳嗽咳兩個月了。「那你一定是得了肝炎。拘留所裡有很多人都得這種病。讓我幫你抽點血檢驗看看。」他說。

我大吃一驚。這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醫生」啊！任何沒有醫學專門知識的人都看得出我得的是支氣管炎，也許正要惡化成肺炎，但絕不會是肝炎呀！我仔細端詳他一番，立刻瞭解到他並不是一個受過專業訓練的醫生，他是一個年紀不超過二十歲的鄉村青年，到這裡來只是因爲毛澤東說過：「我們必須從游泳中學游泳」，而他現在正是執行毛澤東的這項命令：「從當一個醫生中學習如何去當一個醫生」。

儘管報上報導過許多有關毛語錄的神奇傳說，諸如醫院苦力在熟讀毛語錄後，就能在手術房成功的爲病人動手術之類的例子，然而，當毛澤東本人或其他高幹生病時，他們延請的醫生卻往往是從國外留學回來的醫學專家，而非一般未受訓練的蒙古大夫。

這位年輕的「醫生」把我帶到一間有火爐的房間裡，那個房間原本是爲警衞準備的。他從工具箱裡拿出注射器，叫我把夾克脫掉，將捲起袖子來。當他把針筒揷進我的手臂時，一時還無法找出靜脈的正確位置，經過幾次試驗後，我的手臂禁不住痛了起來。我看見他的手也在發抖，汗珠不斷的從額頭上沁出。

我很同情他，因爲這實在是一件超乎他能力範圍之外的工作。「我的靜脈很細，很多醫生都沒辦法一下子就找出來。」我試圖給他一點信心。

他非常感激的看看我，然後再低下頭去繼續摸索，最後，終於找到了靜脈，針筒也才算發揮了功能。

過了好幾天，我的高燒依然不退，大部分時間裡，我都處於半昏迷狀態，隱約夢見自己像個幽靈在鐵窗上盪來盪去。

一天早上，那個年輕醫生又到牢裡來看我，「你得的不是肝炎，可能是肺結核，必須要到醫院接受檢查。」他說。

雖然我知道自己得的並不是肺結核，但是到醫院去的消息卻使我得到一些安慰。

中午，一個女警衞開了牢門把我帶出去，走到第二道門前，一輛黑色吉普車已經等在那裡，我和女守衞坐了上去。

拘留所內的巷道和十六個月前我進來時所看到的顯然有許多改變，到處掛滿了看板、標語，看板上用黃色大字體節錄了一些毛語錄，被排放在前門的進口處，藉以嚇阻那些初進拘留所的人犯。另外，在軍隊的營區內，一面大紅旗上也用白色油漆寫著：「打倒美國帝國主義」、「打倒蘇維埃修正主義」，和「解放台灣！」三條標語。路旁兩排木柱上，綁著美國總統、蘇俄總理，和台灣國民黨領袖的人體模型。當一個個士兵將槍尖刺進人體模型的胸膛時，其他的士兵就高聲齊喊著：「殺！」

上海的街道在陰霾的天空下顯得很荒涼，路上的行人不多，似乎都裹破爛的夾克裡和淒厲的北風對抗。雖然我感到很不舒服，但仍然努力觀察這段期間內文革給這座城市帶來的改變，也想藉此勾勒出我女兒在新環境下可能的生活情況。

這城市到處充滿被破壞的痕跡。焦黑的建築物、廢棄的腳踏車、滿天飛揚的垃圾、故障的紅綠燈，以及街頭巡行的軍隊，構成上海市街頭的共同景觀。有時也看到武裝的革命分子手持鐵棒、高聲唸著標語從街道上揚長而過。在各主要街角，可以看到毛澤東的大型畫像被貼在離地約有七英尺的木板上。畫中爲顯示中國人民生活富足而刻意誇大其年輕、健康、肥胖的臉孔，和畫像底下瘦小、蒼白的行人形成強烈的對比。

我們要去的囚犯醫院就在一座混合監獄裡。這座監獄佔地很廣，有好幾畝地大，是上海市最大的監獄。從上海各拘留所判決下來的犯人，無論是政治犯或是普通罪犯，都會被送到這裡。無人能確知這座監獄究竟關了多少犯人，不過一般人相信，它的人數在兩萬以上。在這裡，犯人們從事各種物品的生產，從簡單的電子到鈕扣無所不做。

這裡的安全防衛措施做得要比拘留所徹底，吉普車駛進監獄那道厚重的鐵門之前，先要經過兩個檢查站，等通行證被詳細審查無誤後，車子才被放行，到了門口，兩旁帶槍的衛兵還會將頭探入車內，做最後一道審查手續。

這座監獄看起來很荒涼，找不到一棵樹或其他任何的小植物，觸目所及全是一排排貼滿標語的工作房和審問室，遠一點的地方有六幢高大的建築物，裡面的窗子全都被黑色的木板釘住，就像我住的那間牢房一樣，所以，我猜那一定就是監獄。

警衛領著我進入醫院大樓，大樓內部的牆上掛滿了標語和毛澤東的大幅畫像，甚至連玻璃窗也畫上毛的人頭像。

走進候診室，那一片淒慘的景象，令我聯想到地獄，這是一座充滿病痛、貧窮、飢餓、哀嚎的人間地獄，那些身穿破衣、面容枯槁的病人坐在長凳上，無神的呆視前方，像是在等待這一切的結束，另外，還有一些人裹著棉被，躺在骯髒的帆布擔架上，我前面的一位光頭老先生就是躺在這樣的一張擔架上，除了嚴重的痙攣和經由他半開的嘴巴急促的呼吸外，他看來就像死了一樣。

因爲所有的窗子都關著，候診室裡汚濁的空氣幾乎令人窒息，我閉上眼睛休息，直到護士小姐叫我的號碼，才再度張開眼睛。

診療室中，顯然不再有中國固有的禮儀存在，無論男女，都得在衆目睽睽之下脫光衣物，接受醫生的診視，醫生和病人間的問答，也都可以被房間裡的每一個人聽到，這時，我認清了一個事實：「犯人根本不被當做人看待。」直到我出獄後才發現，文革期間，上海所有

的醫院都採類似這樣的診療方式，全不顧及人性的尊嚴！

還好，幫我診斷的女醫生除了要我將體溫計放進嘴裡量體溫外，並沒有要求我做其他的事，她看了看體溫計後，對帶我來的女警衛說：「她燒得很厲害，最好在這兒待幾天。」就這樣，我住院了。

病房在五樓。雖然房間很小，却擺了五張床位，靠門的兩張床位都有人佔了，我被分配到最裡面那張靠牆的病床。

雖然我全身還在發燙，但能再度躺在一張眞實的床上，眞好，床單雖然粗了一點，但還算乾淨，棉被也夠厚實，我脫掉夾克、長褲躺下來後，一會兒就睡著了。

接下來的幾天，我時而清醒，時而昏迷，當我再度恢復知覺時，我發現我的手臂被綁在床沿，一支針頭插進我的靜脈中——經由一條橡皮管和一個倒掛的水瓶相接，就這樣，他們在我昏迷時，將液體送到我的體內。

這時，一個夾克上別著勞改徽章的女孩子走進來，看見我已經完全清醒了，就遞給我一碗熱飲料。「喝了它！」說完她就走開了。

那是一碗豆漿。喝完之後，我覺得好多了，頭腦也更清醒了一點。不久，那個女孩拿了一根裝滿注射液的針筒進來，這使我想起了那個年輕「醫生」曾給過我的那一針，然而，她注射的動作是如此敏捷，竟沒有讓我感到疼痛，從她握針筒、走路的神態看來，我敢肯定她以前一定做過專業護士。我爲她難過，也想知道到底是什麼原因使她被送到這裡來參加勞改。

晚餐時，她給了我一碗稀飯，一碟青菜，和一條小黃魚。那條魚雖小，但味道實在美極了，比我吃過的任何東西都要好吃。

晚餐過後，病房裡其他兩個病人中的一個跑過來跟我聊天：「覺得好一點了沒有？你已經昏迷六天了！」她看來已年過六十，但聲音聽起來却好像只有三十歲。

我點點頭對她笑了笑。

「你也得肺結核嗎？這裡是肺結核病房呢！這也就是爲什麼我們的伙食會比別人好的原因。不過我明天就要回牢裡去了，只要我的情況再惡化，他們又會把我送回來休息、調養。他們不會把我們治好，但也不會讓我們死。」說著，她嘆了一口氣。

「啊！你得了肺結核！」我同情的說。

「待在牢裡，每個人早晚都會感染到的，二十個人一間牢房，睡覺時一個挨著一個，誰能不被傳染呢？而且那裡伙食差，工作又重。」

「你要工作？做什麼呢？」我好奇的問。

「裁縫呀！一個禮拜工作六天，一天十小時，我丈夫要養三個孩子，不能再供應我了，所以我得自己賺點錢買肥皂、衞生紙。」說著，低下頭緩和自己的情緒，然後繼續說：「我原來在一家工廠裡當會計，結果一不小心丟了這份工作。」

「是帳目出了問題嗎？」我問。

「不是，我只是批評黨書記，而被人打了小報告，那個時候沒經驗，我不但沒向黨書記道歉，反而批評得更厲害，最後被判十二年徒刑。」

「你沒有申請上訴嗎？批評黨書記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罪，判十二年太長了。」

「有什麼用？你沒聽過『官官相護』這句話嗎？」

「唉！好在壞日子就要過去了，你就快要可以和你家人團聚了。」我試著去安慰她。

「話是不錯，但是，就怕我丈夫已經有了女人，而孩子們也不認得我了。」

「這麼多年來，他們都沒來看你嗎？」我問。

「是我要他們和我斷絕關係的，因爲只有這樣才能保住我丈夫的工作和孩子的幸福，你也知道反革命家庭可能遭遇到的不幸，所以我堅持要我丈夫和我離婚，我還記得那天他抱著我痛哭，告訴我表面上他答應離婚，但實際上他一定會等我回去。」說完，她又陷入一陣沉思。

過了一會兒，她轉變了話題。「你很幸運碰到了一個好醫生，她的醫術旣高明又善解人意，聽說還是美國一所著名大學的醫學院畢業的呢！我剛進來時，她也跟我們一樣，是個囚犯，被釋放後，她又自願回到這裡工作，因爲只要在這裡待過，就很難再回到外面的世界去了，外面的人不願和你交往，也不會給你工作機會，只要曾是反革命分子，一輩子沒法翻身，爲了它，你在牢裡吃苦，出去也吃苦，甚至家人也得跟着一起受罪，所以，有時候我也會害怕再回到外面的世界。」

我很驚訝，原來那個女醫生在安祥的臉孔後，竟藏有這麼一段辛酸的滄桑史。

「她回到中國大陸，是爲了響應政府對海外愛國學人返國爲民服務的號召，所以她放棄在美國高薪的工作回來了。當我第一次遇見她時，她講的話非常坦白，像一個外國人，當

然，也就因此而惹上麻煩。」她補充說道。

我們靜坐了一會兒之後，她起身向我道晚安，回到自己的床上。

我躺在床上想著我的女兒，不知道她能不能應付文革這種複雜的情勢？我祈求上帝保佑她。

我的病慢慢的好轉，我沒有再向那個勞改的女孩提過我的問題，我們通常只是互相交換一個友善、會心的微笑，雖然她給我送來營養的食物，但我注意到，她自己却是吃著普通的甘藍菜煮飯或馬鈴薯，而她身上所穿的衣服也不夠保暖，我決定要試著送給她一件我身上穿的毛衣，當她再進來時，我將毛衣默默的遞給她，以免被外面警衛發現。但是，無論我如何堅持，她總不敢接受，她害怕的望著躺在病房裡的另一個女人，然後將毛衣推還給我。一年之後，當我再度因病回到醫院時，她已經不在那兒了。

隔了一週，我的體溫恢復正常，醫生告訴我可以回拘留所去了，她說話時眼睛充滿了慈愛的光輝，使我感覺到她身上有種神聖的特質，我不相信她是因爲無法跟外面的人相處才回到因犯醫院裡來的，我相信她回來，是因爲她知道這裡的犯人需要她，而她也找到了可以不計榮辱、終生奉獻的使命，她的人格因她所受的磨難而更顯完美。

幾天後，拘留所內的衞兵來把我帶回去了。



第八章 政黨傾軋

一九六七年冬天，我得過肺炎，如今舊疾復發，顯示我的體能開始急速衰退。長期的缺乏營養品、陽光和新鮮空氣使我無法完全康復。而且，我的精神已經退化到無法長時間全神貫注在同一件事情上，我開始瞭解何以赤貧會產生落寞、虛空和死氣沉沉。其實，我知道自己正經歷一切可能導致身心俱疲且崩潰的徵候，我也可能失去思考力，這比我的頭髮成撮脫落，牙齦出血及體重減輕更令我擔憂。

監獄外的一般狀況仍然很亂。儘管在軍隊的控制下，紅衞兵和革命分子所引起的暴行和派系鬥爭仍然持續到一九七八年，毛澤東再也不能控制住他們，政治情況一天不改善，拘留所就無法恢復正常運作，無人能夠愼重的處理我的案子，而我只有在牢中等待，我眞害怕在我的案情未被澄清前，我可能已經死了。

有一天，接過女勞役員給我的冷水後，我端着盆子的雙手發抖，心臟發跳，兩腿顫抖不已，根本走不到幾呎遠的盥洗處。

當我坐在床上喘口氣時，我告訴自己，如果我想活過文化大革命，就必須鍛鍊身心。在決心的鼓舞下，我驀的站起來，一陣昏黑襲向我，逼得我只有再坐下來。那天開始，我一天

做兩次體能運動，起初，運動使我疲憊不堪，其間，往往要分成好幾個階段來休息，同時，我必須要避開警衞窺探的眼光，因爲運動不比飯後在牢房中作片刻走動，那是要被禁止的。

在心智活動方面，我讀一些毛的評論，我想有助於瞭解他的心理，以便當我受審時，能靈活引用他的評論來保護自己。我佩服他有關游擊戰的論述，他主張把握先發制人的優勢，則一小組裝備不佳的游擊隊就能打敗一裝備精良的部隊，造成極大的破壞力。雖然，毛是一個可恨的獨夫，殺了好幾百萬的中國人，爲了他的政治運動，拘押了更多的人，且由於他那禍害無窮的經濟政策，數度使國家的經濟瀕臨破產；雖然他對馬克斯主義不夠瞭解，但是，我不得不承認在游擊戰方面，他是出色的。一天花好幾個小時來研究毛的論著，對受害者的我而言，是一件無奈的事，因爲它總使我想起他惡覇的主宰着我的命運，以及我那無法克服的懦弱。

於是，我把目標轉向小時候所學過的唐詩。令我感到驚訝的是，我竟能挖掘出許多首封在我腦海中數十年的詩句。記憶起那些我認爲早已忘掉的古詩，是件令人異常興奮的事，每當完整成一首時，就有一種得意的成就感，唐詩不僅對我記憶的增進有所裨益，更使我從牢房冷酷的現實中，神遊到一個羽化的世界。

我爲了保持神智清明所做的努力相當成功，但是，當我飽受飢餓和痛苦的折磨，以致於企圖放棄求生意念時，我必須藉著與警衞的衝突來激勵我的奮鬥勇氣。

我走到牢房門口，用盡力氣叫道：「報告！」

「你要幹什麼？」警衞拖著沈重的步伐，走近我的牢房：「我不是跟你講過好幾次，不

要大叫嗎？」

「還要等多久，政府才會來調查我的案子？」

「不要叫！政府會處理你的案子，又不是只有你一件而已。」

「但是，我已經在此地待很久了，我要見審問員！」我從容不迫的提高我的聲調。

「小聲點！你不要叫！審問員正忙。」其實那個時間，審問員正閒著。我們彼此心裏都有數。

監獄裏格外寧靜，我們的聲音傳遍獄中每個角落，我知道其他犯人，沒事幹的時候也會聽著，也知道他們高興聽到另一個犯人正大膽反抗著，就像每當我聽到別的犯人敢和警衛頂嘴時，心中感到鼓舞是一樣的。其他得知我和警衛頂撞的犯人，也會共襄此舉來支持我，我不再感到孤單，就像有個環把他們和我緊緊的連接在一起。

「我是無辜的，我沒犯罪，我並未做任何反人民政府的事。你們無權監禁一個守法的公民！我要求恢復名譽和道歉！」我大聲叫道。

「你瘋啦？安靜！」那警衛怒冲冲的叫道。

「我沒瘋，那個下命令監禁我的人才瘋了。」

「你不想活了？」

我聽到急速的脚步聲，另一個警衛趕到，第二個警衛說：「你製造騷動是犯罪的。」

「毛主席訓示我們說：『攤開事理，據理陳述。』我只不過是服從他的指示而已，我既是無辜的，我並沒有犯罪，我當然可以這麼說。」我跟她大聲的爭辯。

「出來！」

警衛打開牢門，把我帶到監獄偏僻的房間，他們認爲在那兒，不會讓其他的犯人聽到。當我精疲力竭時，我就會屈服，不再鬧下去，有時，我的耐力強過警衛的耐性，他們不是打我的身體，就是踢我的腿，叫我「瘋婆子」，而經常對我的「發病」，感到無可奈何，但他們並不知道我激怒他們的眞正用意。在六年半單獨監禁的歲月中，我故意製造好幾次這種糾紛，尤其當心情極度沮喪無法安眠或進食時，我會故意找警衛出氣。

雖然手臂瘀傷，腿上還留有皮靴所傷的疤痕，但和警衛吵過後，莫名的痛快，心情也平靜多了。我相信我所需要的是人際接觸，即使與警衛衝突也比孤立好得多。此外，攻擊是一種積極的行動，比忍受痛苦能激勵人心。我有許多朋友和熟人在文革期間，就是藉著忍耐這種美德度過浩刧的，至於我，我要從積極的刺激中來支持自己的勇氣。

八月六日，一個特別悶熱的夏日，報紙送得很晚。我無意中聽到一位送報的男警衛向值班的女警說：「很重要的消息！」。我很想知道是什麼消息，但我必須等到就寢時間才能看到報紙。

第一版頭條以醒目的紅色標題，印著幾個大字，那是有關毛澤東前一天送一簍芒果給那些教導北京清華大學學生的工農們的新聞。那些芒果原是巴基斯坦外交部長來訪時，送給毛的禮物，報紙報導了當禮物送達時，工人們興奮、歡呼的情形。據報導，工人和農人們高興頌揚毛語錄且感激涕零，他們保證效忠領袖。

雖然我不知道毛否認紅衞兵與他之間的關係是何居心，但幾天前毛於北京召集他們的領

導人並叱責他們的暴行時，我立刻就看出毛善於宣傳詭辯，這裏頭有重要的政治意味。無疑的，工人和農人被送到中國的頂尖大學之一的清華，是要他們壓制那些年輕的革命分子。

接下來幾天，報紙報導「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組織，這批人在各大學遊行的照片每天出現。中共採的是不折不扣的軍事獨裁與積極主義，從一九四九年竊據大陸，毛與其黨羽表面上製作平民統治的模樣，實際上背地高唱的是槍桿子出政權，爲了維護『親切政府』的假象，只有偏遠地區發生大規模紅衞兵肇事時，才以『毛澤東工農宣傳隊』的名義派遣平民裝束的軍人前往鎭壓，這在在說明了毛酋城府之深。

當紅衞兵問題被解決的同時，毛派的領導在北京繼續組織「省市革命委員會」，這是省市政府的新稱呼，此外，還組成新的黨書記。報紙經常發表頭條新聞，表達加速革新的希望，以使各種狀況有利「九中全會」的召開。我認爲那些擁毛的幫派渴望得到正式地位，被選入中央委員會和黨的政治局，並把那些已遭排斥的老幹部逐出黨內，以避免未來任何對自己不利的威脅。

時間過得很慢，秋天到了，每逢下雨的日子，氣溫總要下降好幾度。由於持之以恒的身心鍛鍊，使我急速退化的健康得以改善，所以，當有令人掛慮的事發生時，都會使我感到震驚。最近每次月經來潮，都不尋常的大量出血，我感到非常害怕，然而，想到可能碰到未受正統訓練的醫生，就不敢要求醫治。我再次感到沮喪，經常做惡夢，醒來時渾身汗濕和氣喘吁吁。

十月的一個晚上，當我在苦練體能時，警衞一間又一間的巡視，命令犯人靜坐下來聽廣

播。一個男播音員宣佈一項令人吃驚的消息：毛擔任主席的中央委員會後通過一項決議，把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逐出中國共產黨。

劉少奇在位許久，在黨的地位上，僅次於毛澤東。三〇年代初期，毛在景崗山推行中國蘇維埃運動，並領導武裝鬥爭時，劉也在國民黨所盤據的地區，指揮共產黨的地下活動。一九四九年後，當毛同時擁有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兩個職位時，劉少奇只是共產黨總書記，兩人曾密切合作，沒有任何跡象顯示，劉試圖從毛那兒篡奪政權。的確，『毛澤東思想』一詞，是劉少奇在一九四五年「七中全會」擔任黨書記時於報告中提出的，可是，一九六〇年毛在大躍進運動失敗後，當中國的經濟瀕臨破產邊緣時，毛澤東把人民共和國主席的職位讓給劉少奇。百姓根據這則消息，紛紛議論黨內領導之間的鉤心鬥角，而毛不得不在有七千名黨內高幹會議前，擺出一副自我批判的低姿態。

劉少奇立刻採取一連串的倒轉政策，以拯救急速惡化的經濟狀況。當他的經濟政策成功，逐漸變成了一個衆望所歸的領導者，他的影響力和重要性，都凌駕於毛澤東之上，後者甚感驚慌，而處心積慮的想除掉這個對他構成威脅的人，因爲毛害怕的不只是失去他所追求的一切，更怕失去他在歷史上的地位。

儘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每個人而言，代表著不同的意義，然而這場整整持續了十年的大規模紛爭，在本質上就是由毛澤東和劉少奇兩派的黨內奪取鬥爭。令人感到諷刺的是，毛雖然處決了劉少奇，似乎已獲得勝利，可是毛死後，鄧小平却採取早在二十年前劉少奇就已試驗過的經濟自由化路線來領導中國。

在中央委員會通過的決議上，劉同時擁有叛徒、內奸和工賊的三大罪狀，然而並沒有什麼證據，在中共，這種情形司空見慣，受害者不允許替自己申辯，再者，他們以中央委員會而不以黨的全會來開除劉少奇，但是，毛在權力高漲時，對此點並不在意。

在中央委員會決議案宣佈後，國家動員宣傳機構來抨擊劉少奇。持續了好一段時間，報紙上充斥着列舉劉少奇罪名的文章，報紙也描述在全國舉行的大型集會上，人民表示了他們「強烈、一致的支持」該項決議，並表達他們對劉的極度痛恨。據我推斷，激進派控制下的報紙，其基本目的是恐嚇那些同情劉少奇的人，使他們不敢妄動，因此我就像很多我的同胞一樣，知道如何讀共黨刊物。自從共產黨僭取政權以來，我一直住在中國大陸，知道大多數的非黨員對此漠不關心，因為他們對毛澤東或劉少奇都沒有特殊的情感，而黨員中除了一小部分毛派信徒外，對這種進展都感到困惑，因為這種現象暴露了黨政醜陋的本質。

北風再度南掠，一伍毛澤東思想「工農宣傳隊」來到第一拘留所，幫助軍事管制委員會處理文革事宜。拘留所在軍事監管下，一切準備就緒，對他們的到訪並不像往常，透過擴音器作正式的宣佈，但當犯人被帶到戶外勞動時，我看到圍牆上貼着很多歡迎口號的海報。

幾個禮拜，犯人再次被提訊。懷著希望與期盼，我聽到門閂被打開的嘎嘎聲，我要求警衛允許我寫一封信給「毛澤東思想工農思想隊」，又恐怕他會拒絕。但出乎意料的，她遞給我一張紙、一隻筆、一罐墨水。我引用了一些毛語錄的語句，寫了一封遣詞客氣的信，請求調查我的案子。

有一天，我又出血了，當一名女警衛走近監視孔時，我正在清洗內褲。

她打開小窗，對我說：「你怎麼啦？褲子怎麼都沾血呢？」

「是月經……。」

「流那麼多血，不對吧？」她開門走進來。馬桶中有很多沾血的衞生紙，我正準備用洗衣剩水，冲洗一番。

「你爲什麼不報告上面？」在離開牢房把門鎖上前，她瞪了我一會兒。

後來，她帶來一位年輕的醫生。

在問過我的年齡後，醫生說：「可能更年期到了，也可能是腫瘤。你應該給婦科醫生診斷一下，不過，獄中的醫院沒有婦科。我給你打幾針止血。」

他打的針很奏效，但是，我担心自己是得了腫瘤，而且還是惡性腫瘤，天！我要離開這要命的鬼地方。

一九六九年一月的嚴冬，也就是一九六六年終我最後一次受審後的兩年，情況開始有了轉機。

我以習慣性的姿勢—腿上放著毛書坐在床上，牢房的門被打開了，兩位女勞改員走進來，在她們後面，那位好挑剔、曾經搜過我房間的女警，雙手叉腰，站在門口，另一位警衞在她後頭陰暗處徘徊。女勞改員把我的東西從我用來當作桌子的上舖拿下來放到地上，然後，把床搬到窗子邊。

「把東西撿起來！難道你要你的老傭人來這兒侍候你嗎？」那女警譏諷的叫道。

我把東西擺到剩餘的那張床上，女勞改員拿進來一床棉被和一個臉盆，一個三十出頭的

女犯跟著她們走進牢房。

女勞改員走出牢房後，警衛鎖上了門。

長久隔離獨居，我就像一個迷失在沙漠中的人渴望水般的迫切接觸外人，我對這名同伴的到來，第一個反應便是精神爲之一振，但是，從毛派善於迂廻策略的領悟中，使我不敢輕易接受這種表面的假象，我回到原位，再低下頭看書，一面暗忖這相當意外的發展。由於文革進入另一個局面，拘留所的庶務似已減輕許多，其實，我在運動時便已注意到在獄內所聽到的脚步聲愈來愈少，可見這監獄的人犯逐漸減少，絕不可能沒有安置新犯人的空間，我覺得事情有蹊蹺。

她把東西放到床上，並常朝我偸瞧。

「你在這裏有多久了？她們會打人？」她低聲的問，並走過來坐在我身邊。

我對她的話，感到驚訝。她不像個新囚犯，她的頭髮焦黃而稀少，想必是飲食上缺乏蛋白質所致，那衣服掛在她營養不良的身上，就跟我的情形一樣。她以一種絕望、恐懼而無神的眼神望著我。

「我們不能交談，那是違禁的。」我朝監視孔一望，只見一個黑眼珠迅速的消失。奇怪的是，她坐在我旁邊，警衛並沒有指責她。

晚飯送來，她很快的把她那份甘藷吃完。看到我只拿了幾片往嘴送，她把容器搶了過去，將剩下的全倒進嘴裏，邊吃，邊自言自語：「我們不可以浪費食物。」

雖然，我並不反對她把我所剩的甘藷吃掉，但這段小插曲顯示了最初我猜想她早就被監

禁的看法是種誤解，她實在是太餓了。

如果我能熟悉監獄的實際情形，早就可察覺出她是幹什麼的，但幾年後，我才知道公安局有一項規定，一間小牢房決不可關兩人，複式牢房最少三人，因爲監獄當局相信三人比兩人更難共謀不軌。

我坐在床上，等著看下一步她要幹什麼。但是，除了使用我的肥皂和衛生紙外，她沒有想進一步和我談談。

第二天早上，新聞播報後，她再度坐在我旁邊。

「我恨文化大革命，你不恨嗎？」

我經常從擴音器聽到，某人被判長期監禁，只不過是因爲批評文化大革命和紅衛兵的橫行，看樣子，她是受警衛的指示這麼做，以促使我去附和她，於是，我只回答：「你不該抱怨，爲什麼不讀一讀毛語錄呢？如果警衛看到我們在聊天，我們要受罰的。」

我四周望了一下，發現她沒有毛語錄，文革開始，毛語錄成了每個中國人最重要的一部分，不管有或沒有，毛語錄都能當作一種對政治信賴的考驗工具，而且，每個犯人都必須研讀毛語錄，何以她會沒有呢？

「你的毛語錄呢？你進來的時候，她們沒有要你帶在身上嗎？」我大聲說。她滿臉通紅，我把我的借給她，但被她一把推開。

「我不要讀他的書，我恨他，他毀了我的家。我想國民黨比共產黨好多了，不是嗎？」

我直覺的看著監視孔，沒人監視。頌揚國民黨是嚴重的反動，使我更深信她是受那位處

心積慮想害我的警衛，也可能是受毛派行動隊員的指使才這麼做。我說：「你不可太放肆了，你不怕打你的小報告？」

但是，她不理我的警告，繼續找話：「一九四九年以前，你不是住在上海嗎？國民黨不是比較好嗎？」她重複的問。

「一九四九年以前我在國外。」我說。

「住在國外？你眞幸運啊！我痛恨住在共產黨控制下的中國大陸，我們沒半點自由，你不恨共產黨嗎？」她再試著問我。

「我是一個基督徒，一個基督徒只想到愛，我們甚至寬恕那些害我的人。」這句話換來她輕蔑的一笑，但或許想得到我的信任，她突然說道：「我也是一個基督徒。」

「那讓我們一起來禱告吧。我們在天上的主啊……」她並沒有加入，只有一臉茫然。

「不是基督徒，就別假裝是。」我說：「不過，沒關係，我可以教你禱告。」

她搖搖頭，我明白，她弄不清楚派她來的毛派份子對誘使我教她禱告，和設計誘我說出共產黨的壞話會同樣的感到滿意。（在文革以後才允許老百姓信教。）

下午，同樣是那個兇惡的女警衛把門打開叫我囚友的號碼：「出來受審！」

我迫切的想知道當他們發現她無法引我入甕時，會發生什麼事，幾小時後，她回來了，揉著眼睛，好像曾哭過，我很抱歉，使得她必須受責難，但是，我避免去安慰她，因爲，我不要給她誘我說話的機會。我原以爲她會再試一試，但卻驚訝的發現，她不想再和我說話。

翌日，她整天不言不語，只是望著窗外若有所思。好幾次當我專心在看書時，感覺她正

朝我這邊望著。

下午，她又被提訊了，回來的時候，她又揉著眼睛，這種情形持續了三天；第四天，她沒回來。當厨房的人為我們送晚飯時，她只給一人份的甘藷。我想替室友要另一份，她搖搖頭，不過，我還是留了一些甘藷。

擴音器響起，宣布有一項死刑要「立刻執行」，犯人的號碼就是與我同住的那個女人。廣播員說：「她是一名為帝國主義者和國民黨工作的間諜，潛伏了好幾年，文革期間，被紅衛兵和革命派揪出來。她有過自白和得到減刑的機會，但她並不認罪，現在，她已受到無產階級專政鐵掌的處罰。」

我第一個反應是震驚，抬起頭，監視孔上有個眼睛正注視著我，我突然恍然大悟，她根本不是什麼間諜，如果我對這項宣佈表現恐懼或不安，那麼這些毛派走狗會把它說成心虛，我以一種鎮定的姿勢斜靠在被上，眼睛注視著門，做出正在聆聽廣播的樣子。

擴音器關掉後，警衛打開小窗，叫我過去。

「有沒有聽到死刑宣判的廣播？」她問我。

「有的。」

「你對這案子，有什麼看法？」

「既然她是一名為帝國主義者和國民黨工作的間諜，她該死。」我隨便說。

「你不覺得這事和你也有關係嗎？」

「有什麼關係？她是一名眞正的間諜，而我不是，我希望人民政府在適當時機能澄清我

的案子，恢復我的清白。」我回答。

「你不實在。」她說道。

「那還有什麼能比信賴人民政府還實在的？」我說。

她關上小窗，但仍在監視孔監視我。拿起一本毛語錄，坐在床上常坐的地方，我安靜的看看書。

就寢時，那位老找我碴兒的女警衞打開牢門。女勞改員走進來，取走我囚友的東西，再把床豎起來後離去，可見那個女的還活着，那是一個嚴寒的夜晚，如果不想挨凍她是需要棉被的。

既然警衞相信她足以擔負要我招供的任務，她必定是被視爲可任意控制和操縱的犯人。如果她能誘我說錯話，可能會得到一些好處，現在她失敗了，他們便改變策略，假裝判她死刑來嚇我。

女勞改員離開牢房後，那位好挑剔的女警衞走進來。

「站起來！」她站在離我一呎左右的地方，以一種威脅的語氣叫道。

站起來後，她打了我一巴掌，痛得我金星直冒，但是，我強忍住，只是站在那兒，直視著前方，這樣一來更激怒了她，她又摑我一巴掌，用她的厚皮靴踢了我一脚。

「站好！帝國主義者把你訓練得好，眞有種！看我們怎麼整你！」

她經過走廊，走到女監舍出口前，砰然一聲地把門鎖上。

夜班警衞來了，她照例檢查每間牢房，來我這間的時候，問我：「你站在這邊幹嘛？」

「我被別的警衛罰了！」

「那個警衛？是值白天班的那個嗎？」

「不，另外一個。」

「那你好好反省反省，去睡吧！」

這不是反常嗎？或許，拘留所中的一些毛派走狗正計畫陷害我。「莫名其妙！」我自言自語。不過，我很高興自己不必整晚站在那兒。

被踢到的部位，有一處是我露在褲管外面的足踝，皮破瘀血而抽痛，由於我的毛襪並不很乾淨，所以，我害怕導致細菌感染。空蕩蕩的牢房除了幾件必需品外什麼也沒有。「怎麼辦呢？」我自問道。看到牙膏，心想它可能含有一些殺菌的成份，所以，在傷口上塗了一些，並從舊襯衣上撕下一片覆在上面，然後，用唯一的一條手帕，把足踝紮緊。

由於足踝疼痛，以致於整晚惡夢連連。

飢寒交迫的痛苦、漫長等待的歲月、堅信自由的渴望、對女兒念念不忘的焦灼，以及最近所受到的虐待，使我的憤怒與日俱增。當第二天起床時，我不再感到沮喪。我覺得好像有什麼東西在我內心要爆發了，我不許自己再容忍下去，更別談寬恕與幽默感了。毛派走狗無所不用其極的想除掉我，我也要以牙還牙！

儘管沒睡好，但我還是很清醒。我捺着足踝的腫痛，我不停的大步在房中走動。「出來受審！」一個男警衛叫道。

我拿起一本毛語錄，一跛一跛的追上他，往走廊走去。

擴音器正播報人民日報的一項頭條新聞，說明毛最近的指示：「開鑿地道，各地儲糧，不求領導權」。當我跟著警衛往過監獄的圍場時，播報員那恭敬的語調，從一擴音器到另一擴音器，緊跟我來。聽他那種効忠毛的話，令人想起毛那種令人攝懼的力量，就像掩蓋住中國大陸的一條毯子，令人有一種恐懼的窒息感。我提醒自己要小心，不要說任何可能被解釋成反毛、反共、或反人民政府的話。如果說出來，我就變成一個「反革命分子」，我必須堅持那些處理我案子的幹部們誤解了毛的政策。如果有必要，我會像其他受害的中國人一樣爲了求生存而謊稱支持毛，甚至推崇他。即使要攻擊，也必須完善、技巧的攻擊，我警告自己。

審訊室的門開著，穿藍制服的人進進出出，似乎一天的工作剛開始，而我是第一個被召喚的。想起前晚發生的事情，我知道即將面對一個不愉快的遭遇。毛派走狗早就希望誘我上當說錯話，他們失敗了！我警告自己要小心，要勇敢的去面對它，我渴望聽聽他們怎麼說。無論如何，他們一定會露出馬脚的。他們露得愈多，我愈有機會發現他們的動機與目的。

警衛打開其中一道房門後叫道：「進去！」

審訊室的牆壁剛才粉刷過，看起來較光潔。窗戶兩邊掛著兩幅紅布長旗，在上面用白漆寫了兩句口號：「無產階級專政萬歲」和「偉大的毛主席萬歲」，牆邊還有個大型毛像的複製品。

有五個人面向門坐著，其中一個穿軍服，我試圖猜測他們的背景和身分。自從一九六三年，國防部長林彪廢除軍階以來，所有的軍人都穿著老式游擊隊時代的多袋裝，以口袋多寡

來辨識職務高低，在昏暗的審訊室裏，我看到坐在主席位上圓臉蛋的年輕人的制服上有四個口袋，猜想他是一名軍官，因爲士兵的外套只准有兩個口袋。其他四個穿著一般褪色的藍色毛裝，有一個年齡看來比其他人都大，臉上的皺紋深陷，靠在桌上的手像工人那般粗糙。我推測穿軍服的年輕人是軍事管制委員會的代表，那位年老的工人代表和其他兩位是「毛澤東思想工農宣傳隊」的代表，而另外一位可能是接管上海公安局的革命分子代表。

在我注視著室內那五個人時，知道他們都是一九四九年共黨革命的受惠者，對毛澤東和共產黨的態度不見得和我一樣，因中國大陸從一九四九年起，對外閉關自守，這些人對西方的瞭解，僅限於官方的宣傳資料，在韓戰和最近的越戰，共黨惡意攻擊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連帶的對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大肆批評，想到要突破他們的冥頑不靈，我不禁爲之一慄。如果要自由的走出第一拘留所和免除不利的控告，我必須堅強應戰。

進入室內後，我拿著小紅書，站在犯人席旁，等待他們問話，審訊官揮動手臂，指向毛的肖像說：「向偉大的毛主席行禮，並向他懺悔你的罪行。」

向毛懺悔我的罪行？我決定利用這個機會反抗，且打斷他們的程序：「我沒有犯罪，我不知道要怎麼懺悔。」我挺直着背脊回答。

「你吃了熊心豹膽啦！竟敢拒絕向我們偉大領袖行禮！在中國的每一個人早晚都要向毛主席行禮，你竟敢拒絕？」審訊員嚴厲的叫道。其他人以一種驚訝和不以爲然的眼光瞪著我。

「你誤會了，我只是說我沒有犯罪，無從懺悔起。我並沒說不向毛主席的肖像行禮，我

當然可以向他的像行禮，表達我對他的尊敬。」由於心情放鬆，我以一種鎮定的語氣回答。

「那就做啊！還等什麼？」審訊員叫道，然後坐下。

我向肖像行個禮，我的反抗並沒有白費。在隨後的審訊期間，沒有人再提到爲我的罪行懺悔。每當我進入審訊室的時候，審訊官一言不發，只是往肖像的方向揮一下手臂。

我坐在犯人席，在前面幾呎遠處，是審訊員座席後的外嵌板，現已被漆成白色，上面有幾個剛寫上的大字：「寬大對待那些招供者，嚴厲處罰那些頑強者。」肖像兩側是一些勸犯人招供的字句。

我聽到後頭小窗被慢慢推開的聲音，看到審訊員注視我身後的小窗，問話前，並微微的點個頭。

「你寫信要求會晤『工農宣傳隊』，現在你準備好招供了嗎？」

「我要求『工農宣傳隊』來調查我的案子，是想國家還我清白。我知道『工農宣傳隊』代表毛主席，希望你們能明辨無辜者和有罪的人，確實執行毛主席的政策。我被關在這裏超過兩年了，對一個無辜被關在拘留所裏的人而言，難道不長嗎？」我說道。

「你在這裏兩年多，態度卻沒改善，你不知道無產階級革命分子已獲大勝嗎？現在，情況不同於你上次受審的那個時候了。你沒有聽到『中央委員會』所通過對劉少奇決議案的宣佈嗎？即使是他也難逃無產階級革命分子的羅網，你又算老幾？」

「我沒有什麼好隱瞞的，我所要求您的只是希望您據實查案。」我說。

「我們會掌握你的犯罪事實，就像劉少奇一樣。他是海外帝國主義的代理人，也是台灣

的國民黨以及中國資產階級，他是第一號的『資本主義同路人』，和你的後台老板一樣，現在，你應當很瞭解破壞中國社會主義的整個陰謀已被揭發了。」

「誰要破壞中國的社會主義？我不曉得你在說什麼？」我告訴他。

「你和劉少奇都屬於資產階級，是帝國主義和國民黨派來的內奸。」

他的論點是那麼荒謬，對劉少奇的控訴是那麼可笑，所以，我感到厭惡。毛澤東和其他激進派的領導人，希望中國大陸人民相信『中央委員會』對劉少奇案的決議，實在是對他們智能的一種侮辱。我輕蔑的看著坐在前面的這些人，因爲他們顯然是反劉少奇計畫下的懦夫。在當時，我激怒他們，我故作愚蠢道：「我一向很尊敬劉少奇主席，我不相信他眞的有罪，或許有些誤會。他冒著生命危險爲帝國主義、國民黨、資產階級而戰，這是大家都知道的。」

我很高興看到這幾句幼稚的話，興起了震撼效果，他們每個人都站了起來，對我咆哮：「你竟敢爲一個共產黨的叛徒辯護！」、「竟敢反對『中央委員會』的決議！」、「你竟敢反對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

以身爲革命分子的代表來看，他們的行爲是對的；但是很奇怪，只有年輕的工人代表和軍官表現得很生氣，其他三個人竟以一種好奇、有趣的眼光看著我。我認爲他們很高興能聽到我爲劉少奇辯護，且似乎對一個被視爲反共產黨的人，能夠對他們罷黜的領導人有那麼強烈的感受，訝異不已。

我發現，在表面上熱烈支持激進派的人當中，尙有許多同情劉少奇的，我對此很感興趣

，我決定把我們談話時間拉長些：「我並沒有反對『中央委員會』的決議，當然也沒有反毛主席。誰敢那麽做呢？我只是覺得不利劉少奇主席的證據，可能並不完全可靠。」我說。

「住口！你竟敢把一個叛徒稱爲『主席』。」年輕的工人代表大叫。審訊官員覷著他前面的文件，另外那年輕人記下筆錄，至於年長的工人代表，似乎這些話正中下懷，嘴角泛起一絲笑容。

「你不可把一個被『中央委員會』告發的人，稱爲『主席』。」審訊官說道。

「我只是習慣性的稱呼。」我說。「十六年來，報紙上、廣播中，和政府出版機構發行的書中，劉主席……」看到年輕的工人代表站起來，我只得暫停。

「劉少奇，」我更正後繼續說：「一直被中國人民覷爲革命英雄，他對共產黨有很大的貢獻，其中包括了黨組織的改進和黨員的教育。我發現在毛主席的語錄中，對劉少奇很恭維，現在一時很難把這觀念轉變過來，而認定他很壞。或許，他只是犯了小錯，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希望毛主席能原諒他。畢竟，他們是多年的老朋友。」

「你在做夢！毛主席絕不會原諒他！」那年輕工人代表說。

「況且，現在外面的世界一定會笑我們，在這幾十年來，一個身爲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要人，怎麽會突然被發現是個叛徒？令人不可思議的是，他竟能瞞過包括偉大英明領袖毛主席本人在內的其他領導人，那太不合常理，豈不是也丟光毛主席的臉嗎？」我問他們。

「我們不管其他帝國主義者和資本主義者怎麽說，反正他們也不會說我們好，在我們地盤上發生的事，跟他們沒有關係。」那年輕的工人代表繼續說：「替劉少奇辯護是犯法的，

他是反革命者，你也一樣！」

「我不是反革命者，我是人民政府和共產黨的支持者。我最敬愛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我要求你們能提出具體事實來證明我曾經做過或說過任何反人民政府或共產黨的事實。」

「你想唬誰啊！你也不照照鏡子，竟敢冒犯人民政府？即使你沒有犯任何罪，你也是一個壓榨勞動階級的剝削者。無論如何，我們有你無法狡賴的證據。」審訊官敲著桌子說道。

我非常生氣，走上前去，拍了他前面的桌子，這個擧動嚇壞了他們。

那軍官從他槍套裏，掏出手槍對著我，叫道：「你想幹什麼？」

我站在室內中央，面對他說：「如果你有證據，你可以打死我。」

「住口！你這個瘋婆子！回你的位置去，如果你敢再離開座位，我會把你綁在上面。」審訊員抬起手臂，命令我回到犯人席，他一邊瞪著我，一邊把槍放入槍套。

在騷擾中，唯一保持鎭定的是那位年長的工人代表，他以一種憐憫的表情看著我。或許，他開始察覺到我是無辜的。

我回到犯人席坐下來，審訊員擺出一副嚴肅的表情，訓了我幾句。

「替一個被黨告發的人辯護，單就這項理由，我就可以關你好幾年。但是，由於你對外界瞭解得還不夠，這次姑且原諒你。」

「在我們偉大舵手毛主席的領導下，革命派決心要揭發所有潛藏在社會主義中的敵人，不管他們的階級有多高，多會僞裝，你要知道你是無法遁形的！」審訊員說。

「我很淸楚我的處境，我認爲眞正的敵人是該罰，但是，你們不應該把沒有反人民政府

的無辜人民，誤認爲敵人，我請求你能徹底調查我的案子。如果你有證據能證明我反人民政府或反共產黨，你可以把我處死，但是，如果你知道我是無辜的，人民政府必須向我道歉，而且是公開登報致歉。」我誠懇的說。

「道歉？」年輕工人代表譏笑道：「你以爲你是誰？你太目中無人了。」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雖然我不是高級幹部，但是，我是這個國家的公民。」

「你光會講修正主義那套，難怪你替劉少奇辯護，他眞是你的後台老板。人是不平等的，人分成好幾個鬥爭階級。勝利的一方控制失敗的一方，只要有階級存在，就不可能有眞平等。」審訊員說。

「你意思是說，你不管一個是否無辜，只看他的階級成分來定罪？」

「爲什麼不能？資產階級是我們的敵人，我們必須再教育那些人，要他們爲自己的食物而勞動，那些抗拒和反對我們的人當然要被消滅，所以，由無產階級制定法律，各得其所，各享其利。」

「嗯！你把我歸類爲資產階級，但我太老弱了，無法爲我的食物勞動，爲什麼不甘脆把我打死，爲什麼還在這兒審訊，浪費時間？」

「我們要你自白，因爲我們還要揪出有關的人。你雖然不重要，但我們不能不管你的死活。」審訊員說道。

他說要揪出有關的人，是誰呢？我更加困惑了。

「你是說前蜆殼上海分公司的全體職員？」

「當然不是！他們跟你一樣不重要。我們要的是像你一樣想代表帝國主義、在暗中破壞中國安寧的人。」

「你指的是誰？是劉少奇嗎？我向你保證我從未見過他。」

「劉少奇是其中一位，但他不再重要了。還有其他那些『擧著紅旗反紅旗』的人，他們要你代表帝國主義進行反共產黨的卑鄙任務，我們就要挖出他們來。」

看來問題比我想的還要複雜，我想他們的目標是允許外國公司到中國大陸設廠生產的黨幹部，如果他們要我和與我有相同遭遇的其他人招認爲外國間諜，他們可能宣稱，允許外國廠商到中國設廠生產的黨幹部，爲外國特工提供了一個安全的避難所。不論我喜不喜歡，我只是共產黨內部鬥爭中的一名犧牲品，當我極力爭辯、抵抗時，我爲共產黨一些幹部辯解，他們不認識我，我也不認識他們，這種奇怪的境遇太可笑了，就像一幅抽象畫，只有原創者才能看得懂。

審訊員的聲音打斷我的沈思：「現在，回溯到一九四九年，在人民解放軍接收上海前，究竟是在何種情況下，國民黨命令你的丈夫留在上海？他們有沒有命令他，混入人民政府，在內部從事顚覆呢？」

「多年的戰爭後，他希望人民政府能夠拯救中國，免於經濟、政治的混亂，並爲全中國人建立一個強大而有爲的國家。我丈夫和我都是樂天知命的人，我們對階級鬥爭一無所知。當初我們由上海的共黨地下組織得到一些毛主席的文章，裏面只談到『聯合陣線』，與所有愛國的同胞們合作，並沒有什麼階級鬥爭。」我指出。

「那是正確的政策。那政策是爲了贏得資產階級的支持，並暗中顚覆國民黨，國民黨被推翻後，那政策自然不再需要。在每一種情況下，我們聯合少數敵人來打擊多數敵人，當多數敵人被征服時，少數敵人中又會變成新的多數敵人，如此，鬥爭持續下去，就是唯物辯證法。」

我無話好說。審訊員把毛政權的哲學，寥寥幾句話說得淋漓盡至。

過了一會兒，審訊員問道：「你丈夫把留在中國的情事跟那些人談過？或許，他和一些他的外國朋友談過？」

「不，那完全是他自己的意志。早在一九四九年，我和女兒住在香港，我丈夫要我們回到上海。我回來以後，他告訴我他決定留在中國大陸。他好像是在『民主聯盟』受到一個大學時代老朋友的影響，你是知道的，『民主聯盟』在知識分子與國民黨之間，以一種自由開放的形式，支持並密切與共產黨合作，因爲『民主聯盟』一些領導成員的努力，我知道那時候有很多知識分子決定留在中國。」我說。

「『民主聯盟』是美國帝國主義者的工具，它的領導人想在中國建立議會民主，並與共產黨分持政治勢力。他們眞會做夢！沒有軍隊，這些政客怎麼能夠施展抱負？在一九五七年，也就是反右派鬥爭時期，大多數聯盟的領導人都被打入右派，他們活該。」

「他們在一九四九年確實對共產黨有貢獻。」我提醒了審訊員。『民主聯盟』領導人的命運，是一個令人寒心的例子，說明毛擅長利用人性的弱點，當共產黨不再需要你的時候，便只有死路一條。

「情勢已不同了……」審訊員又開始說明唯物辯證法。

「我瞭解，唯物辯證法的理論可適用於現實生活的另一方面。」

「我們的結論是，你丈夫接受國民黨和帝國主義者的命令，留在上海，以便滲透人民政府的外交部。」

「當解放軍進入上海時，那位後來在北京成爲副外交部長的章漢夫，就是接收我丈夫辦事處的人，當他將要前往北京接任副部長時，他要我丈夫加入人民政府，和他一起到北京外交部工作，當時，我丈夫拒絕他的邀請，如果我丈夫眞的要滲透外交部，爲什麼他一九五〇年會拒絕到北京呢？」我問道。

當我回答他的時候，我想到一些曾在北京共產黨外交部工作的前國民黨外交官，前駐緬甸大使被控告反革命而遭監禁，其他的人在政治運動期間受害。我很慶幸我已故的丈夫拒絕了章漢夫的邀請。

「章漢夫是劉少奇派的，他在解放前被國民黨逮捕過，他洩露共產黨的機密，他現在已被逮捕。」對這件意外的事實，我感到震驚，因爲我知道章漢夫是周恩來的隨從。

「你可以檢查記錄。如果我丈夫早就想滲透外交部的話，他會拒絕嗎？」我提出的這點，很簡單且合乎邏輯，審訊員一時無言以對。我把握機會，只想一次就把問題解決，我接着又說：

「事實上，我丈夫願意留在上海，不跟國民黨到台灣去，足以證明他心向共產黨。他是國民黨政府的官員，但是，他違抗了他們的命令，理應由台灣的國民黨來殺我們全家，把我

們關起來，他們沒做，你們卻做了，現在，究竟誰爲國民黨工作？」

替國民黨控訴，對革命分子是一種難以忍受的侮辱，我看得出來，審訊員的臉色慘白，當他想控制待發的脾氣時，太陽穴的青筋突出。這個軍官站起來，又做了一個拔槍的姿勢。

「住口！」他叫道。

但是，那老工人代表用一種溫和的語氣說道：「你陳述的見解還不錯。我們偉大的毛主席說過：『攤開事實，據理陳述』，我們同意你爲自己辯護，但你不可誹謗革命分子，又幫國民黨控告他們。」

審訊員看著手錶，然後對我說：「你可以回到你的房裏，我們下午再開始。」

由於一大早就被提訊，這會兒又餓又累，我站起來的時候，感到一陣天旋地轉，眼前一片漆黑，我必須握住椅臂才能站穩，我的腿也顫抖著，但是，我不要別人以爲我是緊張，所以，我指著我腫脹的足踝說道：「昨晚一名警衛到我房中踢傷了我。」

「胡扯！」審訊員說：「警衛怎會違禁的踢打犯人。」

「確實有警衛踢我。」我一跛一跛的走出審訊室。

我眞餓了，怕錯過一天中唯一的一餐米飯。晚餐的甘藷常使我消化不良，男警衛送我回房時，正在值班的女警衛告訴我米飯包在我毯子中保溫：「如果你需要，我可以給你熱開水喝。」她說。

卽使她是我所認爲警衛中較好的一位，但這種有人情味的關懷令人不自在。

我發現裝飯和包心菜的容器被包在毛巾和毯子中，尚未完全變涼。那個警衛拿著熱水瓶

走近我的小窗，倒了一些給我。我坐在床邊用餐，回味早上所發生的事。

審訊員一定是那五人中，受過最好教育的，從他的自信看來，我想他一定是一個有經驗的高幹。我無法分辨他是否爲毛派走狗，但他一定接近毛派走狗，因爲他被授予審訊員的職位。那個老工人代表，並不是一個眞正的毛派分子，我想他會被選爲「工人宣傳隊」的一員，是因爲他有多年的產業經驗，這種人安插在「工人宣傳隊」中只是爲了掩飾。那作筆錄的年輕人似乎是一幅不在乎的樣子，他只擔任書記，也很可能是他的職業，我發覺當我爲劉少奇辯護時，他的聲音或表情並無厭惡感。那年輕的工人代表和軍人是眞正的毛派走狗，他們的外表、言行就像毛澤東時代的年輕人，來自貧窮家庭，接受很多政治洗腦，以致於他們完全失去爲自己著想的能力。

在女監值班的那位警衞行爲反常得出奇，這天早上，我做了什麼，而博得她這般好感？當我嚼著包心菜時也同樣咀嚼着這個問題。唯一我認爲不尋常的，就是我說了幾句爲劉少奇辯護的話。難道是因我所說的跟她所想的一樣？而因她是監獄警衞而不敢說出，她才報償我嗎？

中國人愛講交情，共產黨徒也不例外，當一個共產黨領導人失勢時，所有曾和他有關的人，不論關係深淺都會遭殃。既然整個公安局被毛派抨擊，在第一拘留所裏，必定有很多男女因命運繫於劉少奇而同情他，如果我爲劉少奇的辯護能得更好的對待和更有人情味的關懷，那倒是値得的。

下午，我又到審訊室接受審訊，審訊員作手勢要我向毛像行禮致敬，然後，他選下面的

條文要我唸：「所有的反動派都是紙老虎，表面上，反動派看起來很強大，但是實際上却是個空殼子。」

唸完後，審訊員說：「你可以繼續你的陳述，談談在什麼情況下，你丈夫參加英國間諜組織。」

「我丈夫從未參加任何間諜組織，蜆殼公司是國際有名的石油公司。」我說。

「它在上海的分公司是一個間諜組織。」

「它不是。」

審訊員從櫃台下取出一疊文件，當那兩個工人代表盯著我看時，他開始安靜的閱讀。每翻一頁，他不時注視我，且搖著頭，好像他吃驚文件中有關我的資料。我知道他在裝模作樣，說不定他看的是算命書，所以，我裝出一種呆滯的表情，靜等他開口。

不一會兒，他把文件收下，說道：「你同黨的其他成員比你開通，他們知道利之所在，他們已把一切都招供出來了。」他指著文件，接著又說：「這是一些他們的自白書，由各不同部門主管所寫的，包括你的前主計員，還有你們分公司間諜活動的有趣細節。」

「好吧！既然你已得到你想要的資料，何也不強迫我寫個假的告白？」

「自白，必須是發自內心的。」

「如果你要我說，我只有唯一的一件——蜆殼公司是一家貿易公司，和政治毫無關聯，蜆殼公司在中國大陸設廠，是因為想和中國做生意。不管怎麼說，它能在上海設分公司，是因人民政府核准的，我丈夫和我受上級指示，商討人民政府鼓勵蜆殼公司在上海保留分公司

事宜。」

「共產黨內部的資本主義同路人想保護外國的間諜組織，這是很明顯的。」審訊員說。

「我勸你說話小心點，那是由國家『顧問委員會』批准蜆殼公司留在中國大陸的。」

核准蜆殼公司在上海保留分公司這項命令，是由周恩來簽署的，審訊員一定知道，我不得不懷疑周恩來是否為毛派走狗下次要打倒的領導人之一，但是，只要周恩來繼續當總理，他們絕不敢公開指控。

「蜆殼公司是一家跨國公司，根據馬克斯主義而言，它是資本主義企業最壞的方式，它剝削、利用許多國家的勞動階級。在政治上，這些公司始終是最反共產主義和反動主義的，在解放後，也最不能留在中國大陸。」審訊員說。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認為美國對中國大陸實施石油禁運時，共產黨部允許英國的石油公司繼續留在中國大陸，是一項很聰明而巧妙的措施。它在敵人陣營中製造紛爭，還有什麼比這個更聰明的？我從毛主席的書中領悟到，他主張在敵人中間製造糾紛和摩擦，是一種階級鬥爭有效的策略。」

那年輕的工人代表說：「毛主席教導我們要自力更生，我們不需要外國公司。」

「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說：『我們不拒絕外援，但最主要的是我們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他不拒絕接受來自友邦的援助。」

「你不能因為蜆殼公司與我們有生意來往，就把它列入友好。」審訊員說。

「蜆殼公司多年來，沒和台灣作生意，它對人民政府不是比對他們還好嗎？」

「你很會說話，最初，你替劉少奇辯護，現在，你又替一個反動的跨國組織辯護，即使你沒有犯任何罪，今天你在審訊室所說的，就夠我們對你判刑。」審訊員說。

「我所說的都是事實，你所說的只是根據想像任意控訴，可是，你是一個代表人民政府和共產黨開通的革命分子，而我却是一個落伍的老太婆。」

他氣極了，又拍了一下桌子：「放肆！別忘了這是無產階級專政審訊室！」

「你竟敢蔑視無產階級專政？給我站起來。」那年輕工人代表激動的說道。

我站了起來。

「說一說你丈夫加入英國間諜組織的情形。」審訊員說。

「如果你硬要那樣說，我無可奉告。」

「帝國主義者把你訓練得很好。」審訊員說。

「回答審訊員問你的問題，我們暫時把間諜組織的事擱在一旁。」老工人代表說。

「是的！調查之後，自有結果。毛主席也曾敎過我們，『沒有經調查，就無權發言。』。」我告訴他們。

審訊員又敲著桌子叫道：「我們可沒有要你來教訓我們，你太過分了！你忘了你是犯人，而我們是人民政府的代表。」

「我希望人民政府的代表是公道的、守法的，要依據事實來處理我的案子。」我說。

「這也是我們想要做的，但你拒絕招供。」

「我不願做假的供詞，我不相信假供詞對政府或任何人有什麽利益。我從未做過任何違

法的事，如果我說謊，你們可以嚴厲的處罰我，我也願意在自白上簽字。」我說。

書記得到審訊員同意後，拿出一張紙給我，我走向櫃台，寫了以下一段話：「我是一個愛國而守法的公民，我從未做過謀反人民政府的事，如果人民政府的調查員能從任何人身上查到我所獲得的機密資料，我願意接受死刑。在結束調查我的案子發現我是無辜的時候，人民政府必須恢復我的名譽，包括登報道歉。」

我簽完名，在交給審訊員前，寫下日期，他看了一下，然後傳給其他的人。老工人代表拿出他的眼鏡，小心的擦拭鏡片後，把它戴上，他看了我的供詞，點頭表示贊同，他指著犯人的椅子說：「坐下！坐下！」

審訊員把我的供詞交給書記，用夾子夾起來存檔。

「在什麼狀況下，你丈夫成爲蜆殼上海分公司的總裁？」審訊員問道。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蜆殼公司照例在設廠的國家請一位當地人士擔任總裁。」

「難道不是因爲他們相信，你丈夫身爲一個中國國民，比一個英國經理更容易獲得資料嗎？」他問道。

「我丈夫唯一能比英國經理強的一點是—當他和人民政府進出口公司代表談話時，他不需要一位翻譯員。」我告訴他們。

「你丈夫到過香港好幾次，而你們也在一九五六年到過英國和歐洲。」審訊員說：「我們對你們的歐洲之旅十分有興趣，因爲我們知道你們是接受英國情報機構總部指示去的。」

「你們把事情搞得一團糟，我們到倫敦是拜訪蜆殼總公司。然後，我們到海牙也是爲同

一目的，因爲蜆殼公司有一半的總部在那兒。我丈夫與總裁商討有關在中國大陸的貿易發展，而且北京的進出口公司和化學公司也渴望他去拜訪，他們要從蜆殼公司採購很多東西。由於貿易進行良好，英國專家被邀來中國大陸幫助中國機構進行研究，我們回來不久，反右派鬥爭就爆發了，接著又是大躍進，一切都必須停頓，蜆殼公司專家正在途中，又必須被迫回去，於是就無法從事進一步工作。」我告訴他們。

「你如何得到護照？誰允許你到歐洲？私人是禁止到國外旅行的。」審訊員說。

「我們是向上海外交局申請護照的。至於批准，我想是因爲他這次旅行有利於中國。就在他被邀到北京與進出口公司商談由蜆殼公司供應殺蟲劑和化學肥料一事時，我跟著他一起去。毛澤東在第一步農業集體化政策上，要求糧食增加產量，以證明一九五五年所訂的農業合作化有顯著的成果，在我們回上海前那天，我丈夫去進出口公司做最後一次商談，與他進行一週商談者通知我丈夫，我們的護照已被核准，他要上海外交局等我們，然後，他很小心的說：『總理私下批准你們的護照。』我們想到那位高幹說的是周恩來總理，因爲這樣，我丈夫更賣力的從倫敦蜆殼公司採一切東西。」

審問員堅稱我們到倫敦的旅行是「拜訪英國情報機構的總部，並接受指示。」如果那是眞的，我要這麼回他：總理批准我們的護照，是給從事間諜活動者一大便利！毛派可能去懷疑周恩來嗎？這樣解釋整件事情經過似乎太荒謬。若審訊員要我招供，是因爲牽涉到其他人與一些『擧著紅旗反紅旗』的高幹，難道他也把周恩來總理牽扯進去了嗎？我只有沈思，或許我永遠都不知道，但是，我却不能不去想林彪與毛婆江青，他們希望周恩來下台。每個中

國人都知道江青恨周恩來，或許林彪也認爲周是他得勢的障礙。

「你們的旅行對中國沒有好處。」審訊員說。

「我丈夫在北京碰到的那個人，他認爲如果能從蜆殼公司獲得中國所需的東西，我丈夫將是對此項貢獻的最佳人選。」我告訴他。

「那只是黨內資本主義同路人，和反毛主席訓示的政策。」審訊員說。

「你不該把我們當作旁觀者，以我知道這所有的一切，就我丈夫和我個人而言，人民政府是政府，而代表政府的幹部是我們必須聽從和相信的人。」我說。

「說一說你們在英國活動的情形和你們洩露給其他歐洲國家的資料。」

「我丈夫拜訪在倫敦的蜆殼總公司。他會見了好幾位總裁和其他遠東地區主管人員，他也參觀好幾家工廠的設施。」

「有沒有會見任何英國政府官員？」

「有，都是一些以前認識的外交官。」

「他們沒有問你們中國的情況嗎？」審訊員問道。

「在反右派鬥爭前的一九五六和五七年，中國情況很好。我們很高興告訴他們，經過多年的戰爭，通貨膨脹首度被控制，第一個五年計畫實施得很成功，人民富裕、社會安定，他們都知道。」

「你們一定說了些別的。」審訊員說。

「我們能說什麼？如果你們調查一下在中國大陸與我們來往的朋友，你們會發現我們並

不認識能告訴我們重要事情的人。既然，我們無法進入政府機構偷文件，我們所知的一切，一定是來自於我們的朋友。如我們不認識那些知道機要的高幹，我們就無法告訴英國的友人，不是嗎？」

「不必由你來決定什麼是重要，什麼是不重要，一切由我們來決定。我要你寫有關一九五六到五七年，你們到歐洲之行的詳細報告。列舉所有你們見過的人，和你們對他們所談的，我們就會知道，你們是否洩露了機密。」

「這不是荒唐嗎，我怎麼能記得住十年前我們說過的每句話？此外，當他到工廠各地訪問時，我沒有跟他去。我怎麼告訴你們他所說的？你又怎麼知道我寫的對不對？」

「是你在調查，還是我在調查？」審訊員問。

「當然啦！你是人民政府的代表，一切我都聽你的，但這似乎是在浪費時間。」

「如果我們能查出帝國主義的特務，我們不在乎那麼一點時間。我們相信所有在中國設廠的外國廠商，都有雙重身分，他們除了賺錢圖利，也爲他們的政府收集資料。」

「資本主義國家從未放棄顚覆中國的企圖，因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我們一天比一天茁壯，他們不願意以軍事手段來毀掉我們，所以，他們想進行內部瓦解。在他們大學受訓或在辦事處工作的你們這班人，都是他們潛伏的擁護者。英國是第一個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強權，現在仍佔領香港，雖然他們承認人民政府，但在聯合國裏，他們和美國一起投票阻止我們加入。美國公開支持國民黨，英國扮演雙面人更危險！」審訊員說。

「你太誇張了。」我告訴他。

「你最好不要替英帝辯護，否則，你的境況比現在還糟。」審問員說。

「在寫下你的自白前，你應當改變你對劉少奇的觀點。你要知道，資本主義同路人被整肅了，勝利歸功於我們偉大領袖的政策。你唯一的出路就是招供，回到無產階級革命的懷抱。你以爲你們這些有背景的人可以像文革前一樣，受主義同路人的保護？那你大錯特錯了。」審訊員說。

我很高興那天的審訊，因爲我有機會開口，且已歸納出好幾點。現在，我要利用他們給我的機會，進一步爲劉少奇辯護，我要知道我對毛派及劉派的觀點是否正確。

我裝作愚蠢的說：「老實說，我仍不瞭解劉少奇錯在那裏，爲何毛主席要處罰他？毛主席不是曾公開讚揚劉主席？當我研讀毛語錄時，我留意過。我希望毛主席能原諒劉少奇主席，你不認爲這對中國大陸，對共產黨都有好處嗎？此外，劉主席不是最早使用『毛澤東思想』一詞和督促黨員要研讀毛語錄的人嗎？這可說明他確實效忠毛主席。」

「你不可把這個叛徒當做主席！」

「你還爲劉少奇辯護！」

他們靜下來後，我說：「我當然不敢爲劉少奇辯護，如果他有罪。但我懷疑中央委員會所根據的資料是否可靠，你知道人很容易被威脅做假自白。」

我不得不做這種譏諷，這不過是一則小小的報復。事實上，我所說的正搔着癢處，從他們臉上的恐懼和以那種快速制止我的擧動中，我確信他們知道，或至少也會懷疑所謂對劉少奇不利的證據是毛派走狗所揑造的。

「住口！住口！你這瘋婆子！」審訊員叫道。接著又說：「劉少奇和你一樣有罪！」

「我沒有罪！至於劉少奇主席，我覺得他也是無辜的。」我說。

「住口！住口！」審訊員命令道。

我聽到在我後面有噪音，似乎在外面聽的那人已經感到厭煩，他砰然一聲的關上小窗，表示他的不悅，審訊員很快起身，走了出去。

他回來的時候，交給我一捲白紙。

「回牢房去，把你到英國和歐洲之行寫下來。記下你見過的人，和你對他們說的話，做個完整的報告。」

一名警衞已站在門口，我跟他出去。

當我不在牢房時，熱水已經來了，而且還保溫著。這些親切的關懷是異乎尋常的。因爲我替劉少奇辯護，所以她們對我親切，我不知道此想法是否正確？或者，毛派走狗認爲我會被這種親切所感動而接受她們？當我坐在床邊喝開水時，這種想法出現在我腦海中。

突然間，門上的小窗被打開，那年輕的醫生說道：「過來！」

「你的脚怎麼啦？」

多教人驚訝啊！我從未聽說醫生不請自來的，警衞也站在外面，我說我足踝上的瘀傷似乎發炎了，她打開門讓醫生走進來，檢查我的足踝，並在紅腫的傷口揑了揑。

「骨頭沒有斷，只是有點發炎，我給你綳帶和藥膏。」

不久，值班的警衞交給我一條金黴素和一綑綳帶。在我從驚異中恢復過來的時候，裝著

米飯和包心菜的皿器已送到，並不是平時晚餐常吃的甘藷，當我把皿器還給那位時，她說：「醫生規定你要吃米飯。」

想到那天所發生的事，我感到很高興。那審訊員是個高幹，在那種情況下，我想他並不是一個不可理喻的人，至少，他聽了我所說的辯詞，也做了記錄。當我準備就寢時，心情比往常平靜得多，然而，一整天與那審訊員進行的激烈辯論，對我虛弱的身體是個很大的負荷。

那天晚上，我比往常出了更多的血。

一下子，牢房中的衞生紙和毛巾，被用完了，到處染有血跡。我感到很害怕，叫了警衞，她很快召來醫生。打過針，她告訴我好好躺在床上。黎明時分，我被救護車送到了醫院。

第九章　接踵而至的迫害

老舊的救護車扯着單調的警鈴，快速的穿過上海市街。我躺在擔架上，旁邊的摺椅上坐着一名女警衛。我半闔着眼，一半是避免看到在這偪促空間中在我頭上盤旋的警衛，一半是要好好想想。

我深感失望，久候的審問才剛開始我又出血了，是不是我眞患了惡性腫瘤？我想到死亡，但它似乎不那麽嚇人。反正我活著也逃不過一死，我相信自己的死不過是人生劇本中的一段落幕曲，我將會與我女兒及孫輩們常相左右，代代相傳緜延不盡，但憶及女兒總令我心痛如絞，她過得還好嗎？文革後，她的前途又將如何？

救護車「嘎」的煞住，我聽到遠處的擴音器正播着毛的訓令：「挖深隧道，貯存穀物且不求權力。」當担架抬出，我瞥見醫院前一名守衛帶領著一羣荷著鋤頭、鏟子和簍筐的年輕男囚，除了這些生產用具外，還有一本栓着繩子、揹在肩上的毛語錄，他們看來是相當瘦弱，眞不知道他們怎麽能做那粗重的苦工。他們低著頭，面容憂戚，而我，也像他們一樣，沒有權利，也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我偏過頭，避開這幕人間地獄的景象，而且頭一次慶幸囚室裏沒有鏡子，聊可繼續保有自尊的幻象。

我和我的外科病歷一併送入病房，小房間裡，牀挨着牀，我的牀位於門邊，從門口灌進來的風無法驅散血、尿、消毒劑及體臭的穢氣。我床側是一位半昏迷的婦人，由她呻吟聲來看，顯然剛從手術室出來。我奇怪自己爲何被安排在這些外科手術病人中，難道獄醫也要爲我動手術？這想法令我不寒而慄，因爲在階級嚴格劃分的共產社會裏，犯人所得的必是最糟的醫療服務。

然而，幾天來我只打針而已，出血已被控制住，而因休息及較好的食物使我覺得好受了些。一天晚上，晚餐裏有一只發黑的小香蕉。我驚訝自己對這看來可憐的香蕉竟然「反應熱烈」，且從「吃它」得到了莫大的樂趣。

止血後的幾天，一九六七年多醫治我肺炎的女醫生到監房來，她帶我到辦公室，並告訴我她曾試著安排我到市醫院的一位婦科醫師處檢查，但那時在上海的醫院被紅衛兵和革命派所控制，拒絕給「階級敵人」醫療治療。

「你認爲我害的是什麼病？」我問她。

「可能是某種腫瘤，也可能只是更年期的關係。」

「那你看會是惡性腫瘤嗎？」

「沒有檢查，很難說。」她答道。

「我並不怕死。」我說。「但我絕不能在案子澄清前死，我不能讓女兒一輩子籠罩在疑雲下，那會使她不快活，而且，我好想看看她，我很想她。」我聲音顫抖得無法繼續說下去。

她將手放在我的臂上，同情道：「在我對一號拘留所的報告中，我會強調你需要較好的營養。」

「求求你，大夫，告訴我如何活下去？」我問她。

「把給你的食物都吃下去，就是難以下嚥的東西也都有些營養價值。還有，樂觀些！」

苦澀啃蝕著我的心，我發覺自己連哭都不會了，而她眼裡却有淚：「願上帝保佑你。」

一週後，我被帶回一號拘留所。以後，每天有兩頓飯，佐菜是一小塊豬肉或魚肉，（午餐則還有甘藍菜。）豬肉大都是肥的，皮上還帶着毛，魚也從來沒新鮮過，但因爲大夫的話，我吃光了每一樣。

拘留所裡的年輕醫師開給我買維他命丸的許可證——用我在監獄裡保管的錢。一名男獄卒拿著我的銀行存摺，爲我另外買了魚肝油丸、維他命B，只有牙齦出血不可或缺的維他命C，在上海買不到。

警衞對我受到較好待遇的反應大不以爲然，這些好戰的毛黨爪牙對監獄當局給我額外食物和維他命的決定十分不悅，只要一逮着機會，他們總吼罵或虐待我，當我因運動或提訊離開囚室時，他們會用力推我讓我跌倒，搯我的手臂或踢我的腿。如果我向他們請准許可証，補充維他命丸，他們總是拒絕或喊著：「你吃維他命像吃米一樣啊？」或者：「你以爲這是療養院啊？」

當然也有不那麼兇的，只要維他命丸用完了，他們就會爲我補購，少數我認爲是「劉黨」的警衞，則會在他們値勤時一次買好幾瓶。有一次或兩次，他們甚至爲我買好幾袋跟維他

命丸一樣珍貴的葡萄糖粉，並在其他警衛發現前急急推進小窗來。

我從監獄醫院回來的那天，值班守衛遞給我一枝鋼筆及一瓶墨水。她說：「快寫自白書，審訊員正等著呢。」

我拿起審訊員給我的一卷紙，並看到這已替代了一九六六年冬叫我寫自傳時給我的白紙，第一頁還印著一段毛語錄，下面則是「罪犯簽名」。

我對「罪犯」二字的立卽反應是憤怒，並決定不在這下面簽名。然而，經過幾分鐘的考慮，我設計了一個計謀以扭轉情勢來反擊毛黨。

在毛語的下方，我畫了個方格，也塡上「最高訓令」。在格子裡，我寫了另一段話：「有反革命之處，我們必得壓制；當我們犯錯，我們必予修正。」

其後，我寫下了一九五六年，旅歐時與先夫曾到過的國家，其中記得的活動及接觸過的人名，總之，我寫的是無政治意義的話題。快寫完時，我突然記起在英國時發生的兩件大事，對第一件事我無法確切發表意見，但第二件事，我就像與朋友交談似的寫得較詳細些，（因它與中國或共產黨扯不上關係。）在「罪犯簽名」的地方，我將之改成：「沒有犯任何罪的人」——並簽下我的名字。

我將紙交給值班警衛。就在同一天的下午，我被提審了。

審訊室中，每人臉上均是不悅之色，其實，我心裏早就作好準備了，未待審訊員示意，自動向毛像鞠躬。審問員爲我選讀的毛語錄是：「對付帝國主義走狗和反動派，我們必須以獨裁政治的力量來鎭壓他們。他們只能順服，不准不從。」

審訊員面前攤著我寫的報告，我坐下後，他猛拍一下桌子並瞪著我。然後叫道：「他媽的！」。他指著報告說：「你以爲我們在和你開玩笑嗎？」

我噤聲不語。

「你太不正經了。」這老工人說。

「如果你老是這樣，你就永遠別想從這裏出去。」年輕的說。

在我能回話之前，審問員將我的敍述報告丟在地上，站起來說：「回牢房重寫！」

一名警衞立刻在門口喊著：「出來！」

我跟著他回牢房，不久後又得到同樣的一捲紙。第一頁上面依舊是一段毛語錄及下面的「罪犯簽名」。既然已經展開了行動，決定繼續奮鬥到底，我毫不猶豫的寫下相同的內容，再次在我的簽名之前加上「未犯任何罪的人」。雖然重寫的文字無法和前次一模一樣，但我的記憶絕佳，因此相距不遠。第三天，我將報告交給警衞。我幾乎是馬上被提審。審訊員又再次將我的敍述報告擲在地上，並命我重寫。

再一次同樣的內容，這下，審問員對我說：「你瘋啦？」

「我沒瘋。如果你不滿意我寫的，你可以指出我的錯誤。我將會很高興的改正。」

「你爲什麼在毛主席的引述下多加一段？又爲什麼改掉下面的字？」審問員問。

「我只是試著反應事實罷了。」我說：「我提醒你，毛主席說我們要修正錯誤。我希望你能實踐毛主席的訓令，在我的案子上改正你的錯誤。至於修正我的簽名前的字句，那是爲求一致。我沒有犯罪。如果你一定要稱我『罪犯』，那我就是未犯罪的罪犯。」

「你強辯有什麼用！」審訊員這次沒用吼的。

「我從未犯罪，如果你堅持我有，你必須証明。」

「我們當然會証明，只是我們給你個自白，以便從寬發落的機會。」

「我不是一再告訴你我根本沒有犯罪？只要你能証明我犯了罪你可以槍斃我。」

「你嚇得了誰！你難道不擔心，時間到了我們自然會槍斃你。」年輕的工人激動道。

「回到牢房再重寫。」審問員說。

當我打重着紙，我發現這一次首頁沒印著毛語錄和下方的「罪犯簽名」，所有的紙均是空白的，再次，我寫下我的敍述。兩天後交給值班守衛。

對沒和共產黨打過交道的人來說，我這樣的抵抗似乎是無用也無意義的，但共產黨全是些恃強凌弱的傢伙，一旦讓他們得逞，就會得寸進尺，我在獄中的生活將會更恐怖。此外，我在審訊室所說的話已留下記錄，與生俱來的樂觀使我希望有一天會有公正的人能翻案，而我所說的能助他達成一個正確的結論。

幾天過去，我等著審訊員召我繼續詢問，但都未被提審。終於，一天早晨，兩名粗暴的男、女守衛踢開我的牢門：「出來！」

我彎著身去拿毛語錄，後者踏進囚室粗魯的推我，始料未及之下，我差點撲倒。

「你去的地方不需要這個啦！」她從我手中一把奪走毛語錄，扔在床上，反剪着我的手臂讓男警衛銬上手銬。接着，她猛推了我一把，我踉蹌了一下，才恢復平衡，她又推我：

「快點！快點！」她叫著。

我跟著他們步出女子監獄，穿過中庭來到前門。審訊員、年輕工人和另一人在第二道鐵門等著，街道上停着一輛等待發動的白色轎車。

「進去！」審訊員說。

我鑽進去後坐在中間，雙手反銬的關係使我必須坐直。車子內的柔軟的座墊令我驚奇，坐在有彈簧的軟椅上已是我遙遠的記憶了。

審訊員和那名年輕工人坐在我兩側。另一人坐在司機旁邊。車子慢慢駛出車道，然後加足馬力，馳出監獄。

他們要帶我去那兒？眞要把我關到精神病院？我認爲他們不會處死我，因爲處死一個犯人不必大費周章到監獄外執行，此外，他們殺掉我，想從我這兒得到自白的詭計就毫無希望了。他們可能要加重我的折磨……我想，很可能是精神病院那種地方，這樣讓我的奮鬥變得困難，精神病患的尖聲哭叫會扼殺掉一個正常的心智，然而，車子的方向是另一個目標。

透過車窗上飄揚的紗帘，我看到我們正通過上海市中心的商業區，加速往西郊駛去。路上沒什麽行人、車輛。車子慢下來，轉進技術學校的車道，那是我第一次參加鬥爭公司前會計的地方，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七日晚上，我從那裏被帶到第一拘留所，現在已經是一九六九年的三月了。那些說我背叛國家的不實指控仍在我頭上盤旋。

有幾個人站在蒼白的春陽下。其中一位打開車門，帶我去一個小房間，等我進入後，門鎖轉動，留下孤伶伶的我。

骯髒的房間裏祇有一張木頭板櫈，窗上糊了紙以免我向外看，從天花板到地板的牆上都

貼滿了大字報，還有更多堆在角落裏，我坐在板櫈上，瀏覽著這些大字報，我慢慢瞭解到是爲了我才匆忙貼上去的，那些都是兩年半以前的舊大字報，現在，爲了摧毀我的反抗意志，又把這些東西貼出來。上面佈滿了蜆殼公司以前員工的簽名。

我閉上眼睛不想看到這些可憎的謊言。過了許久，我想到該打聽一下外面的情形，於是聽到脚步聲時，便敲門。

「幹什麼？」一個男人的聲音問道。

「我可不可以去廁所？」

一個女人打開門，帶我到後院去。我們經過宿舍區，成排的牀舖擠在房間裏，後來我才知道蜆殼以前的職員從一九六六年起就被關在那裏，經歷了沒有盡期的訓話、寫自白書及苦工。

我從廁所出來後，沒被帶回原來貼滿標語的小房間，而被帶到曾在一九六六年公司前會計和我被鬥爭的大廳。我被帶到前面，像布袋似的被「扔」在地板上，跌坐的當兒，從眼角瞄見房間的地板上坐滿了人。這是個侮辱的安排，因爲，祇有奴隸、罪人和戰俘才坐在地板上。房裏的人叫著我熟知的口號，足足一分鐘，他們叫喊著要鬥垮我。我聽到有脚步聲走到前面來，一個年輕男子的聲音向大家講話——

「她來了！」他大聲的尖叫。「我們把她帶來這裏好教大家知道她是誰，我們會讓她明白我們知道她全部的陰謀，你們全部都跟帝國主義者要消滅中國社會主義的詭計有關，照理說，你們都有罪，因爲你們替一家本世紀初就開始剝削中國人民的公司工作，它也是專門替

帝國主義者蒐集情報的間諜機構。但是你們犯罪的程度，依照你們在公司的職位及替帝國主義做事的多寡有所不同。你愈資深，你的罪愈重。你工作的成就愈大，你就更有罪。我們革命分子是很公正的。如果你犯了三成的罪，我們不會罰你五成，當然，我們有自己的判斷標準。這是根據我們偉大的毛主席的教訓而訂定的標準。」

「我們會很快的放一些人回家，這對你們是好消息。但是要記住，祇有那些我們認爲表現良好的人才能回去。其餘的人還要繼續再教育。你們什麼時候可以回家，能不能回家，以及你們還要繼續多久的再教育和苦工，完全看你們自己。」

從這個人所說的話，我知道坐在地板上的人大部份是公司以前的職員，現在誘惑他們「贖罪」，必須先揭發我、譴責我，他們照辦了，可是我知道是事先安排好的，發言者是被選出來的，並被吩咐該說些什麼，他們發言的草稿必須經由革命派核定。卽使在文革以前，也沒有人敢公開發表言論——除非他的書記同意。一九五六年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時，以及一九七八到七九年的民主牆，黨命令人民發言和寫大字報。而那兩次運動，因爲黨無法監督所有的言論和海報，人民也超出了黨要他們說話的範圍，局勢一下子便失去控制，黨祇好再牽制這項行動。

八年來，每天我和一起工作的人輪流起立，重複小房間張貼大字報上的話。他們昧着良心，以受驚的聲音說著粗暴的謊言，及與他們那麼不相襯的字眼，我知道他們感到羞愧和痛苦。我感到痛心疾首，這些專橫的革命派把我們羞辱到這些地步，但是我一直注意的聽，我要從共黨命令這些人說的話裏，看出他們的企圖。

我聽到年輕人的聲音命令前會計主任發言，陶支支吾吾的說：

「大家都知道，我在文革一開始就被逮捕，然後被帶到第二拘留所。在那裏，審問員和警衞給我再教育，幫我提高對社會主義的警覺，我才知道我違背了黨與社會主義的罪有多嚴重。那時，仁慈體恤的革命分子把我帶回這裏，並允許家人來看我……」他情緒激動得哭了出來。

等陶恢復後，他像一個精疲力竭的人用盡最後一點力氣，他顫抖的說：「我的太太、兒子與媳婦和我談話，我不能教他們失望，我要招供！跟過去劃分界限。」他停了一會兒好像不願再說下去了，最後他鼓足力氣說：「我是大英帝國主義的間諜。我經由這女人丈夫的介紹，加入了英國間諜組織。他死後，這個女人變成我的老板。文革一開始，她威脅我不要招認，還說要給我一大筆錢。」

否認或跟陶辯論是沒有用的，但是我一定要阻止這場鬧劇，我掙扎著把頭抬起來，大聲笑。我的反應不是任何人能想像的，一片死寂，然後有幾個人衝到我身邊，我身後的人又把我的頭壓下。另一個人大吼：「你笑什麼？」有人說：「你還敢笑！」

負責集會的年輕人在吵鬧中對我大叫：

「你爲什麼笑？回答我！」

「如果你在表演喜劇，你一定希望觀衆笑。不是嗎？」由於低着頭，我祇得對地板說話，但是我把聲音提高，讓房間裏每個人都聽個淸楚，我要讓以前的職員知道共產黨不足爲懼。

「拖出去！拖出去！」年輕人大喊。然後他帶領房裏其他的人大喊攻擊我的口號。我非常高興打斷了他們刻意安排的集會。我猜想如果我一直保持沉默，接下去的情勢將稱了他們的心，共產黨安排陶坐在我身邊，其居心叵測可見於一般。

回到囚室裏，我發現自己運氣眞差，竟是那個壞女警衛當班。不用說，她一定沒替我留飯！她也不拿下我的手銬，一把打開門，將我往門裏一推，讓我撲倒在床上。沒多久，走廊上立刻響起一陣跑步聲，在車上押著我的警衛又回來叫我去問話。

房間裏約有七八個人，四位坐在毛像的對面，其他的人圍繞著審訊員。審訊員向毛像舉手敬禮。我鞠躬時差點失去平衡，地板起伏不平，我趕緊閉上眼睛。有個人說：「站著！」，但是他的聲音好像來自遠方。「你解釋爲什麽笑？」遠方又有個聲音說。

我想說些什麽，卻說不出來，我一定是因爲飢餓而昏倒了。當我睜開眼睛時，我發現自己坐在地板上，女警衛扶著我。手銬拿掉了，我左手的袖子捲着。年輕醫生站在我旁邊，拔出針頭，他向審訊員點點頭後離開了房間。女警衛拉起我，推我坐進一張犯人的椅子後也離開了。

「現在回答我的問題。你看到沒有？別人比你懂事，他們什麽都招了。你也認了吧！」審訊員問道。

在我回答他的問題之前，有人打岔說：

「你笑什麽？你爲什麽要笑？這可不是可笑的事。間諜的罪很嚴重，你知道嗎？」是那個在技術學校領導集會的年輕人。我好奇的看著他。

我很訝異他看起來不像一個工人。他穿著類似軍官的夾克，但是衣領上沒有解放軍的紅色標誌，左手襯衫袖口還帶著一隻金錶，他大約二十五歲，看來很自傲。我不知道他是誰，怎麼敢在文革時穿著如此奢華，他的打扮明顯的屬於資產階級，他不怕被誤認爲階級敵人嗎？

幾年後，我才曉得他的打扮是標準的高級軍官之子。當時他們是中共的黑手黨，他們專幹搶劫財物，強暴婦女，組織黑市和賭場的勾當。那些人的父親在軍隊裏階級很高，他們是中國最大的「後門人」和「修理人」。他們能安排任何事，從住家、工作到進出口貿易，因爲他們可不經由既有的機構，透過自己的好朋友便把事情辦成。即使是香港來的商人，爲了在中國做好聯絡，也都得賄賂這些神氣的年輕人，他們能來去香港走私，把金銀古董運出中國，把電視機、錄音機和手錶運進國內。

「回話！回話！」這個打扮入時的年輕人大叫。

「我笑是因爲事情可笑。」我告訴他。

「什麼可笑？」

「你們安排的整件事都可笑！」

「解釋一下。」

「陶在說謊，而且說得很糟，但是你們相信他，你們還要放他回家。這不是很可笑嗎？」

「陶沒有說謊。」

「他沒有嗎？那你是說他眞的是個間諜？如果眞是如此，你們會讓一個眞正的間諜回家，而不判他死罪或極刑？」

「別管陶的事。你呢？你不想回家嗎？」

「我當然想回家。我要復職，我要人民政府在上海自由日報和北京人民日報刊登道歉啓事，可是，我不要撒謊。」

我注意的看著這個穿著良好卻很愚蠢的年輕人，猜想他可能不明白我笑祇是爲了打斷他小心安排的集會。忽然間他站了起來，激動的大叫：

「把頭低下去！把頭低下去！你還敢看我？回答我的問題。你是不是英國的間諜？」年輕人問道。

「我不是間諜，我沒有什麼可招的。」

「你是個間諜！」年輕人生氣地大叫。

「我不是！」我搖頭說。

「我們有証據。」

「拿出來呀。」

「難道你沒聽見今天早上大家說些什麼嗎？」

「那不是証據，那祇是被脅迫做下的指控。」

「你不用担心。我們會給你看具體的証據。但到那時，你想得到寬厚的待遇就太遲了。」

「一個眞的間諜不會得到寬厚的待遇。一個眞的間諜會被槍斃，不管他承認與否。」

「你現在回到牢房去。」審訊員站起來接著說：「把今天早上在集有中聽到的每件事都想清楚。你要是明白你的處境，你哭都來不及！」他站起來走出房間。

我走過女子監獄時，看到穿著白圍裙的女廚子推著大型手推車載著一大堆給犯人吃的甘薯，兩個勞改的女孩在幫她。顯然還有一個囚犯也有飯可吃，兩碗白飯和包心菜在黃褐色的甘薯裏特別醒目。我一回到牢房，米飯就從小窗裏推了進來。

除了被打和被銬著，我想大致上這一天沒有白過。我已經曉得公司以前職員的遭遇，也比較清楚自己的處境。我很難過許多人已屈服在壓力下，但那些名字沒有在大字報上的人以及那些沒有辱罵我的人，我懷疑他們是否還在世上。

天氣眞的暖和了，幾天前我就不再發抖，我想把暖和的羊毛衣洗一洗收起來，我一定要小心保存我的冬衣，因爲這些東西在監獄商店是買不到的，天還曉得我在拘留所還要待多久。

第二天下雨了。柔柔的細雨輕輕的滋潤大地，喚醒了花木，冬天的逝去，較好的飲食及維他命丸，以及某些警衛放鬆的態度，使我不再緊張，我幾乎有些陶醉了，在隔天被叫去審問，我的心情幾乎是愉快的。這回，祇有那個穿得很好的年輕人和年輕的工人坐在櫃台後。

我進入房間後，警衛把門關上，年輕人向毛的肖像舉手敬禮。我也鞠躬。他命我唸以下的話：「革命不是宴會、寫文章、畫圖，或是繡花；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行動。

「你是不是愛英國更甚於中國？」他問。
「我是個中國公民，當然我更愛中國。」
「如果我們不管國籍，你還會更愛中國嗎？」
「我血脈裏流的是中國的血，我當然更愛中國，我一直是個忠心的中國人。」
「一九四〇年你是不是在美國？」
「對的，我在那裏待了幾個月。」
「你是不是在那裏發表演說？」
「是的。我做了幾次有關日本侵略中國的演講。」
「聽說你也公開稱讚英國戰時的努力。你在紐約一個廣播節目裏演講，也許，也在別的地方演講，不管怎樣，你回到重慶後，在國民黨的廣播電台做了宣傳廣播。你說過英帝英勇，不到獲得最後勝利絕不投降，是不是英國政府要你替他們宣傳的？你是不是在一九四〇年就被英國收買了？」
「我從英國搭乘英國客船到紐約去，一些乘客被廣播節目訪問，訪問員問我有關英國的問題，我自然會誠實的回答。」我說。
「你替英國做宣傳。」
「你要怎麼想都可以，但你得証明你的指控。」
「我們會的。我們會証明你說的愛國只不過是爲了掩飾你的罪行。」
他從抽屜裏拿出一張我在五十年代初期和一位瑞士友人在跳舞的黑白照片。（紅衞兵到

我家去時，照片都放在儲藏室裏，他們一定是拿了一大堆。）照片上，他在教我新式舞步，我們兩個都在笑。

「你說這個叫愛國？」年輕人狠狠的說，好像我做壞事被抓到一樣。

「跳舞跟愛國有什麼關係？」我覺得這問題十分迂腐。

「你跟一個外國人跳舞，你看起來很高興和外國人跳舞！那是絕對的不愛國。」

「跟外國人跳舞是不愛國？」他的話眞令人吃驚，我暗想，如何使這種爭論對我有利……繼續說：「我不知道和外國人跳舞是不愛國。我接受你明智的判斷，因爲你是位開明的馬克斯主義者和革命派，然而，如果我不愛國，至少我很有用。」

「你說你很有用是什麼意思？」

「照你剛才說的，和一個外國人跳舞是不愛國，祇要我跟我的瑞士朋友跳舞，我就會使他不愛國，因爲對他來說我當然也是個外國人。如果藉著跳舞這種簡單的舉動，我就能讓別人不愛國，這不是很有用嗎？你可以把我派去和全世界與中國爲敵的人跳舞，讓我使他們不愛國，那麼，不費一顆子彈，他們就全部都解決了，還有誰比我更有用？」這些話給我帶來無比的快感！以致於最後幾個字都很難說得清楚。

但是這個年輕人覺得一點也不好笑，他的臉因憤怒而漲紅。指著偵訊室的門，他大叫：「出去！出去！我要槍斃你！」

嘲笑當權的人是划不來的，隔天，我便領教了這個代價。

在早餐前我就被叫到偵訊室去。行禮後，同樣的年輕人交給我毛澤東選集第四册，攤開

的那一頁是一封共軍司令部給國民黨將軍的信。這封信是毛澤東在一九四八年起草的，當時國軍被困在南京的楊子江畔，信上指出國民黨的處境毫無希望，並催促將軍快點投降。

「站好，大聲的唸這封信。」他命令道。我大聲的唸著內容。在我唸完正要把書還給他時，他說：「再唸一次，讓這些字烙在你的笨頭裏！」我又唸了一遍。在我唸完第十二遍時，他說：「這些字烙進去了嗎？你明白你毫無希望嗎？你像國民黨將軍一樣被包圍了，根本沒有人會幫你！唯一的出路就是投降。」我不說話，他瞪了我一會兒，又粗聲喊道：「再唸一次！」

我唸完後，我們互相瞪著對方，然後他不耐煩的大喊：「再唸一次！讓這些話烙到你的笨腦袋裏！」那天，我在偵訊室裏站了好幾個小時，一次又一次的唸著那封信，直到我發暈，聲音啞了，腿也腫了。黃昏時，我累得聲音都快聽不見了，我猶豫的說著那些字。當我停下來或遲疑了一下，年輕人便喊道：「認罪了嗎？」他等我的回答。而我不回答時，他又會大喊：「再唸一次！」

等天黑了我才得回牢房，雖然我不確定我在審問室裏站著唸了多久，但一定超過了七個小時，一整天，我祇有在到審問室之前和晚上回到牢房之後喝了些水。為了給自己一些營養，我吞了一把魚肝油和綜合維他命B片。

這種例行公事持續了三天，只有第二天和第三天我在被准許回牢房時及時趕上晚飯。而每天晚上我還得在值班警衛的監視下，於牢房中晚操一個鐘頭；至於睡眠，根本談不上，因為她一個晚上要來踢好幾次房門，讓我無法安枕。

第三天結束時，我再度瀕臨崩潰的邊緣，我想那兩個人也很清楚，在下午結束時，他們都問我：「要招了嗎？」我想說話，但我很虛弱，喉嚨又乾，祇能發出小聲嘶啞的嗓音。「講清楚！你是不是要招了？」我使盡全部的力氣說：「我無罪！」「你一定會被槍斃！」他憤恨的離開房間，把門用力關上，而我坐在犯人的椅子上等候警衞。

日子一天天過去，我沒再被叫去。我一遍又一遍的研究他們的問題以及我的回答。我能做得更好嗎？我能換別的方式嗎？我的結論是他們看起來是要找出事情眞相，實際上祇是要我認罪。審問不是要解決我的案子，而是用來增加我的痛苦。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在我被捕後的兩年半，期待許久的「九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報紙上報導林彪發表了重要的政治報告，稱頌文化大革命和階級鬥爭進展順利。一千五百位代表中有一大部份是他在陸軍、海軍和空軍裏的支持者，在共黨新黨章中，林彪被正式稱爲毛的接班人。林彪和江青成功的把他們的同夥安插進新的「中央委員會」。許多老幹部都被剔除了。少數像總理周恩來和外交部長陳毅仍保住了他們的地位，就整體而言，老派的勢力已在逐漸消失中。報上的最後一張照片，毛站在中間，左手邊站著林彪和江青，右手邊是少數幾個以總理周恩來爲首的老派黨員。

九中全會開會期間，報紙每天報導說「民衆熱烈支持」。在拘留所，犯人被迫從早到晚收聽演講和公報的廣播，包括一長串代表的名字。熟悉的名字不見了，新的名字取代了他們，這反映了共黨領導者之間正進行着新權力結盟。

有一天，我剛坐下來吃早餐，牢門就被打開來，一個男警衞喊道：「出來！」我不理會

他，狠命的囫圇吞下一口一口食物。「出來！」他又叫了一次，但並沒有走進牢房。「出來！」他叫了第三次，而且走進來。他把裝食物的茶杯從我手上拿下，放在桌上：「你可以回來再吃。」我說了：「請出去一下，我要上廁所。」他祇得出去。

女警衞在走廊裏，喘著氣大叫：「你在幹什麼？怎麼這麼慢？」我跟著她走出女子監獄，院子裏另一個男警衞拿著手銬等在那兒。女警將我的手扭到背後銬上手銬。

同樣的白色轎車停在那裏。車旁的老工人代表及那個穿得很好的年輕人看見我的時候，兩個人同時走了過來。我從年輕人臉上的表情知道今天要懲罰我不肯妥協。他咬牙切齒的說：「你要去參加一個集會，慶祝第九屆黨員大會的成功落幕和新中央委員會的選擧，規矩一點，否則革命派會把你撕得四分五裂。」

「這裏是第一拘留所，因爲法律和規定，我們對你是極端的忍讓。出了大門，情形可就不同了，革命群衆想幹什麼就幹什麼，你最好當心一點，否則他們殺了你！就有很多人因此而被殺了。」老工人說。

「你明白吧？」年輕人問我。

「如果我不被激怒，我是不會回嘴的。」

「也許離開前，我們應該先給你上一課。」他說，握著拳在我眼前揮動。

「你現在應該知道暴力不會使我安靜下來。你們愈刺激我，我愈不怕。」

「好吧！我們會讓群衆教訓你，你要注意，如果你敢還嘴，他們會撕了你。」

「你是說如果有人問我問題，我也不可以說話？」我要把情況弄清楚。

「不錯，祇要低頭認罪！」

「我寧死也不承認不實的事。」

「那就別吭氣，不管他們跟你說什麼，就是別吭氣。」老工人說，顯然，他比較好心。

「好吧。我會保持沈默，不管他們說什麼。但那並不代表我承認有罪。」

「群衆不能決定你是否有罪。」老工人向我保証。

車窗敞着，褐色的紗帘在風中飄揚，我可以看見街上的景物。我們直穿過城裏駛向北方。一路上我們經常被慶祝『九中全會』的遊行隊伍給堵住去路。紅色的標語，彩紙上的口號、鼓聲和歌聲，以及毛的畫像，和文化大革命剛開始所用的一樣，但是我注意到參加的民衆和幾年前興奮的群衆大不相同。沒有記憶中的興奮和激動，他們看起來了無興趣的樣子，在三年不斷的階級鬥爭之後，人們似乎患了革命倦怠症，或者，他們對文革的發展感到失望了！

在以往，上海的街道通常都充滿了閒逛的人，但這天除了遊行者以外，只有幾個懶散的路人。紅衞兵和革命派的暴力到底擴展到何種程度？怎麼把行人趕離了街道？不過，我知道黨派內鬨時有許多人因流彈而喪命，紅衞兵和革命分子也爲了「前進行動」暢通無阻而任意鞭打路人。

車子轉進一幢龐大的紅磚建築物。沒有招牌明示這是個什麼地方，入口處也沒有哨兵，祇有一個人在我們的車輛進入後關上大門。氣氛非常神秘，我決定小心的觀察每件事物，因爲，我覺得他們不要我知道這地方是幹什麼的。

經過整齊的樹籬與萌芽的柳樹後，車子停在一棟大樓的前面。兩個身著藍色制服，佩著革命軍紅色臂章的魁梧女人等在那裏。其中一位打開車門，老工人下了車。我才準備要下車，第二個女人已經伸出手粗暴的把我拉了出去。我們進入一個小房間，他們把我推到角落去。

「面對牆壁！不許動！」一個女人大喊。

我聽見這個女人重重的坐下。沒有人說話。在經過一段長的時間後，我聽見開門聲，一個男人提到食物，竊聲商量之後，其中一個女人離開了房間，她回來後，換另一個人走出去。當時我一直面對著牆站著。

忽然門又被打開了。一個男聲威嚴神秘的說：「來了！」這兩個女人像閃電一樣從椅子上彈起來，捉住我的手臂，半拖半拉的將我帶出大樓。

我們走過一個廢棄的籃球場，沿著林蔭夾道，進入另一棟大樓。

我們來到一個會議廳，那裏聚集了不下一百人，分成兩排面向對方坐着，中間靠牆的地方有一座高高的平台。一群穿著國民裝的人圍成半圓坐在桌子後面。牆上掛著紅布、白漆的文革口號。我注意到林彪的畫像掛在毛畫像的旁邊。房裏每件東西都整齊清潔，顯示這大樓屬於一個有充裕經費及高度紀律的單位。我注視著這些人，他們穿著良好，勝過街上普通的百姓。

兩個女人把我推到麥克風前，其中一個把我的頭壓低，這樣我被迫看著地板。從視綫中我看到麥克風下糾結的電綫。我想其中一定有一條接在擴音器上，其他的接到那裏去？是不

是別的房間的人也在收聽鬥爭大會？會是那些人呢？爲什麼他們的態度如此神秘？唯一的解釋是林彪的手下已經接管我的審問。

房間裏的聽衆正大呼口號並在空中揮舞著小紅書。喊過「偉大的毛主席萬歲」後，又接著喊：「祝林副總指揮身體健康，永遠健康！」我認爲這不僅反映了林彪在第『九中全會』後高昇的地位，也証實了組織這次集會的是林彪的親信。

視綫中出現了兩條腿。一個男人的聲音在我前面響起。他向聽衆介紹我的家庭背景、個人生活。我早已注意到每當我的身世被革命派複誦一次時，我變得更加富有，我的生活方式也變得更奢侈腐化。

被人如此的毀謗眞教人無法忍受，我本能的抬起頭來，那些女人忽然扭起我被銬著的手。肩膀傳來一記錐心的刺痛，我祇得彎下身子，垂着頭以減輕痛苦。在那個人辱罵我時，他們使我保持這種姿勢，等到他們又在呼口號時，才把我的手放下來。我後來才曉得我被弄成所謂的「噴射姿勢」，是革命派發明用來折磨「死硬派」的新把戲。

另外一個人接著發言，他說我不服從黨的革命派的命令、不肯招供。我第一次知道我不肯寫認罪的自白書被我說成是反黨的舉動。觀衆聽了更加的憤怒，也許不服從黨是一項比間諜更嚴重的罪。我還沒來得及想出答辭，就被推倒在地板上，旁邊的女巨人用結實的手臂一把將我拉起，我又被「擺」回原來的姿勢。

第三個人又說話了，他抨擊我替劉少奇辯護。當一個人要表達不眞的感受，他通常會誇張，這群觀衆也不例外，這兩個女人一直很敏捷，有一、兩次她們甚至舉起手臂擋開揮向我

的拳頭。

聽衆很快的進入歇斯底里的狀態。他們的吼聲淹沒了麥克風的聲音。有人從後面重重地推了我一把，我踉蹌的撞倒了麥克風。有個女人想把它撿起來，却被電綫絆倒，我一塊拉了下去，這下，許多人在混亂中跌在我們身上，接下來是一場大混亂，好幾分鐘後我才從地上被拽起來。

我精疲力竭，渴望着集會趕快結束，但是演說仍在繼續，看來每一個坐在台上的人都要表現一下，他們不再詆毀我，他們彼此較量用最誇張諂媚的言辭高唱對林彪的讚美。他們努力標榜自己對林彪的愛戴。我想附近一定有林彪忠心的侍從。

忽然間，我身後的門打開了，一個男人的聲音大喊：「走了！」這兩個簡單的字產生了一股驚人的效力，演說者話才講到一半便停了——既然隔壁房間聽講的重要人物已經走了，也沒有必要再繼續這場表演，有的人站了起來，有的人甚至已經在收拾提袋和外套，雖然台上的人仍舊熱烈的喊着口號，但根本沒人在注意他，祇有幾個人在走出房間時應了幾聲，先前對我張牙舞爪的憤怒已被漠不關心的眼神取代，看樣子爲我舉行的這場鬥爭大會只是他們必須出席的其中一場，他們只是做他們虛應的事，現在結束了。當一個男人撞到我身上，後面還有人推扶了我一把。

房間裏一下子空得可怕。我聽見散會的觀衆邊走邊聊：「天氣變涼了，不是嗎？」「你上那兒吃晚飯？」「沒有下雨吧？」他們看起來跟剛從戲院散場的觀衆沒兩樣兒。

「九中全會」的慶祝活動進行了好幾週，每隔幾天我就被送到不同的鬥爭大會上去。結

束之後，我會被帶到審問室去問話，問我要不要招供。我總是這麼說：「我沒什麼可招的。」或「我沒有罪。」，或者保持沈默。然後我又會被送到另一次鬥爭大會。一天又一天，我的耳中塞滿了憤怒指責的聲音，眼前充滿敵意的面孔。我不像一個活人，應該說，我已經成了一具行屍走肉。

我個人對「輪流鬥爭」的經歷，雖然很痛苦，但跟許多人比較起來已經是幸運的了。從毛澤東在一九七六年死後，人們漸漸敢談論他們在文革時期的遭遇，我就遇到過一個形容枯槁的老人幽默的說，他在文革時被鬥爭了一百多次，頸子上經常繞著沈重的鐵鍊（那是用來懲罰那些不肯低頭的犯人。），而且只在他告訴我他許多朋友及同事死在鬥爭大會時，才流露出感情。我問他是不是也經歷過使人非常痛苦的「噴射姿勢」，他輕描淡寫的說：「每個犯人都逃不過。」

第十章　弟弟的告白

當一連串令人頭痛的鬥爭結束之後，夏天終於來臨。在七月眞正的潮暑熱開始之前，上海會有長達一個月的梅雨季節，在這段期間，屋子裏溼氣濃重，一地汚濁。傾盆大雨之後，雨水溢出排水溝又滲過牆角，使得角落總有大片汚漬，屋子裏也經常瀰漫令人作嘔的腐臭氣息，在我收藏的冬季夾克、棉褲，甚至昨晚放在溼地板上的鞋子全都滿佈着霉點。

但是我卻熱切歡迎溫暖的天氣，因爲我不必在冷風中發抖，也不用穿著厚衣保暖，溼氣所引起關節紅腫的痛楚令我沮喪，每當颳風下雨，每個關節就僵硬得令我下不了床。同時，發炎的牙齦更加惡化，它們不止在我刷牙時流血；我只得用手指磨擦牙齒並且在未進食之前漱口。即使如此，每當吃到含鹽食物，接觸到牙齦時，還是會痛得全身發抖。我必須在食用蔬菜之前用冷水洗淨鹽分，每當牙齦痛得受不了時，醫生就開給我一些磺胺藥劑以減輕發炎，但是他說在監獄醫院裏沒有牙科。

我設法不使身體狀況惡化，但是生活從未像現在這般了無生趣。除開肉體的痛苦不適，有些時候，我覺得非常平靜，因爲我已通過了一連串可能有希望澄清我案件的審訊。每天我都被傳去審訊室接受二人宣傳隊員對我親戚朋友的調查。在審訊中我要寫有關與每個親友交往

情形的報告書，我也知道我所寫的會被拿來和親友們所寫的一一比對，他們可以從中發現矛盾，因而加罪於我，所以，正確的記載很重要，但爲了避免牴觸其他人的說辭，我盡可能含混其事，有時候審問非常苛刻，審訊員不滿意我所說或所寫的，就大聲恫嚇我提供親戚朋友的罪狀。

通常，藉著回答詢問或書面報告的機會，我都會爲親友們說些好話，我可以大略的由他們工作的種類和過去的生活猜測出他們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所面臨的苦境，因此，我努力回想親友們一切能在「革命派」眼中地位改善的言行表現，我盡量用聽得懂的家鄉話來說服那些同志。

我們這一代的中國知識分子都有著強烈的愛國心，我們的教育背景和我們對國外的經驗，使我們憂心中國的落後，我們自覺近百年來中國的歷史是部不斷衰退的記錄。事實上，相信共產黨會帶給中國進步的想法眞是太天眞了。共黨導致我們停留原地甚至退步到五十年代。所以，在我的供述中，我老實的說出我的親友們都深愛中國和他們爲國服務的熱忱，但是革命派存心挑剔而不欣賞他們的美德，甚且，毛派故意混淆「人民有共同血統」的民族概念，而主張：「國家只是政府之下的政治社會團體」，如果某人在共產黨奪權之前對中國文化科學、藝術上有重大貢獻，他將會被認爲是對國民黨政權服務而不是對中共效忠，所以，他會因特務之名而獲罪，這種心胸狹窄而荒謬無比的觀點使我經常和審訊員爭辯，但是我很快發現我面對的不是少數偵訊我案件的毛派，而是整個共產黨所共持的偏見。

審訊在雨季中展開，我總是一身溼透，狼狽的走進審訊室。我沒有雨衣可穿，但是因爲

怕冷我多穿好幾件衣服所以不致完全溼透。審訊一直進行到夏季，溼氣和雨水帶來令人窒息的悶熱和大批蚊子。有時候，會遇見一些我所供述出來的親友，他們也加入被批判的行列，我知道我的親友們也正遭受同我一樣的審訊，我很擔心他們，同時更注意這些陌生人的談吐，如果他們看起來溫和講理，我就稍稍放心，如果是愚蠢暴燥，我便憂心如焚。

秋天，我遇上了一段筋疲力竭的經歷，一位人民劇院的軍管委員來問我有關導演黃朝林，及他妻子丹妮的事（後者是漂亮、能幹的演員，夫妻兩人都是我和我丈夫在倫敦求學時代的老朋友）。當共黨接收上海時，黃已經是著名的電影導演。有人說他們夫妻是當時共產黨暗派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所以新政權成立，他們立刻被接受，黃也擔任人民劇院的導演，同時成爲共產黨員，他們的事業如日中天，携手在上海演出一流戲劇，包括莎士比亞劇的譯作，以及其他當代歐美名家諷刺資本主義體系的作品。黃氏夫婦努力的使中國觀衆明白；在國外，戲劇創作者應有以批判眼光來展現現實社會的權利。黃是被大衆及共黨文化事務領導階層所公認的一流導演，而這些稱譽明顯的使他和緊隨毛共後高喊：「藝術爲政治服務」、「藝術是對工、農、兵的禮讚」的口號大相逕庭。

而在這次被審訊之前，早就看過許多批評黃朝林電影「爲上海而戰」的報導。這部電影是五十年代初期爲了稱頌共產黨接收上海市而拍攝的，它成功而卓越的表現出宣傳上的技巧，上演的時候，被譽爲偉大的成就，可是現在報紙卻猛烈攻擊這部電影，報上聲稱：黃英雄化了國民黨而侮蔑了共軍，批評者更指控黃描述城市毀滅及人民的痛苦，是對共產黨自由戰爭下意識的反抗。很明顯的，這些忽然湧到的批判都直接指向黃，在這種壓力之下他被揪出

來成爲犧牲品。

為什麼像黃朝林這種忠黨份子最後會變成衆矢之的？就像其他許多例子一樣，他只是中共領導階層之間權力鬥爭的犧牲品。當初提拔黃朝林的人，是江青在三十年代上海的仇敵。當時，江青只是一名急於出頭的小演員，而她的仇敵却是在上海搞左派文藝運動的首腦——其中一部分是劉少奇所領導的中共人員。左派知識分子十分蔑視江青，認爲她是沒有知識又放蕩的女人，江青忍氣吞聲數年，終於她在文革期間掌握文化部大權，下令所有輕視她的人物下獄整肅，她又宣布加入劉少奇派系——因爲結黨營私是中共的政治方式，每當任何一個官僚垮台總會使他的部屬受到牽連。

「你認識黃朝林這個『買辦』嗎？」這個軍管委員在我唸完一段「毛語錄」才剛落坐，劈頭就問。據我推斷這些人是找不到黃的任何錯處，來向我蒐集他的背景問題。

「買辦」是外國商行與中國政府之間聯絡的經紀人，這個制度始於清朝末期，是爲控制外國行商而設的職位。這制度雖已在三十年代的新式貿易方式中逐漸淘汰，不過蜆殼石油公司這類大公司並未解雇他們在中國的「買辦」，「買辦」是終身職。中共政權把這些老「買辦」視爲最反動的資產階級，中共軍隊接收上海之後，這些「買辦資產階級」全都鋃鐺入獄或課以苛重罰金。黃的父親曾經是蜆殼石油公司在天津的買辦，逝世於中日戰爭時。

「我認識黃朝林，他是著名的導演及演員。」我回答。

「他也是蜆殼石油公司的買辦。」這穿著制服的人民劇院軍管委員說：「我們清楚你的一切，你是死硬的反動派，是帝國主義的間諜，我們並不驚訝你廻避問題。」

「黃朝林有了大麻煩，他是滲透在黨內的階級敵人，如果你想掩護他，這後果將非常嚴重，你的處境會更糟，如果願意和我們合作，我們就能夠以你對文化大革命的貢獻將功贖罪。」審問我的人說。

「我會說實話」我說。

「要說實話，就說他是蜆殼石油公司的買辦。」軍管委員告訴我。

「當『買辦』的是他父親，黃朝林只不過是有個不幸的家世而已。」

「他接辦他爸爸死後的事情。」

「『買辦』的工作老早已經廢除，他父親一死，就不再存在了。」我告訴他。

「那這又是什麼？」那人丟來一份文件，那是一份以黃朝林爲名的一塊天津土地的契約單據，上面有蜆殼石油公司及黃朝林的署名。

「這只是舊文件而已。」我說。

「不管新舊，都表示黃朝林是蜆殼石油公司買辦，他向黨隱瞞這個事實！」

「如果你願意聽，我把事情全部告訴你好了。」我說。

「說吧！」

「在戰前，國民黨政府宣布禁止外國公司擁有中國土地，所有的外商公司就把土地契據轉到公司買辦名下，蜆殼公司也這麼做了。黃的父親死後，黃承繼了家產，在戰時，天津在日軍控制下，黃朝林不住那兒，蜆殼石油公司也不在那兒，我懷疑是黃朝林經紀人把他的印章蓋在他父親所有的財產單據上——包括這筆蜆殼石油公司的土地，這樣一來就不能表示黃朝林

受僱於蜆殼石油公司當『買辦』了！」

「蜆殼石油公司曾支付薪水給黃朝林！」軍管委員說道。

「我不知道這一回事。」我回答。

「你丈夫在擔任蜆殼公司總裁期間確實曾付錢給黃朝林！」

「他沒向我提起這件事。」我決心否認知曉任何交易，這樣，他們知道我無法幫他們定下黃的罪名才會放過我，事實上，先天確曾告訴過我蜆殼公司想送給黃一筆金錢，表示蜆殼公司對他父親的感謝之意。而這塊土地雖在一九五〇年中共的土地改革運動中被沒收，卻仍被用來當做宣傳罪狀的工具。

「你說謊，你僕人說你和丈夫無話不談。」

「他眞的沒向我提起這件事，或許他認爲這沒有什麼大不了，我們很少談公事的。」

「鬼才相信！」

「信不信由你，我不知道任何付款的事，但並不表示你們查不出來，你們可以清查我辦公室裏的檔案或者可以去問問我們的會計部門。」

「我們查過了，你以爲我們會忽視這類事情嗎？我有很多證據證明你丈夫曾付款給黃！」

「既然如此，我知不知道眞象並不重要！」

「我們是要你承認黃朝林是個『買辦』，爲蜆殼石油公司做事，他曾支領金錢，你在蜆殼公司駐華職員中資歷最深，你可以證實我們已經知道的，黃朝林是『買辦資產階級』，是

反動分子，他將被開除黨籍，你和你丈夫是他的朋友，應該瞭解他，可以提供有利情報鬥垮他！」軍管委員說。

被開除黨籍是黨員最壞的命運，他不再是群衆之一，社會地位只比反革命分子好一點點，在任何時候都會被歧視，他的家庭，包括子女及其後代都會跟著一起受罪。對我而言，黃朝林投注生命、才華爲中共效力，卻換來這種下場，眞是令人不平，我堅定的說：

「黃朝林是忠貞的中國共產黨黨員，他絕不是『買辦』，自他父親死後，蜆殼公司在天津就不再有『買辦』了。」

「你不合作，你不想在你個人紀錄上弄個功勞嗎？」審訊人員問。

「我必須堅持事實。」我說。

他們開始憤怒，人民劇場的軍管委員漲紅著臉直瞪著我，他對我感到失望和厭惡。詢問我的人又說：「我們要你供出黃朝林的一切，寫下任何你知道他的事情，如果你試圖掩護他，後果你自己負責！如果你提供有利供詞，你就是爲文化革命貢獻力量，並且會得到嘉獎，試著去回想他曾對你和你丈夫說過的一切，寫出他的生活方式和觀念看法，他是階級敵人，你應該揭發他，我們認爲你最好把握將功贖罪的大好機會！」

「如果你要爭取功勞，就告發黃朝林！」軍委又加了一句。

他們所說的，在在都侮辱我的人格，但這的確是他們爲達政治目的，來鼓勵人說謊的標準說辭，我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屈服在這種壓力之下，至少在目前，這只會更堅定我說實話的決心。

我把我所知道黃朝林的一切生活、看法及他對中國共產黨的堅定信仰，全寫出來，他們丟回供詞又威脅說要嚴厲懲罰我，因爲我沒有供述黃朝林是『買辦』，在天津爲蜆殼公司工作。一次又一次的嚴厲警告，並沒能讓我改變原來的心意，幾星期之後，事情緩和下來，那名軍管委員也突然不再出現了。

稍後，我被釋放了！我聽說革命派想定黃朝林的罪沒有成功，黃既沒被指爲「買辦資產階級」，也沒有被開除黨籍，只是被劃入劉少奇的派系之中，他和他太太在多次鬥爭大會中被批鬥，也做各種粗重的勞動，甚至無論隆多酷暑挑負泥土磚塊，在建築工地做工，黃的健康嚴重受損，他那漂亮的太太也累成了老太婆。

毛 死後，於一九七六年四人幫被捕，中國大陸的政治情勢完全改觀，黃朝林夫婦均獲復職。

在毛執政時代，中共社會最醜陋的生活方式就是黨要求人民在平時互相密告，在政治鬥爭時更得互相劃清界綫。這種詭計大大破壞了人倫；夫妻間互相監視，父母故意疏遠子女，這措施禁止一切人際來往，所以人們不再希冀朋友，而且凡事明哲保身，每個人不敢講眞話，撒謊成了唯一保護自己和家人的方法。

每當我被迫提供某人的罪狀，某人也同樣會被迫供出一些對我不利的證據來打擊我，我能想像得出來，親戚朋友被審訊員盤問時會說出或寫些有關我的什麼事情，這種情形很容易就能看出某人是不是能冷靜地把持自己還是已經變得容易慌張、迷惑。一九六九年末期，我歷經一段十分困苦的時期，我的弟弟在北京也做過一次自白——描述一個絕頂聰明，受過良

好教育的人，如何在壓力下崩潰，使他不知道如何在眞實和虛僞之間劃清界綫。

在隆重的慶典中，毛　的每句文告都會以紅字明顯的刊登在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和解放軍報上。毛　聲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無產階級對抗資產階級的重大政治鬥爭，它也是共產黨與國民黨鬥爭的延續。

一句「根除國民黨的渣滓」口號的公布，鬥爭開始了！每天都有發現國民黨特務的報導，這些特務藏匿國民黨軍事人員，要不就是傾向台灣的國民黨政權。短短時間內發現了不少敵人，似乎突然之間冒出許多暗中渴望國民黨的男男女女，多年來中共一直宣傳打擊前政府，看來全都白費。氣氛愈來愈緊張，眼看就要有一場互揭瘡疤的批鬥和令人毛骨悚然的階級鬥爭，人們想要保證自己無罪，只有誇張的支持毛酋及共黨；大聲高呼口號；以不求回報、自我犧牲的精神努力工作，也殘忍的對待階級敵人。報紙上天天鼓吹每一個人都要對鄰居、同事的舉動嚴密監視，甚至要比監視牢房裏的犯人更積極。

對再一次的提訊，我已不感驚訝，迫害我的人永遠不會放過我，畢竟，我是國民黨政府官員的遺孀。

一進屋子，他們就要我唸出一段毛的話，向毛的肖像鞠躬。他們說：「你就是我們所要剷除的國民黨禍根。」

有個較年輕的人大吼：「自白！」

「自白些什麼？」我問道。

「不要作出一副無辜狀，承認你和國民黨的關係吧！」

「我和國民黨無關！」

「你是國民黨的忠實擁護者！」

「我想連國民黨也不會同意你！」我一邊回答，一邊觀察這兩人，由髮型、服裝看來，他們是來自北方，雖然國語是北方語言，可是土生土長的北方人仍有一種明顯的腔調，我懷疑這兩人來此地的目的，近日來，一連串的審訊中，我供述出住在北方的弟弟、弟妹，也說明姐弟來往的情況。

「你是忠誠的國民黨支持者，你否認也沒用！」

「拿出證據來！」我說。

「我們當然有證據，否則不會大老遠跑來！」年紀較大的開口了。他似乎職位比較高，口氣像沒受過多少教育的工人，十足是無產階級的典型人物！另一個像是學生。

「你曾經在國民黨黨旗前照像嗎？」

「我記不得了！」我想他大概是問我第二次世界大戰，在共黨還沒奪權的多年之前，當時外子擔任政府派駐澳洲的使節。

「你怎麼可能忘記？」年輕人問。

「好久以前，紅衞兵來我家搜查，拿走了所有照片。」

「你一定把照片毀掉了。」職位高的說。

「我爲什麼要毀掉照片？我丈夫是國民黨官員，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

「你扯到那去了？誰問你以前的事？」審訊員不耐煩的說。

「你不是問我過去住在澳大利亞時候的事嗎？」

「胡說，我們問的是解放以後的事，你曾經在國民黨旗幟前拍過照嗎？老實說！」年輕人說。

我很驚訝他們居然以爲共黨掌權之後，還會有人在國民黨旗幟前拍照。

「解放後那裏還有國民黨旗？」我反問。

「不管旗幟在那裏，你只要承認爲什麼要這麼做。是爲了表現你對國民黨的忠心嗎？」審訊員問我。

「我從來沒有在解放之後在國民黨旗前拍照過。」我斷然否認，希望能很快結束這荒唐的談話。

「不要這麼快就否認，你會後悔，又少一次立功的機會！」年長的說話了。

「你最好認眞點，已經有人認罪了，你也逃不掉的。」年輕人說。

「我不曉得你們說些什麼，我不是國民黨，如果我是，我怎麼不去台灣？」我說。

審訊員同那兩個北方人耳語了一番，然後轉向我：「你現在最好回房，仔細想想這件事，你也已經知道人民政府的政策啦，不要死不承認！」

我被帶回牢房，但是心中仍十分迷惑，那些人看來很認眞，他們一定握有能夠支持指控的憑證，我已經被指控是帝國主義的間諜了，還會有誰再忍心加害我呢？

三天以後，我又被傳訊，他們還是逼我認罪，而我的答覆依舊，然後又被帶回牢房要我好好考慮，幾個星期以來，我就這樣被傳進傳出，每隔兩、三天就要去偵訊室受審，我猜不

透這些人打算怎樣？

這次爲了施加壓力，他們停止供給我治療牙齦發炎的藥，這使病情更惡化，口腔裏嚴重潰爛，我已不再能進食，我要求改喝稀飯保持體力。牙牀十分疼痛，使我注意力無法集中，我知道很多人就因爲肉體病痛而意志軟弱，我提醒自己一定要保持清醒。

我要求改喝稀飯，就讓他們逮到機會減少我的糧食配額，只給半碗上頭浮著幾粒米的灰色湯水，幾天的飢餓下來，我餓昏過去，看守的人叫醫生，醫生給我打葡萄糖點滴又送我去獄醫處，我不知道看守我的人對醫生說了些什麼，但醫生開了處方。回到拘留所，就又有了磺胺藥水，食物也改爲麥片粥和一片麪包。

我又被傳去問話，審訊員要我朗讀三次毛　的訓詞，然後坐下，他問：「你眞能明白偉大的毛主席的指示嗎？」

「我想是的！」我回答他。

「說說看！」

「我想毛主席是要人民知道偉大無產階級文化革命是政治革命，而不只是文化革命。」我答道。

「對，那什麼是兩個延續？」

「文化革命是階級鬥爭的延續，無產階級對抗資產階級不是新的鬥爭，而是舊有的鬥爭一直延續下來的。」

「那國民黨的關係又如何？」

「文化大革命是延續著一九二七年以來共產黨對抗國民黨的階級鬥爭。」

「好，你果然知道事態的嚴重性！國民黨是我們的敵人，國民黨戰敗，撤退到台灣島，我們和國民黨的鬥爭會一直持續下去，直到解放台灣，林彪同志也信心百倍，但是『走資派』劉少奇唱反調，他們說台灣問題要在下一代才能解決，這是腐敗論調，毛主席相信台灣問題一定能在這一代解決，只要有林彪同志的領導，一定能勝利成功。我們要徹底打倒『走資派』劉少奇餘黨，再集中力量，在偉大的毛主席領導下，就能解決台灣——所以我們要舉發在暗處的國民黨第五縱隊，要孤立他們，嚴密監視，才不會造成危害。」審訊員說。

「你丈夫是國民黨高級官員！」年長的北方人又插嘴了。

「並不是高級官員，只是中級人員，國民黨撤退台灣時他留在這裏，」我告訴他。

「說得好，很多國民黨官員也都如此，有一部分人是潛伏的特務，其實他們每一個人都被嚴密監視著。」

「我丈夫擔任蜆殼公司總裁時，他的任命已經得到上海市政府的認可，黨當然也做過審核了。」我告訴他。

「那還不夠！當時辦理審核的人可能也是一名走資派，所以我們革命派要重新審查。」審訊員說。

「早在蘇維埃時期，十萬里長征之前，偉大的毛主席早就設計好整套有效對付階級敵人的方法，就是把主要的階級敵人關進牢裏，現在也是這樣。」年輕的北方人無疑是個學生，急著表現從毛澤東書本裏學到的事情。

「你該明白你在這場鬥爭中所處的地位是介於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由於你家庭背景和丈夫的關係才站在國民黨那一邊。」年長的北方人說。

「你恐怕搞錯了，我並不包括在兩黨鬥爭之中，我很遺憾兩個政黨互相爭戰，無辜的老百姓受害，打擊民族元氣，身爲一個中國人，希望兩個政黨能和平相處，統一中國，共同爲這國家謀福祉。」我說。

「我們一定會達成統一的，但是要打倒國民黨！」年輕人說。

「如果你不是傾國民黨的傢伙，又像你說的不是包括在兩黨鬥爭中，那爲什麼又要站在國民黨旗幟前拍照？」審訊員問。

「我眞不知道你在說些什麼，我想不透，到底怎麼一回事，其中一定有誤會。」我誠心說道。

「想想看，一九六二那一年你幹了些什麼」審問員問。

「在那年除了母親過世，一九六二年我不知道還有什麼事。」

「那就對了！你最好招認整件事的來龍去脈！」兩個北方人同時說。

「你們想聽有關我母親去世的事？」我很奇怪的問。

「對，告訴我們一切！」審訊員說。

我給搞昏頭了，不知道他們葫蘆裏賣的什麼藥，但我還是說了當時家母去世的事。

「那時候鄰居打電話要我趕回家去，當我回到家，家母已經被七月攝氏三十五度的天氣熱得失去知覺，我們召來救護車送她去醫院，起初她稍微好了一些，但是又感染肺炎，最後死

於熱衰竭。」

「你弟弟也回南京嗎？」

「對，他們都帶媳婦回來。」

「你母親去世後，你做些什麼？」

「我是長女，我得安排葬禮！」

「你迷信，溫情主義，這又證明你是眞正的反動派！」

「迷信」一詞，是共黨慣用的字眼，他們反對任何形式的宗教信仰。

「我母親是佛敎徒，所以爲她擧行佛敎葬禮。」

「你一定做了犯法的事，佛敎寺廟在『大躍進』時期就都關閉了，和尚也沒有了，你上那兒找和尚替你母親超渡？」審訊員問。

「是一位南京佛敎研究院的人幫我安排的！」

「他們只能對外賓表演些儀式，不能爲中國人服務。」

「我求他們幫忙，商量了好久，他們才肯幫忙。」我說。

「有了他們幫忙，我才能擧行大型葬禮，我並不知道這事犯禁。」

「你擧行葬禮，又使迷信復活，你弟弟和弟妹也都有罪，因爲他們不去阻止你。你又把在美國的妹妹名字刻在母親墓碑上，你沒有和在國外的叛徒劃清界綫，這一切事情都證明你是反動派。」年輕人說。

「在美國的妹妹也是我母親的女兒，在父母墓碑上刻上子女名字是中國的風俗。」

「我們待會再談這問題，現在你告訴我，葬禮之後，你做了些什麼？去了那裏？」審訊員和兩個北方人似乎開始興奮起來，專心的瞪著我看。

「我們回到母親的住處，整理她的東西。」

「在這之前，你們去了那裏？」

「沒去那裏，我們是直接去的。」

「葬禮之後，你們沒有去孫逸仙紀念堂嗎？」

「沒有，我們都很傷心而且疲倦。」

「招吧！」年輕人拍桌子對我大吼。

「你們要我招供些什麼？我母親的葬禮並沒有政治意義！」

「葬禮本身沒有政治意義，可是你們去了孫逸仙紀念堂，在國民黨旗前面照相就有很重大的政治象徵。你想藉這相片向國民黨表示忠心，當時是一九六二年，國民黨正打算要攻打我們。」年輕人說。

這種指控荒唐得令我想大笑，但我明白情況不容許這麼做。和這些無知的人說話要花費不少氣力，而我沒有那麼多精力，疾病纏身加上飢餓，我不願多說。在整個偵訊過程中，口腔疼痛折磨著我，使我陷入極度的疲倦中，但我必須繼續保持清醒，即使我仍然不知道他們爲了什麼事來指控我。

「拜託，講點道理，好嗎？首先，你確定在孫逸仙紀念堂裏有國民黨旗嗎？如果在南京沒有國民黨旗，那你們就知道我不可能在那種旗幟前面照相。第二，就算有這種旗幟，而我

也希望在國民黨打回大陸時表示忠誠，難道他們會相信嗎？就因爲我拍了這麼一張相片？國民黨又不是笨蛋，他們不會奇怪我的動機嗎？因爲他們都知道我和我丈夫在撤退時留在大陸而沒去台灣。」

「他們會相信你的，你是他們的地下工作人員！」年輕人一口咬定。

「假設我眞的是國民黨派的間諜，我就根本不需要這樣來表示忠心，這就是你們矛盾的地方！」

兩個北方來的公安人員說：「你必須對你所做的事認罪，事實上，我們早就握有從你弟弟那裏拿到的照片，就是在南京孫逸仙紀念堂的國民黨旗前面照的那一張。」

「請你們去問問我弟弟和弟妹，他們會告訴你們根本沒有發生這件事，我們從來不曾去過南京的孫逸仙紀念堂。」

「我們的確查過你那個在外貿協會工作的弟弟，起先，對每一件事他都不認賬，但是，革命派終於使他明白該走的路綫，他老實招供了，他說是你想去孫逸仙紀念堂，這樣你還想狡辯嗎？」年輕的北方人又在大吼。

我的心開始往下沉，那些人說的當然全是虛構，到底共黨是如何對待我弟弟才使他不得不撒這種謊？我可以想像他屈服於壓力之前所受的痛苦與折磨。

遇上這種極嚴重的情況，反而讓我在毛語錄中得到幫助，我揚起這本書大聲說：「偉大的毛主席訓示我們『飯要一口吃完，路要一趟走完』，懇請諸位恪遵主席訓示，去孫逸仙紀念堂實地看看，紀念堂是南京市政府管理的一個部門，外國遊客很多，根本不可能在國民黨

政府撤走這麼多年後還留有國民黨旗，請親自去看看，如果眞發現有這種旗幟，回來懲誡我，我絕不逃跑。」

兩個北京公安人員直瞪著我，審訊員站起來說：「回牢房好好想想！」

或許，他已經想通我剛才說的邏輯：最好的解決辦法就是親自去南京看看，我正希望這樣，他們去孫逸仙紀念堂看不到國民黨旗就會回北京報告，可能就因爲這樣，好幾個禮拜沒有再傳訊我。

文革期間，革命派同志利用公款，旅行全國各地，美其名「調查階級敵人的罪行」，實際上卻是去觀光、訪友、探親，逕自延長行程或繞道大城市，爲的就是採購。上海是個大都市，大家都想來一趟，那兩個北京來的人來上海之前可以直接去南京查看的，可是他們怕萬一在南京查不到國民黨旗，就得直接回北京覆命，而沒機會到這兒，所以先來上海。在上海停留查案的開銷都可以報公帳，他們待了一個多月——一個多月的假期，完全免費的旅行，這種機會只賞給平時對黨效忠，表現優良的人。

在牢房裏，我不停的想著這件事，我本來很憤怒：自己親弟弟會在壓力之下出賣我，但是再仔細想想他這幾年所吃的苦頭，文革期間所受的迫害，我的憤怒都煙消雲散了，心裏充滿了無可奈何的憐憫，也聯想到激進的革命派幹部想盡辦法告發國民黨支持者，揑造事實，強逼認罪的手法。他們成功的脅迫了我弟弟，而他的理智一定崩潰了！我深信，他並不笨，更不會出賣我這個姐姐。

弟弟在五十年代的外貿協會擔任經濟分析及撰寫世界經濟情勢報告，外貿協會網羅英、

美留學生回國服務。他是中層人員，待遇不錯，但可惜的是儘管人緣不錯，但却不曉得，也不知如何去滿足黨的需求，黨委書記有權左右他的生活和工作，他的工作報告老是不能符合黨「資本主義世界已事態緊急！」的宣傳，這幾年他過得很不快樂，常常試著在事實眞相和宣傳謊言之間達成妥協，黨要求他的言行都要符合黨的政策路綫，他變得沈默異常，很少說話，也罕有笑容，除非他能完全迎合黨的路綫，不然單位裏的黨委就要整肅他。有一次，這名書記十分粗暴的當衆抨擊他：「我簡直不能忍受一篇篇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經濟情勢表示樂觀的報告由此地發出去，如果再這樣寫下去，你將成爲黨的顚覆分子。」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展開，黨委書記利用機會來打倒我那不馴的弟弟，指責他曾爲國民黨某部長擔任助理，於是他遭到疲勞轟炸式的鬥爭談話，他被關在辦公室裏好幾個月，日以繼夜，不眠不休的被一組組人員審問。共黨找不到批評黨的證據來定他「右派」的罪，但仍使他神情憔悴，最後一絲笑容由他臉上消失，頭髮也白了，眼神空虛茫然，當時他只有三十七歲。

他知道在辦公室不受歡迎，就申請調職，黨委書記不甘心整不倒他，當衆宣布他太驕傲，需要一段時間向工農階級再學習，因此他被分派到北京城外的山谷中養雞。生活樸素，每個月只能回家一次，但是他很樂意遠離那些官僚，也很認眞的照顧雞群，而養出比別人更肥，下更多蛋的雞，每次一回家就携來滿懷的書本及各種設備來改善工作，農戶漸漸能和他相處，他也能爲農戶們解決問題，當地農村黨部上級卻對他不滿，要求將他調往別處。

在「大躍進」運動失敗以後連續出現好幾次的經濟危機，黨中央又拉攏了一些學者專家

歸隊服務，問我弟弟想要什麼工作，他說希望能在英文系教英文，爾後以一貫的認眞態度從事新工作，文革時期，他已是知名的英語教學權威，指導年輕老師之外也自己出版書籍。

稍後，我由牢裏釋放，就試著跟他聯絡，而弟弟說由於過去我接觸西方世界太頻繁，是個「危險人物」，他拒絕與我連繫，直到一九七六年，毛　死後，四人幫垮台，他才敢邀請我去北平。我發現他在文革期間已被折磨得不成人形，我不忍心再責問他爲何誣陷我在國民黨旗前拍照的事，我不要他再受壓力。

關閉幾年之後，外貿研究院重新恢復運作，他又和老同事回到英文系，似乎已十分心滿意足。在我離開之前，他主動提起；「你在一九六二年送過我一張相片，對不對？」

「我給你的相片是在上海萬翔相館沖洗放大的，我在一九六二年只給了這麼一張。」

「是不是媽的相片？我只記得你曾寄相片來，可是革命派的人卻堅稱我們是站在國民黨旗前面照的，他們一口咬定，我根本記不得，最後，竟然迷迷糊糊的信以爲眞！」

「沒有那回事！」我非常生氣：「我們根本沒去過孫逸仙紀念堂，他們是騙子，想嫁禍給我們，他們想誣陷我們向國民黨諂媚，這樣就可以重罰我們。」

他平靜的握著我手臂，認命的說：「不要激動，生他們那種人的氣沒用，他們說有就一定會讓它有，不管你怎麼去否認，我想你也清楚。你必須學著接受，我們都要適應，說不定將來還會發生在你我身上。」

「我不會再讓它發生！」

「很遺憾你這麼說，你恐怕會受傷！」

弟妹這時候走進來說計程車在外頭等，我顫慄著向他們告別：不知道是因爲氣憤生活在如此恐怖的制度陰影下，還是悲哀我們竟然無法維持最起碼的自尊。坐進車子裏，回頭揮手，弟弟已經進屋去了，他似乎對我失望，失望我沒有隨風披靡。

一九八四年我又去亞利桑那探望弟弟，他在國際管理學院雷鳥校區擔任交換教授，我覺得飽受疾病磨難的他老了許多，但當活潑的眼神再度出現時，他興奮的告訴我，他升等爲經濟學教授，到美國來演講中國的新經濟政策。我問他萬一那天黨政策又轉向，像以前那樣忽左忽右的變動怎麼辦？他倒抽一口氣，好久才出聲說話：

「我已經是半截身體進棺材的人了，每一次變動都那麼多年，就讓我們祈禱下次變動來臨的時候，我已經不在人世吧！」



第十一章 一場殘酷的拷問

弟弟的這件事過去之後，審訊員繼續偵察我的親友，這次偵訊又耗了七個月，直到一九六九年年底，我不再被傳去偵訊室。我一等再等，一個月又一個月，仍然沒有找我問話的跡象，我忍不住，就問牢房警衛，要求見審訊員。

「你找審訊員有事嗎？」警衛問我。

「我想問他，什麼時候判定我的案子？」

「他不能判定，他只負責問案，其他的由政府決定。」

「政府要多久才能決定？我等了好久，我身體不好，需要醫療。」

「你不會有問題的，我們不是給你特別的伙食和藥水了嗎？」。

「可是一點也沒效，情況一天比一天差，嘴巴痛得要命，吃太多的磺胺藥劑對我腎臟很不好，醫生曾警告我不要吃太多磺胺劑。」

「你自作自受，誰教你不肯招認？」警衛說。

「我又沒有做錯事，要招認什麼？審訊員查過我的一切生活，所有的交往和我的親戚朋友，政府都知道了，還有什麼好懷疑的？」挫折感加上極度失望使我提高嗓門，但是他不理

會我，關上小窗後走開了。

過去，我總以為查清楚沒犯錯之後，就能無罪開釋，可是，事到如今，怎麼又變成由政府決定了？這是共黨的一貫作風，我所不懂的是他們用什麼標準來判定我，為什麼這麼久，如果我不曾抱着希望，就不會這麼失望，我又被推下絕望的深淵。

一九六九和一九七〇年是我一生中最悲慘的時期，回想那幾個月的寒冬風雨，要命的病痛，我一直慶幸能活過那段日子。有一次我請守衛去買塊肥皂，而他給了我一塊不起泡的東西，他說肥皂每人每月只配給一塊。我懇求他再讓我買一小塊好讓我洗內衣，他馬上勃然大怒：「你什麼時候才改得掉總想比別人多得一點的資本主義習慣？一個月一塊已經不錯啦，很多地方一個家庭一個月才配給一塊肥皂。」

衞生紙由稻桿紙漿，加上舊報紙、蔴繩及舊布料做成硬梆梆的東西，每一張紙上都能看見各種細碎的灰色遺跡，這種衞生紙也得要配給才能得到！特准我買的食油、維他命丸也經常缺貨，食肉大部分都是脂肪。物資缺乏也影響到了警衞，連他們看起來都無精打采的樣子

很顯然的，這多難的國家又面臨另一階段隨著政治動盪不安而來的經濟危機。

報上報導了鄉村農民「自動」減少了應得的配額，使人民公社有更多的收成繳給政府，這是「大躍進」運動失敗以來一直重覆出現的飢荒和物資的缺乏。在這艱困的時候，每天都有英雄事蹟發生：增加報繳，減少自己所得的典範。但是，仍然有一半的版面，是上海解放日報用來攻擊「走資派」人物的，(他們又被稱為「修正主義者」)，鬥爭的重點是毛澤東的人民戰爭理論對抗資本主義的船堅炮利。罷黜的兩位陸軍將領——國防部長彭德懷，前任參

謀總長羅瑞卿是主犯，日報的標題在廣播中播出，指控這兩個人公開主張西方進步的武器比人力來得重要，因此引發了鬥爭，但因這兩人離開職務多年，始終在紅衞兵、革命派迫害下苟活，所以也只輕描淡寫的指責他們的觀點只是替些幕後黨政軍人物發言而已。

長期的貧乏艱苦的日子侵蝕了我的精神。偵訊我的理由無聊得令我感到消沈，不只因爲個人衞生問題：不足的肥皂，粗糙衞生紙等令人無可奈何的因素，更加上外界新聞報紙上分歧的意見，或許已經爆發猛烈的鬥爭，但是連黨或軍事首領都無法振作我昏沈的意志，我每天早上起床都得和那凹凸不平的床舖抗鬥一番。

早春季節，我又犯了肺炎，被送到監獄醫院。我復原得很慢，再回拘留所時已經是五月初暖洋洋的天氣了，雖然日子還是一樣的苦，但只要天氣暖和，就比較舒服些了，我慶幸自己又再一次死裏逃生……我終於獲准外出活動，戶外欣欣向榮的生命，使我感謝上帝賜我再生的奇蹟。

「九中全會」後在各省市黨的書記處陸續成立，共產黨對每一件事物的控制仍然採取嚴密態度，我愈來愈難得知外界眞正發生了些什麼事。在這動亂的時代，報紙猛烈抨擊「走資派」，也經常暴露出領導階層的權力鬥爭，革命學者評論毛的「修正主義」背離了廣大群衆的意願，現在這種論調已經在上海解放日報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公開抨擊，我一眼就能看出是出於職業文宣人員的手筆，因爲用的全是些陳腔濫調。

我發現高階層將有另一回合的鬥爭，因爲報上刊登政治局委員少了陳伯達的名字。他是文革時期的大將，毛澤東忠貞的左右手，大陸一直傳說「毛語錄」有一部分是陳伯達的傑作

，而今報紙痛罵他是僞善的馬克斯主義者，他曾自稱只是「卑微的平民」，可是仍然成爲權力鬥爭中的犧牲品。他在一九七〇年秋天在廬山的「九中全會」裏，力捧林彪，觸怒了毛澤東，被貶成反革命派。

「九中全會」另一項重要議題是中共與美國之間的關係。就尼克森所提議，透過第三國引介，美國願改善與中共的關係。總理周恩來向毛提建議：如果美國承認中共，那中共就可以取代台灣在聯合國的席位，也可以加速解放台灣，但是林彪反對與美建交，認爲美國是資本主義國家領袖，是中共頭號敵人。

據我所知，毛之對陳伯達開刀，事實上是要警告林彪。這件事使林彪奪權失敗，事後證明，「九中全會」是中共與美國建交的重要前因，林彪自此失勢，徹底失去大權，連帶也關係到周恩來。

一九七〇年我還在牢裏，知道陳伯達事件玆事體大，所以一直注意其發展。當年秋天，一張美國作家艾嘉斯諾與毛澤東在天安門上合影的照片出現於國慶報刊上，毛　和外賓一起站在上頭，這是首次給予美國人的禮遇。斯諾是中共的老朋友，他爲毛澤東發行「大河彼岸」，爲中國共產黨在世界上爭取了不了同情的眼光。我所知道的毛澤東是個心機深沈的人物，他凡事計謀，他要一位老美一塊兒站在天安門上接受數十萬人民的歡呼歌頌，其動機頗値得深思。

國慶日稍後，報紙報導北平已與加拿大達成協議，建立全面外交關係，並訂定和平共存五原則：相互尊重領土的完整和主權的獨立自主、不干涉對方內政、互不侵犯、公平互惠、

和平共存。加拿大中斷與台灣國民黨政府外交關係，承認北平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

我想毛澤東是想利用加拿大模式向美國表明：如果要和中共交朋友，就必須放棄台灣，而中共也會以一樣的模式來歡迎美國，這種情勢使我充滿希望，至少中共已親向西方。

濕冷的西北風又吹起來，但並沒有挫折我的精神，自文化大革命以來，第一次感覺到事情順心，陣風掃起一片落葉飄到我牢房裏來，我端詳這片微黃的樹葉良久，想像它是希望的象徵，好的兆頭。

我平靜而不再焦慮的等待事態的發展，心想就要熬出頭了，等中、美兩國進一步接觸後，情況必會改善的，但是，我錯了！

一九七一年一月的一個下午，我被傳去審訊室，我非常意外，心臟也因緊張而狂跳不已。來到中庭，一點也沒察覺出風暴即將開始，在門口，警衛狠狠推了我一把，我幾乎是跌著進去的，有幾個警衛也在裏面，我才站穩，他們就都圍上來對我大吼。

「你是帝國主義的走狗！」

「你是工農群衆的剝削者！」

「你是反革命派！」

他們的吼罵夾雜著，只看見一張張憤恨激動的臉，他們一個接一個宣布「罪名」，一邊叫罵又一邊不耐煩地像練球般的推擠我，使我無法平衡，頭昏眼花、呼吸困難，還沒站穩，有一個男人抓住我衣領，拖向他面前。他的臉緊逼向我，讓我看到他眼神裏赤裸裸的凶暴，立即，他又用力把我推開，我跌跌撞撞的倒向牆壁。在摔到地板之前，又提起我衣領向前擲去

。他一再用迅疾的手法將我丟過來拋過去，其他人就在旁叫罵，我開始昏頭轉向，頭痛欲裂，胃一翻，全嘔吐在他身上，他憤怒欲狂，又把我摜在椅子上，不停咒罵，我猛跳不止的心臟，幾乎蹦出喉嚨，我趁隙閉起雙眼，盡力復原，忽然有個女人聲音大叫：「你還不招供⁉」其他人也一齊大喊，我仍然緊閉雙眼，不作聲，這是我唯一的防衛了。

有人揪住我的頭髮往後猛扯，這時我被迫看清了他們共有五個人，似乎他們以爲可以用暴力屈服我，但是這些愚蠢的警衛這麼多年來日夜看牢我，卻並不瞭解我，不過也難怪，他們畢竟是奉命行事罷了。

有一名凶蠻的女守衛說：「你是招供還是想吃點苦頭？」

我仍不作聲，這使她給了我一記耳光，將我雙手反銬在椅子上，她說：「這手銬就銬到你招供爲止，什麼時候招供，就什麼時候解開，一輩子不招，就帶著手銬進墳去。」

「想想你的處境！」

「如果現在招供，我們立刻打開手銬，放你回房！」

「怎麼樣？招供就解開手銬！」他們七嘴八舌說著。

「說！說！」他們又齊聲大喊。

我看著他們，有氣無力的說：「我眞的沒什麼可招！」

「大聲點！大聲點！」

我知道走廊外有人，所以才要我大聲說給他聽，我集中力量，用清晰的聲調大聲說：「我無罪可招，你們弄錯了！」這時，後面的小窗被用力關了起來。

這些守衛等了一會兒，確定人已走遠，就把我推出外面，我一起身，那凶蠻的女守衛就把手銬弄得更緊。

他們並不把我帶回女牢，而是向角落裏的小房子走去，穿過長廊，我被推進一扇門內，裏面一片漆黑。我等他開燈，可是他關上了門，在門外問：「現在要招了吧？」我不答話，他就鎖上門離開了。

我站在伸手不見五指的暗室裏，有股腐臭味道撲鼻而來，唯一的光是自門縫透進來的，漸漸的，當我眼睛可以適應黑暗時，才看見屋裏有塊板子，角落有水泥馬桶，我就站在僅剩的空間裏，房間不過五尺見方。忽然有個軟溜的東西掉在額頭上，我大吃一驚，但是雙手銬在後面，我只有猛搖頭把它甩開，我想卽使蟲子也不會喜歡住這裏。

心跳仍然急速，腐臭氣味教人想吐，我慢慢深呼吸，來減緩心跳，坐下來就稍好一點。環顧四周，幸好沒有前人留下的血跡、糞便和嘔吐穢物，我實在太累了，靠在膝上我閉上了眼睛，我安慰自己：這個密不透風的水泥盒子裏要比牢房滋暖些。

我正試著擺脫手上的手銬時，外面突然爆出一聲：「要招供了嗎？」我嚇了一大跳，心想守衛什麼時候站在外面的？

我連答話的氣力也沒有，自顧自的回想過去美好的時光，但是醜惡的現實實在太鮮活了！

其他守衛不時進來看我會不會屈服在新壓力之下，每次來問的都是同一句話，問完就走，人走了，整個地方又恢復死寂，我想這裏除了我沒有別人！

我不知道坐了多久，其實時間已失去意義，我的雙腳發麻，頭痛欲裂，趁警衛沒出現，我起身活動兩腳及肩膀，兩隻手臂扭在後面太久而非常不舒服，站了一會，就再坐下來休息，打了個盹，又再起身活動，我覺得很虛弱，身子搖搖欲墜，可是仍強迫自己活動，我知道這樣對我最好。過去，我從未有過「閉室恐慌症」，可是現在我卻老是感覺牆壁往我這兒倒，爲避免胡思亂想，所以我加快活動，作深呼吸，以求平靜，雖然我很餓，可是一看到近在眼前滿是污穢的馬桶我就不想吃任何東西。

夜晚過得很慢，我愈來愈覺得是被深深埋在地下的水泥盒子裏。我的手又熱又痛，手指無法彎曲，我想我的手指已經紅腫了。這讓我很擔心，我怕這些愚蠢粗魯的人爲達目的會故意使我殘廢。共產黨員在鬥爭中向來是不擇手段，他會不顧一切的服從：「只要毛主席指向那裏，我就衝向那裏。」他根本不在乎你的手是不是會殘廢，這種例子我見得太多了。手對我十分重要，沒有它們，我如何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生活下去？

手指尚存一點知覺，但是腫痛難忍，我不知道能再支持多久，迷糊中，我記得曾有一篇文章說到有人不吃不喝活了七天，以我目前的虛弱，可能再活五天，可是手的問題是一大威脅，我不能使它們就這樣報廢。當初戴上手銬時，並不是這麼緊，要不是那凶蠻的女守衛把它再扣緊，現在也不會這麼痛苦，可見他們本意不是要銬這麼緊，或許待會有人來，可以請求放鬆一些。

終於有人來了，我聽大門一開，就立刻發聲站起來。

「你要招供了嗎？想通了嗎？」來者是一個男的。

「我有話想對你說。」

「好，終於要招供了？」

「不是的……是我的手！」

「手怎麼樣？」

「手腫起來了，手銬太緊，請你鬆一鬆，好嗎？」

「你覺得不舒服了吧？嗯？怎麼不招供呢，你招了，就可以打開手銬！」

「你能不能先稍微鬆一下？」

「你何不像其他人一樣招供？這是你自找的，不是手銬的錯。」

「可是你看看我的手，已經腫得很厲害了。」

「我不能幫你，如果你招供，才能打開，我只能做到這樣。」

「你可不可以向上級報告？」

「不，除非你招供，我才帶你出去。」

似乎再說也沒用，我坐下來，他再問：「要招了嗎？」我沒理會，過了一會兒，警衛就走了。

我的手會腫起來，是他們意料中的事，我不是第一個被他們銬起來的人，他可能已經去報告上級了，他們正期待我爲了手而招供，我決心不再要求放鬆手銬，只暗求上帝保佑它們。

「過來！」有個女聲在叫我。「我勸你趕快招供，你不笨，爲什麼不放聰明點，招了不

就沒事了？要這麼自討苦吃？」我不答話，她又說：「你擔心你的手是對的，手對要寫字的知識分子非常重要，要保護你的手就得趕緊招供，」我還是不說話。「他們說直到你招供了才解開手銬是說到做到的，無產階級專政是不會說著玩的。」

我仍然保持沈默。

她等了很久，才說：「你再好好想想，我只能這樣勸你了。」她走遠了，我又能安靜下來。

我很生氣我竟笨到以爲她會幫我鬆一下手，我怎麼能表現出我的軟弱呢？這樣他們更以爲我終將屈服，我告訴自己說：「忘了你的手，如果非殘廢不可，就讓它們殘廢吧，世上太多有用的人都是殘廢，甚至連手都沒有！」我記得一九五七年在荷蘭，遇見一位二次大戰的退伍軍人，他失去雙手，而今用腳指頭抓筆畫畫，由此啓示了我，也鼓舞了我準備失去這雙手臂的勇氣。

警衛全等在外面，等我向他們投降招供，他們還以爲我很在乎兩隻手臂，所以抱著希望聚在外面等我屈服，長時間未進食，又沒睡覺，我愈來愈虛弱，腸子絞痛，腹部痙攣，但我把頭埋進膝蓋裏強忍痛楚等他們離開。終於他們有了行動，打開牢門叫我出去。

冰冷清爽的空氣使我精神大振，激起餘力來支撐發軟顫抖的雙腳，守衛還是帶我到偵訊室。

我走進去先得向毛的肖像行禮，他們又把我銬在椅子後，要我背誦教條。「第一，不怕苦，第二，不怕死。」在這情況下，這些教條相當適切。

「這些訓示不是對你這種人說的，毛主席是對革命軍人訓勉的！」一名女守衞說。我還記得下一句是「爲勝利奮鬥到最後關頭。」可是他們不給我機會了。

「現在你考慮得如何啦？」

「沒有什麼可說的。」我回答。

「不要故作冷靜，你擔心你的手，你希望鬆一鬆手銬。」

我不答話。

「你該想想妳爲什麼會戴上手銬，完全是你的錯，我們所有人犯都上了手銬嗎？當然沒有！如果手銬不舒服，你趕快招供就能脫下來，不過，全由你決定！」女守衞看我不發一言，不禁大怒吼叫：「你活該！我從沒有遇見像你這麼死硬派的犯人！」

「你不想保護自己了嗎？雞蛋碰石頭，你會撞個粉碎！」

要是一、兩年前，我可能會反駁，而因此沾沾自喜，現在我太虛弱太疲勞了，根本不在乎他們說些什麼。

他們面面相覷，又看看我椅子後面的小窗子，一個男守衞說：「拖出去！拖出去！讓她這花崗石腦袋去見上帝！」

共產黨員居然會說出「上帝」這字眼來？這句話卻的的確確是毛澤東敎的，意思是要那些反對共黨的死硬派知識分子改變他的思想，也表示某人不願接受黨的觀點。

守衞開門走出去，儘管我冷得發抖，但還是慢慢跟著走出去，外頭的寒風像刀片似的颳著我的衣服，我猛打寒顫，當守衞押我回牢房時，我看見守衞的鬧鐘，這才知道在那水泥盒

子裏我足足待了二十四小時。

被傳出去前，倒了一杯水放在桌上，現在我想喝，雙手仍被銬著，只好用牙齒咬起杯子，讓水流進喉嚨，我灌進不少水。

這牢房比過去二十四小時我所待的水泥盒子冷得多，但不會那麼髒。到了用餐時間，廚婦還是像過去一樣從窗口推進鋁盆來，可是我不知道該怎麼吃，雖然餓得頭發昏，但我不得不繼續餓下去，因爲雙手銬在後面，我絲毫動彈不得。

沒有人再來問我招不招供，但是一定有人在監視我，我聽見有人走到窺孔來往裏面看。到了就寢時間，守衞照舊叫大家上床睡覺。

舖開棉被對一個沒吃東西的人來說眞是費力的動作，但我還是做到了。我躺下床，用單邊臂膀支持體重，相當不舒服，然後我翻過身來趴著睡，這樣會壓迫到胸口，睡不了一會，又得換姿勢，我不停發抖，終於發現想倒身睡覺已不可能，只好半坐半臥，斜靠在牆上，希望能小睡片刻。牢房裏氣溫很低，窗口結冰，吐出來的氣全成了白霧，我全身痙攣發抖，手脚都凍僵了，只好掙扎着起來繞著屋子走，活動四肢。手銬好像重得要扯斷了手臂似的，我不得不用手指去托頂著手銬。走動一會兒後，更覺疲累，只好再坐下來。就這樣走走坐坐，我不知道是不是曾經睡著過，寒冷而漫長的夜晚，對我而言是如此的悲慘不幸。

然而，任何事情不論好壞都會有結束的時候，一縷曙光照進屋子，傳來守衞催起床的喊聲。接著，送水來的女孩看我沒推出接水的臉盆，就打開小窗瞧瞧我，我背轉身來讓她看見手銬，她迅速的關上窗子跑開。

不能梳洗也是一大困擾，雖然我可以勉強用嘴巴咬杯子喝水，可是我的空胃卻以痙攣和絞痛來抗議無濟於事的清水，而被銬得發燙的兩手讓我一直焦燥不安。

第三天，胃腸的疼痛奇蹟似的消失了，但我更加虛弱，視力聽力開始混淆而模糊。夜晚的降臨對我來說無異是一則酷刑，我仍然靠在牆上半臥著，不停的發抖，可是已無力再起來走動了。該就寢時，小窗子被打開，有個小小的聲音叫我：「過來！」我以爲又是叫我招供的，可是她小聲說話，似乎是不想讓其他人聽到。

使盡吃奶的力氣走到窗邊，原來是那位年長的女守衛，她注意到我蹣跚的腳步了。一開始，我就察覺到這個婦人比較有人情味，跛足加上纏小腳使得她走路異於常人，她操北方鄉音，我想她是在中共流竄到北方時加入共產黨的。她不像其他人那樣對犯人吼叫。天氣寒冷，如果輪到她當班，她會把棉被借給那些不夠暖和的犯人。有回我沒辦法吃東西，光喝稀飯，結果餓昏過去，也是她送我到醫院，後來又多配給食物給我，我想她和其他人不太一樣。

「你怎麼不吃東西呢？」她小聲問我。

多傻的問題！難道沒看到我被反銬著嗎？

「他們不會解開手銬，如果你不吃東西，餓死了，正好被判成反革命派，犯人在定罪前自殺死掉，都會被判成反革命的，這是慣例，你不知道嗎？」

「我不知道怎麼吃。」

「想想辦法，你可以用湯匙啊！」

她似乎頗有同情心，我請求她幫我鬆開手銬，它使我極度不安，心神不定。

「鑰匙不在我這裏，在別的高級幹部那裏，你最好明天吃點東西，胃裏有東西會讓你好過些。」

從階梯上面灌進一股冷風，表示有別人進來了，她很快的走開，聲音很小，並沒有被查覺。

走回床前，我想她說得對，該設法吃些東西，餓死就不能翻身，但是不用手，我怎麼吃飯？桌上有塑膠湯匙和一卷沒動過的毛巾，下一頓飯，我就想點辦法來吃吧。

她說鑰匙在高級幹部手上，不在守衞身上，那就沒希望鬆得開了。這手銬箍得我的手、我的肩膀都非常難過，爲了減輕痛苦，我把棉被圈成一團，當成靠墊支撐在背腰部，這樣便能支持著被銬著的雙手

在冷冽中，忙碌使得時間比較好打發。

天亮了，我起身伸直兩腳，發現昨晚當靠墊的棉被上染上血跡，一定是手銬磨破了皮膚，而我竟沒有痛覺，這使我眞正感到恐懼，看樣子我要失去雙手了。

廚婦又來發食物了，我背轉身去把小窗子拉開，她把盆子放在反翦的手上，我走到桌旁，再轉身過來，在桌面上舖條乾淨毛巾，用湯匙挖出碗裏的飯菜，米粒大多粘在碗盆上很難挖，每一個動作都使我痛得流淚，我一試再試，好不容易弄出來夠多的米飯，佈在毛巾上面，我彎腰下去，像隻野獸一樣的吃它們。

收碗盆的女人來，她並沒有像平常一樣催促著我，她在門外看著我吃。因爲動作困難又會疼痛，我常要休息喘口氣，所以吃得很慢。當痛得流下眼淚時，我就想値不値得這麼痛苦

的吃飯呢？但我畢竟忍著吃下去，只因爲我得活下去。

中午，再送飯來，我發現廚婦已經幫我把飯都弄鬆了，我只要把盆子蓋在毛巾上，就能很快吃到飯菜。

我能再進食似乎激怒了共幹，因爲又開始有守衞來追我招供了，他們絕口不提手銬的事，可能是不願讓其他犯人知道他們這樣對待我。他們還是繼續逼我招供。不知道爲什麼，手銬居然也影響到我的脚，也讓我的脚又腫又痛，鞋子穿不下，只好當拖鞋趿，體重減輕但是兩條腿還是無力得很，所以走路蹣跚欲倒，雖然天氣漸漸轉暖，我還是被手銬傷得直發抖，每當不得不活動一下時就痛得流淚。

廚婦從窗口送水來的時候，悄悄說道：「上級可能不知道你的手受傷，你怎麼不哭哭看？叫出聲音來，讓他們知道你傷得多嚴重，」說完她很快的關上窗子離開。

中國人常把某些感情表現在外，用哭號來表示哀傷和痛楚，我不喜歡哭叫，從小我就不輕易表現感情，哭泣是軟弱的表示，而我現在能用這方法來引起別人注意我將要殘廢的手嗎？我決定不這麼做，因爲第一，我不知道需要哭多久，其次，我不願做任何可能被看成要求憐憫的舉動。既然是上級的指示要讓我戴手銬，他以爲我吃不住這苦頭就會以招供來救我自己，那麼最好的反擊就是不怕痛，我決心不採納那廚婦的建議。

又過了好幾天，這手銬已經影響到我的心理，大概是痛楚牽制了神經系統，漸有週期性迷亂出現，甚至會忘記自己身置何處，第一次上手銬的事，我已記不得了，生命就像一條永無止境、荆棘叢生的路。

頭腦清醒的時候，我用簡單的數學來訓練自己；二加二等於四，四加四等於八……，但是不一會兒就失去注意力，又陷入迷亂，守衛還是常來門外看看，可是他們所說的對我而言只是一連串毫無意義的混亂字句。

不知過了幾天，我已全身虛脫，連去窗口拿食物的力氣都沒有，我想說不吃了，可是沒力氣開口，或者我說了，沒人聽見，迷糊中，我彷彿聽見那個廚婦鼓勵我去拿水和食物，但我聽不清楚，只知道她站在外面等。

我再次睜開眼睛時，發現自己躺在地上。

「起來！起來！」一個男人喊：「別裝死！你躲不掉的！」

我的雙手還彎在後面，可是已經沒有手銬了。

「起來！起來！」一個女人叫。

我打起精神來，看見當時銬我的人都在，女守衛拿著那副手銬晃來晃去，手銬上滿是膿血。

「不要以爲這樣就能擺脫我們，對付你的辦法多得是，誰膽敢和無產階級專政作對，就不得好死！」有個男的這麼警告我。女警衛狠狠踢了我一腳，然後他們一起離開了。

我仍然虛弱無力，動彈不得，手銬是拿掉了，可是當我把手慢慢舉到面前時，立刻又閉上眼，我的雙手已經血肉模糊，指甲發紫，手指全都腫大得像根紅蘿蔔而無法彎曲，我祈禱上帝能幫助它們早日復原。

過了好一會兒，我嘗試站起來，但是從腳跟傳來的疼痛讓我掉下眼淚，我的腳根本站不

起來，棉襪被乾硬的膿塊黏住了，用力脫下襪子，入眼的是一片紅腫及纍纍水泡。刺破水泡，需要繃帶和消炎藥，我費了極大的力氣，幾乎是爬著來到門邊，斜靠著門，我大聲呼叫值班守衛：「報告！」儘管我的聲音微弱，但話聲甫落，小窗子立刻被拉開，原來守衛一直在外面監視我。

「幹什麼？」守衛問道。

「我可不可以看醫生？」

「爲什麼？」

「我手指和腳都受傷了，我需要一些繃帶和消炎藥。」

「醫生不對正在受罰的犯人做治療。」警衛這麼說。

「既然這樣，請你給我一些紅藥水或殺菌藥水好嗎？」我知道每位守衛都有一些藥品放在他們房間裏。

「不可以！」

「可是傷口會發炎啊！」

「那是你的事！」

「我可不可以只用繃帶包紮傷口？」我舉起傷手讓他看清楚傷勢，他却扭過頭去。

「我可不可以要一點繃帶？」我再一次請求她。

「不行！」

「那你就沒有遵守毛主席訓示的革命人道主義。」我光火了。

「你這種人不適用革命人道主義。」

「你說得好，因爲我不是共產黨的眞正敵人，我沒有反政府的行爲。革命人道主義是對日本侵略者用的，共產黨在中日戰爭中供給日本俘虜藥品繃帶，是毛主席書上說的。」我譏諷的告訴她。

「你看看你！還是這麼好辯，不知悔改，你並沒學到手銬的教訓嘛，也許你戴得還不夠，你再吵，我就把你再銬起來。」這只是虛張聲勢，她無權再給我戴手銬，她也知道我明白她在唬我。

似乎別無選擇，我只有靠自己來醫療傷口了，上帝保佑，一定可以設法避免發炎感染的。我聽見那廚婦推著沈重的台車載著兩大桶開水進來了，我在窗口等她，她給了我特別多的熱水。水倒入洗臉盆，我用毛巾小心翼翼的清洗手上的血塊膿汁，然後洗滌腳上的傷口，熱水讓皮膚舒服了很多，我還想喝水，可是目前先得把傷口洗乾淨。

我坐在床前擦乾腳，一面想著能用什麼來代替繃帶，多年的囚禁以來，我的衣物因要互相補綴已所剩無幾了，最後發現可以用洗過的枕頭套，把枕頭外套撕開成布條狀，但我試圖舉起雙手到衣架上拿枕頭時却舉不起來，我想這是長期的肌肉痲痺，使兩隻手舉不過肩膀……大概可以用運動來復原，可是要花一段時間，在這之前，手腕的傷口是不能包紮了。

送水的小女孩來送冷水，她把水倒在我端出小窗外盛水的盆子裏，當看到我支持不住，兩隻手發抖時就不倒了。我留些水飲用，其他的用來洗臉。我還想洗澡，但又怕感染風寒，身體實在太虛，水又不夠，只好作罷。要梳頭，手舉不過肩，只好握着梳子，俯首彎腰去將

就手中梳子，左右擺頭來梳理頭髮。

送飯的廚婦從小窗口推進滿滿一盆的飯菜，我把上層飯菜夾到杯子時才發現底下埋著兩個煮蛋。

總有機會的！我要盡一切可能來回報她這兩個雞蛋的好意。她並沒有打開窗子像以前一樣催我快吃，而是隔著門大叫：「你老是慢吞吞的！吃完把盆子還給夜班守衞，我不能整晚站在這裏等你！」

我坐在床前吃飯，每一大口的吞嚥，就讓我多了一分力量，吃完之後，洗好飯盆，起來活動手臂，我很盼望能快快復原，好把枕頭套拿下來做繃帶包紮手腕傷口。我搖擺手臂來伸展肌腱，可是站久了腳又會痛，只好運動與休息間歇交替。夜班守衞來收飯盆，又遞給我一份報紙，從報上日期，我才發覺從上手銬到今天才過了十一天，但卻覺得很漫長。

十一天來第一次除去手銬，我想好好睡一覺，但是手銬戴得我神經受損，全身都痛，不管用什麼姿勢均無法入睡，毛毯加棉被好像太重了些，又不怎麼冷，乾脆我拿開毛毯，但是要想不讓手上、腳上的膿血污染棉被，似乎已不可能。

在犯人手上戴特製手銬是中共監獄中司空見慣的事兒，有的還會加副腳鐐，犯人被鎖定在窗前，不能吃喝、上廁所，爲的是想藉這酷刑摧毀犯人的意志。

要把手臂復原到能舉過頭，花了我好幾個月，幾乎一年以後我才能把手臂伸直在我面前。心理上的傷痕癒後無痕，可是手銬留下深深的傷疤至今仍在，我永遠會記得這是毛澤東和他的文革派留下的遺物，兩年之後，手指才完全消腫，手臂也才恢復正常知覺，只是神經卻

嚴重受損，十三年後的今天，一遇天氣濕冷，就會使我頭痛，甚至在屋裏，都得戴手套睡覺。我的雙手無法舉起重物，右手比左手更嚴重，別人褲子上的拉鍊在右邊，我就得特別改到左邊，我想，這樣子那調查員會說這又是我另一項頑固的象徵。

一些朋友說：「那你當時爲什麼還要把拉鍊拉上？」我想不拉拉鍊，會影響我的骨氣，回想那些年，能在中共面前保持不敗的原因就是我不屈不撓的精神。

至於腳傷，它們在手銬除下之後仍然又腫又痛了好幾個星期，但它們不是永遠不可救藥，當有太陽的好天氣時，我就用針挑開水泡，然後讓它們慢慢痊癒。

除下手銬的那天早上，守衞來叫犯人出外活動。

「我可不可以不要活動？我的腳腫了，穿不進鞋子。」我在窗口對守衞說。

她就著窗口看我的腳傷：

「你還是得出去！」

「恐怕我沒辦法走長距離了，腳很痛，我可不可以不出去？」我再度請求她。

「不行，今天每個人都要出去。」

她就站在門外瞅著我，我只好拖着腳，全身顫抖的「走」出去，每踏出一步腳底就會傳來錐心的疼痛，我走得很慢。

走了大約一碼多的距離，我再度懇求她。

「不行，你今天一定要出去。」

什麼意思？是什麼特殊的日子嗎？她很耐心的從走廊末端跟著我走出去。我是最後一位

。

忽然，那個兇守衛跑過來：「為什麼你老是慢吞吞的？走快點，我們不能等你一整天。」

我咬緊牙關想盡量快些，她在後面狠狠推了我一把，我跌倒在地，另一個守衛扶我起來。

「你裝死！快點！快點！」她又在大喊。

「我走不快，跌倒了不是更慢？」我跟扶我的守衛講。

「不要緊，盡力而為就可以了。」她看來比較講理。

我終於「走」到操場。每個守衛都站在講台上，我搖晃著站不住，腳上的傷口不住發疼，我實在一步也挪不動了。

「走啊！」講台上那個兇悍女守衛在喊。

我痛極了，不再理她，就着一扇鐵門，我靠了上去。

「走啊！你在那裏幹什麼？」她對著我叫嚷。

「我走不動了，腳實在很痛，你沒看見我的手腳都有傷嗎？傷口上還有膿血！」我也對她吼。我希望她過來打我，這樣別的囚犯就都能看見平常不讓他們談論的事實。我的聲音大到足夠讓在場的每一個人清楚的聽見，但是她並沒有衝下來揍我，好像我說的都是她想聽的，她居然修正了她的語氣說：「那你就站在操場中間好了！」

我步履艱難的走到場子中央面對著她。

「轉過去，面對大家！」

為什麼她要我面對大家？似乎她是要我讓大家看而不是讓我去看講台上的人物。有個所

謂「高級幹部」在那台上，我只看見對我友善的警衛。這個「高級幹部」一定知道我手臂受傷，我想他是在查驗手銬對我造成的傷害，那女警衛必定會逼我把傷勢說出來，她喜歡聽這些，因爲可以藉此讓上級對她工作認眞產生良好的印象，但是爲什麼「上級」要躲在後面篷子裏呢？我轉過身來，看見帳篷裏走出四個穿卡其軍裝的人，後面跟著那女警衛。我在外面不到十分鐘，就有人叫我回牢裏去，回房的路上已經沒有人在背後催我走快點了。

剛才陪我出去的守衛跟在我後面，她打開牢門時，我擧著傷手，對她說：「請看看這些傷口，我很需要包紮，以免感染，可不可以請你幫我，把架子上的枕頭套拿下來，我好用它撕成布條來當繃帶？」

她一言不發，從架子上拿下枕頭套遞給我。

這布套子在我一九六六年入獄時就不是新的了，如今薄得像張紙一樣，我毫不費力的把它撕成布條，做成兩副繃帶。

牢裏非常安靜，我沒有聽見守衛命令樓上的人犯下來運動的聲音，從進來以後就一直很安靜，似乎已經停止出去外面活動了，這是從來沒有的情況。我發現今天所謂出外活動完全是爲了讓那三名軍事人員觀察我的狀況而已。

再送開水來的時候，我先洗乾淨傷口，把它包紮起來，很快就又滲出膿血來，布又染紅了，不可能立刻改換另一條繃帶，房間裏十分陰濕，濕布條要很久才能乾，我必須趕快想個法子來使濕繃帶快乾。或許，我可以利用裝滿開水的杯子當成熨斗來燙乾布條，這樣可以讓我一天至少更換兩次繃帶，如果在就寢前清洗繃帶，再放在乾毛巾上包起來吸水，第二天早

上可能就會乾，這樣，我一天二十四小時就能更換三次。

熱開水送來了，我把綳帶纏在杯子外圍，一股蒸氣白煙冒出來，濕布上的血跡慢慢變淡，我很高興這辦法可行。

以後的幾個月中，我全心照顧傷口，報紙也只是走馬看花的瞥一眼而已，然而，我注意到一些公開的抨擊已經減少，更有報導要求中國共產黨應該爭取在聯合國的正統地位，另外就是林彪的名字在報上出現的次數，已比不上近來表現更突出的周恩來了。

因爲身體狀況不佳，傷口復原得很慢，光是表皮結痂就費了好幾個星期，同時，我牙齦潰爛的老毛病又犯了，當手腕傷勢較爲減輕時，我請醫生爲我治療。

有些守衞會在値班時候來查看我的傷勢，她們不大相信我傷得有多嚴重，看了之後，大部分都不表示意見，只有少數人說我活該！

我不希望再被傳訊，現在任何有關我這卑微生命的事，都比不上結束我那敏感牙齒的痛苦來得重要，我知道共產黨一定會用其他報復手段再來拷問我，但我已不打算去揣測。



第十二章 釋放

一九七一年，我繼續跟病魔纏鬥，並等著毛派下一步的行動，春夏逝去，金黃色的秋天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是十月一日，這是一年中最重要的大事，這個國定假日的慶祝儀式從一開始就由人民政府主持。在這天，每人除了額外的食物配給，還能在公園中免費看戲，及被批准在國營商店購買短缺的日常用品。

最主要的節目是每個城市有由當局所組成的遊行隊伍，在佈置得五彩繽紛的遊行車上，展示著過去一年來經濟、文化成就的圖片，成千上萬的工人、農人、學生，甚至家庭主婦都列隊行進，高喊由共黨宣傳部門爲此節目所特別製作的口號，來保證他們對人民政府忠貞不二。這些遊行都經由每一地區的主要團體及市政官員詳盡計畫及重複演練。

在北京的慶祝活動是在舊紫禁城前的天安門廣場舉行，由毛澤東和政治局委員以及主要高級幹部在天安門上的司令台校閱，陽台的兩側還爲外國顯要人士及外交官設備看台。到了晚上更有精心設計的美妙煙火。

令人印象深刻的，上百輛遊行花車，和成千上萬的男女隊伍步行經過檢閱台，他們揮舞著紅旗，高喊著口號，在頭上高舉著毛澤東的肖像。對毛來說，這必是令他極度興奮的時

刻，尤其看到這些他的崇拜者在行經時注視他並發出雷鳴般的歡呼：祝他萬歲、萬萬歲（如同對古中國皇帝的用辭一般）。毛澤東微笑的照片刊載在十月二日全國所有的報紙頭版上，做爲他在這重要場合中歡喜的見證。

中國大陸的人民都知道，對毛澤東這個來自湖南的農夫而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慶是滿足他私人虛榮心的大日子，因此，一九七一年十月一日沒舉行任何慶祝活動，眞是令人震驚，我很訝異那天早晨的廣播什麽也沒提。下午，我焦急的等著報紙，拿到後只看到毛澤東的肖像印在頭版上，日期十月一日與「國慶日」均用紅色印出，但對官方的主要活動或特別節目卻隻字不提。當我正爲這顯著的遺漏困惑不已時，一名警衛突然推開小窗：

「交出你的毛語錄。」

這麽奇怪的命令讓我一時之間沒法意會，也許我一時疏忽損壞了這本册子，而她要依此爲由來懲罰我。匆忙的拿起書，瞥了一眼確定它絲毫未損後，我安心的將書交出去。她關上窗門後，我聽到她上樓到其他囚室收回書，因而臆測她是奉命這麽做的。

直到被命就寢，她才把書還給我。檢視它，試圖找出她當初收書的原因，卻訝異的發覺序言已不見踪跡。毛語錄起先是人民解放軍爲其半文盲的士兵而編纂，後來國防部長林彪下令全國人手一册。

毛語錄的序言由林彪所作。他在其中稱揚：「現存最偉大的馬克斯主義者，成功的將馬列主義信條應用在現今中國的特殊狀況中。」他力勸解放軍須熟讀毛語錄的內容，並將其應用在日常生活中，如此方能「揉合毛澤東思想進入血液內」，成爲「讀毛主席的書，服從毛

主席的命令，做個毛主席的好戰士。」

序言中的措辭沒有一處會被視爲反毛的，事實上，它是明顯的阿諛，使許多人覺得要背誦它頗爲肉麻，但在文革期間，這種肉麻卻成爲一定的習慣。我覺得序言被撕去的唯一可能解釋是其作者正處於失勢的狀態，毀去一個不名譽首腦的名字與著作，是共產黨慣用的技倆。

很明顯，這名警衞奉命收回犯人的毛語錄，是要將序言「處理掉」，我猜想林彪也許正被鬥爭、批判，拿著小紅皮書，我楞住了，反問自己，這可能嗎？

「你爲什麼還不睡？」門外傳來守衞的聲音。

我不希望她知道我對所發生的事感興趣，我迅速鋪好床躺下，那晚，我睡得並不好。

在警衞撕去我那本毛語錄序言後，報紙刋載了揭發某個「睡在我們身旁的人」的專論，沒提到名字，當年劉少奇被公開指謫時也曾用同樣的措辭，這暗示著毛不希望對他不利的敵人接近他，其他文章談到毛的「心腹」聲言支持毛，同時却又密謀置毛於死地。報紙也提到在抗日戰爭和對抗國民黨的解放戰爭期間，黨的歷史和軍事戰鬥，包括我在內的中國人對林彪的個人歷史眞是耳熟能詳，因爲他被捧爲毛澤東的接棒人後，一直是個風頭人物，雖然我不知道他和毛澤東之間鬥爭的細節，但鬥垮是毫無疑問的。我關切此事並專心閱讀報上的每一個字，有一天，我鬆了一口氣，因爲負責管理上海公安局軍事管制處的林彪部下的名字消失了，既然一號拘留所是上海公安局管轄權下的監獄系統之一，此人也是控制拘留所最高階層的幹部，如果我的臆測沒錯，林彪在上海的軍方代表正是迫害我的人，我當然希望林彪下

台，同時我也提醒自己注意情勢的發展。現在高興還太早，因為我知道林彪的沒落所造成的政權眞空狀態，將由江青為首的激進分子，或周恩來帶頭的老班底來接掌。

十月末的一個夜晚，守衞又命犯人們坐著聽特別廣播，打開擴音器，聽到某個人正就「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優勢」作演說，他演講的主題是尼克森總統在次年二月訪問中國大陸的公告，他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因此而提升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並使對人民共和國一直採取敵對政策的美國，終於瞭解此策無效。

「尼克森，這位資本主義王國的元首卽將來訪有何重要意義？如果中國萎靡不振他會來嗎？當然不！尼克森決定到中國向我們偉大的領袖表示敬意，是因為他必須面對經過偉大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後淨化並強化的中國，在偉大的舵手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下，這是無法抹煞的事實。別忘了，美國是最反動的資本主義國家，也是我們最大的敵人，美國總統的來訪是中國無產階級最偉大的勝利。這是文革偉大成就的反映，証實了他們資本主義制度的式微，而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在世界上的活力與影響力，與日俱增。」

「最初，當他提議來訪時，許多同儕都認為不該歡迎一個帝國主義代表，但我偉大的舵手是寬宏大量的，他說：『讓他來，讓我們禮貌的歡迎他，看他說什麼。如果他承認過錯並誠心改善，我們很歡迎；如果他眞心悔悟的話，我們馬克斯主義者會給他機會。』我們偉大的舵手眞聰明！他是對的！我們將迎接尼克森。接下來幾個月，我們將依此新情況來敎導同胞們，並幫助各位瞭解接受尼克森的來訪，並非放棄我們的原則，而是接受美國政府對其錯誤政策的投降。尼克森的訪問是我們偉大的勝利！」

「接著，我要警告在一號拘留所的犯人，你們被關在這兒是因為你們不但崇拜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世界，而又藐視社會主義的中國。你們希望並相信資本主義世界有一天將會在中國盛行，這次美國總統來訪對你們將是一個教訓，仔細想想，如果國民黨沒撤出中國大陸；如果美軍沒在韓戰中被中國人民自願軍打敗；沒在越南陷入泥淖，如果我們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後沒更強盛，尼克森會誇過大半個世界到北京來對我們偉大的領袖表示敬意嗎？」

這冗長的演說沾沾自喜的重複著美國總統的即將來訪，我得到了其中的要旨。由拘留所被放出來後，我才知道這套自欺欺人的言辭也在全國播放，於是在每個工廠、公社及人民大會為此即將來臨的訪問預備人選，並藉機造成毛澤東為今世上最偉大領袖的假象。

中美關係的新轉變使我振奮，我相信這對共產黨領導權力的均衡將有決定性的影響，至少，在相當重要的時機，周恩來的地位將會提高，也許在武力方面也會較佔優勢。如果是，我嚴酷的考驗將接近尾聲，然而，依我在中國的幾年經驗，我知道事情進展不會快。在北京，一個重要政策的決定，常要費數月甚或數年的時間，方能使基層社會知道，我也略知由江青帶領的激進派黨爭在上海有強大的勢力，而且她的舊識張春橋正是當地的首要書記。

這些年來我毫無生機的活著，對這新發展不勝竊喜，數週來，我注意報紙的刊佈與徵兆。警衞像是失常了，一九六七年一月革命派及紅衞兵接管上海市政府後，他們就處於這種情況，我想，他們也許正忍受著林彪沒落後的政治首腦。

冬天又來了。我毛衣肘部和起皺長褲膝蓋的破洞都無法修補，夾克和被子的裏襯均已不堪忍睹，剩下的只是兩層綴滿補丁的布。唯一的襯衫已被縫補得無法辨認原布了。很明顯的

，如果我得留在拘留所過明年冬天，我極需增添衣服。我決定再試一次，看看情形是否能有所改變，雖然以往我對衣服的請求總被當作耳邊風。

「報告！」我向門外喊著。

「你要什麼？」一名警衛拖著步子停在我囚室的門口並打開窗子。

我把毛衣拿出去讓她看那些破洞然後說：「天氣變冷了，我的衣服都破破爛爛。請看，上面都是洞。我實在需要一件厚夾克、棉被和一件襯衫。」

「你在這兒幾年了？」

「我在這兒有六個冬天了。一九六六年九月進來，當時紅衞兵給我的衣服、被子就不是新的，經過這麼多年，實在不能禦寒了。」我說。

現在，我彷彿在這個黑暗的隧道末端看到一絲曙光，我要活下去，直到重見天日！也許我的話使她不耐煩，她皺著眉頭關上窗子走開了。

我不管別人是不是嫌我囉嗦，接連數天我都對執勤的守衞重複我對衣被的請求。終於有個警衞不耐煩了，他說：「好啦！好啦！你要暖和的衣服，我們知道了，我們會考慮你的要求。」

週復一週，天氣愈來愈冷，我決定再試一次。

「報告！」我叫著。

「你要什麼？」一名守衞走近問道。

「可不可以讓我看看提訊記錄？」

「我想請求保暖的衣服。」我接著說。

「你還沒拿到衣服嗎？」警衛開窗。

透過窗子，我見到曾經鼓勵我爲活著進食的婦人，（從這晚後我沒再見過她。）我說道：

「我冬天的衣服全破了。請進來看看。如果我再沒禦寒的衣物，恐怕我又會生病了。」

她打開門走進來檢視我的衣服，然後說：

「我會報告上級。你願意先借些囚衣穿嗎？」

我怕穿囚衣，並不只因爲我怕臭蟲，而是我不願意捐棄自己僅剩的尊嚴。

「不，謝謝你。我不要囚衣，我想用我自己在政府手中的錢來買新的冬衣。」我的話她似乎聽不懂，我只得解釋：

「我的錢是在紅衛兵抄家時拿走的。他們告訴我，如果錢不是剝削來的，政府會替我保管。我在國內的土地或工廠沒有任何股份，我告訴他這個情形，他說那麼錢不會充公。」

「我會報告上級。」她答應我。

幾天之後，我被召去審問室。那較老的警衛已經不在了，而坐在審問員位置上的是那個總喜歡領頭整我的女警衛，還有另外兩名女警衛在其兩側，有一個看起來還蠻溫和的。看到那粗魯的女警衛讓我驚訝又失望，難道北京新情勢沒給一號拘留所帶來任何改變嗎？由這個女人負責，我提出的請求怎還有希望呢？

向毛像鞠躬並由面目全非的毛語錄中讀了一段後，我坐在爲囚犯而備的椅子上等她嘲弄

我的要求，沒想到，她的口氣竟然很好。

「它們都破了。」爲了証實，我扯開身上的藍棉外套，露出破爛夾克裏的破洞和棉絮，我還抬高手臂讓她看到磨破的袖口。

「好吧！好吧！穿好你的外套。」她說。

「政府那兒有我的財產，我請求批准使用一些我自己的錢。」

「是那個部門？」她問。「你有收據嗎？」

「紅衞兵抄我家時拿走了錢，他們沒有給我收據。」

「提到紅衞兵的革命行動時，你不該用『抄家』這個字眼，他們是依毛主席的指示去除四舊並對付資產階級的。」她說。

「我不是資產階級。根據馬克斯主義，只有以股票的利息和工廠或由佃農得來的紅利爲生的才是『資產階級』。我的錢都是合法賺來的，就算繼續遺產也是經過法律認可的。」我激動得很，如果一年前我這樣說，她早就翻臉了，而現在她只是不睬我。

「到你家革命行動的紅衞兵敎師，有沒有告訴你是那個部門保管你的錢？」

「沒有，只說我的錢要等毛主席決定後才能用。」

「的確。所有被紅衞兵取走的私人資產都已被凍結，而且在毛主席沒做決定之前不能動用。」她說。

「我在中國銀行開有外滙帳戶。」我說。

「外滙帳戶也被凍結了。」

「那，好吧，讓我借部英文打字機。我要寫信給我香港的銀行，讓他們送些錢來。」

「不行！你不許跟中國以外的任何人聯絡。」她說：「我們怎麼知道你會寫什麼？」

「在發信前，你們自然會知道我寫什麼。」

「你可能藉密碼發送消息出國，別廢話了！我們要做的是將你的要求呈上去，讓你在天氣轉涼時拿到些保暖的衣服。現在你回房，去讀我們偉大毛主席的語錄！」

我被押回囚室，談話當中，這兇巴巴的女警衛從頭到尾居然以平常，幾乎是同情的語調說話，眞是令人震驚，我想她是典型的「緊密跟隨黨的路線」的黨員，中國人稱之爲「變色蜥蜴」——因其能隨所處環境改變態度及行爲，而且快得像蜥蜴變色一樣。這種黨員是生存者也是成功者，他們從不疑心黨的政策，只是迅速的奉命執行，他們是不用腦筋的機器人，不需獨立思考的能力和良心，他們是任何黨書記的「忠貞」幹部，只要他代表權力並能讓他們陞遷，他們總無疑而且心甘情願的爲新人效忠；然而只要是垮台，他們也會第一個公開指摘。他們是中國共產黨革命下產生的新典型。因爲每次經過政策的轉變後，他們似乎仍維持著原位，成爲中國年輕一代效法的模式，結果導致中國社會上根本價值觀的巨大轉變。

一週後，警衛將一個大包袱丟在囚室地板上，我簽了收據，他鎖門離去。我拿起包裹到床上解開。非常驚愕的發現，裏面有一件夾克、一件羊毛滾邊的冬衣、兩件毛衣和一條毛褲——那是一九六六年紅衛兵搜屋後准許我女兒保留私用的，當時還留有一牀冬天的棉被。衣服堆裡還有幾條毛巾和一個梅萍喝茶用的瓷杯，其中一條玫瑰色肯農牌的洗臉毛巾是我從香港帶回來的，在我被關前一直是她用，毛巾看來正和一九六六年時一樣。我檢視藍毛料鑲褐紅

色絲邊做的夾克，它看來和一九六六年時一樣新。我用顫抖的手拿起白瓷杯，看到裡面有褐色沾染的痕跡，那是茶漬。

我仔細看著每樣東西，並意識到這是不祥的預兆，我的心砰砰的跳個不停，雖然我不願這麼想，但却無法不想，我被捕後，女兒也許遭到不測，不然爲什麼衣服依舊如初？毛巾也沒用過？也許她死得很突然，所以喝茶後沒洗杯子。雙腿抖得令我跌坐了下來。

一號拘留所允許犯人家屬在每月五號送些衣服和肥皂毛巾等日用品給他們。一到這天就是我在監獄中最孤獨的一天，當我聽到警衛將包裹交給其他犯人而從未給我時，不太能諒解女兒從不送東西來。後來，我告訴自己，她是共青團的成員之一，上級不准她與我來往，當每個月我因渴望、失望，在心裏掙扎時，總這麼安慰自己：梅萍不來看我也好，那她就不必在監獄門口排上幾小時的隊。其實，她早已死了！

「報告！」我衝到門口，希望能從警衛身上問出眞相。

「你要什麼？」警衛打開窗門瞪著我。

「剛才你給我的東西是我女兒的衣服和被子？」我說。

「是的。」警衛答道。

「我女兒怎麼了？」

「沒怎麼啊。」她回答。我彎下身由小窗口看她。她看來相當正常、平靜。

「衣服看來跟一九六六年時一樣新。難道她過去幾年都沒用過嗎？」

「我怎麼知道？也許她買了新的。她不是做事嗎？她自己有薪水，她可以買呀！」

「告訴我，我女兒現在還活著，是嗎？」我急得快瘋了。

「如果你想知道我是有沒有看到你女兒，告訴你，我沒有。」

「可是你知道，對吧？」

「為什麼她該跟別人不同？」警衛關起窗門離去。

是我瘋了？難道牢獄生活使我變得多疑了？我再次仔細檢查每樣物品，每摸一件衣服，我愈發確定她死了，她不在世上的想法愈來愈強烈，但我需要確鑿的證據，因我已慣於面對事實，我不能胡思亂想！在我心頭有塊大石頭阻止我接受她已經死了的想法，這將使我奮鬥多年以求生存的目的變得毫無意義。她那麼健康，那麼年輕，怎麼可能死呢？我不斷試著說服自己，不管我看到什麼，她一定還是好好的。

梅萍的東西不尋常的攤在眼前，使我無法釋懷。它們似乎告訴我，我被監禁後不久，時間突然靜止了，藍夾克看來像新的。當我試著想像可能發生之事，我的心緒快速的思索著。警衛的意思似乎說她還活著，但卻未明說，一個突如奇來的想法使我再度走到窗前。

「報告！」我喊著。

沒人過來。我不停的喚，仍然沒人答應，但我聽到走廊末端的房間有警衛們的談話聲。當天晚上值夜警衛來叫我上床時，我嘗試着和她交談，可是她不理我，只在遠處叫我去睡覺！

我無法入睡，我愈想愈着急，隔天早上，我再喊警衛。

「報告！」

沒人回答，我決定等白天值勤警衛來時，再作打算。

我喊了報告後，她來問我要些什麼。

「守衛昨天給我帶來我女兒的衣物，我很担心。我不瞭解爲什麼我女兒好像沒用過它們。紅衛兵只留給我們一人一件外套，過去幾個冬天她怎麼會沒穿破它？我要知道我女兒是不是好好的活著，求你叫她親筆寫些字給我看。」

「犯人不准和家人聯絡。」她說。

「我只要她寫『毛主席萬歲』或一段毛語錄就好，或者只要她寫她自己的名字。」我懇求著。

「我已經告訴過你，犯人是不准和家人聯絡的。」她堅持的說。

「可是我在這兒已經很久了。」我說。

「那也一樣！」

接連數天我對每個値勤的警衛重複請求。我愈發肯定梅萍眞的死了，因爲他們不是避開就是保持緘默，其中一、二個在拒絕我對女兒筆跡的要求時好像十分困窘。他們不是不敢看我，就是盯著地上。我心緒紊亂、心情苦悶。我旣渴望又害怕知道眞相，前一刻我認定她已死，後一刻我又懷疑是自己因長期的監禁而變得敏感、悲觀。

數週來寢食難安、焦急擔心，我又生病了，發著高燒並說著夢語，我再度被送到監獄醫院。這次我已失去了生存的意志，但身體却很快復元，奇蹟似的，我又活了。在聖誕節前我被帶回監獄。

坐牢這些年，我不斷呼求上帝，也同時感覺到了祂的存在，在灰暗囚房的單調環境中，我經歷了幸福生活中所未有過的歷鍊，我對內心深處的信仰重生了，使我重獲勇氣繼續奮鬥。信心在我生命中的黑暗時刻支持著我，並帶領我安然度過貧病折磨。即使遭受無比的痛苦，我知道上帝永遠在我身邊。

在警衞嚴密監視下，白天我不能公然祈禱，爲了能安心祈禱，惟一的方法就是假裝看著毛語錄，而以受創的心靈向上帝禱告。每當對祂提及我女兒時，我又回到一九四二年在澳洲坎培拉她出生後，至我們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七日被迫分離之前的珍貴時光。我再度感受到，她成長中每一個階段予我的喜悅，並慶幸上帝賜給我一個女兒。日復一日的祈禱，盡量想她活著的日子，我不去想像她的死亡。

我逐漸的接受了現實，不再指望出獄後還能看到她好好活著，我的「釋放」還需要一番戰鬪，而梅萍究竟出了什麼事，也是需要我去查証，雖然沒有梅萍的日子凄涼無望，但我必須奮鬥下去。

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森總統抵達北京。報紙所有的版面都刊登了此次訪問的內容，並刊載其抵達的隆重儀式、歡迎宴會及與毛澤東合影的大幅照片。當我看到毛與美國總統握手時的笑臉，我想這眞是毛澤東最得意的時刻，他多年不被接納的屈辱都消失了。我肯定他喜歡與美國總統的這次會議，不單是對他和共產黨的意義，更是對他的死對頭——國民黨的一種示威。

在所有照片及報導中，周恩來光芒四射，報紙刊登周恩來陪同尼克森到上海，（尼克森

將由此返回美國。）報導說，尼克森的返期略有延遲，我知道，這是雙方協議不順利的緣故。協議公報中包括美國承認台灣爲中國的一部份，這項約定提出美國不承認台灣獨立，（這是中共最担心的。）此外，在公報中，中共未能正式同意對將來兩岸中國的統一，放棄使用武力，這是中共決定性的勝利。看來中共在美方訪問中獲益不少，而其代價則是精心策畫的殷勤招待。與美復交的政策似乎不太正當，我覺得周恩來地位之大爲提高，是因他有成功而技巧的外交手段。

階級鬥爭暫時停止，氣氛緩和了許多，報紙語氣不再尖銳，甚至警衞也表現得正常。五月，我被提訊，剛到這拘留所時的那名審訊員又回來了，他要我另寫一份自傳。爾後，他問及我的家人、親友及私生活，再次詳細詢問每件我在一九六九年對來自工農宣傳隊的審問者說過的事。當我不耐煩，並告訴他我早已回答過這些問題時，他只說：「你再答一次有什麼關係。」

一連串的審訊持續數週。我不記得被召去審訊室有多少次，或讀了多少段毛語錄，雖然不再有叫喊和激辯，但我既不舒服又疲倦，並極度的沈悶。

一九七二年秋季某一天，審訊員提出一封由蜆殼辦公室檔案拿來的信，問是不是我寫的。我看到自己的名字，回說：「是的。」

「這証明你的不法活動，但在同時這可成爲政治錯誤。」

「我可以看看信嗎？」我暗暗吃驚。

他把信遞給我。這封信是一九五七年十月，外子去世後——我接掌蜆殼的管理工作時所

寫的。

記得當時的情形是那天早晨蜆殼香港分公司的經理打電話來，他告訴我有位經理被指派接任我丈夫的職位，不過要次年五月份才能到達上海，他說：「倫敦方面想知道那樣對你方不方便。」我告訴他可以，並且還會通知上海市政府工商部門。然後他請我開張新任經理夫婦該帶東西的單子，特別是當他們知道中國人是以米為主食，很想知道是否該帶麵粉。

因為當時秘書是個英國女人，我想她知道該給什麼建議，所以我請她開單並寫張由我簽名的附函。出於幫助同胞的熱忱，她列了一張相當長的表，包括的項目從扣子到清潔劑。而從政治觀點看，我覺得這信完全無害。

「我看不出有什麼不對。」

「你洩露出上海穀物供給的情形。」他說。

「眞的，讓我再看看。」現在我才知道他受命為我坐牢找藉口，以免我被釋放時說自己無辜的。因為，「偉大榮耀無誤的中國共產黨」是不習慣承認錯誤的。

他再交給我信並說：「讀有關口糧配給的那段。」

我唸：「上海政府准每人每月二十擔的穀子，每人還可買米或麵粉，這些足足夠用。」

我問他：「有什麼不對嗎？」

「那洩露了有關上海穀物的供給情形。」他說。

「穀物配給是給所有人，包括住在上海的歐洲人。衆所週知的事算什麼洩密？」

「你的信是寄到國外。」他說。

「我不信在上海的歐洲人回國後不會談及此事？那所有海外回國作短期走訪的中國人又怎麼說？他們難道不曉得家人有多少口糧配給？他們離開中國就會輕易忘記此事嗎？」

「那是他們的事，這封信是你的事，你承不承認寫了它？」

「事實上這信不是我寫的，但我願意負全部的責任，只是我不能同意你的一點是，我陳述每人每月有二十擔米或麵粉配給額的事實是否構成『洩露情報』的罪！」

「洩露關於穀物供應的情報是犯法的。不過你知道規定，我們可以從寬處置。」

「胡扯！那那算情報，你不要胡謅！」我氣了，但他祇是停止審訊，不理會我。

冬天到時，犯人們又一天三餐，午餐有魚或肉，但我的健康每況愈下，這些東西並沒助益，我還有嚴重的出血。當血量控制住後，我被那兇巴巴的女警衛帶到第一醫學院的中山醫院檢查。大概已事先約診，因此我們直接到婦科，並在其他正等著的病人之前進入診療室。

我驚奇的發現「醫生」是個二十出頭的年輕女革命分子，在簡短的檢查中她很笨拙，事後她告訴警衛，我得了子宮癌。我不信，因為我確定她不是合格醫師，而顯然的，警衛及獄中其他人都相信他，我的待遇改善了，有些警衛同情的看著我。釋放後我才知道，負責我案子的幹部在我去醫院後就鄭重的為我找住處。他們批准了一片兩房一浴的公寓給我，因為他們認為既然我沒有子女，那麼我的餘生將需一名特別護士來照顧。

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七日，午餐之後，我在囚室裡走動，一名警衛打開小窗說：「收拾你的東西。」

「我的東西？」我問她。

「是的，你的東西。不要留下任何物品。」

不久後門被打開，進來兩個服勞改役的女孩，她們收起我所有的東西。廊上一名警衛說：「出來。」

我環視囚房，這個六年半來的「家」，沒有我的洗臉盆和毛巾，它似乎已不同往昔了。我心想是否該撕下牀邊牆上的幾張衞生紙，然而我決定留給下一位不幸的女人。當我站在房裡看它最後一眼時，再度感覺到手腕上手銬的冰涼，並憶起所忍受的一切身心痛苦。

「來呀！你還在那兒做什麼？難道你待得還不夠久？」警衞喊著。

我跟著她到前庭，進入一九六六年初到時，登記入獄的屋子。這會兒沒人，我在椅子上坐下。

一名年輕醫生隨我進入屋子，他以一種隨便的態度半倚著櫃台，說：「我告訴你治療你的藥物，你離開後也好告訴你自己的醫生。」他說出幾個藥名。

「非常謝謝你。」我說。

「你待會兒就要被放出去了，高不高興？」醫生問我。

「是該走的時候了，不是嗎？關一個無辜的人六年半是夠久了。」

他沒聽見似的繼續說：「在你離開前我想給你一點忠告，這是爲你好。你在這段期間的表現不夠好，事實上，在拘留所這幾年，我們從沒有一個犯人像你一樣，這麼頑固而好辯。你離開這兒以後，一定要試著控制自己，當心別激怒群衆。上海不再是文革前的上海了，你必須尊重無產階級，否則你會倒楣。你是個病人，該不希望再回來吧？」

我不吭聲，他留了幾分鐘後離去。顯然他是被命來叮嚀我的，但我不知道爲什麼，實際上，我並沒仔細聽他說話，我的心只惦念着我的女兒。

兩名男警衛徹底搜查過包袱後，我被送到偵訊室。這囘不用再向毛像鞠躬或讀毛語錄了，審訊者只指著囚犯座椅叫我坐下。

另一名我從未見過的男子坐在他旁邊。這人說：「你今天出獄，我們覺得是讓你出去的時候了。我把人民政府對你的案子所達成的結論唸給你聽，你聽完之後，如果有意見，可以表示。」

他由紙夾裡抽出幾張紙，然後說：「起來聽結論。」

我站起身。

他讀出我的名字和其他個人資料，例如年齡和出生地，然後說道：「上述者於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依下列理由帶入一號拘留所。第一，一九五七年十月，在一封寄往英國的信中，她洩露上海穀物的供應情形。第二，她爲叛徒劉少奇辯白且反對中央委員會對劉少奇的判決。問題嚴重，應予懲戒，但基於政治思想落後與無知的事實，決定給予反省的機會。一號拘留所六年半的教育後，我們觀察她有某種程度思想上的改進及悔悟，因此，我們決定不對她加以控訴，以示無產階級的寬宏大量，並准許她以『自由人』出獄。」他唸完後，昂起頭看著我。

我大怒，氣憤和厭惡使我無法呼吸。我不齒他們厚顏的虛僞和無恥，却也深知錯不在他，而是我們都必須在其下生存的邪惡制度。我必須戰鬥，不計代價，我坐下來，瞪著他。

「你沒什麼話要說嗎？你難道不感激？你難道不高興你可自由離開了？」這人問。

我盡力克制使我顫抖的怒氣說：

「我不能接受這個結論。我要繼續留在一號拘留所，直到我的案子達成正確的結論。你們得宣告我是無罪，未犯任何政治錯誤並對不當的逮捕道歉，且恢復我原有的名譽地位，此外，還必須在上海和北京的報紙上公開道歉，因爲這兩個城市中有我的親友。至於你剛才唸的結論，那是揑造托辭，我被帶進一號拘留所是在劉少奇被公開指摘之前，你怎能說我爲他辯白？至於洩露穀物供應的情形，那只是你們爲保留面子胡謅的，你們都知道我從沒洩露任何事。」

他們彼此對覷，然後審問員說：「一號拘留所不是養老院，你不能一輩子待在這兒。」

「不需要一輩子。我會留在這兒直到你們還我公道，如果你們決定明天給，我就明天走。」

「我們已經在這兒聽你的意見了。如我所說，我們准你表示意見，我記下來了，我們會呈給上級，你現在可以走了！」另一個說。

「不！要是我現在走了！你們會忘掉此事，這個不當的結論會納入我私人的記錄文件裏。我要留在這裡。」我說。

審訊員站起來：「我從來沒看過犯人拒絕離開監獄的，你一定瘋了。無論如何，政府要你走，你就得走，從一大早你的家人就在等你了。你還要拖多久？」

他是說我女兒在外面等我？噢，我多麼渴望見到她！突然，兩名女警衞走進來，一人一

邊，把我拖出第二道門。

在遠處，有個年輕女子的身影站在一輛藍色出租車旁。她比梅萍矮，我的心再度往下沈，她不是我的梅萍！她是何安！我的教女。

第三部　爲正義而戰



第十三章　梅萍在那裏？

我靜靜的站著，眼光巡視著車道，除了遠方的武裝哨兵外，只有我的教女兒何安，她正張開雙臂迎向我來。

「梅萍死了！所以她沒來接我。梅萍死了！梅萍死了……」我的耳朵嗡嗡響，我的視線朦朧不清，眼前的景物一片模糊。雖然內心深處希望梅萍是因事耽擱，所以沒來，但是我整個身體已被傷痛的心情擊潰，我無法移動雙腿。何安扶著我坐進一旁等候的汽車中。

「梅萍呢？」

我害怕這個答案，但我必須問。

何安沒有回答，她只是緊緊握著我的手。我不敢再問：「梅萍死了嗎？」我生怕一說出來會變成眞的。

當車子經過熟悉的上海街道時，我們沒說一句話。從一號拘留所釋放出來，並沒有帶給我絲毫的解脫感，只是到了舊地更增添了新的憂慮。

計程車停在一扇黑色木門前。一名穿著藍色棉上衣、寬鬆長褲、僕人模樣的中年女人爲我們打開大門，並幫忙何安提我的行李。

看來曾經是個小花園的地方現在卻堆著碎石塊。除了破磚碎瓦和土堆中唯一的榆樹外，遍地雜草叢生，眼前的房子破舊不堪，樓下的房間沒人住，陽台堆積了厚厚的一層灰。推開大門後是個小廳，我們由此走上樓去，廳與樓梯已掃過也沖洗過，但牆仍是灰的。何安帶我進入頂樓的一個大房間。房間裡的床鋪著白色的床單並有花棉被、衣櫃、小書桌、枱子、四張椅子和安樂椅。這些家具通常是配給新婚夫婦。

「樓上這兩個房間是分配給你的，公安局發給我證件，我去爲你買了這幾件家具。」何安緊抱着我，感嘆的說：「噢！你再回來眞好！」

她的臉貼著我的臉，抱了我好長一段長時間，我知道和她談論梅萍並不容易，我得給她時間。她沒有解釋爲何梅萍不在場，這毫無疑問的告訴了我：梅萍死了。我感覺到一股無法抗拒的沮喪和痛苦。

「他們把要給你的五千塊錢交給我，我想你會需要一些錢生活，所以牆壁沒粉刷、窗帘也沒換。」何安解釋說：「媽本來要和我一起來接你的，但是當我們等計程車時，她被叫去參加林彪事件的研究會議，你知道林彪吧？」

「從報上見不着他的名字時，我想他已經下台了！」

「他死了！當他逃亡蘇聯時，飛機墜毀了！周總理現在是毛主席跟前的紅人，那就是爲什麼你會得救的原因！啊！眞高興見到你！要是……」她話還沒說完，語氣已轉爲哽咽，爲了怕我看到她流淚，她低下了頭。

我想她正要告訴我關於梅萍的事，但這時女僕端著兩杯熱茶進來，打斷了我們。

「這是阿姨，」何安介紹她。「她是來照顧你的。她睡在隔壁房間。」

「謝謝你，阿姨。」當我從女僕手上接過茶杯時，我對她說。她是個大約五十歲的女人，瘦小、皮膚粗糙、雙手強健。當她遞給我茶杯時，眼睛不住的打量我。

「要不要燒熱水洗澡？」她問我。

「謝謝。現在不要，我要洗時再告訴你。」

當她關門離開後，我問何安：「現在仍允許有僕人嗎？」

「現在失業的人太多了，只要你生病或生產，沒人會說你請佣人不對，而且是公安局的人建議我幫妳找一名女佣，他說你生病而且需要開刀，他讓我覺得你病得很嚴重，我得告訴你，你實在瘦得可怕。」何安注視著我，皺著眉頭說。

「別談這個，你怎麼找到阿姨的？」我問何安，我懷疑她是公安局派來的。

「媽從朋友那邊找來的，但是……」何安壓低嗓門：「她跟陳媽不一樣，跟她說話要小心。」

我點點頭。

「政府現在對你好，是因爲北平的情勢變了。這兩間房間是給你的，還有你的專用浴室。昨天我在這裡掛窗帘的時候，一名住宅局植樹部的人告訴我他被派來替你的花園種樹，他甚至還問我你喜歡那種樹。」

因爲我獲得兩個房間和私人浴室，還有住宅局種樹部提供的樹木，何安就下結論：人民

政府對我「好」，這是由於政府主宰着我們命運，所以人民對政府機關代表的任何一點跡象都非常敏感。

何安似乎比較放鬆了，面露笑容，所以我決定問她梅萍的事：「你現在可以告訴我梅萍發生了什麼事嗎？」

她望著我，似乎懷疑我是否能禁得起她將告訴我的事，最後她決定面對這件事：「那時候我不在上海。你知道，一九六六年我從音樂學校畢業時，文化大革命剛開始，八月，梅萍生日那陣子，我正等待當局分發工作，那年十二月，我被派到貴陽，一到那裡，就被派到貴陽附近的人民公社勞改。一九六七年夏天，媽來信說梅萍自殺了……」

噢！梅萍眞的死了，正如當初她的衣物被送到一號拘留所給我時所想的，在出獄時，我還拼命地抱著她還活著的希望，現在，最後一絲希望也破滅了。如果我死在獄中而不知道梅萍死了，那痛苦會少一點。一切掙扎與奮鬬，忽然之間變得毫無意義，我覺得自己掉入了空虛的深淵中，分不清方向，何安擁緊我，與我哭成一團。

他們對梅萍做了什麼，弄得她必須自殺？我那活潑健康的女兒如果不是被逼得走投無路，怎麼會自殺。

「他們告訴我，她的名字被列在攝影場會議中的自殺名單上。昨天，公安局的人叫我別告訴你任何事。他說攝影場的革命委員會代表明天有來通知你。」何安告訴我。

「他們有沒有說她爲什麼自殺？」

「當時我正忙著參加集會。通常公告只說這些人『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態度不正』

。」

「欲加諸罪，何患無辭。」我說。

「不錯，我也不相信那是眞的。」她補充說。

我告訴我自己，一定要查清楚梅萍是怎麼死的，雖然會花些時間，但我不會罷休，一定要找出事實眞相，不過，我也告訴自己要小心，因爲如果當局發現我的企圖，他們會阻止我。我不會讓人知道我要做什麼，甚至包括何安在內。

「你在上海工作嗎？」我問何安。

「不，我被上海公安局召回。他們寄了一封信請貴陽方面放我一個月的假。是兩個禮拜以前。原來公安局的人要媽媽來爲你準備一切的，但是她一年前得了心臟病，不能站在商店門口排長龍，所以公安局才叫我回來，我得趕快回貴陽，小孩子需要我。我結婚了，而且有一男一女。」何安快樂的從袋子裡拿出一張全家福的照片。

「恭喜！」我說。

照片上有個五歲的漂亮女孩和一個男嬰，她的丈夫和她笑容可掬。

「他叫李東，從北京戲劇藝術學院畢業後也被派到貴陽工作。貴陽市政府文化部很亂，高級幹部被公然抨擊爲『走資派』，革命同志互相鬥爭，沒有人知道如何安置我們這批畢業生，所以，當他們把我們全部送到同一個人民公社接受勞改時，李東和我立刻成爲朋友。在貴陽外界的公社工作相當辛苦的，我們每天必須挑很重的水和肥料上上下下幾百層階梯，那些農夫恨我們，他們憤恨我們在那兒吃他們已嫌不夠的分配糧食，却又不敢拒絕我們，所以

不論我們多努力工作，他們都嫌我做得不夠，我很怕他們。我想，我會累死，而且永遠回不了家。當那些農人生氣時，李東常幫助我、保護我，他學過編劇，所以知道很多歷史故事，他常以幽默和有趣的故事讓我支撐下去。」

我再看看相片上的李東，那是一個瘦男人，一點也不魁梧，也不出衆，但他有一對慧黠的眼睛和調侃的笑容，在相片上站在他旁邊的何安，看起來像小女孩。

「你和李東在一起很快樂嗎？」

「嗯！我們在一起非常快樂，他很照顧我和小孩，你知道，他正秘密的寫一個有關文化大革命的劇本，叫做『瘋狂』，一齣諷刺劇。」

「天哪！如果稿子落入革命派的手裡怎麼辦？你們不是住在政府指定的房間嗎？」我爲他的大膽冒險感到驚慌。

「李東說他必須寫，不然頭會爆炸。幸好，我們組織裡的革命派對他還算客氣，不會搜查我們的房間。李東認識那些沒唸多少書，也沒唸過馬克斯主義的革命派的地下作家，李東常爲他們寫演講稿，因爲他會引用馬克斯、列寧和毛主席書上的話。那樣寫，聽衆們會認爲革命派很有知識。當他們和其他革命派有黨派鬥爭時，李東甚至爲他們計畫對策。」何安告訴我。

「他爲什麼要那樣做？」

何安大笑不止，以致說不出話來：「李東說，既然他不能手刃革命派，他就要讓他們在黨派鬥爭中自相殘殺。」

我驚愕得說不出話來，問了何安有關李東的家庭背景，我知道他的悲痛來自家庭的苦難。他哥哥，一名信仰共產黨的中學教員，於一九五七年被鬥爭。他的大嫂死於自殺。他的父親被紅衞兵控告是大地主，把他裝在袋子裡亂踢後死於心臟病。

「我想你不在人民公社了吧？」

「不在啦，當毛主席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問北京時，我們被召回貴陽，突然之間，革命派對我好起來了，因爲我在澳洲出生，他們認爲澳洲和美國是同一個地方。」何安開心地笑著。「每個人必須遵從毛主席的正確路線，革命派密切注意北京。美國乒乓球隊來訪時，毛主席告訴他們『中國要對美國友善』，所以他們決定對那些在美國出生的人好一點，有人說北京的政治局呼一口氣，整個國家會感到一陣風。」

「你現在做什麼工作？」

「我爲貴陽歌舞團鋼琴伴奏。」

說着，何安的母親來了。我的老朋友蒼老了很多，讓我幾乎認不出來，挫折與認命刻在她深沈的皺紋裏。她緊抱著我嘆氣說：「噢，看到你眞好！」

我的記憶回到二十六年前的澳洲雪梨。那時候，我們是兩個快樂的小母親，我們並肩走在一起，我們的兩個小女兒帶著玩具水桶和鏟子走在我們前面，在一片金色沙灘上蓋一座城堡，（我們不知道沙丘上的城堡中很容易倒塌。）何安的父親在雪梨的中國總領事館工作，那時我們日夜盼着回國。

很明顯的，何安的母親也正想著梅萍。她說：「你要節哀，事情已經發生了，難過無濟

於事，多爲自己想一想吧！你看來很虛，身體要緊，別太傷心了！」

然後她告訴我一些她們在文革時期遭受的屈辱與迫害。她告訴我，她已獲准從教員生涯中退休，但何安的父親仍在銀行工作，因爲他們從未被視爲資產階級，所以仍能住在原來的家，紅衞兵只不過燒了他們的書，沒收了他們的「貴重物品」。

我謝謝她幫我準備住所。她說：「上頭的方策改了，好多人都被釋放了。」

「是啊！幾乎所有外國公司的高級職員都被抓。我們兩個朋友都被關在一號拘留所，一個去年年底釋放，另一個人最近也會被放出來。其中一個在紅衞兵抄他們的家時死了老婆—這個可憐的女人嚇得從六樓跳窗自殺。」

我正想著她告訴我的事，她又說：「現在別管別的，先看你的病要緊，你要一個合格的醫生，現在醫院門診的大夫沒一個是醫科畢業的，尤其是公安局的人說你得的是子宮癌。」

「我不認爲我患了癌症。」我告訴她。「出血的症狀已經很久了。幾年以來也沒有惡化，如果那是癌症，我現在應該痛。」

「太好了，我希望不是癌症，你需要一個好醫生好好替你檢查一下。」

「能找到好醫生嗎？以前的郭大夫現在怎麼樣了。」

「恐怕郭大夫也病得很嚴重，文革期間他受了不少罪，我看能不能找其他醫生，我們必須走『後門』。」

「什麼是『後門』？」我問她。

「這是個辦事的新方法，就是說要安排看醫生或買急需的東西，透過朋友或熟人找『路

子』。」她解釋，「當然啦，後門的費用較高，因爲我們必須送禮給那些替我們安排的人，這是今天辦事的唯一途徑。」

「那不是犯法的嗎？」我問她。記得黨以前並不贊成這一套而且做這種事的人下場都很慘，在文革以前，除了特權階級，沒有人敢私底下安排任何事情。

「所有的法律和規定都被說成是和人民對立的『走資派』工具。沒有人知道什麼是合法什麼是違法。反正，一個人被抓就是違法，一個人避開了就是合法。人們利用『後門』能夠避開，所以每個人都這麼做。」

阿姨端吃的進來，我去浴室洗手。六年半來，我第一次照鏡子，鏡子裏的人有張蒼白的臉、消瘦的雙頰、枯乾的灰髮、眼睛由於需要隨時警戒而過度明亮。我以前不是這樣的啊！但我安慰自己，六年半是一段很長的時間，不管怎樣人總會老的，我再看我自己一眼，我希望我的臉頰能快點變圓，我的眼睛能重新冷靜的估量這個世界而不再焦慮不安。

何安與母親已坐在餐桌前，阿姨準備了豐富的晚餐，有雞湯、豬肉片和甘藍菜，飯很香軟。我已很久沒看到這樣的飯菜了，但却沒有胃口，而牙牀也痛得無法咀嚼，我喝了點湯，吞了幾口飯。

「我要在看婦科醫生以前先看牙醫。」我說。

「我帶你去看表姊，她是六號人民醫院的牙醫。」何安建議。

「最好先跟她聯絡一下。」何安的母親提醒女兒。

「好，明天早上我去找她，然後再把她的安排告訴你。」何安對我說。

當何安和她的母親離開後，我幫阿姨把盤子收到樓下的廚房。然後我去看阿姨睡覺的小臥房，那裡只有一張單人牀和她的東西，沒有其他家具，窗戶也沒有窗帘，顯然的何安沒有足夠的錢來佈置兩個房間。我從自己的房間裡拿了一張椅子放在阿姨的牀邊。

我叫廚房裡的阿姨燒點熱水給我擦洗身體。我注意到浴室有些斑點，但沒有東西可以刷洗，而且，晚上很冷，洗澡時整個浴室都還是冰涼的。

洗澡在上海實在是件大事，爲了要有足夠的熱水，阿姨必須燒好幾次水，先裝滿那些熱水瓶，然後再燒一大壺，我在等熱水的當兒，發現何安在書桌裏放了一些紙和信封，我寫了一張紙條給梅萍的朋友（也是同學）——一位攝影場演員。我想他是我弄清楚梅萍死因的最佳線索，我請他儘快來找我。

我聽到阿姨從後邊樓梯上下來。她提著一大壺開水，步履蹣跚，我趕緊拿了拘留所帶回的搪瓷盆，叫她把水壺放在盆裡免得濺到手，然後我們各提一邊把熱水提到浴室。

由於沒有警衞催我，我徹底洗了個澡，用完了大水壺和何安買的六個熱水瓶的水，走出浴室，我站在陽台上望著閃爍在微弱街燈下的街道，我認清楚了自己位置。

這棟被指定的房子座落在住宅區，一排雙併式房子的末端，這裏每棟房子均是劃一的格式而且需要油漆，對面一排相彷的房子與我的花園籬笆隔著六呎寬的水泥路。從陽台上，我可以看到隔鄰的花園，竹竿上晾著衣物。這些房子一度是上海中產階級者的家，但從一九四九年至今，這個城市的人口已超過兩倍，而政府蓋的房子屈指可數，這是毛澤東的政策，現在幾個家庭必需擠在一幢房子，共用廚房、浴室和走廊。我一輩子從沒住過這樣的大雜院，

我想是否有什麼辦法可以回到自己的房子。

一整天的折磨，我已身心交瘁，但當我關上房門躺在床上時卻輾轉不能成眠，何安和她母親在時我壓抑了自己的情感，現在，我終於一個人了，沒有衞兵的監視，阿姨也睡了，那份沈重得我負担不起的感情在我胸口終獲爆發，是多年來第一次眞正屬於我個人的時刻，我任由悲傷的淚水流盡心底的悲哀。

第二天早上，兩個攝影場的人來找我，他們告訴我，他們是上海影片攝影場文革委員會的會員，被派來通知我女兒的死訊——她於一九六七年六月自殺。

「公安局告訴我們，你因為健康情形不佳被釋放。我們知道你可能很快要入院，所以決定直接來通知關於你女兒的死，這樣她的案子也可告一段落。」其中一個人說。

整個會面過程，他一個人發言，另外那個人只靜靜的坐在一邊，我對自己的被釋放是因爲健康情形而感驚訝。無論如何，那並不是我能與他們爭論的，所以我只說：「我想瞭解我女兒死的情況。」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六日早晨，她從南京路的上海體育協會大樓九樓跳窗自殺。」

「她爲什麼會到上海體育協會大樓？」

「她被革命派帶到那裡偵訊。」

「她爲什麼被偵訊？」我問他。

「那並不重要。」他說，把我的問題推到一邊。

「當然重要。這跟她的死有關。」我堅決的說。

「不，那跟她的死無關。她是自殺的，是她自己要死的。」那個人用無情的語調說。「不管怎樣，一九六八年我們才被派到上海攝影場和『工人宣傳隊』一起工作，那時你女兒早已經死了。」

「在你們去那裡工作前後，攝影場有沒有調查她的死因？」我問。雖然我對那個人的官僚作風感到憤怒，但我仍保持冷靜與禮貌。

「怎麼調查？」他很不耐煩的回答。「自殺的人那麼多，我們又不是沒事幹，反正，根據我們偉大毛主席的說法，自殺是企圖逃避再教育與改造，這是反社會主義的罪行。那些自殺的人是眞正的反革命派，雖然我們沒有在他們死後這樣稱呼他們。」

「你敢確定我女兒是自殺的嗎？」

「我們接管攝影場的時候，她的名字就在自殺名單上。你女兒的骨灰放在火葬場，如果你要去拿，得先去攝影場拿一封當局的公函。」

「法律上不是說在屍體火葬前，驗屍員必須檢查嗎？」我很不高興，但是我必須保持冷靜，追問到底。「我希望看看驗屍報告。」

「你難道不知道你女兒自殺時到處正在動亂？那兒有什麼法律和秩序。」這人有點火了：「那時候自殺案件一天就有好幾百件。」

「你的意思是說她火葬前沒有驗屍？」

「我們不知道有沒有，事實上，我們對她的死不太清楚，只知道她是自殺的。」

「我要正式請求上海攝影場革命委員會調查我女兒的死因。」我對他們兩個說。

他們靜靜的凝視著我，然後離開，另一個人從他袋子裡拿出一個信封和幾本硬紙板封面的筆記本，我認出那些是梅萍的，他放在桌上。

那個發言人說：「信封裏的錢是攝影場給死亡工作人員家屬的，這些筆記是你女兒日記的一部分，『革命委員會』要我們交還給你。」

我站在那兒看著他們走出門口，他回頭看著我說：「你女兒的同事們都說她是個好人，我們很遺憾，不幸的家庭背景使她對無產階級的文化大革命的態度不正確。」

阿姨跟著那兩個人下樓，把前面大門鎖起來。

我站在那兒望著梅萍的日記，却不敢去碰。經過好一段長時間，我才從本子裡得到眞正的慰藉，但是，傷口仍刺痛了我，那種落寞感令人受不了。我還是不敢翻閱，滿心想著那個攝影場的人告訴我的話，他說得不多，但對梅萍的死多少知道了一些。我更發下定決心要謹愼的進行調查，我相信我總有一天會弄個水落石出。我取出給孔的信，叫阿姨帶到郵局。

阿姨下樓關好前門後，我想該裝個彈簧鎖在籬笆的門上，還有屋子的大門也要一副，好像有很多事情要做：牆壁需要粉刷，花園的碎石堆要搬走，還要再買些家具。我不知道是否能把房子弄回來，政府可能說一個人住太大了。如果我必須住在這裡一段時間，我想，我必須在樓下走廊的盡頭設第二個浴室，建一個我專用的廚房，那將可以阻止後來住樓下的人上來用浴室，也省得阿姨從後面樓梯上上下下帶來飯菜和水。爲了確保我的隱私和避免接觸樓下的人，我還打算在後面樓梯做一道門，建一堵牆把前面走廊隔開，做這些工程需要材料和人工，而且又得花一筆錢，我如何去籌措這一切？

當我走到樓梯口要轉進房間時，從走廊的窗口看見好幾個住在後排房子的鄰居正靠在窗台上注視我，晚上，只要燈開著，不管什麼時候踏出房門，我就像一條金魚缸裡的金魚。事實上，有一扇窗戶正對著我房間門口，如果門開著，那些靠在窗口的人便可以直接看進我的房間裡面，我決定立刻爲這些窗戶做窗帘，那是一筆必需的開銷。

我聽到有人敲前面大門，這時阿姨還沒有回來，我跑到陽台向下望，一個穿得像工人的男人很大聲的在下面說：「我是住宅局植樹部的，來告訴你關於花園種樹的事。」

我下樓開門。

「你是新房客嗎？」他問我。

「是的。」

他在花園繞了一圈，踢著碎石塊。「你得先清理一下這些垃圾我才能種樹。有那些東西在，樹怎麼活得了？」

「那是住宅局的工作，我爲什麼要負責那些碎石堆。我來之前就有了。」我告訴他。「而且，我也沒力氣把那些都弄出去。」

「前天那個年輕女人是誰？是不是你女兒？」

「不是，她不住這兒。我女兒已經死了。」

唉！「我女兒已經死了。」我不得不承認，只要我活著一天，每當說到這幾個字時，我的心便要劇痛一陣，眼前也會浮現我那漂亮的女兒全身血泊的躺在南京路上。

雖然我力圖冷靜，但眼淚仍然不聽話的奪眶而出。我掏出手帕，轉開臉去拭淚，我覺得

難爲情，我竟然在一個陌生人面前崩潰。

那個人也避開不看我。他低著頭，靜靜的說：「我會向上級報告，看能不能找幾個年輕人把碎石塊搬走。」然後，轉身就走。

下午，何安告訴我，她已經安排好她的牙醫表姊明早在六號人民醫院替我做檢查。

「這就是『後門』，我們不必天一亮去排隊掛號。我已經把你的姓名資料給了她。她會替你塡卡、付掛號費二角。到診所時，她會把你的卡片放在最上面，就像是你在門診窗口第一個掛號，然後你馬上就可以看病。」何安告訴我。

「眞的合法嗎？我不願給你表姊添麻煩。」我很耽心說。

「不會，她不會有麻煩的。每個人都這麼做，每個醫生都有一些走『後門』的病人，黨員和高幹也帶他們的親戚朋友走『後門』。」

我在拘留所這些年中國似乎變了，而這個改變並不是文化大革命所要領導的方向。第二天早上，我跟何安去看她的牙醫表姊，一切正如何安所說的，雖然候診室擠滿了人，而且還有些病人沒位子坐，但我們却立刻被帶進何安表姊的診療室。在這同時，其他「後門」病人也被其所屬牙醫唱名進入診療室，而最令人驚訝的是竟然沒有人抗議，其他的人只是坐在那兒看著我們，似乎心甘情願的讓我們走在他們前面，雖然他們已經等了很久，而我們剛到。

我問何安他們爲什麼心甘情願接受不平等待遇？何安說：「他們在這裏沒有門路，但他們在其他的地方有的是『後門』，當我們必須等的時候，他們可能正享受優先權哩！」

「那沒『後門』可走的怎麼辦？」

「他們必須去找。只要你有親戚朋友，你就會有『後門』的。」她告訴我。

第一次接觸『後門』系統後不久，我也變成走後門的專家。我用免費教英文換取好處，美中建交及英文科技資料的輸入使得英文教師炙手可熱，野心勃勃的青年男女希望找到政府機關或外交人員的翻譯工作，計畫移民的人們也想學英文，所以我的住處常擠滿了上課的人。

當北京決定開放所有凍結的外滙存戶，來鼓勵海外的中國人滙款回來給早已枯竭的親人時，我重新獲得一大筆以前帶進大陸的錢，並經由只能用外滙交易的海外中國商店，來買不足的物品。在以前，我常買煤取暖，買木料修補房子，因爲當時只准使用百分之二十以內的外滙買東西，所以剩下的錢存了好多年，運用這筆失而復得的錢，我沒有什麼顧忌，我可以用物質來報答那些爲我打開『後門』的人。

所有的事陸陸續續發生了，當何安帶我經過候診室的人群進診療室，我覺得自己不太光明正大，不自在極了。

何安的表姊檢查過我的牙齒後告訴我牙牀嚴重感染，因爲拖延太久無法一般的治療，她說：「你的牙齒最好全部拔掉。」

她看了看我衰弱的身子補充說道：「你不夠強壯不能每天拔牙，兩天來一次好了，同時，我給你一份證明讓你可以買奶粉。如果可能，每天吃它幾個蛋。等身體好些，我再爲你拔牙。」

我們走出醫院，何安我去店裡買了個急需要用的鐘。商店外面，有個老頭坐在矮凳上，

前面有個秤，花三分錢，路人可站到磨損的秤上量體重。我秤了一下，發現只有八十五磅重，比以前正常的體重足足少了三十磅。自從這次之後，我定期來老頭的秤上量體重，直到我離開中國大陸。

當健康好轉時，牙醫每天為我拔一顆或兩顆。全部拔完，她告訴我裝假牙以前，必須等牙牀治療好後才能裝上假牙。我非常失望，因為不止說話不清楚，而且只能流質食物。每當我照鏡子時，我對自己的樣十分沮喪，所以連在家裏也戴上口罩。

何安對我說，既然我現在健康好轉，可以自己在城裡走動，她要回貴陽跟她的丈夫孩子相聚。我感謝她為我做的一切，依依不捨的目送著她離去。

一個禮拜天早上，孔來看我，我們坐在陽台上享受溫暖的陽光，他說他雖然不能確定梅萍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但他懷疑官方對自殺的說辭。

「我早在十幾歲就認識梅萍，我知道她不是那種會自殺的人；此外，她去體育館幹什麼？還有，是誰帶她去的？反正不是我們攝影場的革命派，他們已經在攝影場質詢過她。」

「你認為她會被帶到那兒去，是因為幾年前她參加過女子划船隊嗎？」我問他。

「不會吧，上海體育協會曾經解散過，體育館被上海民兵的一個次級組織接管。我聽說有個秘密法庭設立在那兒。那個地方好像不太正當。」孔說。

他從椅子上站起來走向通阿姨房間的門口，確定她聽不到我們，我又回到座位上。

「你是說那邊有刑房和那一類的東西嗎？」我焦急的問。

他沈默了一段時間，但在我問他同樣的問題後，他說：「梅萍並不是唯一被帶到那裡離

奇死亡的人。」

現在我腦海裡的梅萍不僅是躺在血泊中，而且嬌弱的身體還被拷打成殘廢，這副影像刺痛得令我發抖。

「對於她的死，所有的朋友都很難過。」孔說：「有一天我們一定要弄個水落石出。目前，什麼都不能做，政治情勢仍然不穩定。」

「現在，北京不是周總理在主持嗎？」我問他。

「自從林彪死後，周總理的地位更穩了，但是江青和她的黨羽仍在作祟，除非掌握了大權，否則，林彪事件爆發之後，他們必須採取低姿態，因爲文革早期他們跟他交往密切，此外，周總理病得嚴重，北京來訪問攝影場的人說他得了癌症。」

「眞糟糕！」我說。

「前任黨總書記鄧小平已經復職，他將成爲周總理的助手。周總理屬意他接替職位，但江青和她的黨羽決定由他們中的一位來繼任周總理的職位。」

「毛主席呢？難道他不說話？」

「就算說了也不算數，他病得很重，而且聽說江青存心隔離他和其他幹部，避免讓他們直接接觸。這是個動盪不安的時刻，我是個演員，但却一直浪費時間參加政治教育課程，或在人民公社工作，我根本沒有機會演戲。」

「文化大革命有許多情勢我仍然不瞭解。幾天前，何安給我看一些紅衛兵的刊物，我發覺很有趣。你有沒有？」我問他。

「放在家裡，你可能有興趣。因爲它們沒經過檢查，裏面寫了很多關於黨領導權的權力鬥爭。雖然紅衞兵刋物的目的主要是打倒『走資派』，但是却揭發了整個黨的領導權，這些事在人們口中比書上的還糟！不管怎樣，那些紅衞兵刋物的大部份內容都是跨張式的革命，我挑一些最有趣的給你。」

孔告辭。我陪他走到樓梯，天花板掉下一片油漆。

「爲什麼何安沒有把這裡重新粉刷過呢？」他問我。

「錢不夠。他們只撥給她五千塊。」

「你應該寫請願書多要一點。現在是好機會，所有的事都比較寬容，再幾個月情勢可能又要緊張起來了。」

「我看，那些保管我的錢的高幹會利用這個機會整我吧！」我問。「算了，我寧願跟我的弟弟借錢也不要跟他們接觸。」

「下個禮拜六我帶幾個朋友來粉刷牆壁。」孔提議。

「不好吧！太麻煩你們了！」

「我們都是梅萍的朋友，幫助你是我們的責任。」

「我眞不知該怎麼謝你及其他人。我甚至不認識他們啊！」

「也許有一天你會有機會爲他們做點事的。至於我，多年來我一直在你家受到你的照顧，現在我爲你做點事也是應該的。」

花了十五元買油漆，孔和兩個攝影場的年輕人花了一整天粉刷了兩個房間、陽台和走廊

。他們用攝影場現成的梯子和工具，他們告訴我，組織成員爲私人用途使用組織的工具司空見慣了，只要使用後放回原處就可以，孔也帶給我一堆舊的紅衞兵刋物。

何安的母親爲我找了一位婦科吳大夫，她同意替我檢查。吳大夫畢業於前北京聯合醫學院，繼承了我以前的家庭醫生郭進的職位。

「吳大夫是我一位朋友女兒的朋友。每週四，她專看年輕醫生們無法處理的病患。她下週四看你，爲了避免經過門診部的年輕醫生，我朋友的女兒請一天假陪你去醫院，介紹你給吳大夫認識。」

「這樣不好意思，讓你朋友的女兒請一天假，爲的只是帶我去見吳大夫。我可以自己去嗎？」

「她想要認識你。因爲我告訴她你曾在英國大學就讀，她非常熱心，她希望等你健康情形好一點時敎她英文。」

我知道我正一步步捲入「後門」的大網中。但不這樣做我又能怎樣？如果我經由正常程序，不但天亮就得大排長龍，也不能碰到吳大夫一樣有經驗的醫生。

星期四，我去看病，吳大夫說我沒得癌症，而是「急性賀爾蒙分泌失調」，可能是長期壓力和不正常的生活情況所引起的。她婉轉的提到我的監禁。她建議我切除子宮，因爲如果醫院的工作被政治發展干擾，那麼我需要的長期治療可能會中斷。我發現她和孔一樣，預期有更多的政治鬬爭，而現在的平靜氣氛只是暫時的停息而已。

一週後，我成功的動了手術。住院三週，我和另外二十五個女人同住在一個擁擠的病房。

這些人有些得了癌症，她們枯殘的身體和呻吟的聲音，就像我在拘留所中看到的、聽到的一樣悲慘，事實上，當我因麻醉劑消退醒來時，有一段時間我以爲自己又回到監獄醫院。

當我住院時，中國銀行通知所有外滙存戶解凍，再度擁有金錢的償付能力給我一種美妙的獨立感。我寄給何安和她丈夫一份遲到的結婚禮物，並邀請他們新年時帶小孩來上海玩。

出院後，我又去看牙醫，並且裝上假牙。它們一裝進嘴裡，我就覺得不舒服，我常有一種把假牙扯出來的衝動，因爲那兩排巨大的假牙塞在嘴裡快讓我窒息了。牙醫告訴我，晚上可以把它們拿下來，但是長痛不如短痛，我決定一天戴二十四小時，這樣，我才能很快適應它們。晚上，當我難受得睡不著時，我吃安眠藥。

現在有足夠的錢了，我在後面樓梯口裝了一道門，把浴室的設備移到樓下，將原來的浴室用來作餐室；而原來浴室的地方就在走廊盡頭，我還安裝了污水糟和瓦斯爐，這個工作由當地住宅局的三個工人承包，花了我一筆錢。因爲孔和他朋友的幫忙，我才能夠買到水糟、後門的木材、移走浴室後鋪的瓷磚。反正，所有的事都靠走「後門」。

這些工人長期受僱於住宅局，替我做事並沒有額外收入。這種情況下，工人的態度通常是敷衍了事，他們偸懶，做事馬虎，給他們錢是違法的，我必須用中國人所謂的「招待」來鼓勵他們把工作盡速完成，這包括一條高級烟、豐富的菜餚以及啤酒。孔、阿姨和他們的朋友到不同的商店排除或者走「後門」幫我準備一切。完工時，我各給了三個年輕人一份禮物，並告訴他們我要建一堵牆把客廳隔開，但是弄不到磚，當時他們不知道有什麼「後門」可以弄到磚塊，但答應如果我弄到磚塊，一有空就會幫我砌牆。

一天下午，當我正爲阿姨的房間縫製窗帘時，有三名社區委員會的女人來拜訪我。

「我們是本地的社區委員會。我叫陸英，負責管理你。」其中一個女人自我介紹。然後她指著一個胖胖的女人說：「這是我們的黨委書記。」

第三個女人說：「我是她的代理人。」

我站起來歡迎她們，請她們坐下，阿姨端來茶水招待。

每個地方的社區委員會都是公安局的『觸角』，在公安局的監督下，社區委員會的人員直接和人民接觸再向公安局報告，這組織負責居民每週的政治教育、經營托兒所、分發配給的票券、分配生育限額、調停鄰居之間的糾紛。在某些情況下，社區委員會的人甚至幫助警察解決犯罪問題和逮捕犯人，因爲他們對管區內人民生活有相當的認識。

大部份社區委員會的工作者是拿退休金的退休人員，他們目前的工作是沒有酬勞的，只有在特別情況，或退休金太少時，才有額外津貼。這些婦女（和一些男人）以擁有管理人民的大權爲樂，他們對個人做成的報告，以機密文件處理而且在公安局內存檔。事實上，社區委員會系統使得警察能夠在幕後密切監督所有人民。

當我們坐下時，黨委書記咧嘴笑著對我說：「聽說你最近搬來我們管區，所以我們來看你，還要請你參加我們星期二、星期五下午的研讀會。」

「謝謝你們走這一趟。我應該早就去向你們報到，但我忙著看病和安排新環境。」我很禮貌的說。

「你得了什麼病？是不是……」黨委書記猶豫了一陣。

「沒什麼大不了的。手術很成功。」我說。

「你不是得了癌症嗎？」副黨委書記看來較冒失。

「不！沒那麼嚴重。」我很快的說，我知道她們一定從拘留所有關的人，也許是警察，知道了我患癌症的消息。

她們交換眼色，似乎很驚訝，但很快的她們又恢復鎮定：

「你能不能加入我們的研讀會？一週兩個下午？」陸英問。

「我很願意，但是我能不能先休息幾個月，讓我剛開刀的身體復元？醫生堅持我每天下午得休息，直到我完全復元。」

黨委書記站起來走到陽台。她大叫：「好寬敞的陽台！」她進去浴室又驚叫：「你一個人用的浴室！」甚至還打開餐具櫥看裡面，大叫：「好大的櫥子！」然後坐下來對我說，「一個人兩個大房間，你有特別待遇，你知道嗎？」她一本正經的看著我。

「普通人不可能有那麼大的地方。」她的代理人補充道。

她不能強迫我去參加研讀會，因爲這是自願的，但她不太高興我要求休息幾個月。當要一個人順從時，她們就會製造一些讓人自覺忘恩負義的罪惡感，這是黨員的一貫技倆。

「我很感激政府爲我所做的一切。請二位向有關當局傳達我的謝意。」我說。

黨委書記和她的代理人都點頭贊同，很滿意我這句話。

「當然，我希望有一天能住自己的房子。你們知道政府有關於私有房屋的政策嗎？」我想我也可以藉此提醒她們，既然政府使用我的房子，比別人多給我一點地方也不足爲過。

笑容突然從她臉上消失。她生硬的說：「不太清楚。」

陸英說：「你必須趕快復元，來參加我們的研讀活動，以改進你的社會主義意識。我們都要研讀馬克斯、列寧和毛主席的訓示，資產階級比其他人更需要。我住在附近，離你只隔三戶。我會帶來拜訪，看你有沒有進展。」

「很好。」我有禮貌的回答。

「我有一個房間，和我兒子、女兒共用。同一棟房子還住了另外三家。」陸英顯然要藉著這句話說明政府對我的特殊待遇。從她講話的口氣和表情，我可以推斷她很嫉妬我有那麼大的地方。由於她是社區主管，我必須和她相處融洽，免得她找我麻煩。

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社會，是根據黨給每個人的待遇來分級的。文革之前，我從未與「群衆」接觸，老趙代表我們家處理所有的事，並與社區委員會打交道。上海黨書記處的聯合前鋒組織，對我畢恭畢敬。他們禮遇我這種身分的人，是爲使外界對人民政府留下印象，因爲我們常有國外來的訪客。但文化大革命改變了一切，現在我成爲群衆的一份子，從一號拘留所被釋放，到我離開上海這段時間，我深深瞭解一般中國人民的生活與問題。

在她們起身的同時，但黨委書記說：「你得讀毛主席的書。它會幫助你對最近的經驗，採取正確的態度。」

我沒答腔，我又能說什麼呢？要我說我喜歡拘留所嗎？她會相信？她似乎在期待我的回答。當我繼續保持沉默時，，副黨委書記看著陸英。陸英說：「哦，對了，我帶了你的配給票，有棉布、毛線、縫紉線、棉被的補給。前幾天我已經把油、肉、豆腐配給票給阿姨了。」

我謝謝她們，禮貌上我應該送她們到大門口，但她們堅持我留在房間而叫阿姨跟她們下去關門。我知道她們私下有話要跟阿姨講，所以也不再堅持。

我把茶杯端到廚房，然後回去縫窗帘。

阿姨回來問我，「你是不是已經拿走茶杯了？」

「嗯，但我恐怕沒去洗。我很想趕快把窗帘做好，你晚上就可以用。」我告訴她。

阿姨嘆口氣，說：「你一點都不像她們說的！」

我不知道她指誰，但我猜可能是公安局的人或是社區委員會的人。我想，最好的辦法是笑一笑，什麼都不說。

「你眞是個好人。那天你剛出獄，病得那麼嚴重，還幫我提熱水。當你看到我沒椅子就給我一張。你花很多錢把廚房搬到樓上，省得我上下樓梯。你取回外滙存款後，又給我加薪。現在你又做窗帘給我，你眞好心。」

「謝謝你，阿姨。我只是做我該做的。」

「我不會讓你失望，你是個高尙的人。對了！你對文革的看法怎樣？」她問。

我知道這是社區委員會要她問的，可能公安局也要她們報告我的態度。

「就我個人來說，文革是一場災難，我被關，我女兒死了。但從整個國家來看，這當然比較重要，也許它是對的也是必須的。」我知道這些話正是社區委員會的女人喜歡聽。

「你對極了！你眞前進！爲什麼剛才不告訴黨委書記？她們會認爲你思想正確。」

「她們沒問我對文革的看法呀！」我說。

「明天早上，我到菜市場遇到她，告訴她你說的話。」

阿姨是個沒腦筋的女人，她常不小心洩露了她向黨委書記報告我的一切。雖然我已出獄但仍被監視中，大概只要我住在上海，我就不得不隨時提防、警戒。

那晚我獨自在房間裡靜坐，『離開中國大陸』的想法油然而生。脫離政治的壓力與解脫不時的警戒，才是眞正的解放，女兒死了，再也沒有理由把我留在上海，即使那時候離開中國大陸的想法很荒謬，也不太可能，但是我仍必須堅持這個想法而且努力達成。

似乎是上帝引領我放遠頹喪的眼光，祂讓我在一望無際的地平綫上看到了一線曙光。

第十四章　追查眞相

好幾次在惡夢中，我看到女兒遭到毒打與酷刑，被殺死在一間血水四濺的房裏，這景象讓我透不過氣來。當我躺在黑暗中以幻覺追憶更多可怕的情景時，整顆心忐忑不安。我決定該到南京路走一趟，看看上海體育館，我相信我的體力足可支撐我到梅萍死的地方看個清楚，且如果可能的話，我還要問些事情，反正，我必須走這痛苦的一趟。我不能把我的計畫告訴阿姨，因爲她可能會跟當地社區委員會的婦女說。我能做的是以搭巴士到南京路的時間代替平日散步所花的時間，因此我逐漸延長散步的時間直到我離開公寓每次花兩小時。

「這些日子你能走了好長的路噢！你身體一定好些了，你的兩頰開始有血色啦，來，坐下！我泡杯茶給你。」阿姨對我說。

當我每天的長途步行已成例行活動後，阿姨便不再對我離家時間的長短提出異議。我想，時機已成熟，我可以實行計畫。

南京路是上海最主要的道路，横穿市區，自鬧區延長到西邊郊區，在一九四九年五月，共軍佔據該市前，上海體育館是基督教青年會的總部。它位於南京路中央地帶，面對人民公園（以前的賽馬場），從我住處算起約有半小時的車程，在上海，巴士都擠滿人，我無法往

裏挪一點，只好擠在門邊，和人群靠在一起。好幾次，我旁邊的女人重重的壓到我胸口，我想她一定能感覺到我的心跳加速，我很緊張，害怕可能發現什麼。我的理智告訴我我必須走，却有個不清楚的小東西希望我趕緊回頭。巴士抵達我的『目的地』，一時不知何去何從了，我被人群順勢推下車，發現自己就站在人行道上。

隨著人潮往前走，我望著對街人群聚集的大樓，體育館隔壁是公園、旅館和大劇院，這些都建於三十年代，但至今仍是上海人讚賞的目標。秋風中飄揚著文革標語：「政治在控制之中」、「不忘階級鬥爭」……。在屋頂上，似乎鼓動人民「革命到底」。對周圍的人而言，朝上望的我像是來自外地的旅客，正崇仰上海市的奇蹟，沒有人特別注意我。當步伐蹣跚，找尋體育館的窗子時，一波波的人潮將我粗魯的向前推。

在人民公園的大門外，男男女女與小孩子正排隊買票入內，有的人則東張西望，等待他們的朋友或家人。我停在其中，不停舉眸望著對街的大樓，我已數到第八層，但看不到第九層，祇瞄見斜傾的屋頂。爲避免別人投以注意的眼光，我來回走動，宛如不耐煩的等候人。然後，我又朝上看，只是怎麼也找不到梅萍『自殺』的第九層樓的窗戶，當我思索著這項發現時，我不由自主的走過人民公園。就在我轉身回走時，我看見第九層樓和窗戶是在體育館的另一邊，這些窗子並非面向南京路，而是在一條有兩層矮公寓的小巷之上，那些窗子既窄又小，還被垂直的鐵條圍著。這些鐵條間的空隙是否足夠讓一個人穿過，是我無法在街道上看得出來的。

我的發現大異於別人告訴我的。我需要時間仔細想想，因此買了一張票進入公園，選了

一個角落坐下，從那兒我可看到對街大樓的頂樓，凝視著這些圍有鐵條的窄窗，我懷疑女兒的眞正死因，也確信還有些我不知道的事實。太陽溫柔極了，一陣微風吹過秋葉空隙發出沙沙聲。我可以聽見車聲、人聲，但獨自處於痛苦中，猶如一個人被孤立在荒島上。

我該跨過街，敲敲體育館的大門，試圖問些什麼嗎？我重複的如此自問而遲疑不定。一個小女孩踩著輛小三輪車在人行道上的角落來回兜著圈子，她母親尾隨在後，當脚踏車速度加快時，那母親喊道：「慢點！小心！」小孩踩著更快，她得意的回頭瞧母親，她的黑眼眸出現淘氣的亮光，這對母女從我面前經過，消失在一叢灌木後。

當離開公園，走向車站時，我的眼睛盡是梅萍的身影；街上每個年輕女人和小女孩都像是我女兒，我內心此刻的痛苦，遠比獄中任何孤獨無助的時刻更來得錐心。在車站，人群聚集，一班車過站不停。我跨過街去，隔著體育館有條小巷，在入口處一個年輕女人正坐在矮櫈上織毛線。

「你住這兒嗎？」我問她。

她點頭，手上的活兒並沒停下來，一些人從人行道上走過，但沒入朝我這方向看，我想這些房屋是違建，它們佔了這巷子一半的空間。

「你要找人嗎？」那女人擡起頭來問。

「我來自北京，」我撒謊道：「聽說在一九六七年有個年輕的上海影片攝影場的女演員從這棟大樓跳下自殺，你可知道這件事？」我指著她身後的體育館。

她擡起頭看，搖搖頭道：「不是一九六七年。那是在文革開始後一年，不是嗎？那時這

棟樓正在翻修，它周圍都是鷹架。我記得這件事，因爲我們在文革開始後不久就搬來這兒了。那些工人把這巷子弄得一團糟，沒完工就不管了。」

「那大概是我搞錯了，」我說完後轉身離去。我終於得到一個重要的線索，很顯然的，我女兒不可能像別人所告訴我的那樣「自殺」。

我必定是在南京路上走錯了方向，因爲不久後，我發現自己愈走愈不對。一輛巴士開來，我上了車，經過一小段坎坷不平的路後，我重回到住家那條街道。當我打開前門，看見兩輛脚踏車停在庭院，樓下的房間有聲音。

阿姨在走廊上告訴我，樓下房間有部分分配給一戶朱姓人家，她告訴我有關朱家的事，但我無心聽，因爲我腦子裏已裝滿在南京路的發現。

我女兒的死仍是個謎，沒有進一步的發展，但毫無疑問的，她是被革命派整死的！假使她是遭謀殺而非自殺，謀殺罪是唯一死刑，我要揪出兇手，親眼看著他受刑！在我腦海中，不再是梅萍躺在南京路上；然而，在我夢裏、我獨處的任何時刻，眼睛看到的是她慘白的臉和半死不活的軀體，耳朵聽見的是她的哭泣和呻吟聲，我向上帝發誓！我一定要報仇。

幾天後，朱家搬來了，正當我遲疑是否該下樓去歡迎他們，說些應酬話時，朱太太已經上樓來了：年紀與我相彷，染黑的頭髮上抹了油，還用一個玳瑁梳將它固定成一髮髻，嘴角叨著香煙，我請她進來坐，阿姨遞給她一杯茶和小碟子彈香煙。

「我女兒棄和女兒梅萍是同個學校的。」她非常友善的道：「她們是好朋友。」

「你女兒現在和你一起住上海嗎？」

「葉是我大女兒，她在北京的解放軍歌舞團工作，因爲我先生是資本主義者，紅衞兵劫掠房子時，我們被掃地出門，住進車房。你能想像一家七口擠在一個小房子裏的情形嗎？上個厠所，提個水都得走兩百碼遠，紅衞兵要我淸掃街道，我先生更好幾囘遭到鞭打與鬥爭。我們不過是個小資產階級家庭，沒什麼錢，我先生只不過解放時期有個製造面霜的小工廠而已。」她說時變得很激動，不停的吸着煙。

「旣然你女兒在解放軍裏，你們家人應該獲赦免的，你們不是『模範家庭』嗎？」我問她。「模範家庭」的頭銜是給每一個有兒女在軍隊裏的家庭，他們會得到「黨」所給的特別定量配糧與特權。

「紅衞兵才不管這些！但現在我們的身份總算恢復了，我們在這兒有配給的房間可住。」

「我希望你們住得愉快。」我有禮貌的表示。

她輕拍我的手說：「我不該老談我自己，你的情況比我們更糟，聽說你去過臨時拘留所！女兒也死了，我一聽說梅萍自殺，馬上寫信給北京的葉，我們都很難過。」

我不想和她談梅萍的事，此時抱怨我的遭遇是不智的，所以我沒答腔。

她微笑著，熄了手上的煙又點了另一根，深深的吸了一口，吐出煙後，她說：

「我來是和你討論電費的事，我認爲我們先該把每件事說淸楚，你同意嗎？以後才不會有誤會。我女婿是個電工，他注意到這屋子衹有一個電錶，旣然你和我們家合住，你同意我們平分電費嗎？」

我還沒來得及回答，阿姨大概在走廊上一直聽著我們的談話，這會兒她走進來：

「朱太太，你們有七口人家而我們才兩個，我們該分成九份，你們付七份，我們付兩份。」

「這是什麽話！雖然我們有七口人，但住的地方沒比你們大，費用該平分才對。」朱太太對阿姨感到厭煩。

「你們人多，燈也一定較多，對半分不公平。」阿姨辯論道。

我想了想，說道：「我們何不看看別家怎麽分擔？我去問陸英，她是我們這單位的領導，也跟別人家合住，我們問她好了。」

「問也是白問！你一個人住兩間房，也沒見少用電啊！」朱太太激動的說。

她將煙捺熄在小碟中，站了起來：「我去叫我先生來跟你們談！」她離開房子，喃喃自語走下樓去，根本不等我說是否願意見她先生。

我不明白她爲什麽這麽擔心電費，我住的幾個月裏，電費每月沒超過基本費。

我聽見樓梯上的脚步聲，一會兒，門被推開了，朱先生走進來，他是個穿著華麗、臉部肌肉鬆弛的男人，看樣子可能曾經相當肥胖。一下子，阿姨回屋裏來，保護似的站在我身旁。

「我太太告訴我你不想和我們平均分擔電費，是嗎？」他無禮的說着。

因爲他沒敲門就闖了進來，所以我坐在書桌前沒站起來迎接他。

「以後，你們任何人要進我房間，得先敲門！」我告訴他。

他臉色轉紅，看來很不自在：「你能談談有關付電費的事嗎？」他問道。

我堅決的說：「不想談這件事，下個月我會付一半費用，同時，我將居住在一公尺內，以後就不會再有爭執，我眞搞不懂你們爲什麼要小題大作？」

他坐在椅子上，衝口說出：「搞不懂？有關錢啊！紅衛兵充公我銀行的存款，我現在沒工作，每個月我和我太太祇有十二塊（那時折合約三英磅）過活，我一個兒子沒工作，另一個一個月祇賺四十塊，我們還得照顧孫子，他的父母都在東北，那兒的糧不夠，我們也要寄一點給他們。」

我站起來表示這面談已結束，說道：「好吧！基於你們的困境，我會付一半的電費。」朱先生扮個鬼臉，說道：「我不是來乞求憐憫的。」

目送朱先生傴僂的身子離開房間，我替朱家人感到難過，窮困眞是令人沮喪消沈。

隔天，我向住宅局申請購買電錶，但那兒的職員對我的申請函置之不理，每次我到那兒詢問，總是說我的申請正在考慮中。

有一天，我碰見一位曾幫我遷移浴室的工人，他說：「你得不到許可的，走『後門』才是你拿到電錶的最佳途徑。」

幾天後，我正準備外出，朱太太的那位電工女婿向我搭訕，他似乎在花園裏等候我好久了，他提供我走後門的路子和官方的價錢，我們最後以雙倍於官方比例的價格成交。

「這是你從工作的倉庫拿來給我的電錶吧？」我相信他一定是從組織裏偸來的。中國共產黨的國有企業中，在黨書記疏於看守屬於政府的公有財產之時，順手牽羊是常事，因爲可

憐的工人們覺得這樣能補償他們的低廉工資。這種現象已經是公開的秘密了，工人們當它是笑話，稱為「共產主義」，也就是「共享財產」。

「你何必在乎它從那兒來的？你想買個電錶，不是嗎？」這年輕人無禮的說。

我猶豫了，懷疑是否該買一個偷來的東西。

「我會替你打點好。」他說道。

「你打算要我用多少錢雇你做這工作？」我問他。

「我很想免費為你做，因為你對我們全家這麼好，但是，政府給我的工資太低，我需要一點外快，六塊會不會太多了？」他問我。

我望著面前這個令人厭惡的傢伙，雖然營養不足、穿著破舊，但他看起來很聰明，我瞭解，他和我們每個人一樣，都是這種制度下的犧牲者，在不同的環境下，利用機會賺錢謀生，他必定是個有自尊心的年輕人。避開他貪求的眼光，我說：「就六元吧。」

阿姨因這整個事件而對朱家人不滿，也對我的「懦弱」感到生氣。她預測日後朱家會佔我便宜，利用我，她告訴我說：「你不知道他們這種人……」

朱太太的孫子是個六歲大的活潑男孩，等著進小學唸書。他被寵壞了，沒有一點規矩，一天樓上好幾回，尤其愛我不在時，溜進我房裏，打開我的抽屜，拿他想要的任何東西，有時候，我從外頭散步回來，會發現他正拿著我的紙筆在我書桌上亂畫。有些時候，他帶著球進房裏，在我乾淨的牆上投來投去，更經常跑進跑出以消耗他過多的體力。當阿姨做飯時，他還會偷吃那些菜。假如阿姨有些零錢擺在桌上，祇要那孩子來過一趟，那些錢必然不翼而

飛。我對朱太太說了好幾次，但她總是說：「我會告訴他別上樓去，我也管不了他，事情一大堆要做啊！」

一天早上，我打開門，聽見有人在樓梯打呵欠，低頭看，朱太太那個沒工作的兒子剛起床。夜裏，當我睡着後，朱家佔用走廊，將它變成臨時臥室，床靠在他們那一頭的牆邊，而靠我這一頭擺了一張小桌和椅子，祇留給我不到一呎寬的走道。事實上，他們藉著擺下許多袋子在樓梯的下幾階，擺明了這些地方屬於他們。我叫阿姨來瞧瞧這件事，她馬上想下樓去和朱太太吵一架，但被我制止了。

早餐後，我到住宅局的辦公室。

「我住太原路一號。」我告訴坐在辦公桌後的那個人。

「我知道你是誰，我認識你。」他說。

「很抱歉來打擾你，有個問題想請教你，可以告訴我一些有關住宅局處分配給我房子的空間利用範圍嗎？」

「你可以使用樓上的房間。」他答道。

「那麼，樓下的通道呢？」

「通道和花園各是一半的，你的租約包括半個花園和半個通廊。」

我謝過他便返家。朱太太正站在斜草坪上晾衣服，我對她說：「我注意到你兒子晚上是睡在通道上。」

「是啊！裏面沒地方睡。」她漫不經心的答道，繼續晾她的衣服。

「我剛去過住宅局，局裏的人說通道一半是屬你用，另一半則是我的，可否請你轉告令公子，把他的東西都移到你們那一頭，別堵住了樓梯間？」

「他可留了空間讓你進出，你又不胖，想要多大空間進出？」她一副不高興的樣子。

「我需要多少空間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有多少空間屬於我。請告訴他把東西從我這一頭移走！」我堅決的說完後進房裏去。

「我們有七個人，我女兒要來看我們，我們裏頭擺不下另一張床。」朱太太說。

阿姨站在陽台上聽我們對話，我進房內，她小聲說道：「我們來築道牆，要不然沒別的法子能阻止他們超到你這部份來。」

「可是我找不到地方買磚塊。」我說。

「給我幾天時間，讓我回蘇州老家，看看能不能找到賣舊磚塊的人。」

「當然可以，你隨時可以回家看看。」我很高興阿姨回家幾天，（雖然她每星期休息一天，但很少到別地方去。）

阿姨回家後的那天早晨，我拿了她的菜籃，起個大早到市場去，那時才五點鐘，天還黑著，通往市場的街道上已經熙熙攘攘塞滿了匆忙的人群。

由於阿姨和我已經吃完了配給的豬肉和蛋（它們少得可憐），我希望買到一隻不是配給的雞來熬些湯。另外，還得買些蔬菜，並且在配給票期限內買下每月配給的豆腐。因爲雞比菜類稀少，所以我先到賣雞的攤子排長龍，除了站在那兒的人外，還有許多舊東西，像破盒子、舊帽子、工具、洋鐵罐等和購買的人排在一列，祇要隊伍往前移動幾步，站在那些怪東

西旁的婦人就順手把它們往前挪，它們成爲隊裏的一部分。我很納悶，但從身旁的婦人談話中，我才知道，只要有認識的人或朋友在隊伍裏的你移動所擺的東西，這跟人在那兒排隊是一樣的，藉這種安排，一個人可以同時「分身」排兩、三排隊，事實上，這和走後門一樣，是互相幫助的方法：當我在這一隊裏替你移位，你也同樣在另一隊爲我服務。當一個東西接近攤子前時，這位朋友便大叫在另一隊的那人馬上過來買她的食物，那人馬上放個東西在她的位子上，穿過其他隊來買東西。每個人都很願意這麼做，因爲每個人都需要別人幫忙。在這種情狀下，購物便成了相當耗力而費時的差事。

最後輪到我時，必定得等上將近一小時，我看到祇剩五隻雞在那大籃子裏。

「你的配給證呢？」那人問我。

「快點！快點！別人還在等著呢！給他看你的配給證！」從我後面有個女人不耐煩的叫道，我被人往前推了一把。

我很快的從錢包中掏出配給證給他。

「什麼！才兩口？你祇能買隻兩斤的雞，現在我剩的都是大的，明天早點來！小隻的賣得較快。」那人已經把注意力移到我後面的婦人：「你的配給證讓我看看。」

我決定去排蔬菜攤的隊。沒買到雞，我並不難過，因爲我已厭煩站在那裏，我從周遭吵雜的三姑六婆的口裏知道，就算買到雞，還得到另一隊去排，等牠被宰，清洗乾淨。即使最好的雞湯，也不值得如此大費周章。

當我在人群中走向蔬菜攤時，我聽見後面有個男人叫著：「太太！太太！」這是下人對

女主人的稱呼，在文革後，我很訝異聽到這麼叫，也奇怪那位「太太」是誰。那聲音很像是尾隨在我後頭，一會後，我的老園丁站到我旁邊，他滿眶淚水，當他說話時，聲音沙啞：「您還活著！您眞還活著！您看來很好，但梅萍……。」

人們好奇的看我們，有幾個停下來聽，我很快遞給他我的住址，要他等會兒來看我。

我沒興致買食物，祇帶了些麵包和果醬，這些和家裏的泡菜汁夠我吃上一天，因此，我回家等我的老園丁。

眞高興能見到他！從被釋放後，就一直在找他，我欠他錢。當我被帶進臨時拘留所時，他的退休金就放在我錢包裏。

他也同樣高興見到我，他穿了件新衣服，當我迎他進屋裏時，他高興的微笑著。

「眞高興在市場碰到你，我要把這些年欠你的退休金還給你。」我告訴他。

「喔！梅萍早就給我了，您被關進……後，她來看過我。」他避開監獄二字。

梅萍的薪水很少，我知道紅衞兵在她銀行存款裏留下不到幾百元，她必定把所有的錢都給了他，我眞以她爲傲。

「你知道有關她死的事嗎？」我問他。

「聽說她是自殺的，除了她送錢來的那天，我就沒再見過她。」這老人低下頭：「但老趙見過她，有一次，我在街上碰到老趙，他說常看到梅萍。」

「你能幫我找到老趙，請他來見我嗎？」

「當然！我還要找廚子，他們都會很高興知道您活著，而且還好好的。」

「你知道老趙和廚子都在那兒工作嗎？」

「是的，他們都有工作，我想，廚子是待在一家工廠，老趙是在一所學校當警衛。你知道，紅衛兵毒打他，打斷了他的手臂，他已經殘廢了。」我的老園丁說道。

知道老趙的事使我驚訝又悲傷。我問老園丁是否有工作。

「我失業好幾年了，但現在情況似乎已改變了點，有時候，我找到零工，就連地方警察局也會要我替他們種些花，這樣又好了，你說不是嗎？」這老人很顯然對人生的興衰、好運與壞運的交替，感到無奈。

我猶豫是否該請他來我花園做點什麼，即使有幾棵住宅局所種的樹，這花園看來仍空無一物，他似乎也在想這件事，因爲他問道：「您希望我偶而來幫您整頓下面的花園嗎？我看那樹籬該修剪，還有，您是不是想種點別的。」

「那太好了！你能找來一些花苗嗎？能種草坪嗎？」我急著問他。

「恐怕沒法子弄到草坪，我在家裏把花種在盒子裏，你是知道的，我不種些東西，手指頭就會癢，紅衛兵到處搶掠那陣子，我把那些苗種全藏到床底下。」他低聲笑著。

我陪他下樓看花園時，朱太太正在那兒，我向她介紹老園丁並告訴她，他要來種些花。

「祇種你那邊，我們這頭不想要花，你難道不知道毛主席是反對種花的嗎？」

朱太太顯然不明白情況已與往前大不相同，既然情勢很容易再轉變，我不再和她談，祇問她：「你們那頭的樹籬想修剪嗎？」

「我可沒錢付給你的園丁，我們沒有外滙，也沒對外的連繫，供不起一個園丁。」

她提到「外來的連繫」時，我知道她在諷刺我坐過牢

兩天後，阿姨回來了，帶個籃子裝了她透過後門在蘇州買到的一條大魚、一隻肥雞，和一些蛋，她習慣的從後門進來，朱太太正在廚房裏，看見阿姨帶著籃子。

「你打蘇州帶回來什麼呀？」朱太太問阿姨。

「你管我什麼東西！這些是從我先生和兒子那兒帶回來的禮物。不干你的事！」阿姨沒好氣的說。

我聽到她的聲音便去迎接她，阿姨走進廚房，對我說：「那老女人眞討厭，你怎麼去市場買東西的？買到蔬菜了嗎？」她把籃子放在廚房桌上後，走進浴室。我從籃子裏拿出蛋來，心想是否該拿點當禮物送到樓下給朱太太。從黑市買東西是非法的，但祇要不被報上去，幹部們通常不管，而且他們也知道沒法子阻止得了。

我聽見樓梯上傳來脚步聲，看到陸英站在樓梯口，我走過去歡迎她。

「你來這兒已有一段長時間，現在你一定康復了，能參加我們的研讀會了。」她說著，在我房裏坐了下來。

「非常謝謝你的關心，我的確好多了。」

「很多人都說你該來了，她們看到你外出走得蠻快的，覺得你很強健。」

「的確，我現在還不錯。」

「我們正在研究林彪的罪行，這很重要，有助於我們瞭解這位企圖傷害毛主席的罪人，下星期你最好加入我們。」她的口氣非常權威。

「好的，我一定去。」我屈服了，因爲既然不再有「健康不佳」的藉口，也只好接受這件事。

阿姨從浴室出來時，陸英對她說：「我聽說你有一段時間不在家。」

「我回家幾天看看老朋友。」阿姨說。

「你買了東西？黑籃子裏是什麼？」陸英問。

「當然沒有！這全是從家裏帶來的禮物。我有表兄弟在鄉下，他們養雞，也到河邊抓魚，他們把這些東西送給我先生。」

「你知道，從黑市買東西是非法的，每個人看到這種事，都有責任向我報告，你得保證不在黑市買東西。」陸英很粗魯的對阿姨說，因爲她無法證實阿姨眞的在黑市買了那些東西，覺得顏上無光。

阿姨離開後，陸英轉向我說：「有幾次聽到附近的人批評你的服裝，他們說你太注意自己的服飾，你的衣服不但昂貴且全新的。」

「其實，我不喜歡穿新衣服，而且沒有比重新找回舊衣服更讓人高興的事了，但是，我不知道怎麼找回那群從我家劫走舊衣服的紅衛兵，或許你能幫我找回來？」我對陸英這麼說。

她很困窘，她忘記紅衞兵把我全部的衣服帶走了，但她還是批評我：「下回你買衣服，就買像我們所穿的這種深藍色斜紋棉布料的成衣，這樣，看起來才不會由於穿你那灰羊毛衣，而顯得身分特殊。」

陸英走後，阿姨和我都知道朱太太向社區委員會打了小報告，或許說我衣服壞話的人也是她。

我問阿姨對這件事的看法，她說：

「我叫我的老男人小心查這事，他查到以後會告訴我們。」

隔一個禮拜天，老趙和廚子都來看我，談過他們的工作和家人後，我焦急的問他們關於梅萍的事。老趙說：

「革命派帶走你後不久，給她一間房間，那房子是一位重慶大學陳教授的，紅衞兵鬥爭他，又把他全家趕到頂樓去住，剩下的部分則分配給其他家庭合住，梅萍在那兒有個房間，十來天我就去看她一趟，她看來還好，就只擔心你。她死後，我問陳太太怎麼回事，陳太太告訴我，那天夜裏，一群革命派來屋裏把梅萍綁走，陳太太認爲那些人不是從影片攝影場來的，她說當她聽到梅萍喊著不跟他們走時，她到樓梯口來注意聽，但最後，那些人還是把梅萍帶走了。」

「和梅萍同住一樓的其他人呢？」我問老趙。

「我問過，沒人敢說什麼，他們似乎很害怕。」

我問老趙那房子的地址，他寫下來給我，但警告說：「你不要去，你找不出什麼東西來的，我記得他們被警告過不能談這件事。」

「你最好別親自去問，假如警察知道你在問這事，那可不好。」廚子說。

「你說過這教授是在重慶大學嗎？」我問老趙，因爲我想溫妮的先生亨利也是重慶大學

的教授，可能可以替我引見陳家。

「是的，梅萍向我提過，陳太太對她很好。」

「我的朋友黃教授夫婦怎麼樣了？」

「他們碰上很多麻煩，被紅衞兵關了起來，不過現在很好，祇是黃太太很虛弱。」

「他們還住在原來的公寓嗎？」

「我想是吧！」

老趙和廚師還告訴我，老陳媽已經去世了。

「你無法想像一九六七年和六八年，上海是什麼模樣。」廚子說道：「紅衞兵和革命派瘋了，他們闖進市內，任意搶掠、綁架，在秘密法庭中對犯人行刑，殺人不眨眼，弄得沒人敢上街，當沒有足夠交通工具供他們使用時，他們甚至用救護車來綁架人，好多人自殺！甚至有人跑到公安局要求坐牢。」

「最後一次看到梅萍前不久，她告訴我，她將嫁給孫凱，但他們想等到你開釋後才結婚，她似乎很自信你會馬上獲釋，因爲她說她知道你沒做錯事，你要找孫凱嗎？」老趙說。

「你知道他的住址？」我問他。

「一九六八年他給過我，還告訴我，假如有你的消息，要我通知他。」

一九六八年已是五年前了，孫凱仍關心我嗎？既然他很可能知道梅萍在那段恐怖時期被綁之前的生活，我自然急著見他。

「請設法找到他，把我的住址給他，假如他已經結婚，別在他太太面前提起梅萍。」我

告訴老趙。

然後，我要老趙到影片攝影場拿一份允許證明，到火葬場帶回梅萍的骨灰。

幾天後，陸英又來提醒我一定要參加星期二下午的社區研討會。

「帶張櫈子來，會場的長椅不夠坐！」她補充一句。

星期二下午，我穿了深藍色棉夾克和灰條紋長褲，我希望這扮相會讓陸英覺得有面子，我聽了她的「忠告」；但是我的夾克是由我的老裁縫師特別縫製的，與其他中國女人穿的成衣不大一樣，我想讓陸英知道，我聽了她的「忠告」，但並不鼓勵她老是給我「忠告」。我不做任何輕蔑她職權的事，也讓她知道，她也得如此對待我。

住宅委員會的房屋很像我以前所住的房子，爲了這次會議，三樓的房間全打通了，當穿着藍布衫的人蹣跚進入房間時，一些好奇的眼睛注視着我，我相信我那一號拘留所的囚犯之名譽早已不逕而走。

和我一道走到會議室的朱太太領我穿過人群擁擠的房間，來到窗下的女人堆中，她示意我拿櫈子坐在她們中間，沒有人歡迎我們，每個人像害怕不留神臉上的表情就會被人指責似的，面無表情。幾週後，我才知道，和我坐一起的這群女人全都是那些被稱爲資產者和知識分子的成員，文革時被逐出者，以及被無產階級懷疑的問題分子。雖然我們和其他人坐在同一房間裏，但彼此分開，即使房裏擠滿了人，我們這組也會和工人們的椅子分開來。

這種隔離並不是黨或幹部的命令，乃是多年來人民接受「階級」劃分的結果。幾週後，有一次我遲到了，台上已經開始演講了，我匆忙的把椅子往門邊一擺，坐在無產階級當中，

兩個工人像觸電般的，馬上把他們的椅子移開，以致我在那擁擠的房裏，獨自坐著。我雖然很訝異，但不覺困窘，趁演講者停下來喝茶時，我帶著椅子穿過房間，朱太太和其他幾個像戴了無形枷鎖的婦人，點頭表示歡迎，即使這樣，他們的臉部仍毫無表情。

會議室內掛了我熟悉的文革口號，令我回想起爲我舉行的鬥爭大會。自從文革被視爲解放生產力並增加生產的運動後，這些對國家經濟成就的稱頌油然而生，當然，文革適得其反，高幹喜歡撒謊、濫用職權，無故製造一些假象，事實上，那些大字報仍處處表現出社區委員會對文革和毛政策的支持，這就是我們黨書記與同僚在政治上能幹的表現。

我們的正前方——房內最明顯位置上擺着抨擊林彪的標語，漫畫加上文字，列出林彪反黨、反毛的罪行。

會議開始，我們全體站起來唱「東方紅」——一首歌頌毛澤東爲東方旭日的歌。自文革後，它已代替了國歌的地位。我們坐下後，一位沒透露姓名和職務的人對林彪的罪行，做了一次惡毒的抨擊，他從長征時開始一直談，到林彪擔任終身軍職，最後以企圖殺害毛爲終結。他推翻文革時期對林彪所做的讚揚，林彪當時的所做所爲被公認一切都是好的，如今全成了壞事，現在，我們不知道的壞事揭開來了。但是，幾乎沒有人注意聽，男人們不是懶洋洋的抽煙，就是打盹，許多女人也忙著她們的編織和修補工作。研討會不過是種形式，人們來這兒是因爲上級的規定，而他們不能不從，這種洗腦方式有等於沒有，成果自然是零，沒有人因參加研討會而變得更贊成，或反對共產黨。

演講結束了以後，聽衆照例站起來表示支持他，像這樣的場合中，無論他的官階或身份

有多低，他總是代表黨的。每件事都是事先安排好的，而居民起來說的話，也都來自從他們皮包掏出來的紙條。反正，每個步驟都是事先經社區委員會的安排。

會議結束時，每個人站起來呼口號，表示我們集體對林彪不滿。雖然很高興聽到他被判罪，但我沒開口。其實，我們這角落沒幾個人出聲音，或許，其他人也像我一樣認爲自己祇是旁觀者，當大家成群走在十一月寒冷夜晚的微弱燈光下時，步子都比來時快許多。

在家門前微弱的街燈下，我看到一個高高的年輕人站在那兒，待走近點，才認出是溫妮的兒子，我仍認得出他，他已從十幾歲的孩子長成瘦高英俊的年輕人了。我帶他進房裏，問起他的父母。

「收到您的信，知道您已從拘留所出來，我們都很高興，急著要見您，我擔心她身子不好，皮膚上又有個治不好的怪硬塊，父親也不太好，他的心臟有問題，又有高血壓。」這年輕人平靜的說著，看來既悲傷又徬徨。

「再告訴我一些有關你母親的病，她看過皮膚科醫生嗎？」我問他。

「那叫皮膚硬化症，皮膚變得又硬又僵，內臟也受到了影響，所以無法吸收營養。」他還說：「她常住醫院，但似乎沒有一個醫師能給她注射靜脈以外的治療。」

「我明天就去看她。」我告訴他。

「您最好先有個心理準備，她不再像從前的模樣。」

「你和你兩個弟弟現在怎麼樣，都在工作了嗎？」我問他。

「文革爆發時，我唸大學，被送到四川，那兒鬧饑荒，我得了結核病獲准回來，兩個弟

弟也下放到鄉下當農人，林彪事件後，他們才被放回來，一個現在替商店送貨，最小的沒有工作。」

晚上雨下得很大，冷濕的空氣使我的關節痠痛得下不了床，早餐後，我帶著沈重的心情去拜訪我的老朋友溫妮。

我穿著雨衣和膠鞋，帶一把大雨傘，踏著大雨過後的泥濘到溫妮的公寓。由於滿腦子裏全是溫妮，以致路過了老家而不自覺，直到抵達目的地收起雨傘後，才知道已過了。

我見到她時，她病得快死了，沒有她兒子的幫忙，她根本無法移動自己的身子，我必須彎身讓她看見我。上帝，這就是當年漂亮又傲氣的溫妮嗎？我永遠不會忘記當時她那不成人形所帶給我的震撼。

她的眼神告訴我，她很高興見到我，她喃喃自語，眼神是黯淡的：「梅萍死了，我的孩子沒前途，要是我們在一九四九年就走……該多好！不是嗎？我們呆呆的留在這兒……」她閉上眼睛，喘了一口氣。

我把她的手揑在手裏，那是把冰冷的瘦骨頭，「別想那麼多，好溫妮。」我彎下來在她的耳朵這麼說。

她歎了口氣，我放下她的手，站在那兒，忍住淚水，不敢擦它，怕她見了更傷心。當我俯身看著棉被下萎縮的軀體，她兒子示意要我離開，我親了她額頭，她睜開眼睛，嘴唇移動，困難而微弱的說到：「想辦法到國外去，你可以辦到！」這是她最後的一次忠告。

當我聽見樓梯上傳來脚步聲，趕緊擦去眼淚，一個佝僂的老人站在我面前喘著氣，那是

亨利，他的頭髮全白了，眼睛也瞇成一線，一臉的失意、沮喪，當我叫他的名字時，一時間他認不出我是誰，後來，他沒微笑，祇點個頭：「那一定很可怕，不過，你活過來了，太好了！」我問他關於溫妮的病，他證實了孩子對我說的話，當問到他自己時，他只是搖頭歎氣，最後，他告訴我，因為心臟有毛病，已獲准做翻譯工作。我問他是否認識一位重慶大學的陳教授，梅萍曾經在生前幾個月住過他們的房子。

「我跟他很熟，但現在不想見到他或他太太。」他勸道：「等情勢好一點，那時他們能比較自由的說話。」

「情勢會好轉嗎？」我問他。

「噢！是的，現在好多了，你經過酷刑以後，一定更堅強了，你可以等啊！」

十二月初，阿姨的先生帶來了好消息，他已替我找到一些磚塊，兩個農夫兄弟同意從蘇州河用木船把它們送來，在一處木船可停泊的橋下，將它們卸在碼頭上，問題是當船抵達時，我找不到一輛貨車把這些磚塊接過來，我讓阿姨去通知和我討論過這計畫的孔。那晚他來時，告訴我能介紹一位在工程公司開貨車接送修理街燈工人的年輕人，我給阿姨的先生一部分頭款，便送他回去，要他在磚塊送到上海前，等我的消息，他測量過那道牆的高和寬度，確定那些磚塊一定夠用，但告訴我必須放置鐵條支持那牆的重量。

我雖然急著築好這道牆，但我認為最好先徵求朱家的同意，另外我應該從住宅局那兒得到許可，讓它合法化，最好是寫份我和朱太太簽字的請願書給住宅局。

阿姨和我想了一個計謀來對付朱家，我把每天散步的時間從下午改到早晨，阿姨走通道

往前門到市場，而不走後門，進出時故意不把門閤緊，這樣，一陣冷風就會吹進他睡覺的地方。有時候，他會起來關上門，但半小時後，又發現門開著，每回他抱怨，我們就恭敬的道歉，但我們天天早上這麼做，兩星期後，我想時機差不多了，就請朱太太上樓來喝茶。

「你認爲我們來築道牆把通廊隔開來，這樣，你兒子就有間小臥房，好嗎？不然，每次我和阿姨早上出門去，他會睡在冷風裏。」我問她。

「好啊！但不要花太多錢。」朱太太說。

「我付全部的費用，磚塊、水泥和工錢。」

「眞的？那多不好意思，但你確實比我們家有錢。」

「只要你同意，沒關係的。」

「當然，當然。」

「我會寫封請願書給住宅局。」我告訴她。「我們都簽名，明早我就送去。」

她簽了名，爲了避免這份請求函石沉大海，我找來曾替我修浴室的工人希望能「安撫」住宅局的職員。我問他們想不想在工作時間外，賺點外快，他們表現得很熱心，我告訴他們，我已買到磚塊，也寫了一份請願書。我要求他們在我提出請願書前，先向那些職員打聲招呼，我遞給他們一條高級香煙，讓他們自己決定是要送些給職員或留著自己抽，他們說：「沒問題，我們會向單位打招呼的，他不會拒絕。」

他們給了我暗號，我帶著請願書上辦公室去，毫無困難的蓋上章。帶著它，我到特定商店去買水泥和鐵條，然後由孔的朋友小馮駕著他工程公司的貨車送回我的住處。我問他貨車的行

里數和汽油是否都要受檢，他笑著對我說文革後，這些規定都廢除了，然後又說：「別忘了，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每個東西都是屬於人民的，你和我都是其中的一份子。」無論如何，他從我這兒拿到了一條煙，而又可以分送那些工人。「我該去他們工作的地方等他們了。」他解釋道。

我又送阿姨回蘇州找人來送磚塊，我要她寫信告訴我，他們出發的時間。這行程需要兩天，我得安排小馮和我一起坐他貨車到指定的橋去等候那條船。

船預定抵達的當天，小馮那天上午早早就來帶我上車去等船，因爲它抵達的時間無法確定。我帶了些三明治當中餐吃，在吃東西時，我問小馮修燈工人怎麼辦，他說他已安排另一輛貨車的司機接送他們，因此他能休息一天。當然，我必須謝謝他的同事和那些工人，我知道，偷偷使用工程公司的貨車，是違法的，但我不向小馮問起這事，馮見我焦慮的樣子便說道：「別擔心！『政治比經濟重要』是毛主席說的，祇要我們有正確的政治思想，經濟並不重要。」

「我們要喊『偉大舵手毛主席萬歲』來表示我們政治思想正確嗎？」我開玩笑的問。

他認眞的搖搖頭，說道：「不必，我們的黨書記不在這兒。」然後他看著我問道：「你眞在第一號拘留所被關了六年多？」

「眞的！」

「你知道自己爲什麼被關嗎？」

「他們控告我是帝國主義間諜。」

「不！你被關是因爲你不瞭解共產黨，我想你最好快點學習，你對合法與非法有這麼多老式的思想，你顧慮太多了！」

「嗯！老實告訴你，我覺得爲了我私人的目的而使用這貨車不太好。」

「在中國，我們有公有權，是吧？什麼是公有權呢？每樣東西都是大衆的，是吧？誰是大衆？我們，是吧？」小馮沒好氣的說。

我搞不清楚他是認眞，抑是開玩笑。

下午，我們看見阿姨站在一條由兩個農夫搖槳的木舟上，慢慢接近橋旁已荒廢的碼頭。我向她揮手，她回了我，小馮倒車至岸邊。船靠岸後，我才看到磚塊沒有一塊是好的，在這行程中，許多已經碎掉了。我懷疑這些是否還能用，但阿姨的先生跳上岸來，小聲對我說：「好的都藏在下面，以免引起注意。」

兩個農夫、小馮、阿姨夫婦和我忙著把磚塊裝上貨車，做完後，我付錢給那兩個農夫，他們馬上轉回去。

岸邊上上下下的人群，在碼頭忙著裝卸東西，其中大部分人帶了很多籃子、捆繩和箱子。許多人兩肩挑起籃子，裏頭裝有各種東西，其中大部份是在上海黑市買不到的。他們專心在自己的買賣上，以至沒人注意到我們的活動，然而，當我們離開那地方時，我才鬆了一口氣。不論此事被認爲正當與否，我有股罪惡感，希望不要再到這碼頭來了。

回家後，我們卸下那些磚塊，堆在花園角落上，朱家人都跑出來看，但沒有一個來幫忙。雖然我已精疲力竭，但沒忘記應該請小馮和阿姨夫婦到餐館大吃一頓，小馮興致勃勃的慶

祝大功告成，喝了幾瓶上海啤酒和紹興酒。我謝謝他幫了我們自己做不來的大忙，他舉杯一仰而盡，說道：「工人階級萬歲！」又引用馬克斯的口號：「工人階級領導一切！」說完高聲大笑，很明顯的，小馮也是個憤世嫉俗的人。

我很累，很快就睡着了。隔天早上，我到花園看那些磚塊時，發現有些不見了。朱家告訴我那天晚上他們聽見嘈雜聲，或許是有人翻牆來偷走，但阿姨告訴我，那些不見的磚塊八成是朱家人拿的，藏在他們房裏。果然牆才開始動工，朱家就搶先一步在通道盡頭使用那些磚塊。

我去住宅局找那些年輕工人，當天晚上，他們下班後就來築牆，每天晚上從五點半做到十一點，祇休息半小時，他們花三個晚上完成了。阿姨把從蘇州帶回來的美味食物拿出來給他們做消夜，阿姨睡着後，我供應他們咖啡、蛋糕和香煙，坐在樓梯間和他們聊天。雖然他們不善言辭，但基本上他們對工作和政府財產的態度與小馮相去不遠。他們使用的工具都是住宅局的，當我要付他們錢時，他們笑我，喊我是個「不瞭解『中國』的外國人」。

牆築起來後，更確保了我的隱私權，也使我的體力得以完全恢復。聖誕節早上，我做了感謝的禱告。許多陌生人幫我恢復健康和建立一個「家」，雖然我送他們禮物，盡力回謝他們，但我知道，我所付出的和我所得到的不能相比，他們在時間與服務上給我的幫助太大了，特別是醫生與牙醫；此外，當人們走後門幫我時，他們是冒著可能會受到嚴重刑罰的危險——即使當權者對這種事情視而不見，但後門畢竟是不合法的，他們來幫我是因爲可憐我遭到不公平折磨又失去唯一的孩子，我的悲慘與不幸感動了他們。這麼多年來，上級宣傳機構已

背棄了人道主義，因爲感情包袱和提倡人倫關係完全是根植在階級的忠誠上，而我個人的經驗告訴我，生活在不合理的制度下，殘酷現實強迫他們要撒謊和僞裝，但大部份的中國人仍是善良的、有感情的、富同情心的。

無產階級的文化大革命，對勞動階級做了這麼多虛張聲勢的承諾，並沒有眞正改善他們的生活，或給他們新的發展機會，中國人民繼續和貧窮、困乏做毫無選擇的奮鬥，文革只不過是製造了一個跳板給那些憤世嫉俗、大膽無恥的年輕工人揮霍罷了。



第十五章　特殊的學生

新年過後幾天，我搭乘長途巴士到福州路，在那兒有較大規模的書店。我首先逛了一家外文書店，希望能找到一些英文教科書，來教我即將在新年後開始上課的學生。偌大的商店除了一個店員和我這個顧客以外，別無他人，四壁的書架上僅僅陳列著以英、德、法和俄文翻譯的毛澤東選集，以及馬克斯、恩格斯、列寧、史達林、北韓的金耀松和阿爾巴尼亞Enver Hoxha等人的系列作品，沒有其他書了。接近入口處的櫃台上灰塵滿佈的堆積著世界其他地區的共黨報紙，我看到一份英國的每日工人報，發現它至少已被塵封了幾個月。

我問店員：「我怎樣才能找到一些英文教科書？」

她慢吞吞的搖搖頭。

我後來到新華書局，這家書局是販賣所有出版刊物的政府代理機構，我想買一本唐詩三百首，來驗證一下在獄中所背誦的詩文，看看自己對詩句的記憶是否正確。

這家新華書局有生氣多了，一小群人站在科技叢書部的櫃台前，而店員也忙碌得很。許多顧客買孩子們看的漫畫書，在中國大陸這些書多半都是描述有關革命英雄的事蹟、壞地主的壓榨及揭發國民黨反革命分子的政治宣傳。書店中央區域充斥著毛澤東的文集、訓詞和一

些貧乏的詩集，我記得在拘留所裏看過報紙的報導，有一億五千萬份毛澤東選集和七億本毛的訓詞已經付梓，以使得每個中國家庭都能有一套選輯，並且讓每一個人都有一本訓詞，這些書架上還包括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金耀松等人全套作品的中文版本。雖然這兒的女店員管理了這麼多書籍，但卻門可羅雀。

在這書店的一個角落，我發現「文學」標記下陳列了一些書，我無法看清它們的標題，於是去問店員：「你有唐詩三百首嗎？」

她搖頭，說：「沒有，當然沒有。」

從她的聲調裏我看出唐詩三百首已被激進派黨員所禁，她一定認爲我笨到竟然想買這種書。

隨後我指著平放在她身後書架上的書問她：「那些是什麼書？」

她沒有講話，卻拿起一本來讓我看清書名，它是歐陽海之歌，內容是描述一個軍人設法要解救他的騾子，而被通過的火車撞死的故事，他的勇氣及自我犧牲的精神歸因於一個事實——他研讀過毛澤東的書，因此毫不畏懼。這篇故事已被毛共批准，特別是江青。這本書印售了數萬本，而作者已被任命爲九中全會的中央委員。

「這本我已經看過了，你還有其他的書嗎？那本怎麼樣？」我指著較下方的架子上。

她耐心的拿起那本書並展示給我看，它只不過是同一本書的另一版本。

「還有其他的書嗎？」

「有一本雷鋒日記。」她說。

雷鋒是另一個死去的軍人，他被公認爲國家英雄，也被毛澤東指認爲自我犧牲的模範，文化大革命之前，他在一次「學習雷鋒」的全國性活動中受到讚揚，當時受毛的書籍教化的所有中國人從雷鋒日記片段中的「讀毛主席的書」、「遵從毛主席的命令」及「成爲毛主席的好戰士」等句子裏都受到感動，報章和包括林彪在內的領導人物，都廣爲引用書中字句，雷鋒被共黨利用來說明共黨主張——政治化比現代化的武器，及在文革時期相繼被肅清的軍事領袖所提倡的軍事戰術都要來得重要。

「我已經看過這本書，你還有沒有其他的書呢？」我問。

她搖了搖頭。

走出新華書局，搭巴士回家，我心想，或許這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應該重新命名爲「文化浩刼」才是。

因爲我買不到英文教科書，就不能爲那些初學的學生上課，而只能接納那些曾修過英文和自備書本的人。我有六個學生，從星期一到星期六，我給他們每人一次早上或一次晚上的課程，上完課後，我會端上一杯茶跟他們閒聊，從學生那兒我知道了一些在報紙上看不到的消息和傳言。在那段時間，我經由學生口中得知很多中國政治變動頻繁的狀況。

我最感興趣的是一個跟隨我許多年的學生，他是一位曾經在早年文革時期擔任過紅衞兵領導的年輕小伙子。大德有相當不幸的個人背景，在他僅僅幾個月大時，父親捨棄他的母親逃到香港，從此音訊全無。在他母親到上海外語學院教英語前，他、母親、兩個妹妹貧苦的熬過許多年，她的薪水雖然不多，但他們已不必再被迫變賣他們的家當來換取食物，不過生

活仍然清苦。他的姨媽在五十年代嫁給一位共軍將領，那時，許多共產黨領導幹部得意洋洋的捨棄他們的糟糠之妻，另娶有吸引力的城市女孩。

他的家人攀上優秀軍人的關係，加上他對任何富有的人都懷着怨恨，使他得以爬上領導階層。一開始是加入學校的紅衞兵組織，繼之又加入城市裏的紅衞兵組織，他參加所有的紅衞兵活動：掠奪財富、拷問階級敵人、派系械鬥，甚至濫殺無辜。當我們練習英文會話時，我要他以英文說故事給我聽，他就會說到在文革時的『功勳』，那種理所當然的聲調好像他在談論著天氣似的，他並不爲自己所做的一切感到羞恥，我認爲大德沒有什麼道德觀念，並且還懷疑爲什麼他自己的母親是一位英文老師，他卻想要向我學英文。有一次我直截了當的問他，他只是聳聳肩：「你不可以這樣直接問別人問題，就算你問了，答案也不可靠！」

大德告訴我，當他姨丈在林彪的指示下被活埋時，他已失去領導地位，這事發生在「九中全會」之後，那時，林彪被任命爲毛澤東的接班人，他的姨丈是位被大肆宣揚爲戰鬥英雄的資深黨員，他之所以遇害，是因爲揭發林彪沈溺於海洛英毒品的罪名，而對林彪繼任的合適性提出質問。

「我能相信你剛剛所告訴我的事情嗎？」我開玩笑似的問他。

「絕對能，因爲相信它，對你沒有害處。不過，你也可以不信，因爲我不再是一個紅衞兵的領導幹部，而且我的姨丈已經死了。不過我想你知道相信別人是件蠢事。」他說著，好像是一位講經老僧。

他的名字叫大德，但我從未遇見過像他這樣蔑視道德，也對罪惡無動於衷。由於聰明和

上進，他極端自負，事實上，也是因爲這樣，促使他時時告訴我他所知道有關黨內權力鬥爭的事。況且他喜歡每一種鬥爭，每當談到有關領導者的政治陰謀時，總是興奮異常，他似乎對別人的不幸特別有興趣，也十分輕視犧牲者，只因爲他們沒能勝利。對他而言，不管花多大代價，『成功』有著無限的魅力。很難知道他到底忠於那一邊，我曾經問他：「你是站在那一邊？」

他指著胸口說：「當然是這兒，站在我自己這邊。」

一天，他看到在我書桌上的一本紅衞兵刊物。

「你爲什麼要讀這麼幼稚的廢物？」他輕蔑的問我。

「我想知道被關在拘留所時，文革期間發生了什麼事。」

「我能徹頭徹尾的告訴你每一件事，而且更多。」他自誇的說。

「你不會因爲告訴我而惹上麻煩嗎？」我問他。

「假如你不告訴別人，我怎麼會有麻煩？而就算你說了，你也要跟着遭殃！」

「如果當局知道了怎麼辦？」我問他。

「我們兩個不說，別人又怎麼會知道呢？你房裏又沒裝竊聽器。」

「你確信？」

「當然，你還沒重要到需要用這種極爲短缺的裝備，你只配用人力。」說完，又哄然大笑。

大德是透過精心安排才成爲我的學生：當我開始上課時，梅萍有位上海市立管絃樂團（

已被解散）的小提琴手朋友，想成為我的學生，而他母親是我大學時期的同學，她問我是否願意教她的兒子，因為這個小伙子希望移民到他叔父所在的美國去，原先我以為這小提琴手很渴望學習，但是卻發現他上課從不專心，也不做功課；事實上，他經常不在指定的時間來上課。

有一天，我在等他半天出現的卻是大德時感到非常生氣，後者自我介紹說：「我來為張道歉，他剛剛被召去公安局拿護照，他今天不能來了。」

他與我對桌坐下，打開他帶來的書說：「我很抱歉來打擾你，我正設法自修英文，你能為我說明這段文字嗎？」

我看著這本書，書名是 Gathering Storm 由 Sir Winston Churchill 所著。

「你從那兒弄到這本書的？」我問他。

「『借』來的。」他強調著這「借」字，「原來有一整套，而我只借來這一本。」

「你過去是紅衛兵嗎？」我問他。

「哦！是的！」他對著我微笑：「你很聰明，正如我所聽說的，我還聽說你的英文是上海最好的。」

這本書其實是他跟其他紅衛兵到藏物室偷來的。幾天以後，這位小提琴手和大德一起來向我道別，並且要求我能收大德為學生。

阿姨端茶來時總對大德分外有禮，而對其他學生卻漠不關心，阿姨的態度和大德想成為我學生的計謀喚醒了我對這瘦長年輕人的興趣，何況他也渴望成為我的隨從，除了早上指定

是他的課程時間以外，他幾乎每天都找藉口來看我，他告訴我他的時間很充裕，因爲他是「待業者」，一個在人民政府中「失業」的代名詞，而照理來說，這三個字不應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出現，他還說他希望回饋我爲他免費授課。

他經常陪我逛街，他會跟我站在一起，推開紊亂的人群，並且告訴我櫥窗上還有什麼日用品可以買。因爲他高過其他顧客的頭，有時，甚至在其他顧客尚未取得之前就伸出長臂從商店助手那裏『搶』到東西。假如我們無法在參觀一家家商店之後找到我想要的，他就會自告奮勇爲我經由「後門」取得。在公車上，他會保護我免受群衆擁擠之苦，並且用手肘推開別人好騰出位置給我。當我在累了一天之後感謝他時，他會說：「我喜歡跟你逛街，你總是買最好的東西，那使我感到舒服。」

不久，我發現他喜歡美食，但付不起錢到餐館吃一頓，因此以後當他陪我逛街時，我就招待他到所選擇的館子共進豐盛的午餐。第一次，他問：「你想上最好的館子嗎？」

「我要請你到你想去的任何一家餐館。」我告訴他。

「不介意價錢？」

「不介意！」

他叫了四人份的食物，而且吃得精光，當我明白他是因爲營養不良才這麼瘦時，發覺就算他是那些希望我遭殃的人所派來的密告者，我也無法不同情他。

如果我不承認自己希望利用大德，那我就是一位僞君子：如果他是受指示來監視我，他可能會利用我每一句不小心的話或不謹慎的行動來鬥爭我；大德可能知道我女兒死亡的眞相

，當時機成熟時，我打算要問他，當然，這個『時機』必須是在一個無害於他的時刻，同時，我還要利用他來傳遞假象給他同僚。

長久以來有任何我能離開中國的機會時，我都會做出「沒有僕人不能單獨生活」的印象，我曾聽大德告訴孔：「她連飯都不會煮！」我相信他認爲我像寄生蟲，並且可能會告訴每一個人，事實上，我處心積慮的製造出我希望住在中國的假象，因爲我的「不能沒人侍候」，可能有助於我申請去美國看妹妹的探親護照。

一九七四年初，我已康復並改善了所住的公寓，我心情愉悅，教書讓我暫時忘卻女兒的死，我感覺比過去更爲平靜和輕鬆。

過年了，阿姨告訴我會有特別配給，起初，這節日遭到革命派所廢止，如今又再度恢復。在商店裏，配給的食品項目也比平時豐富，對我而言，雖然受到激進分子的壓制，但鄧小平與其同僚爲重建中國經濟所做的努力已經略見成效，由於「十中全會」，使得有更多以前被稱爲走資派的高級幹部得到復職，因而使中國的政風直向右轉。

有位學生告訴我，最近復職的鐵路部長爲整頓交通要到蘇州。蘇州是一個連接廣州、上海到北京的鐵路交通樞紐，當革命派佔據這個鐵路據點，並使它無法正常運作，又拒絕遵從這位鐵路部長萬里的命令時，部長召開了群衆大會，在他手下面前責備這些革命派，並把他們抓出去槍斃。身爲老幹部，下了這麼一個決策，引起了那些長期受苦的群衆的喝采，不幸的是，當激進分子看到他們好不容易才取得的地位在他們脚下逐漸腐蝕時，更加速了下一回合的鬥爭，然而，黨的老幹部暗地裏拒絕參與文化大革命，他們爲了避免遭到反抗毛澤東政

策的控訴，就從毛澤東舊作中找到了可以引用的訓示，藉以證明他們重整秩序和正常生活的努力。

中國人過年都要祭祖，孩提時候，臘月十五就開始準備，一直到上元節過完，前後持續整整一個月，而今在社會主義下，一切從簡，家人的團聚取代了祭祖，但中國人畢竟是中國人，爲了過年仍頗費心思的。新年那天，家中要大掃除，因此阿姨和我花了幾天打掃屋子，清理櫃子中的東西，地板上蠟，粉刷家具和清洗門窗，而我終於也有穿新衣服的時候。並非每個人都能買得起新衣，不是因爲新衣的價錢問題，而是因爲須要配給的布票，所以我能盡力做到的就是替阿姨弄到一件棉夾克，這衣裳比她平常穿的時髦多了。我倆耐心的排隊購買我們要用來招待我們的訪客的食物，依舊習俗，我希望所有的學生都來向我拜年，而對於那些可能帶小孩來的訪客，我已準備好壓歲錢。阿姨看到我準備壓歲錢時，她變得不安起來，她担心社區委員會婦女們會控告我企圖復甦舊習俗，我告訴她我只會給那些不打小報告的人。

因爲我擁有外幣兌換券，所以比大部分的人富有得多，我決定慷慨的對待每一個人，我甚至買了一個大冰淇淋蛋糕、兩包巧克力給阿姨做爲新年禮物。但在我心深處感到非常悲傷、，因爲當別人團圓時，我却是孤獨的，過去我與我的女兒和丈夫過年景象引起難言的感傷，但我絕不讓任何人知道我的悲傷，我想要讓這些革命派認爲我對於女兒之死採取了宿命的態度。

過年前兩天，何安跟著丈夫與孩子們回家團聚，我很愉快的見到她那聰明絕頂的丈夫與

聽到他們對北京權力鬥爭的看法，他們的兩個小孩很可愛，由於小孩太小，感覺不出頭上的政治烏雲，他們看來是那麼無憂無慮和快樂。

何安很幸運，她有丈夫與孩子們在身邊，許多中國的年輕人都被遣送到遠離家人數千里外的遠方，一年僅有一次短期的「軍事假」，孩子們長大之後幾乎不認識他們的父親，而婦女們則得單獨挑起撫養小孩與維持家計的雙重責任。其實，黨用「社會主義的需要」和「服務人民」的名義束縛中國年輕人，是愚蠢而殘酷的行爲，要知道，黨內高級幹部及他們的孩子很少被要求去做這樣的犧牲，而且，甚至受到「特殊待遇」，讓他們的配偶在同一城市工作。

我被釋放的消息已經散佈在梅萍的朋友之間，假期中他們來拜訪，包括那些因軍事假回家探親的朋友。他們所談論的多半是有關工作調度的事，他們急於利用走「後門」調到他們想去地方，在我這裏聚會時，那些已經開始進行交涉的人渴望能相互交換資料與經驗。從他們的談話中，我明白在低階級幹部間賄賂與貪污的泛濫。

「如果文革的目的是要淨化中國社會和提升社會主義，你怎麼解釋理想主義在部分幹部中已經面臨崩潰了呢？」我問一位梅萍的朋友，她是從武漢回來度軍事假的，而且也正設法調到她丈夫所在的上海來。

「文革時期獲得陞遷的新黨員在一開始就不是理想主義者，」她說：「他們把文革當成個人發展的機會；而老黨員剛入黨時，可能是理想主義者，現在因爲文革時期的恥辱經驗而完全覺悟，他們覺得黨對他們不公平，又發現在過去戰爭時期所作的犧牲毫無價值，所以他

們現在只關心在未來權力鬥爭中的政治既得利益，能給他們自己與孩子一個舒適的生活。」

「你不怕賄賂高級黨員會惹上麻煩？」我問她。

「當然怕，但我會全力以赴，反正這是司空見慣的事兒了，也許有一天，黨領導者會抓，不過那時候，他們正忙著互相鬥爭，總之啊，我必須抓住這個機會。」

我們的談話被負責招待客人和送上蛋糕的大德所打斷，當他從厨房捧出蛋糕時，我陪著梅萍的朋友，抱著熟睡的嬰兒和小孩的隨身用品一起下樓，她趁四周沒人，輕聲對我說：「小心你那個學生，我看他像是個便衣警察。」

「他只不過是失業的年輕人。」我告訴她。

「不要相信他！小心你所說的話。」臨走時她說。

孫凱（我女兒生前願意託付終身的年輕人）拿着我的住址，在年假的最後一天來看我，他告訴我他不再教數學，因爲學校已經關閉，現在他爲一家研究機構設計精密儀器。

「一九六六年，梅萍告訴我你被捕，我的爸媽和我都以爲我們應該立刻結婚，好讓她能遷入我們的住處，但她不同意，她堅持要等你被釋放，並且說沒有你在場她不能結婚。那時，我們每個人都認爲文革將會在一年以內結束。」孫凱說。

「她死前，你常看到她嗎？」我問他。很傷心看到這位原本該是我女婿的英俊男人。

「我每個禮拜見她兩三次，我們盡可能在一起，你是知道的，我父親在一九五七年被打入右派，我被列爲『階級敵人的家庭成員』，又因爲我是老師，同時也屬於『臭老九』，梅萍不得不參與影片攝影場文革活動的行列。她似乎不會有麻煩，想不到，後來竟然有一些不

認識的人綁架她。」

「請說下去。」我求他。

「本來她預定在六月十六到我家吃晚飯，下午我去接她時，陳太太（梅萍所住房子的敎授太太）告訴我說梅萍在那天早上自殺了，我立刻趕到影片攝影場，之後我又趕到火葬場，因爲我不是她的家人不許看他們的報告，當時，管理員看不過去，偷偷告訴我：『一位上海影片攝影場的年輕女演員屍體已經在那天早上被火葬了』。」孫凱痛哭著。

「你相信她會自殺嗎？」我問他。

「當然不相信，我去了那裏，看了傳說她自殺的地方，反正！她絕不可能是自殺的。」

「你是指那些鐵架嗎？」

孫凱吃驚的瞪著我：「你怎麼知道的？誰告訴你的？你不可以讓別人發現你知道這件事。」他又附加一句：「假如負責偵辦梅萍死因的人知道你不相信她自殺的話，可能會做出危害你生命的事情，小心，他們什麼手段都使得出來。」

「我瞭解，我不會說的。」我向他保證。「你知道是誰綁架她的？」

「我不能確定，但我想可能跟調查你案子的人有關，不管他們是誰，他們一定是受了唆使！」

「你怎麼查出來的？」我立刻問去。

「你也知道，體育協會在文革初期被紅衞兵關閉後由革命派接管，但已過去的田徑協會卻保留了底樓來儲存文件，有人從這些文件中知道綁架梅萍的人是依上級命令行事，而告訴

我這些事正是體育協會的人。」

「你能爲我安排接見這個體育協會的人嗎？」

「那將會對你造成危險。」

「我早已有心理準備了。」

「都這麼多年了，我不知道他是否還在，爲什麼不等到政局比較穩定的時候？」孫凱似乎並不同意我的要求。

的確，梅萍去世是不爭的事實，人不能永遠悲傷，孫凱不再來拜訪我了，幾年之後，聽說他已經娶了一位老黨員的女兒，我瞭解孫凱爲什麼要娶一位高幹的女兒，他是確定所娶的這個女人，永遠不會成爲政治迫害的犧牲品，除此之外，能娶到一位黨員的女兒，他將洗去右派分子後代的「汚點」——一個讓人一輩子無法翻身的十字架。

孫凱的來訪勾起我內心的痛楚，我告訴阿姨我要去躺一會兒，當她去收拾廚房時，前面突然響起敲門聲，朱家人全出去了，我只好叫阿姨去陽台上看看是不是朱家的客人。

她從陽台回來說：「是位上了年紀的老先生，他問我你住不住在這裏，要我下去嗎？」

「去看看吧！」我告訴她。不曉得這位訪客是誰，我很快的把被蓋拉平，把房間弄整齊，隨即到前面。

「鄭太太！你不認得我了嗎？眞高興見到你！」這人一邊上樓一邊說著。

從他的聲音風度看來，我明白我的訪客是胡先生——先夫的老朋友，從一九六六年夏天文革開始，他曾意外來訪，以後就不會再見到他。

他伸向我的手是硬朗的，除了小手指頭包紮著繃帶外，他似乎改變不大。我熱情的迎接他，記起他在一九六六年給我的忠告。

引他進門之後，我請他坐下來。

「眞高興能再見到你，你氣色眞好，在現在這種環境下，一個人活得有希望，就已經很好了。」他說。

「你和你的家人還好吧？還住在以前的地方嗎？」我親切的問他。

「哦！不！我們這些人都一樣：被紅衞兵掃地出門！」胡先生告訴我。「我已經受夠了，但是我們不能光想過去，能活著就已經是天大的恩賜了，我知道梅萍的死對你是椿打擊，而我呢，我的老母親和妻子都死了，你曉得，她們受不了文革時期所帶來的迫害，死於心臟痲痺！在這之前，因爲她們是資產階級的家屬，心臟病無處可醫。」胡先生嘆著氣，幾乎要哭出來，但他從口袋中拿出手帕，擤了擤鼻子，馬上又恢復理智。

「你是怎麼找到我這兒的？」我問他。

「全靠運氣，我今天早上在街上遇到老趙，聽到你已經自由感到很高興，應付完一下午的客人後，立刻就騎著脚踏車趕來。」

「還在工作嗎？」我問他。

「唔！我可以退休的，但是在家裏成天乾坐也沒意思，做些粗活兒也好，晚上可以一覺到天亮。我現在住在岳母家，紅衞兵留給她一個房間，我們在裏面又隔出一間，我就這樣住進去了。她現在八十歲，身體硬朗，我很高興能照顧她。」

「孩子們呢？」

「因爲有我這麼一個資本家的父親，他們全被送到外地工作去了，我大兒子已經結婚，而且生了一個女兒。」

「實在很謝謝你一九六六年夏天來看我時給我的忠告，在拘留所那段時間，我常常會想起你所講的話，你對現在的政局有什麼看法？」

「當然好得多了，可是到底能持續多久？」

「你認爲到最後，權力鬥爭會更激烈嗎？」我問。

他警戒的瞄了一眼半開的門，點點頭，又說：「你明天願不願意跟我去南陶？我聽說那間老花店重新開幕，還有水仙球呢。」

「明天我不能去，早上有學生要來上課，阿姨要休假回家，下午我還得洗些衣服。」

「明天下午我可以來幫你洗衣服嗎？因爲我自願在除夕加班，所以補假一天。」

我並不想要他幫我洗衣服，而我也知道他有話要說，假如我想聽他不得不說的話，我就必須跟他出去。

「或許，衣服可以過些時候再洗。去花店吧，我也正想要一些水仙花球莖。」我說。

胡先生很高興我接受他的邀請。啊！我幾乎忘了中國男人喜歡一個女人『聽話』。好像我接受了他邀請，我們就更親密了似的，他不僅握我的手握得更久，甚至想拿錢給我，他從他皮夾子裏取出一個小包：

「你知道像我們這樣的老人，生活津貼總是不夠用的，我在日本的外甥每個月都滙款給

我，我可以跟你共享嗎？」我被他弄得有些不知所措。他又說了：「收下吧，假如你收下的話，我會很高興的。」

「非常謝謝你的好意，但是我現在不是依靠政府津貼來生活，我的外國滙款券已經不再凍結了，而經濟上也沒什麼困難。」我很快說完。

他似乎有些頹喪，但一會兒又恢復過來，他說：「眞佩服你，你想像不到我能再見到你有多高興。你能經歷一番考驗回來眞是奇蹟，你是了不起的女人！」

我謝了他的美言，送他下了樓。當我站在花園目送胡先生推著脚踏車出去時，回過頭來，發現朱太太正從窗口看著我們，似乎當胡先生在樓上時，朱太太一家已從外面回來了。

「我明天下午兩點半再來。」胡先生回頭說。

「好！」我回道。

朱太太對我的客人感到好奇。於是，她趁阿姨通過後門拿垃圾出去時，問了阿姨。我猜朱太太會在早晨向居民委員會婦女會報告，那麼一來，我在假期期間曾有這麼一個訪客的事將會人盡皆知，在這封建未杜絕的中國大陸，雖然男女在一起工作，私下却不會成爲朋友，我知道，胡先生的來訪將成爲閒談的話題。

南陶爲上海市的內城，城牆早已拆除，目前是個市集，它有蜿蜒狹窄的曲巷、數以百計的商店和賣著各式商品的攤子，這些商品從無花果到供做醫藥用的青蛙，一應俱全。以前這個地方據說除了棺材以外，什麼東西都買得到，還有許多賣著別處吃不到的食物的餐館。市集中央，有一個明朝花園，裏面裝飾著假山，庭台樓閣，紅衞兵之所以沒摧毀它，是因爲有

個反帝制革命組織的「小刀會」在一八五三年以這地方做爲秘密總部。

接近南陶的市街，因爲假日人潮擁擠而禁止機動車輛通行，胡先生和我下車後，穿過幾條街向市場入口走去，我們隨著人山人海的群衆到達花店時，花已經賣光了，但商店仍擠滿了男女和孩子們，他們正在瀏覽宜興茶壺、杯子、花器、漂亮圖飾的磁器、小動物和花瓶，這些東西在遭受毀損之後最近才再度重現。我買了一個繪有山水、樹石的淡棕色磁壺，也買了一個能當成桌燈的花瓶。

走出花店，胡先生說：「你一定累了，我們找個地方坐坐。」

「搭巴士到中山公園好不好？我們可以坐下來談談，這時候，人不多！」胡先生說。

由於被監禁多年，不知什麼時候起，只要在人群中待一段時間，甚至群衆不對我存有敵意，也一樣會讓我感到不安和疲乏，因此，這枯樹落葉和冰凍的池塘，乏人問津的荒廢公園的確是受我歡迎。胡先生付了兩塊錢的門票，我們走了進去。

即使那是個無風的日子，二月仍是春寒料峭的，因爲四下空曠無人而更使我感到刺骨，儘管胡和我像上海每一個人一樣穿著厚厚的棉衣，但沿著小徑行走時，我的臉頰還是被寒風颳得刺痛不已。一片冬青樹叢中纍纍紅莓吸引了我。最後我們來到一處假山後面，這裏是胡先生說話的好地方，但我忍不住想起世界上有多少人能瞭解，我們爲了要能完全沒有顧慮的談話，竟要這樣躲躲藏藏的。

胡靜靜的看了一會兒，問：「我實在不應該勾起你在拘留所不快的回憶，但我想知道你是否明白了你怎麼會成爲被迫害的靶子？」

「我想是因爲我爲蜆殼石油公司工作吧，有人說蜆殼石油公司的上海分公司是一個『間諜組織』，而我和外子又是英國的代理商。事實上，他們並沒有控訴我任何具體的事，只不過要逼我承認他們所說的。」我再一次想起被那些審訊員凌虐的日子，和我爲了應付每件事付出的代價。

「從他們所有問題中，你沒領悟出什麼嗎？」

「我想那些在我們身上發生的事，可能與所謂『兩條路綫的鬥爭』有關吧！」我告訴他。

「不錯！我想你會發現我將要告訴你的事很有意思。紅衞兵和革命派在一九六七年一月革命之後，就接管了我們的工廠，革命派把我們的黨書記降級爲普通工人，又控告他是『走資派』，他被安排到我這個單位。你知道，文革前我們相處得還不錯，那時我負責工廠的技術部門，而他是黨書記，現在我們兩個人都成了苦力。我們經常在開飯前、沒人時交談，就是他告訴我，你被捕是因爲所謂『與外國公司及政府部門共謀』的嫌疑。」

「他怎麼知道我的事呢？」

「在你被捕之前，紅衞兵來我工廠問你的事，正好黨書記在場，他出來接見，梅萍是位知名的電影演員，當她的死成了話題，你的案子就常一塊被人提起。」胡先生說。

「他還告訴你些什麼？」我問他。

「參與共謀的是周恩來的黨羽，在一場鬥爭大會之後，死得很離奇。據說他是把臉貼在瓦斯爐上自殺的，但當屍體被發現時，窗戶卻敞着，而屋裏也沒有瓦斯味。」胡先生說。

「這麼說，他的死也很可疑嘍？」我想著女兒，不知道何時才能眞相大白。

「但是他家人一口咬定他是自殺的。在北京，周恩來收養的一位人民藝術劇院的導演乾女兒，被捕入獄時，因爲江青把她視爲敵人而受拷問致死。兩位京戲名角兒——馬連良和程硯秋也因爲拒絕承認是國民黨間諜而被打死。他們是被周總理由香港邀請回國的，聽說周總理還是她們入黨的保證人。有很多被控爲帝國主義的科學家，也是被周總理邀請回國的。想想看，假使這些人裏的任何一個承認是間諜，就算不指控周總理掩護間諜，那些激進分子也同樣會懷疑周總理。」胡先生說。

「你的意思是說，你的黨書記認爲我和其他上海外國公司的中國雇員被捕下獄，只是因爲林彪和江青這幫人？他們想要利用我們的口供，來鬥爭周恩來允許外國公司在中國活動的政策？」我問。

「不錯，我的黨書記是這麼暗示。劉少奇被整垮以後，林彪和江青都認爲周恩來是他們發展野心的主要障礙。他們眼裏的周恩來很難纏，因爲他不像劉少奇那樣明顯的反對毛主席，所以必須設計一種詭計，但是，你知道周總理背後有一大群領導人物和老黨員的支持，在權力架構上，它是一股難以擊垮的集團。」

「林彪死了，周恩來是繼毛主席之後最具權勢的人物，他的地位不是更鞏固嗎？」我問。

「是好了一點兒，但還不夠鞏固，因爲江青和她的同黨意興風發，這會兒正靜以待動，現在的問題是：誰是接班人！」

「不是鄧小平嗎？」

「那也不一定，鄧小平不夠敏銳，如果他太急了，激進派的領導階級會感到威脅，那下一回合的鬥爭馬上又要到了。」胡先生說。

太陽西下後，公園裏變得非常冷，在遠處，人們三三兩兩的走向出口，我想我們也該離開了，胡先生問我要不要跟他到飯館去吃飯，但是我意興闌珊，我說我要搭巴士回家去。

在大門口，胡先生告別時囑咐我，有空時他會再來看我：「我已經好幾年沒像今天這樣出來蹓躂了，很高興看到你精神這麼好，你可不要想不開，我會常來設法讓你愉快起來的。」

朱太太站在天寒地凍的陽台上，我猜想她聽到我們談話時出來的。她從嘴上取下香煙，說：「玩得好嗎？」她可能希望我會告訴她去了那裏，好讓她能向社區委員會打小報告，我忍住衝動，只是淡淡的說：「你不覺得站在那裏很冷嗎？」然後逕自上樓。

第二天，我的老友—何安的母親，在我還在上課時候來了。下課前，她為我們兩個準備了一頓簡單的午飯，用餐時，她數度提到新年並不斷說起我的客人，我突然明白她正希望我告訴她有關胡先生的事。但她怎麼知道胡曾來看過我呢？我感到震驚和頹喪，我下了一個不幸的結論：她是那些監視我的人派來的。想到這裏我全身發冷，我決定對她坦白，好讓人不認為我企圖掩飾什麼事情。

「除了年輕人之外，還有一位老朋友也來看我，是老趙在街上碰見，把我的地址給了他

，我昨天跟他去南陶，買了一個宜興茶壺和花瓶。」我說。

「他結婚了？」

「他是一個鰥夫。」

「你早就認識他了？」

「他是我丈夫的朋友。」

「他是做什麼的？」

「他曾經有一家油漆工廠。」

「他對你感興趣嗎？」

「這是什麼意思？」我問她，感到十分迷惑。

「別介意我這麼說，這一代的男人不會要求女人和他一同外出，除非他喜歡那個女人。」我的老友說。

我回答她：「你不可以這麼說，我想他是念舊才來找我的。」我還是認爲胡先生的來訪，與其被人誤認爲有政治意圖，不如堂堂正正說出來的好：「我現在老了，只把他視爲一位好心的老朋友。」我告訴她。

「你是個有魅力的女人，我眞奇怪，你經歷了那些可怕的事，看起來卻比你的實際年紀來得輕。我相信你的紳士朋友最後會要你嫁給他——假如你給他這個機會的話。」

「我不瞭解胡先生，不過，現在想以後的發展不是太早了點嗎？」

「以一個老朋友的立場來說，我希望看到你再婚。在這種社會裏，寡居並不好。你需要

個人來跟你商量事情和照顧你。」她誠心的說。

在她離開之後，我拉下窗簾，躺在床上，我爲自己被監視感到頹喪，何安的母親竟也加入告密者行列更令我悲哀。什麼時候才能再過正常生活呢？我問自己。至於胡先生，我不明白除了在他休假期間來找我作伴之外會有什麼用心。無論如何，我不會嫁給他或其他任何人，我的意圖依然是：當環境許可時永遠離開中國大陸。

自從尼克森來訪後，上海公安局已對私人申請到外國的案件，重新發給外出證，雖然等待時期仍舊很長，而且常常被打回票，但自從被釋放之後，確實許多人取得了護照。我像以前在獄中一樣，隨時注意出現在報紙上毛　的消息並且殷切的盼望聽到毛　的死訊，我知道除非政治上有重大突破，否則很難離開。

過了一會兒，樓下傳來敲門聲，我聽到沿著房子周圍的水泥小道上有沈重的脚步聲。因爲我不想見任何人，所以沒去開門，一會兒，我聽到大德跟朱太太在我窗下談話。

「阿姨不在嗎？」大德說。

「她回家去看家人了。」朱太太說。

他們在花園裡低聲談了一下，然後大德又來敲門，我還是沒開門。

傍晚，朱太太帶了一盤魚上來，隨後跟著她的孫子。

「我知道你不喜歡煮飯，所以準備一點東西給你當晚飯。」她沒提到大德來過，所以我也沒有問，我知道她想以送魚當藉口，上來看看我是不是眞的睡著。

我給她孫子一些糖果，請他們坐下，孩子手裏握著一枚自衞隊的臂章。我開他玩笑：

「你參加自衞隊嗎？」

他拿出臂章說：「這是我叔叔的，他正在接受大德叔叔的訓練。」顯然小孩子什麼也不懂。

「大德在自衞隊嗎？」我問小孩。我雖然驚訝，可是仍盡量保持往常一樣的聲調。朱太太努力想轉移小孩的注意力到糖果上，但他依舊天眞的說：「哦！是的，他還是一位領導呢。」

「眞好，我想等你長大以後，你就會像你叔叔和大德一樣喜歡待在自衞隊！」

這孩子很明顯的說了些瞞著我的事，因爲朱太太不僅感到困窘而且一臉驚嚇，她罵着孩子：「你胡說些什麼？大德叔叔根本不在自衞隊。」

孩子反駁她：「他在！他在！」

朱太太急忙站起來，向我說晚安，走下樓時一路對孩子罵個不停。

自衞隊附屬於軍隊，它過去是由林彪在上海的爪牙所控制，林彪死後，自衞隊的控制權就落入江靑在上海市內黨羽的手中。一九七四到一九七五年間，激進派做了一次大規模擴充，也加強上海自衞隊，希望能發展成他們自己的私人軍隊。

假如大德是自衞隊領導人物，他就不可能是他所說的『待業人』，而因爲自衞隊員是由工廠和政府機關的行動隊中徵募來的。我認爲大德沒在工廠工作，因爲他對書本太有興趣，手也太乾淨了，想必是上海政府的官員，換句話說，他的上司就是江靑的黨羽，我很高興終於能知道大德眞正的身分，他不是屬於警察就是其他類似的組織！老實說，這些對我並不重

要，因為我早就懷疑他表裏不一了。

時間一天天過去，春天又降臨了，屈指算來，我離開一號拘留所整整一年，雖然我並不自由，但我得承認物質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除了關節炎外，我並沒有什麼健康問題。

隨著氣候逐漸暖和，陽台成了我的起居室，我跟學生坐在那兒研讀英文。通常我在陽台上，坐在幾盆茉莉、百合花、羊齒樹和一些我採來的，或學生送給我的花卉之中用餐。我終於順利借到一本唐詩三百首，花了不少時間愉快的把內容抄在簿子上，反覆朗誦，以調劑我的心情與記憶。

八月某一天，夕陽仍流連不落，胡先生像往常一樣路過來看我，他要我跟他出去吃飯，可是阿姨已經弄好了飯菜，於是我邀他留下來一起用餐，我們在陽台上面對金黃色的晚霞吃飯，胡先生心情愉快，與我閒談起在杭州時的孩童時代。在阿姨清理好飯桌之後，大德又出現了，他總是有藉口來看我，這次，他給了我一滿袋的無錫桃子，他說如果等到第二天，桃子就會爛掉。我對胡先生介紹大德。天色漸漸暗下來，阿姨把桌燈拿到窗台上，她也給大德一個大盤子，大德挑出袋子裏的桃子放上去，我看到每一個桃子熟度正好，完美而無瑕疵，它們甚至比我在文革前所能買得到的更好。

「你去那兒弄到這些桃子？」我問他。

「我有很多後門，實際上，我雖然沒唸過大學，但我是一個『後門學博士』。」大德大言不慚的笑著，然後到廚房洗桃子。

大德的忽然出現，似乎使胡先生感到窘迫，他突然沈默不語，過了一會兒，他在離開之

前禮貌的恭維了大德那完美的桃子，我送他出門—每當大德來時，朱氏一家就不再出現，也不再注意我了。

「如果可能的話，我明天會再來。」胡先生與我握手道別。我再度回到陽台，大德對我說：「他是個資本家，對不對？」

「你怎麼知道？」

「我可以從他的擧止判斷出來，除此之外，他還有銅臭味，就像所有資本家一樣。」大德激動的說。

「我也可以看出，你十足是個紅衞兵首領。」

「不！當我還是紅衞兵的時候，我只不過是激動的狂熱分子罷了，現在我是馬克斯主義者。」

「你是黨員嗎？」

「還不是，不過不久之後就會是的。」

「既然你這麼痛恨資本家，那你爲什麼還想要跟我學英文？你沒有發現我跟資本家一樣令人厭惡？也散發著銅臭氣？」

「你不一樣，因爲你對錢不在乎，我認爲你不會成爲眞正的資本家。你的麻煩是太天眞，相信仁慈、慷慨。所有資本主義國家的統治階層都以這種垃圾思想來愚弄人民，而不知不覺傷害到革命精神。」大德說。

「你知道資本主義國家什麼？你又不是他們。」

「可悲的是，我永遠去不了資本主義國家。」

「假如你有機會，你想去嗎？」我問他。

「當然，在美國或者歐洲國家，我能努力工作來開創自己的生活，這樣，我會幹得很好。」他渴望的說。

「你把我弄糊塗了，前不久，你想加入共產黨，現在你卻說有機會就要出國，你是不是想在資本主義國家裏發動共產革命？」我問他。

「當然不是，因爲我必須留在這裏，所以才非加入共產黨不可，如果我能到資本主義國家去，我也可能成爲一個資本家。」他無奈的說，好像在想我竟笨到無法瞭解他的完美邏輯。

「什麼！我以爲你痛恨資本家呢！」

「我現在是痛恨他們，但如果我是他們一份子，我就不會恨他們了，不是嗎？」

「如果你成爲你所痛恨的人，不會感到不舒服嗎？」

「怎麼會？你不瞭解『唯物辯證論』嗎？」

大德離開之後，我坐在陽台上左思右想，覺得他是我一生中從未遇見過的怪人。馬克斯主義者相信人的個性是由環境造成的，大德是典型中共革命下的產物，事實上，我覺得他十分可憐，他聰明又勤奮，假如他能在自由社會裡生活與工作，他一定會成功，我認爲他在中國大陸前途無亮，雖然是黨員，但由於他的自大與自負，他必定會是一位個人主義者，而共產黨絕不容許個人主義者的存在。自他姨丈死後，他已經失去成爲無產階級中堅分

子的身價。

胡先生隔幾天後下了班再來，這次我跟他去一間嘈雜的飯館，坐下後，胡先生說：

「你那位學生似乎很有一套，我認爲他帶給你的那些桃子，只有地位高於上海革命委員會副書記的人才有辨法弄得到。」

「我想他是經由後門得到那些桃子的。」

「不，絕對不是，它們只保留給不需付錢的高級幹部。」

「難怪他不肯告訴我，我該給他多少錢。」

「問題是他爲什麼要拿這些桃子給你。」胡先生似乎很焦慮。

「那可能只是看我的藉口，他必須帶些不容易得到和沒有冰箱不能保鮮的東西。」其實我知道大德是爲了胡先生來的，但我不想告訴他，免得他憂心。

「你知不知你被監視？」他問我。

「當然知道！」

「那你知不知道這種嚴密的監視很不尋常？當你被釋放的時候，他們有沒有對你說些什麼？」胡先生問我。

「沒說什麼，也沒說我是無辜的，他們只說我已經受過再教育了，思想上也有一點改進。」我又記起最後一次在拘留所審訊室裏的質詢。

當胡先生正在考慮我的話時，我記起了那位來自攝影廠的人。

「有位上海攝影廠的人說我是因爲生病才被釋放的。」

「眞的嗎？你也認為假如你沒生病的話，他們會繼續留你？」他焦慮的問我。

「他們以為我得了癌症。」

「或許你的案件還沒完結，而所謂的『同謀』罪名也還沒解除，這樣才能解釋為什麼你受到這麼嚴密的監視了。」胡先生說。

「他們別想找藉口再把我關進拘留所！」我說。

「你有沒有想過和倫敦或香港的蜆殼石油公司聯繫？」

「政局這麼不穩，我不會輕易跟國外任何人接觸。」

「假如他們設法跟你聯繫呢？」

「這問題我已經想過了，假如我收到任何來自國外的信，就把信送到公安局，問他們我該不該回。」

「那是最聰明的，政局並不樂觀，江青又想復出。最近在報上注意到關於她的報導嗎？我聽說毛主席比以前更信任她。」胡先生告訴我。

「為什麼黨裏面權利鬥爭，遭殃的卻是我們？我們又不是黨員！」我無助的感嘆著。

飯館雖然擁擠，胡先生和我卻能自由的談話。

晚上仍很悶熱，我們走路回去，沿街兩旁都是些坐在板櫈上搧涼或睡在長板上的人群。目前上海人口已高達一千萬，政府不准人民私建，又沒有額外住宅可提供市民，結果造成許多家庭共用一間房子的不便，在昏暗的街燈下，上海的街景蕭靜慘淡，像極了一處龐大的難民營。

胡先生說的對，政治局勢正在惡化，一九七四的下半年，江青的名字不斷出現在北京日報上——明顯表示她的權力不斷高漲。她以毛澤東的代表或以她革命領袖和政治局委員的身分接見外國政要，她以女主人自居，邀請那些人去看樣板戲或者共商國家大事，幾乎每天報紙的頭版都有她的照片及其活動的報導。

「批孔批林運動」是指批鬥林彪和孔子，江青運用對報紙和所有主要刊物的控制權，親自指揮這個運動。她的同僚姚文元把一些毛派作家組織起來，提供給報紙固定的作品，並且透過教化與讀書，動員全國人民參與這個運動。儒家哲學不甚受到注目，一篇又一篇的文章強調一件小但廣爲人知的事實：孔子五十歲時，在魯國擔任公職並且做過宰相，毛派作家宣稱孔子是墮落的封建人物，因此是阻撓進步的障礙。

每個中國人都知道，江青的「批孔運動」實際上是在對抗總理周恩來。他們指桑駡槐，批孔文章更一步宣稱，在孔子那時代，有一個進步的學派—法家。儒家和法家之間的鬥爭被比喻成革命派和走資派的鬥爭。

由於厭倦領袖之間的鬥爭，中國人民，包括軍人黨員，普遍都傾向周恩來。有關江青的謠言滿天飛，其中有不少是揑造中傷她的。她實在是一個不受歡迎的人物，因此許多有關她那放縱的私生活以及稀奇古怪的男女關係，成爲民衆茶餘飯後的話題，愈來愈多抱著嚴肅態度的人擔心毛澤東支持他老婆及其他激進的領袖，他們認爲，由於鄧小平、周恩來扭轉文化大革命的趨勢嚇着了他，而使毛害怕在「文革」所倡導的東西和他自己會被全面推翻。

由於「批孔」引起政治情勢的緊張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再興，我的幾個學生輟學了，他們

擔心學英文又會變成一種禁忌。居民委員會活動日益頻繁，研討會緊鑼密鼓的召開，愈來愈多的人們被組織起來支持「批孔」，關於林彪的批鬥則日益減少，阿姨提醒我，外出時要穿棉夾克，免得引人注意。我們每天的伙食愈變愈差，因爲她愈來愈捨不得向那些溜進城的鄉下人買雞蛋和雞。

剛入冬時，就發生一件不尋常的事，這事提醒了我又有被控告的危險。

有一個鄉下女孩拜訪我，她叫陳蘭，（是梅萍的朋友，在到上海影片攝影廠工作之前，梅萍根據國會的指示，爲了體驗農民生活而在上海外的馬路人民公社逗留了六個月，那時就住在陳蘭家，一塊兒生活及工作並成爲好朋友。）根據陳蘭所述，梅萍敎她讀書和寫字，告訴她外面的「天地」，令她大開眼界，並且介紹一些女孩子喜愛的：像冷霜及洗髮精之類的東西，陳蘭還告訴我，有一次她母親突然生病，當時沒有人在家，梅萍向生產大隊借了條船，載著她母親由河港划到縣立醫院，及時做了緊急手術，從此之後，陳家對待梅萍就像親生女兒一樣，而這兩個女孩也更要好了。

陳蘭來看我，爲我帶了一張梅萍和幾個鄉下女孩合影的大照片。她噙著淚說：「這是我最珍視的財產，但是，我知道您已失去所有的照片，所以我希望您留住它。」

我告訴她我要複製一張，然後將原來這一張還給她，可是過了好幾個月，我始終找不到一家相館願意接這份簡單的生意。正當我打算橫過蘇州港，到城另一頭去試試其他相館時，聽到有人敲樓下的門。阿姨下樓去，接著我聽到一個男人的聲音：

「我是她女兒的朋友。」

一會兒，阿姨走進我的房間，後面跟著一個身材魁梧的年輕人。

我放下相片站起身。

「我叫劉英，是梅萍的朋友。」自我介紹後，他拿出一個禮盒：「我聽說你被釋放了，所以來看看是不是有需要我幫忙的地方。這是一盒長白山產的人參，上海是弄不到的，因爲我到東北出公差，所以爲你帶來一盒。」

一盒長白山人參算得上寶貝，它的價格相當於一個工人一個月的工資，我感到詫異，他到底想用這麼昂貴的禮物從我這裏換得什麼呢？我對他說：「非常感激你送我人參，可惜我向來不吃人參，能不能借問一下，你怎麼知道我地址的？」

「我到上海影片攝影場的革命委員會查詢時，他們給我的。」

這顯然是一個謊言，因爲中國高級幹部不會答應諸如此類的個人請求，我也不相信他是梅萍的朋友，他的長相和說話的樣子不像是梅萍會交往的人。他爲什麼要拜訪我？他想要什麼？我極想知道原因，同時，我有種感覺，他可能是被那些希望我遭殃的人派來的。

「阿姨，請你倒杯茶給客人，好嗎？」我走到門邊，告訴在廚房的阿姨。這禮貌性的舉動使我的客人安心，他微笑而且心情輕鬆了一點兒，坐在我要他坐的椅子上把禮物擺在桌上。

我也坐下來，問他：「你在『文革』之前來過我家嗎？我怎麼不記得見過你，而且梅萍從未向我提過你。」

「你們母女非常親密，對不對？每個人都知道，你們深愛對方，這就是我爲什麼要來的

原因，而且我想和你討論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的身體向前傾，一副神秘兮兮的樣子。

「我知道有些人願意幫你抓到兇手，這些人並不要求金錢或報酬，他們只是希望幫助你。」

多麼不尋常的提議！「文革」時期發生的每一件事，它們的正確性在「批孔」運動再三的受到官方肯定的宣傳，對我而言，想再涉及任何有關我女兒去世的舉動，都足以使我立刻回到一號拘留所，所以我很快的答道：「我對抓誰不感興趣，雖然女兒的死讓我很傷心，但這事我不想再提，反正她死了，任何事都無法使她復活。」

「你怎麼這麼寬宏大量！做為她的母親，為她復仇是你的責任。」他說。

「我相信有一天會眞相大白，到時候政府自然會展開調查。我對於『人民政府』十分有信心，你能不能告訴我你在何時何地認識梅萍的？」

「我是在馬路人民公社遇見她的，她住在一位農民家裏，我常找她聊天。」

「你在馬路人民公社裏待過？」

「是的，我在那裏做一些科學性質的工作，就在那時候認識她的。」

他眞的是梅萍的朋友？他眞的在馬路人民公社認識梅萍的嗎？我想我可查出他的話是否正確，我問道：

「既然你在馬路人民公社待過，那你一定知道陳蘭，就是那個和梅萍很好的女孩。」

「哦！是啊！我常看見她們在一塊。」他說得很慌張。

我把梅萍和幾位鄉下女孩合照的相片遞給他。

「有人給我這張相片，我從未見過陳蘭，你能告訴我那一個女孩是陳蘭嗎？」

他看了一會兒，指著和梅萍搭肩的女孩。猜是很會猜，可是他所指的女孩並非陳蘭，陳蘭站在排尾，離我女兒很遠。

這項錯誤證明他根本不認識梅萍，他爲什麼來呢？只是誘我爲梅萍的死復仇，誘導我做錯某些事嗎？或是他希望得到某些東西？我悶不吭聲，他以爲猜對了，自覺得意非凡：「我會經常來看你，慢慢讓你對我熟悉，我對世界大事有興趣，相信能從你那裏學到不少，而因爲我是個科學家，你也能從我這裏學到不少，如果你不願意直接和那些我告訴你的人接觸，我可以當你的密使。」

「你爲什麼要這麼做？和那些牽涉我女兒去世的人作對不危險嗎？」我問他。

「我愛梅萍，自從聽她的死訊後，一直很思念她，我和你一樣痛恨兇手，爲了替她報仇，我願意做任何事。」他說得很假，還裝出一副傷心的樣子。

「你愛梅萍？那你一定和她很熟，奇怪，他從沒跟我提過。」

他臉紅了：「我雖身在異地卻一直愛著她，她不知道這件事，就叫它『單戀』吧！」

「你很浪漫，但是我認爲有不白之寃也應該讓政府來調查，不管我們多憤怒都沒有權力做任何事。」

「現在的政府絕不會做任何事，是他們唆使兇手，難道你看不出嗎？你怎能期望他們做出什麼事？」他把音調提高，顯得很不耐煩，可能我沒上當使他感到失望。

「請冷靜點，你不可以毀謗政府，你說是政府唆使兇手，這是反革命的，我不許我的客人在我家說這種話。」我用一種嚴厲的語氣警告他。

「你是個謹愼的女人，不管我們私下說什麼。自從發生在梅萍和你身上的事之後，你一定恨共產黨還有人民政府，即使你嘴裏不說。」

「你大錯特錯了，我並不恨共產黨也不恨人民政府，但我會考慮你的話，假如我改變主意，自會跟你聯絡，你的工作證？我想知道你的身分並且抄下你的地址。」我問他。

「你沒有必要看我的工作證，我把地址寫給你。」他似乎對我的要求感到慌張。

「假如你要我信任你，你一定要給我看。」我堅持著說。

他很不情願的遞給我他的工作證，我戴上老花眼鏡用心看它。這工作證是由一家工廠發給，編號只有一個數字，在中國，人們都知道這類工廠是軍方的，此外，在工作證上印有「機密」二字，他似乎是在武器製造廠從事機密工作的技術人員。

在我被拘禁的期間，我極力辯護我不認識任何知道政府機密的人，和任何在軍事工廠從事機密工作的人接觸，因爲這樣不僅會讓我無法離開中國，並且會遭到誣陷，所以，我打開房門，叫出阿姨：「我要對客人說些話，你當個見證人。」轉過身來，我把工作證還他，對他說：「劉英，我不准你再來看我，我有『外國關係』並曾被誣告成帝國主義的間諜，而你，身爲一個從事機密工作的科學家，來看我就已犯了嚴重的錯誤。你回工廠以後，必須立刻向黨書記坦承你的錯誤，而且要把跟我說的話全部向他報告。」

他站在那裏，一副手足無措的樣子。

「阿姨，記住，你以後絕不能開門讓這年輕人進來。」

我把門開得大大的，又對劉英說：「由於你從事的是機密工作，我斷定你是黨員，我很

驚訝你會這麼笨，小心我會向警方告發你。現在你走吧！永遠不要回來。」

他一言不發的走了，但我發現他把那盒人參還留在桌上，我叫阿姨趕緊拿去還給他，但是他已經騎著脚踏車消失在路的盡頭。

我對整個經過感到憤怒，打消了外出的念頭，阿姨帶給我一杯茶：「別生氣了，這划不來的。」

一會兒，大德衝上樓來氣喘喘的說：「啊！你在家啊，好極了！」

「你明知道我在家。」我對他說。

「發生什麼事了？什麼事使你生氣？」他表示驚訝。

「別裝了！」我遞給他那盒人參，並說：「拿回去，叫他們停止這種蠢把戲。」

「我會拿走任何你不想要的東西，但不會告訴任何人去停止他們的把戲，我幹嘛那樣做！爲什麼不一笑置之呢？你會害怕嗎？你不是聰明得足以看穿任何把戲，並能讓玩把戲的人感到不快嗎？」大德用他那一貫的狡黠的口氣說。

「你眞不誠實！」我說。

「爲什麼要誠實？在你有過那些遭遇以後，你應該知道誠實會害死自己，現在不誠實的人才活得下去！」

「請你回去！我沒心情聽你胡說。」我告訴他。

「我不過想讓你高興，好吧，明天你覺得好些時我再來。」他走了，帶走那盒人參。我不相信他會送回去，不論它來自何處，我甚至懷疑，他會把它帶回去送給母親，大德就是那種人。



第十六章　毛澤東之死

劉英的造訪絕對不是單純的事件，在他之後，陸續有許多自稱是我女兒的朋友來訪，其中有些人我知道他們的名字，但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沒有一個人來過我家。他們不是同道來，而是一次來一位，有的甚至是晚上到我家造訪，每在談論梅萍之死約一小時後，我就確定這將是個無眠的夜晚。

「阿姨，你別再開門讓那些自稱是我女兒的朋友進來，好嗎？他們所談的，不外是她如何死在兇嫌手上，或是要我怎麼替她報仇等等。我已經煩死了！」

「只要我在這裏，就得開門讓那些人進來。我知道你深受困擾，每次他們走後，你總是很累，可是我能怎麼辦？如果把我給辭了，你就能自己做主。」她悲哀的說道。

「你找得到別的工作嗎？」

「老實說，我比較喜歡爲你工作，而且我也不可能找到這種待遇和你這麼好的人了！」

我不想辭掉她，但很明顯的，她奉命讓那些訪客進來，我只好想別的辦法。

「假如我替你出房租，你能住到別處嗎？」房屋短缺是上海極嚴重的問題。

「最近我的一個表姊死了丈夫，或許她會讓我搬去一起住。你要我外宿？」

是的，這將是最好的安排。阿姨只要在早上來工作，就可以得到一樣的薪水及房租補貼；而我則得到一整個安靜的下午和晚上。這樣就不會使她爲難。

禮拜天，阿姨搬入她表姊家裏。我在門口掛上牌子，寫道：「由於年邁加上身體不適，本人需要休息。如無預約，請勿打擾！政府幹部，若有公事，歡迎隨時入內。」下面簽上我的名字。

翌晨我走進庭院，看見牌子被撕得粉碎，丟在地上，朱太太正站在巷子裏，我拾起碎片趨前問道：「是你家的人弄的嗎？」

「我們從不走近那扇大門，而且，每次去你家，我都走後門。」她那遊手好閒的兒子也站出來說：「昨晚一定有人爬過牆來，我們曬的兩件襯衫被偷走了。」

「可不是嘛！這附近到處都有小偷。上次研討會開會時，黨部書記還要我們特別小心呢！」朱太太補充道。

我一點也不相信是小偷幹的，便問道：「你們報告公安局了？」

「還沒！」她兒子瞥了母親一眼，迅速的說：「我們待會兒會去。」

「我現在就去。」我望了望手錶，時間正過八點。

「不用麻煩！我們會去。」他急忙道。

「我現在就去。」拿著紙片，我朝巷底的公安局走去。這幢建築原是上海富賈的居所，而一家人早在共黨統治前搬到香港去了，這附近，就屬它還算得上氣派，裏面還有個漂亮的花園，現在，裏頭凌亂的被隔成幾個房間，有幾張桌子和板凳隨意的放置。我站在櫃枱前，

一位女警抬頭問道：「什麼事？」我報上戶口號碼並要求見負責該區管理的老李。她回答說他們正在開研討會，要我先回去。我不願拖延這件事，執意在局裏等待。

坐在板凳上，看著一些人進進出出辦出生、死亡、遷移的證明。時針似乎走得特別慢，但我仍堅持著，直到十一點過後，裏頭的一扇門才打開，一個穿制服的人走出來。

「告訴老李，有個太原路的人要見他。」那位女警說道。

一會兒老李走了出來。他是個粗壯的男人，態度輕鬆，不像一般公安幹部，貌似忠厚但精明得很。我不知道自己在他眼中是不是個討厭的人，不過却很尊敬他的公平與機警，他很少到我住處，即使來也很有禮貌，不像人民共和國的早期，一些年輕的傢伙一進門，就在我家地毯上亂吐痰。

我說明來此的原因，包括朱家的失竊案及我手中的碎片，他將碎片重組，讀完後，眉頭一皺：「怎麼回事？」

我注視他的神情，知道他不曉得我有那羣訪客，但我並不排除公安局裏有幾個幹部，尤其是那些文革時期的毛派分子可能私自安排這項事件。從一九七〇年以後，文革時的毛派和復職的老幹部一起在各個政府機構工作。在那種劍拔弩張的氣氛下，什麼事也沒做成，毛派進行計畫時，總是小心翼翼的不讓高幹們知道，而前者也怕後者恢復文革前的氣燄，因此，一些復職的老高幹常令人覺得只是一具空有虛名的傀儡！

我告訴他紙牌上的告示，是爲了阻止那些來偵詢我女兒死亡事件的訪客，並補充：「朱家告訴我，這是小偷弄的。」

「好的，今天下午我會去告訴朱家。」老李會意的說。

我道完謝，回到家時，阿姨早就來了。我告訴她整件事情的經過，她也認爲是朱家幹的。「他們爲什麼要那麼做？」我問道。

「一定是有人指使。」她輕聲答道，做出「隔牆有耳」之態。

我已經想過，老李既然允許我掛上告示，我決定再做一個，那天下午，我一個人安靜的度過，門上的告示也沒再被撕破。

但翌日阿姨離開後，我的毅力就受到考驗了，先是何安的母親，她是我的老朋友，來到門口，我以爲她讀完告示以後會走開，但她沒有，她喊了我好幾聲並敲門，我決定不理她，最後她沒趣的走了。隔天則是我的姪女，她是我死去妹妹的女兒，文革時，只是個十幾歲的小女孩，却因爲出身不好被狠狠批鬥了一番，因此特別害怕那些反毛派，由於我去過拘留所看她，所以她很信賴我，看到她來，我吃驚不小，因爲我叫阿姨通知她過年才來我家聚聚。現在我對她也一樣置之不理，最後她只好走了。

我懷疑她們兩個人都是被派來試探的，於是我決定去拜訪何安的母親，當向她解釋來訪的原因，她低頭遲疑不敢說話。

或許，她是害怕萬一說出實情，日後我會洩露說出是她告訴我的。

一會兒，她問道：「你爲什麼不對那些人忍耐點？睡不着的話，可以吃幾顆安眠藥啊！別自找麻煩，難道你不怕他們？」

「不，說來也奇怪，我一點也不怕，我要想辦法還擊，否則我會死不瞑目！」只要一想

到女兒的寃死，我就更恨那些毛派，還擊至少能讓我痛快一些。

「我們是老朋友了，假如我做了一些我不想做的事，希望你能諒解，唉！在這種局勢下，誰也不能永遠做自己眞正的主人。」她說。

「我瞭解，眞的。」我回答，起身離去。

她陪我走到街上，說道：「假如我向別人說，我身體不好不能拜訪你，你不介意吧？你知道的，我的心臟愈來愈差了。」

「當然不會。我會想念你的，這樣也好，免得你爲難。」

「希望不會太久。好好保重。」她如釋重負，與我揮手道別。

我堅持卽使大德，也要先預約才能見我，幾個星期之後，訪客終於不再來我家了！

但是騷擾却沒有停止，只不過是由我家轉移到大街上。有一天，我散步回家，突然來了一羣小學生對我大叫：「間諜，資本主義的間諜、走狗。」我不理他們，繼續往前走，但有兩個比較大膽的小孩却擋住我的去路，對我大吼大叫。我停下來說：「跟我來，我們好好談談。」他們聞言撒腿就跑，我到居民委員會抱怨，但他們說：「無能爲力。」

日復一日，小孩們總等在那裏大聲侮辱我，我試著改變散步的時間，但沒什麼差別，而且，我發覺每次都有一個坐在腳踏車上的男人，遠遠的看著，孩子們一開始向我辱罵，他就騎車走開。

雖然那羣討厭的孩子讓我在路上引起側目，但我仍不放棄散步的習慣。幾個星期以後，阿姨發現前門被人用粉筆寫上：「這裏住了一個自大的資本主義間諜。」阿姨氣得要拿抹布

擦掉，我阻止她。

「這簡直是侮辱！而且別人經過門前會怎麼想？」她說。

「他們愛怎麼想，就怎麼想吧！何況他們早該熟悉這種事了。文革早期，不是很多人家門口都這麼寫著嗎？」

下午，我照例走出家門，看到那個騎腳踏車的男人正在對街，這次他站得很近，我看清楚他大約三十出頭，有一頭濃密的黑髮，而且注意到他的腳踏車座墊是鮮黃色，他一看到我，立卽騎車離開，我關上大門，不理會門上的字句，逕自外出散步。

幾天後，一陣大雨將門上的字淋刷殆盡，而孩子們似乎也厭倦他們的遊戲了。最有趣的是，大德來我家上課，對門上的那些字也不予置評。我總算享受了幾天耳根清靜的日子。

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七日是我自拘留所出來的兩週年紀念。我坐在陽台上，在慘淡的春陽映照下讀著唐詩，安靜的度過早晨。下午，我回憶多年的牢獄生活、私刑與詰問、寒冷、飢餓與痛苦的折磨，不禁看著手腕上的疤痕，知道它將伴我至死。一想到四周埋伏著敵人，不禁懷疑自己會被捉回牢中受他們的殘酷虐待，我得提高警覺。

我太沮喪了，所以錯過平日午後的散步時間。後二天，天空飄著細雨，迨一放晴，我便迫不急待的想出去運動。

阿姨請我拿舊拖把去合作社換把新的回來。三點，我拎著舊拖把出去。當我正要穿過大街時，不知什麼東西猛的從我身後撞來，我尖叫一聲跌在地，立刻，煞車聲四起，一個男人迅速將我拉到一旁，一輛公車壓上我的拖把柄，將它輾得扁裂，司機探頭出車窗，對我叫罵

道：「你瞎了啊？想找死啊！」而後發動引擎，開車走了。

事情發生得太突然，我一時恍恍惚惚，無法恢復正常，只覺得心臟狂跳搖搖欲墜。

「是輛脚踏車撞的，他沒停下來。」救我的那個人說。

「謝謝你救我，我眞不知該怎麼感謝你？」我的聲音抖得聽起來像來自別人的口中。

「還好是那輛巴士及時煞車，你最好到醫院檢查一下，看有沒有傷到筋骨。」

「我沒事，只是受了點驚嚇。你一定得到我家來，讓我好好謝謝你，或許，你可以陪我到公安局報案。」

「你沒當場捉到那個人，報也沒用，而且，我正要趕去開會。」

「你看到是誰撞我嗎？」我問道。

「沒注意，但我看到他的脚踏車座墊似乎會發亮。」

「是不是鮮黃色的？」

「我不敢確定，那個人坐在上面，對不起，我得趕去開會。」說完，他便騎車離開。

我知道，那個男人故意撞我！走回家中，我服了兩片阿斯匹靈，睡了一小時。醒來時，發覺全身痠痛，幾乎無法動彈。掙扎的走下床，想洗個熱水澡，但阿姨不在，我沒法燒開水，夜晚似乎過得特別慢，我睡得很不舒服。總算熬到早上，阿姨開門進來爲我準備早飯。

當她看到我的模樣，聽完「意外」後，她憂心忡忡的做著清掃工作，整個早上，她看來似乎隨時要哭出來似的。或許她覺得該負一半的責任，因爲她向某人報告我的行踪。

當阿姨爲我預備熱水時，我躺在床上休息，突然想到今天下午，胡先生要來看我，此刻

我雖然寧願留在床上，但仍勉強起身收拾房間。四點正，胡先生來了，我拿出阿姨準備的茶點招待他，並敍述我的近況。當他聽到我出意外時，竟嚴肅的望著我：「請你讓我照顧你！假如你願意的話，我會很高興。」

這是求婚嗎？我驚訝的怔在一旁。他似乎因我的沈默而不好意思：「你以爲婚姻只是年輕人的專利嗎？或許我的求婚太唐突了。」

「喔，不！我不是這個意思。我很感激你，但我已在亡夫面前宣誓，永不再嫁。」

他溫和的微笑，執起我的手說道：「我很敬佩你對他的堅貞，我一直就很尊敬他，他是個好人。」這句話消弭了彼此的尷尬。

從那以後，胡先生常來我家。一九七七年，他告訴我已獲復職，現在又是公司的助理總裁兼總工程師。他忙著使公司恢復文革前的生產量，整個人看起來朝氣蓬勃，似乎年輕了十幾歲。

一九八〇年，我獲准離開中國大陸時曾寫信告訴他。他回信說，他知道我想離開這個國家，但却不能瞭解我風燭殘年離開祖國的心情。

意外發生後沒幾天，大德帶來他的喜訊，興奮的提及即將來臨的北京之行，並要求我教他一些國際禮儀。從他口中，似乎暗示要去北平的外交部受訓。雖然他去那兒，暫時還沒有工作，但看到他興高采烈的模樣，我仍向他握手道賀。當他知道我出「車禍」後，一臉驚訝的問：「怎麼會這樣呢？」

我諷刺的問他這不是他早已知道的嗎？他似乎看出我的想法，漲紅臉罵道：「你以爲整

件事都是我在幕後策畫的嗎？你以爲這個世界上，好人與壞人分得那麼清楚嗎？告訴你，我從來沒涉及危害你的事件，何況，除了我的母親以外，就屬你對我最好了，你確定那不是件意外嗎？」

我搖搖頭，告訴他那男人騎著有鮮黃座墊的脚踏車。他聽完臉色大變，似乎他知道那個男人是誰。

「假如我給你一點建議，你會生氣嗎？」我搖頭，示意他說下去。「你知道，有些握有權勢的人討厭你的膽識，他們喜歡別人對他們卑躬屈膝，但看看你做的—在門口掛上那種告示，又把阿姨送到外頭去住。你難道不曉得，居民委員會隨時可以要另一家人住進那間空房？」

「那間沒有浴室，他們不能走進我的臥室，使用我的浴室。」我答道。

「那你就錯了。上海有許多人家擠在一棟房子裏，根本沒有浴室，居民委員會沒要別家住進來，已經算對你開恩了哪。但是我要告訴你，整件事沒那麼單純，某些幹部雖然同情你過去的遭遇和你女兒的死亡，但局勢不停在變，希望你能退一步想想，別惹上一些不必要的麻煩。」

我答應會好好想想。而後回到他北平之行的話題上。

「事實上，我不是去受訓。江青同志說外交部必須重新組織，所以派一些信奉毛語錄的年輕男女混入外交部，她說：『在混凝土中加些沙子，它才會鬆散。』畢竟陳毅和周恩來控制外交部太久了，現在整個部門充滿了資本主義色彩，該是無產階級改革他們的時候了。」

「到北平以後，你會馬上到國外就任？」

「我不知道。江靑同志的意思是這樣，但恐怕還得一段時間，無論如何，我的名單已經送去了，希望能獲准去北京，畢竟名單裏面以我的英文程度最好。」

「我希望你能獲准。那樣總比在上海和那些革命混混搞在一起好。」這次他紅著臉，沒反駁我。

整個早上，我們一起研究國際禮儀。當他離去時，眼中充滿對未來的憧憬，畢竟，他在地方上服務了這麼多年，現在該是回報的時候了。

一九七五年，新聞輿論大肆刋登批孔的文章，掀起全國人民一波又一波的批孔熱潮，名之爲「革命動力」。有一天，上海解放日報刋出一整版有關義大利名攝影師安東尼奧在中國大陸拍攝照片的廻響，那些照片充分反應出大陸的貧窮、落後與醜陋，因此一直沒正式刋登在新聞媒體上，我們從未聽過安東尼奧這個人，一經披露，我們的硏討會將他批評得體無完膚。我讀著那篇文章以及稍後人民日報上的陸續廻響，漸漸覺察出整件事情背後一定有人指使，加上後來聽說那些照片流傳於海外各地的大使館，甚至用來供外國人參觀，更肯定我的懷疑。最後證實，指責安東尼奧事件的主要目標就是要打垮周恩來及鄧小平，因爲報紙指出是他們允許安東尼奧拍攝的。

爾後，許多類似安東尼奧的事件被揭發，總而言之，爲的是打擊當時正大力提倡恢復工廠和農村人民公社生產力的周恩來與鄧小平。

那陣子流行一句標語：「我們寧願要社會主義下的低生產力，也不要資本主義的高生產

力；我們寧願要社會主義所帶來的貧窮，也不願資本主義所帶來的財富。」甚至有人說：「我們寧願要社會主義下誤點的火車，也不要資本主義下準時到達的火車。」在這種荒謬的鼓吹風氣下，有的工人害怕做得太多，農人不願到田裏工作，而司機們則故意誤點，因此使得文革後逐漸恢復的生產力，在毛派瘋狂叫囂領導下，又逐漸走下坡。

報紙也喊出頭條口號：「打倒文革時期的右傾翻案風！」而所謂的右派分子暗指的就是鄧小平，他們稱他爲：「資本主義同路人」。雖然鄧小平在一九七三年復職，但人們對他的指責仍然不減，甚至愈演愈烈。當時人們怕得罪毛派，怕被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整個大陸再度呈現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景象。

周恩來提出的四個現代化計畫：工業、農業、科技以及國防的四大現代化，曾獲得人民代表大會的同意，在毛派激烈的宣傳戰漸被遺忘後，鄧小平繼續致力於改善大陸生活並實現四個現代化。鄧小平恢復大學入學考試制度之後，仍向毛的意識型態讓步，凡是考生均先得到工廠或農村人民公社學習無產階級的勞動，而毛派分子却在遼寧省弄出「張鐵生事件」來諷刺鄧的改革。當時，該省是由毛的姪兒毛遠新管理。根據報紙的說法，張鐵生沒有在試卷上作答，却在答案卷背後大肆批評「前資本主義同路人」使中國退回到文革以前的情況，他的結論如當時的標語一樣：「打倒文革時期的右派翻案風。」於是張鐵生成爲全國青年的英雄，而且被送到全國各地宣傳「打擊文革時期的右傾翻案風」。

由於毛遠新是江青的親密戰友，大陸人民漸漸瞭解「張鐵生事件」只不過是毛派分子的

宣傳戰略之一。

有一天，我在修剪玫瑰花枝，看見朱太太的兒子正送走一位客人，他回來時，要求與我談話，我遂邀他上樓。

「我那位客人從一九六七年就成爲副主席王洪文的親密戰友。他們都參與上海工人革命司令部的成立，因此每次王副主席來上海時，總會一起喝酒、吃飯。」他說。

我知道他想要說些什麼，因此靜靜聽著。

「這幾天，他將應副主席之邀去北平。只要他對王說一聲，你的麻煩就全沒了。」

「我會有什麼麻煩呢？」

「第一，你至今仍未復職，而且女兒死得不明不白的，我想你會替她報仇，而這一切只要王的一句話，就都辦得到。不過，你得付些代價，以你在人民銀行的錢，一定付得起，或許也可以幫你弄張到香港的出境許可，而這一切只要人民幣一萬元。」

我心中暗暗的訝異著，從一月上海革命的英雄到國家的副主席，竟然都接受人民的賄賂，太不可思議了！我想這可能是個陷阱。

「謝謝你願意讓朋友幫我忙，但目前我並不打算去香港。至於復職及我女兒之死，我想，人民政府會適時處理這件事，我不想拿這些小事去麻煩王副主席。」

「你難道不曉得時局在變動嗎？假如你不先私下和高級長官溝通，政府不會爲你辦任何事的。」他微怒道。

我瞄了瞄門口，暗示他降低聲調。

「我得信任人民政府是爲人民辦事，對吧？」

「沒見過你這樣死腦筋的人！」他氣沖沖的甩上大門。

顯然，他非常懊惱我的拒絕，因爲他可能因此失去一筆傭金。

幾天後，我向大德提議上餐廳請他吃午飯，他却說：「別去了。現在餐館的一些好菜都被拿去伺候外國人，普通人民吃不到。」但他提議弄些菜來我家煮。隔天晚上，大德帶著魚、蝦、雞及一瓶紹興酒和兩瓶啤酒。飯後，他愉悅的坐在安樂椅上，說道：「我的手藝不錯吧！」

「眞是好極了！現在……我想問你一些事。」

「嗯……，看來我得爲這一餐付點代價，很樂意告訴你。」

「我想請你爲我分析一下目前的局勢，但你不必告訴我你不想說的事。」

「我告訴過你，現在正處於轉變的關鍵上，尤其是在黨和政府之間，他們拿不定是要保留文革時期的甜美果實呢？還是要走回『沒有劉少奇的劉少奇政策』？」他分析道。

「什麼是『沒有劉少奇的劉少奇政策』？」我問道。

「就是鄧小平現在做的。」

「我以爲輿論針對的是周恩來。」

「鄧小平是周的那一派，周恩來已經病得快死了，而爭論的焦點就是誰是周的繼承人？鄧小平？或張春橋？周和一些老黨員比較喜歡鄧，但一旦由他接掌，恐怕又要走回文革時期的右派作風。」

「副主席王洪文呢？他會不會接任毛主席的位子？」

「哦，不！他只是幫江青暖暖椅墊罷了，他不可能在毛活著的時候，坐上副主席的位子；但一旦毛死了，江青倒很可能成爲毛的繼承人。江青比較喜歡由張春橋繼任周的位置。」

天啊！千萬別那樣，我暗自禱告，但沒對大德說。然後我向大德提起朱太太兒子昨天的談話。他要我別答應，因爲這是個陷阱，假如我答應了，銀行的存款會被提走而香港的出境准許則永無下落。大德拿起一罐啤酒喝了一口，說道：「很多人上過這種當。」

「結果呢？」

「啞吧吃黃蓮！能怎麼樣？他們早該知道賄賂是有罪的。」他拿起第二罐啤酒。

「這種骯髒的事，當局怎麼能視若無睹？」

「算了，別太淸高，有錢能使鬼推磨，只要錢能買到你要的，人總會不擇手段，而且這種事，上頭的人總有辦法走法律的漏洞，這是中國的傳統，你該知道的。」

「難道社會主義下的政府不想辦法改變嗎？」

「改變？要那些貪汚的人來改變？算了吧！」爾後，他喝完酒，站起身來向我道別。走道門口時，他回頭問：「我想，你該知道周恩來得了癌症，在北京醫院快死了吧？」

「眞的？」我問。

「不錯，只要他挺不過去，可能會發生許多情況……就像上海一些外國公司和政府部門有人企圖謀反……這你是知道的，有些控告可能會被擱在一旁。」

「爲什麼寧可把控告擱置而不願澄淸呢？」

大德有點生氣，他淸淸楚楚的說：「你知道的，只要是由上級提出來的控告，即使寃枉也只有被擱在一邊的份兒，想要由上級那兒討回公道是不可能的。難道你還希望上級承認自己控告錯誤嗎？」大德不等我回答，就甩上大門，逕自離去。

我訝異這種論調，這至少意味我即將結束痛苦的日子，開始過正常的生活，不過一想到我浪擲的歲月及女兒的寃死，心靈便感到一陣空虛。聽完大德的話，更加強我離開大陸的決心：假如政策只是暫時被擱在一旁，那麼只要有政治上的利益需要，它們隨時就會翻身復活，只因爲激進派的領導策略錯誤，就害得成千上萬的老百姓，像我女兒一樣死去或是像我一般過著暗無天日的日子。

那時謠傳毛澤東曾到醫院探訪周恩來，當周虛弱的指出要鄧小平接任他的職位時，毛竟將頭一偏，假裝沒聽到。也有人說，毛和周都快死了。江靑那一夥人都希望周比毛先死，因此有人說他們在藥裏動手脚。甚至有人謠傳，毛遠新和江靑下令禁止別人參見毛澤東，因此當時許多黨的決定並非直接來自毛本人。

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來死了！從一九四九年擔任總理以來，他一直是個謎樣的人物，對中共統治下的人民來說，他就像歷史上許多名相那麼淸廉能幹，因此民間有許多關於他的傳說。雖然周從未公開反對毛的敎條與政策，而且比起其他激進分子，並不那麼熱烈信仰馬克斯主義，事實上，只要仔細回顧他過去所做的決策或發表的言論，可以看出從年輕時就入黨的周恩來並不眞正熱衷於在大陸上實施共產主義。把他與一般急進分子對海外學者的看法一比較，就可看出其不同之處：周認爲可以利用海外學者來建設中國大陸，而激進分子則持

反見。

在大陸，消息由人們口中傳遞要比在新聞媒體上流傳得快，因爲輿論需經過當局同意才能刊登。當人們早已獲悉周恩來死亡時，上海解放日報才刊出他的死訊，人們只想由報紙的描述，猜測北平政府對此事的態度。

阿姨拿塊黑色臂章給我，以表示對周死亡的悼念與追思，並告訴我上海革命委員會不願供應大量黑布做臂章，因此，我們的居民委員會自行組成一個哀悼會。當舉辦周的悼念會時，許多居民攜老扶幼的自動參加。整個會場充滿著欷歔、哭泣聲，這是我第一次眞正感受到人們眞情流露的會議。

那晚梅萍的朋友孔，告訴我外頭在周死後盛傳的流言，說江青很高興的對外聲稱：「以前我被關在籠裏，現在總算可以出頭了！」

「她從文革時期就已蠢蠢欲動，大家早就知道了，你覺得她下一步會怎麼樣？」我說。

「誰曉得她想怎樣？或許得等到她當上黨中央委員會的主席吧！外面盛傳，她打算派人暗殺鄧小平哩！」他回答。

「現在應該知道誰會繼任周總理的位置吧？」

「還沒公佈，恐怕裏面大有文章！據說上海有人正策畫向北京政府請願，要求張春橋繼任周的位子，現在，那些激進分子恐怕正張燈結綵，只等命令一下就大肆慶祝呢！」

「鄧小平怎麼辦？他畢竟是副總理啊，應該是第一順位人選！」我問道。

「老黨員當然希望由他繼任。」

「軍隊傾向呢？在鬥爭中，軍隊不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嗎？」

「葉劍英負責軍方，但有些地方軍已經偏向江青那幫人了。」

幾天後，中央委員會替周辦了追悼會，而由激進派控制的上海解放日報僅以小篇幅報導這件事。許多上海民衆趕到北平參加追悼會。無視於北平正吹著一月寒風，他們仍靜候在醫院外頭排隊，等著瞻仰周的遺容。北平的民衆反應更加激烈，他們認爲激進分子沒有好好對待垂危的周恩來，因此紛紛抗議，尤其是有關日後周的遺體的埋葬之處，更是議論紛紛。

周死後，江青愈來愈活躍，經常公開露面。那陣子報紙不但大作「打倒文革右傾翻案風」的文章，更刋登一些歷代中國女權當政的事蹟，像漢朝的呂后及唐朝的武后。江青想登上主席之位的野心更加明顯，但民衆不喜歡她，因此有關江青亂七八糟的性關係及耽溺縱情物質享受的事蹟，更加被誇大的流傳全國。研討會時，上面警告我們不許揑造有關黨內領導者的謠言，假如聽到，要馬上向上級報告，雖然他沒有指出究竟是那個領導者的名字，但我們心裏都很清楚這是江青的命令——撲滅有損她名聲的謠言。

陰曆三月，也是新曆四月的清明節。這節日自從一九四九年中共統治大陸後，就改爲義士節，以紀念社會革命所犧牲的無名英雄。一九七六年，清明節的前幾天，許多民衆不約而同聚集在天安門——紀念革命犧牲同志的英雄碑——追悼周的死亡，小孩甚至在手臂上綁著白布，口中哭叫著：「周爺爺。」

周恩來沒有後代，這是中國人民一直引以爲憾的。曾經有人勸他娶個年輕女人以延續香火，但他回答：「所有中國小孩都是我的孩子。」因爲那時的老黨員都急於娶個年輕貌美的

妻子，因此在人民心目中，周象徵不可污衊的道德規範。

悼念周的花圈絡繹不絕的自全國各地集中在天安門廣場上，來自北平或其近郊的工人、農人，不分男女聚集在廣場前追悼。各式追悼會擧行著，有人吟著從家鄉帶來的悼念詩；也有人特別趕來觀看一切。據估計，淸明節那天，約有幾十萬人聚集在廣場前參加追悼，並誓言追隨周的腳步，尤其是年輕人更義憤塡膺的表示要繼續完成周未完成的四個現代化。漸漸的，整個氣氛由追悼周的死亡轉變爲反對激進分子控制中國的熱潮。

反抗行動也如火如荼的在其他各城市進行著。開往北平的火車除了滿載趕來追悼的人們與花圈外，車身也貼著許多海報標語，公開反抗激進分子。甚至有人遊行示威，抗議激進分子想控制政局。此外，更有人將毛澤東的暴行比喻爲焚書坑儒的秦始皇，最後四處散發傳單，公開演講辱罵激進分子。眼見一場暴動又即將來臨。

在中國大陸，從未發生過這種由人民自動組團示威遊行的擧動。以往的遊行都是由政府授意，以達到宣傳政策的目的，尤其，經常由政府支持人民去外國的大使館前示威遊行。即使在文革時期，有過短期內政府無法控制人民的擧動，但當時活躍的紅衛兵却仍由毛派走狗控制著。當天安門廣場上的活動愈演愈烈時，激進分子不禁心驚膽跳，於是決定採取行動。在四月五日的當晚——一個浴血的晚上——江靑那幫人命令北平軍隊包圍整個廣場，於是由江靑等人控制的警方及軍隊攜槍帶械進入廣場，驅走羣集的人民。當人反抗時，軍方開火了，上千人死於非命，上萬人輕重傷。公安局將四處張貼標語或唸悼念詩的人民捉去，未經審判就當作顚覆革命的叛亂分子，一律予以槍殺斃命。天安門廣場橫屍一片，血淋四地，北平

當局足足花了兩天時間才將廣場上的血漬弄乾淨及移走屍體。這就是所謂的「天安門事件」。

事後，我聽說當時臥病在床的毛澤東從江青及毛遠新口中，以為天安門事變是鄧小平幕後操縱的，憤怒之下，親自召開緊急會議，撤除鄧的職位，並任命當時的無名小卒華國鋒出任副總理—毛雖年事已高又久臥病榻，但他明白若任命張春橋出任總理，將引起一場內戰，屆時黨也將分崩離析。

華國鋒是中日戰爭時，中共在山西的游擊隊員，對中國大陸人民而言，他只是個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文革之前，他曾出任毛的家鄉湖南省的黨書記；文革一開始，他被指為資本主義同路人，但由於他對毛表現得忠貞不二又會馬屁逢迎，並在毛的故鄉設立灌溉系統而獲得好評，之後很快的恢復原職。毛認為華的出任不會引起激進分子和黨國元老間的衝突，而且相信華國鋒會確保他在中國歷史上的事蹟不被遺忘，因此有心捧華為毛的接棒人。

天安門事變很快的在各地傳了開來。上海電台和研討會都將這次事變稱為「顛覆革命的叛逆行動」，但廣場上的悲慘情景却在人民口中迅速傳至全國各地，甚至那些在廣場大屠殺時逃生的人也紛紛執筆為文，寫下當時的慘況或紀念詩詞，以追念無辜的民衆，這類文章更如野火般迅速在民衆手中傳閱。

華國鋒的出任暫時安撫了民衆的騷動，但鈎心鬥角的權力傾覆仍暗地在進行著。大衆對鄧小平的興趣因而四起，暗殺鄧小平的謠言方興未艾。他一直下落不明，但有少數人向我透露說鄧在廣東，正受軍隊的保護。

「自從鄧被革職，人民對鄧未來的去向反而非常好奇，這不是很奇怪嗎？」當大德談及華國鋒時，我問道。

「人們希望他能像以前那樣回來還擊。」他回道。

「可能嗎？」我問。

「誰曉得？」大德回答。

自從天安門事件後，他似乎比以往更消沈，雖然他經常談論後來的一些事情，但他從未提起四月五日究竟發生了什麼，而且，華的出任似乎令他失望。當他向我提及華的出身背景時，却拒絕與我進一步討論華的出任，他以往的冷漠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深思的神情。

我講完國際禮儀，預備講一則短篇文章時，大德突然眼睛一亮，問：「你想不想見我女朋友？」

「你有女朋友？以前怎麼沒聽你提過？」我驚訝道。

「我想訂了婚以後再說。」

「那麼你們訂婚了？」

「差不多。不過她爸爸仍然反對我們的婚事。我想，他一定認為我太窮了。」大德沮喪的說。

「他是個重要人物嗎？我是說，高級幹部？」

「不，他以前是資本主義分子。」大德直瞪著我，似乎不希望聽到我說出難聽的話，但我只是驚訝的說不出話來。

「我不去北平了，他們送了兩個北平高級幹部的親人去，那兩個人甚至一句外國話也不會說！我想我頂多只能在中學教英語，結婚後定居上海，我媽也認爲這樣對我最好。」我想這次的打擊或許會讓他開始明瞭，他和那些激進分子在一起沒什麼前途。

「我很高興你能留在上海。你一定非常愛那個女孩，也因此才有勇氣接受和資產階級聯姻所可能帶來的問題。」我說道。

「沒什麼問題，事實上，黨已經通過一項修正草案，他們將把十年前凍結的資產，連本帶利的還給那些資產家，她們家現在算是很有錢了，而且，她爸爸告訴他們，一等財產歸還後就分給他們，所以她爸爸以爲我是爲了她的錢才娶她的。」

幾天以後，他帶著女朋友來我家。她二十八歲，比大德大二歲，人長得不很美，却很溫順，看得出她深愛著大德，似乎是他的聰明才智吸引了她。我向她恭賀，並問她何時請我喝喜酒。她聞言害羞的說：「還不確定，我爸爸還沒答應，他不是嫌他沒錢，是不喜歡他是革命分子。」

大德很快的辯道：「我要當老師了。外語中心最近在舉辦中學英文師資的檢定考試，我媽已經替我報名了。」

七月，大陸北方一個工業兼採礦的都市——唐山——發生一場大地震。由於地震預測局本身陷入權力爭鬥中，因此整個行政均告癱瘓，事先沒有預測到。唐山百分之八十的市區被震毀，百萬居民非死即傷，震區包括北平與天津，但受損的程度較輕，僅房屋倒塌，數千人無家可歸，當震災的消息傳開後，政府當局無法事先預測示警的無能愚蠢，再度掀起人民的

憤怒與不滿。那時民間有許多人觀察動物或昆蟲行徑來預卜地震，衆說紛紜另一次更強勁的地震卽將來臨，於是大家紛紛在市區的空地搭建帳蓬，而上海的居民委員會也組成震災救援小組，要我們睡覺時打開門戶。全國人民霎時處在一股無助、歇斯底里的懼震氣氛中，而這股懼怕直到九月毛澤東的死訊傳來，才使人們的注意力得以移轉。

在那同時，大德順利通過師資鑑定考試，他被分派到離我家不遠處的一所中學任教，負責教導十二年級。在經歷過文革紅衞兵領袖及革命分子的刺激生涯後，大德似乎覺得他的新生活顯得平淡無味，雖然他不再來上課，但偶爾仍來拜訪、聊天，他知道我和黨沒有任何政治牽連，不會把他的談話洩漏給黨，因此一直把我當成好聽衆。毛死後不久，他過來看我。

那天下午，毛澤東的追悼會在天安門的廣場上擧行，有數十萬的工、農、兵代表出席，副總理華國鋒在台上唸悼詞，在他身旁是穿著軍裝的副主席王洪文及穿著黑衣的江青。我們的居民委員會將各家分組，集中在有電視機的人家裏觀看追悼會的儀式，我被分配在樓下的朱家。

從電視上，我看到上海追悼小組由馬天綏率領，馬是上海勞工改革會的領導人張春橋的副手，文革前，只是資歷淺薄的上海副市長，當紅衞兵及革命分子踩平上海市政府及黨書記部時，他加入所謂的「一月革命」並成爲激進分子，多年來，他已竄紅成爲上海激進分子所信任的領導人了，尤其當張春橋留任北平時。

朱太太將那架小電視的聲音轉到最大，使房內每個人至少都能聽到演講。根據黨的慣例，馬的悼念詞，卽使不是一字不漏的照抄，也和華的講詞大同小異，但我很訝異聽到馬的說

詞中竟與華的有兩大不同處：第一、馬說：「我們必須實行毛主席旣定的決策。」而華則根本未提及什麽「旣定的決策」；第二、華道出毛在文革時代所喊的名句：「我們只要馬克斯主義，而不要修正主義；我們要團結，不要紛爭；我們要的是公開坦誠，而不是陰謀顚覆。」但馬却隻字不提。

當節目轉播完畢後，我向朱太太道謝並起身上樓，一會兒，大德來了，他是在學校看的電視轉播。

「馬天綏的說辭爲什麽和華主席說的不一樣呢？馬所謂的『旣定政策』又是什麽意思？」我問他。

「所謂的『旣定政策』當然是指江青將繼任毛的位置。」大德答道。

「你是說就是毛死前訂下的遺囑？」

「誰看到那份遺囑了？」

「報紙上是這麽登的。」

「能確定那是毛的筆跡嗎？能確定沒有另外一份嗎？」

「那不可能是僞造的。」我說，並想像那些字是由一隻顫抖的手寫下的潦草字跡。

「自從毛喪失說話能力以後，就『寫』了很多潦草的字條，這你是知道的。」

「天啊！那麽毛可能什麽也沒『決定』。」我驚訝的瞭解到。

「感謝我準岳父的堅持，我不再是革命分子了。」

「聽說你是軍方的上尉。現在還是嗎？」

大德怔了一下，我以為他會否認，但他只略為困窘的說：「我想是朱家告訴你的，身為老師，我現在是知識分子，沒必要再留在軍隊裏了。」

「當你沒事做的時候，就有資格？」

「我哪兒有沒事做過？」

「但這是你告訴我的。」

「那是謊話。我被迫向你撒謊。」

「那你在政府有工作了？」

「算得上有，我只是一個信差，或許你可以叫它暫時的信差。以前你不是稱那些擔任芝蔴小事的無名小卒為小地瓜嗎？我想我就是個小地瓜。」

「你涉及那次安東尼奧的事件，甚至一些政府部門的陰謀，對嗎？」

他點點頭。

「難道你不曉得那是件陰謀？」

「剛開始，」他注視我，懇求道：「難道你不瞭解嗎？當時我被信任的人指使，他們告訴我，他們有你和外國公司交往的不法證據。我知道整件事是個陰謀，你只不過是黨組織權力鬥爭下的犧牲品，甚至我也是，我錯失上大學的機會，並且浪費我最寶貴的青年時期，我只不過是上面那些人的工具罷了！」

「現在，你再也不是了。事情已經結束，而你又當上老師。」

「對極了！」

「你退出時，那些革命分子有沒有對你怎麼樣？他們對你娶個資本階級的女人，有沒有很氣惱？」

「他們巴不得我趕快走，省得還得替我找差事。至於結婚，還有人羨慕我娶了個有錢的老婆呢！你認爲他們爲什麼要參加政權傾鬥？還不是想找個好工作，換個好環境，多賺點錢，在大陸，參政就是發財之道。」

「你能告訴我梅萍是怎麼死的嗎？是誰殺了她？」

他猶豫了一下，才說：「不是有人告訴你，她是自殺的？」

「我不相信，你認爲我該相信嗎？」

「她原本不必死的。他們做得太過火了，這眞的是件意外，我很抱歉，請相信我，當我聽到她的死訊，眞的很難過。」

「你是說綁架她的人並沒有奉命殺她。」

他點點頭。

「她爲什麼被綁架？」

起初，大德不願告訴我，但經過一番掙扎，他說道：「就像平常一樣，有人認爲她應該公開指責你，因爲你在拘留所裏，不肯認罪。」

「兇手呢？他們是政府組織裏的高幹嗎？」

「他們都在四周。我不能告訴你，我已經說得太多了。」

「我要向人民法庭提出控訴，我要讓那些人受到法律的制裁。」

「沒有用，他們被保護得好好的，而且，假如你現在提出控訴，他們馬上就知道你不相信你女兒自殺死的。」

「而他們會懷疑是你透露給我的？」

「或許。」

「我想，你不該再來這裏了。」

他點點頭，沈默許久，以往他是爲上課，現在課程結束，他的確不該再來了。我邀他留下吃晚飯，在他走前，從抽屜抽出四百塊人民幣：「大德，我很高興認識你，你是個聰明的年輕人，我希望你會有個快樂的生活，這是我送你的結婚禮物，或許可以讓你添些有用的東西。」

他一言不發，情緒顯得非常激動，他站了好久，才伸出手接過錢，轉身離去。

第十七章　復甦的生命

多年來，我一直等待毛澤東的死亡，當我在牢裏服刑、痛不欲生時無不時時刻刻祈禱他快點死，現在他眞的死了，我却不知道該怎麼辦？想揪出殺我女兒的兇手就地正法，只不過是個遙不可及的念頭而已。

我密切注意政局的變化，同時仍舊繼續上課，我有個學生每兩天來上一次課，她從小因小兒痳痺而不良於行，也沒有讀書，只有她那在醫院當護士的媽媽教過她一些讀書、寫字的課程。每次下課，她就畢恭畢敬的向我道謝，拄著拐杖一步一步，慢慢的踩下階梯，走回家去。

當望著她吃力的移動那雙殘廢的脚時，不禁覺得在大陸的生活有時充滿諷刺。她的腿疾使她倖免成爲毛澤東的政治實驗品，而那些健康的年輕人，包括我的女兒，却在偉大的人民舵手領導下邁向悲慘的路途，不是死了，就是被犧牲掉，像以前當過紅衞兵的大德就是個活生生的例子，而殘廢的她則被遺忘，安然無恙。

由於她的母親即將退休，她想像大德一樣成爲中學老師，以便賺取母女的生活費，因此她請我幫她準備師資考試，於是教她英文佔了我大半的時間，但我仍靜候時機向人民法庭請

求調查我女兒死因。我早已寫好一份上訴書，並不時拿出來重新訂正，只等著在適當的時機，向適當的政府組織提出控訴。

十月八日早晨，我照例六點起床，我走到陽台，欣喜的發現今天將是個涼爽的秋日。當我往下看時，發現我那個殘廢的學生站在門前，她做個手勢要我下去。

我安靜的走下樓，打開前門。學生在這個時刻來拜訪我，想必有什麼異常的事。她說不想吵醒朱家，所以沒敲門，我問明她的來意，她說：「昨天晚上我哥哥突然被緊急召集，恐怕有一場戰爭，你最好待在家裏。」

「戰爭？什麼戰爭？」

「我也不曉得，軍方不許我們告訴任何人，但我和我媽都認爲該先通知你一聲。」

我向她道謝，目送她一跛一跛的走遠。

我想像不出此刻中國大陸會參加什麼國際戰爭，但她告訴我，軍隊正進入戒備狀態。我想到我有一架收音機，天氣好時，可以收聽到BBC或美軍之聲，我走上樓，將收音機帶進浴室，關上門窗，我按下抽水馬桶，以掩飾轉動頻率的雜音，但怎麼也收不到任何聲音。當阿姨來時，我詢問她市場的狀況，她只是像平常一樣，抱怨市場缺貨。不希望錯過任何消息，我將調頻轉回地方電台，拿了筆記本坐在床上朗誦並抄寫一些唐詩——這是我最好的消遣，因爲它可以使我忘記身在何地。

那天沒有發生任何事情，晚餐後，朱太太在花園大聲叫我參加一項由居民委員會舉辦的會議：「他們要我們立刻過去。」於是，我拿著小板櫈跟她穿過街道。

屋內擠滿了人，氣氛顯得非常沈重。居民委員會在晚上召開會議是件很不尋常的事，每個人都靜靜的等著，不像以往集會前會低聲談話或大聲寒喧，甚至也沒人抽煙。

當人們都到齊後，一位中年的區黨部幹員站起身來宣讀黨的一項決議，內容是說十月六日那天，黨出動八千三百四十一連的軍力包圍中南海（清朝皇帝的冬季行宮，後來改爲黨中央委員的宿舍及行政辦公廳），逮捕了江青和她的三個親密戰友——即爲人熟知的「四人幫」，這項行動是由華主席和當時的國防部長葉劍英發動的，事後並開會宣示這項逮捕是爲了維持黨的團結，並防止社會主義建設的成果被四人幫的奢靡作風腐壞，且指出毛死前即指出四人幫的問題必須解決。這項決議對我而言，只不過是毛生前江青的戰友，在毛死後的二十六天被反對江青的那夥人先發制服而已！宣讀並不長，唸完後，黨幹部說時間太晚，下次再擧行討論，我們可以囘家了，沒有歡呼聲也沒有噓聲，沒有人說一句話，大家毫無表情各自囘家。人們低著頭，惟恐別人從眼神中看出自己的感受，我們這樣毫無感覺，是因爲我們害怕。雖然這件事令人那麼訝異，不敢相信它是眞的；雖然我們早已習慣朝令夕改的黨政，但沒有一件事比得上這次的逮捕行動如此令人興奮。我們都知道上海由激進分子控制，或許剛才那位區黨幹部也是江青那派的，上海人很聰明，誰也不會傻到一聽消息後立即歡呼大笑。

我和朱太太一起走囘去，各自沈思著。打開大門時，我們看見朱太太的軍人兒子站在台階上。

「你囘來了？」朱太太問道。

「已經結束了。」她兒子囘道。

我不理會，逕自往家裏走，隨後鎖上門。爬樓梯時我咧嘴微笑；踏入房間後，我虔誠的感謝上帝，同時也警告自己別太樂觀，四人幫被逮捕只不過是一場權力鬥爭的結果，並不表示華國鋒將放棄毛澤東的政治路線。我甚至懷疑華除了毛派路線之外，還能懂得用什麼方法統治中國大陸？我整夜輾轉的想著我的未來——如何恢復我的職位以及要求法庭調查女兒的死因。

翌晨，朱太太告訴我，陸英曾經來電通告，我們將要舉辦全市遊行，對黨逮捕四人幫的行動表示支持，因此要我們下午兩點時到居民委員會的辦公室拿旗幟和標語。

我從未參加過遊行。想到手中揮舞著小旗，口中叫喊著口號，就令我厭惡，我討厭自己被這麼利用。過去幾年來，我之所以能一直保持高傲的政治態度，就因沒人要求我參加遊行，現在我被要求了，我發覺自己很不容易拒絕別人，當我猶豫時，朱太太不耐的催促道：「你一定得參加，否則會被認爲支持四人幫。」

「我沒法連續幾小時在城裏遊行。」我無力的說道。

「我們這些老太婆只要在這一區遊行就可以了，不會超過一個小時，這是陸英說的。」難道只因爲我拒絕遊行示威，以往那些討厭我有膽量的激進分子就能指摘我是四人幫的支持者嗎？這眞是天大的笑話！這些活躍分子擅於見風轉舵，但我知道我別無選擇，我必須參加生平第一次的遊行，而且希望這也是最後一次。

居民委員會的女同志們一定是連夜趕工，能在一夜之間弄出這一堆旗子、標語。當我在下午兩點到辦公室時，看到一堆堆的旗幟、標語堆在桌上，等著居民來領取。陸英要我和街

角附近的女人們排成一隊，這支隊伍最短也最安靜，裏頭的人幾乎都是文革時期的犧牲者。或許我們這些人比那些退休工人、待業青年更能將這次遊行視爲娛樂吧！我們這羣人曾經被批判、被鬥爭，却只能忍受，在實行社會主義的中國大陸，我們搞不清楚周遭到底發生什麼事，在那些忠貞的共產黨員眼中，我們是壞預兆、危險分子，因此我們必須被永久隔離，即使在遊行時，仍被歸類組成一隊，但在冷淡、不關心的外表下，我們却爲了自保而隨時提高警覺。

遊行開始了，我們的隊伍在後面，穿過門走到大街時，每一個人都分到一份標語，我的是：「打倒江青！」四個簡單的字。在街上，我們停下一會兒聽一名年輕的活躍分子的囑附。他告訴我們，他會在我們的隊伍旁邊，當他高喊手上的標語時，我們必須跟他一起喊。在整個遊行隊伍的前頭，有幾個年輕人拿著紅旗子、鼓、鑼。當年輕人一揮手，我們開始遊行並喊口號，前面的工人和年輕人的隊伍很快的把我們拋在身後，到市中心集合去了。

而我們繼續在住宅附近兜圈子。

我們遇到其他住宅的隊伍。大部份的時間，我們總是靜靜的在街上走，絲毫未引起騷動。或許沒有革命分子吸引衆人眼光的特質，我們的遊行徹底失敗，一個小時後，那年輕的活躍分子終於放棄了！他准許我們回辦公室。我們在那兒丟下旗子及標語，未等進一步指示就迫不及待的各自回家。

「你知道，我們差點鬧內戰呢！」當我們到達住家隱密的花園時，朱太太說。

「眞的嗎？是什麼時候？」我問她。

「武裝部隊預備動身前往北平援助江青，但可能消息走漏，正規軍包圍整個城市，他們不得不放棄。這是我兒子告訴我的。」

「還好他沒有加入戰鬥。」我說道。

「可不是嘛，他爲江青戰死，死得不太寃枉了？想想她在文革對我們做了什麼！」她答道。

不久，我聽說城裏的激進分子都被革職了，有人說他們被捉去審問，有些人則說他們被關在一個地方，寫自白書，這些將會在四人幫公審時，對江青大大不利。不久又有人謠傳上海革命委員會和黨書記已重新任命，這些人的命運和文革時的華國鋒差不多，他們曾受紅衛兵的欺凌，但很快的，又被視爲「毛主席的正確路線分子」，這裏指的就是鄧小平。總之，他們被任命爲高級幹部，並和江青那幫的激進分子共事，這些人的出任，不過是華在他短暫四年掌權時間內的一種表徵而已，華的掌權沒有任何實質上的政策改變，而位居上位的激進分子也未被完全肅清。

一九七七年八月舉行「十一中全會」，當時全國上下全神貫注於批鬥四人幫，這次會議也使華國鋒的政治權力達到高峰，他不僅被選爲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也是黨軍委會的統領，四處可見他的相片與毛的並掛，而報紙也稱他爲「聰明的主席」，「英明的舵手華主席」以別於「偉大的舵手毛澤東」。很明顯的，那些殘餘的激進分子正積極重塑華的個人形象，因爲他們相信華可以成爲他們的護身符。

會議中重新強調「高舉毛澤東的偉大紅旗」，而華國鋒也保證他將實行毛主席的政策並

遵守毛主席的指示。同時，黨會任命負責逮捕四人幫的八三四一團的團長汪東興為中委會的副主席，以獎勵他對江青下台的貢獻—聽說四人幫中的三個被命令參加政治局緊急會議，而當他們剛走進會議廳就被逮捕了；江青却拒絕出席，還是由汪東興親自到她家，用手銬銬上的。

汪東興一直是毛澤東的貼身侍衞，他負責帶領八三四一團保護住在中南海的毛，及其他政治局高幹的安全，因此他一直對毛忠貞不二，而人家都說他對毛的最大貢獻就是將毛的注意力轉移到一個非常美麗的女子張玉鳳身上。此女後來成為毛的寵妾，並任命為毛處理日常生活的秘書。

張玉鳳是毛最後一個女人，中國大陸的人民都知道，但沒有一個敢說，他們「偉大的領導者」是個好色的傢伙。在毛年老體弱時，他相信，正如古代一些中國皇帝所相信的，年輕的處女能使人年輕、長生不老。

華國鋒不是一個幹練的領導者，由於他以前只是軍隊中的次級幹部，所以在人民、黨員眼中永遠是爬不上來的無名小卒，所以他既得不到人民的擁戴，也得不到高級黨員的支持。失去這兩大助力，他根本不能有效的統治整個大陸政局。

一九七七這年，中國大陸被地方軍隊或革命分子分割盤據，他們以自己的方式闡釋毛澤東的政策，毫不理會北平當局的指示，這時，整個國家也因經濟不景氣而癱瘓，加上黨內部的長期權力鬥爭，人民早已對共產黨失去信心。

逮捕四人幫正如掀開沸水的鍋蓋，很快就擴散成災了，受害的人民要求平反，於是有個

別或集體示威遊行，人民羣集在政府辦公大樓外面，被下放勞改的青年們憤怒的要求返回都市，公共建築的牆上貼滿各式各樣的大字報，上面敍述著每個人的辛酸史，並要求政府還他們公道。

在第二次中委會開會時，華國鋒做了下面二項指示：其一，他同意葉劍英及其他老黨員的要求，恢復鄧小平副總理之職。其二，他答應人民，政府將重新審判文革時期的犧牲者所提出的控訴。

我陸陸續續跑了好幾趟人民法庭、地檢處及公安局，提出我的指控。一九七七整年，我持續著這個行動，每次所得到的只是地檢處的幹部們要求我寫下報告，而人民法庭和公安局却毫無回音，總之，我的指控投訴無門！而與我同在外頭羣聚等待的人，恐怕也好不到那兒去。

一九七八年三月，一個公安局的幹部在老李的陪同下來到我家，當他們坐下後，那個穿著藍色褪色毛裝的中年男人傾身向前，皺著眉頭仔細看著我說：「我是公安局的人。你曾經向公安局及地檢處提出許多次控訴，是不是？」

「不錯，我提了幾次。」我答道。

「不是幾次吧，」他搖搖頭。「而是很多次！你爲什麼要寫這麼多份控訴書？難道你不相信人民政府？難道一點耐心都沒有？」他嚴厲的指責著，老李則兩眼盯著地板看，沒有人碰過阿姨爲他們準備的茶水。

「我從被非法逮捕下獄已經十一年了，我的女兒也死了十年，我夠有耐心了。我不在乎

告訴你，我對黨和人民政府的信心，早被一些文革時期自稱代表政府的幹部給折騰光了。」我堅決的告訴他。

「今天我來這裏，是要告訴你，不許再寫控訴表了。你的控訴遲早會被受理，因爲這是黨和政府的指示。」

「我必須等多久？」

「你知道在上海有多少案子要審嗎？那些都直接或間接和四人幫有關，有的死了，有的被關在牢中，現在我們得先處理那些還在牢裏的，把無辜的先放出來，然後再處理那些早先出獄仍然活著的人，像你一樣，最後我們才能處理那些死於文革的人，像你女兒的案子。反正現在有人正費力的整理那些訴訟案件，你一定得耐心等候，我們遲早會處理你和你女兒的案子。」

似乎很合理，我的確不知道政府須面對這麼多的控訴案件。

「很謝謝你專程來告訴我這些，請代我向你所代表的上級致謝，我得說，由於你的拜訪，使我對政府恢復了信心，你跟我過去十年來所遇過的幹部大不相同。」

「那是一定的，我也是最近才復職。」那男人扭曲著嘴苦笑。

「既然你自己也吃過文革的苦，一定能瞭解我的感受。」

「我很瞭解，但希望你能試著想想別人也吃過苦，想想那些在文革時犧牲的領導人，像劉少奇、彭德懷、賀龍……這些死於非命的人。還有看看我，一個自中日戰爭起毫無怨言爲黨效忠的幹部，只因爲文革時不願成爲四人幫的一分子，也……。你知道嗎？劉少奇夫人最

近才從牢裏放出來，你得看看整個局勢，不要光顧自己的問題，但你放心，我們會盡快處理你的案子。」

我望著坐在眼前的中年男子，並懷疑黨在他心中現在是怎樣的形象。他褪色的藍棉制服、蒼白瘦弱的臉頰，在在顯示出曾有一段煎熬的日子，像他這種忠貞的中低階級基本幹部才是支持黨的骨幹，一旦他們對黨失去信心，黨將不能有效的治理地方，不論北平政治局的指示如何正確，沒有他們，是絕不可能成功的在地方上推行。

我向他保證會靜候審判的來臨，不再提出控訴書了，那人似乎很高興他終於完成任務。我送他到門口，目送公安局的人騎著一輛生銹的破車走了。

由這次的拜訪，我確定控訴已受到注意，而且最後將恢復原職，同時也知道這一切都是因黨的政策改變所賜，根本不是眞正爲人民平反，事實上，報紙刊登重審文革時的寃案時，從未提及要還給人民一個『公道』。當四人幫被逮捕後，政府與人民並不控訴他們違犯法律，而是指控他們濫用黨的力量來達成他們的野心－在中國大陸，沒有一條法律能脫離黨的政策獨立存在。

幾個月以後，一九七八年的夏天，在我女兒被殺的十一年後，三個上海影片攝影場的人來拜訪我。

「我們代表新近成立的黨書記向你的女兒，也就是我們的工作同志鄭梅萍致哀悼之意。」說話的中年男子自稱是人事課課長。

曾在戲劇學校教過梅萍的退休女演員，拉起我的手含淚道：「我們都很難過，希望你能

瞭解我們深沈的哀悼之情。」一個紅極一時，畢業於魯迅藝術學院的女演員，此刻注視著我，如同注視著攝影機，其表情生動自然堪稱一流。雖然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本人，但我知道她是上海影片攝影場助理導演的太太。

第三位是個年輕人，他說：「我是梅萍的同學，代表同學來致哀悼之意。」

我請他們坐下，並要阿姊倒茶奉客。人事課課長告訴我，他們公司裏有二十九件死亡的案子，在王昆等人組成的委員會審視下進行重新審判，許多一流的影星都因涉案入獄。我問他是否知道我女兒的死因，那名叫王昆的年輕人說梅萍的死涉及許多公司以外的人，因此可能需要公安局來辦理。

「我們很努力的澄清所有的案件，黨明白指示要我們修正過去誤審的案子。」王昆說。

「今天，我們除了表示哀悼之意，也是來告訴你我們非常關心你。」那位女演員說：「假如你經濟上有困難，公司會幫助你。」

我想這是上級吩咐她的，於是禮貌的回答：「非常謝謝你的好意，我沒有任何困難。」然後，我轉身面向他們三人，說道：「我只希望你們盡快查出殺死我女兒的兇手。」

「眞正的罪魁禍首是四人幫。」人事課長乾澀的說。

「沒錯，但眞正謀殺我女兒的兇手還沒受到法律的制裁。」

「根據我們的記錄，你女兒是自殺身亡的，除非有證據，否則我們不能肯定她是被害的。」那位課長顯然不願聽到我說「謀殺」二字。

或許是眼見我要發怒，王昆很快的接口道：「我想我們很快會回來拜訪你。你什麼時候

比較方便？」

「下午都可以。」我告訴他。

他們起身離去時，那位女演員再度表示對我女兒的哀悼，不論她是眞心或是假意，她使我和她一起哭了起來。

王昆來看過我幾次，漸漸的，我意識到他是要讓我有心理準備，以接受影片攝影場的聘請，回復到原來的職位，但在我而言，這並不夠，他們並沒有查明我女兒的死因，雖然他們不再堅持梅萍是自殺死亡，而說是她死於迫害，但我知道，有人正設法保護那個兇手，我經由王昆向攝影場抗議，但都沒用。王昆告訴我，政局相當複雜，時機未到，有些事無法定奪。

當我仍舊堅持控訴時，一九七八年十月，三個公安局的人，包括上次老李陪他來過的那個男人，來我家要我停止控訴。

他指著一個年約五十歲的矮小男人，說道：「這是韓導演。」又指向另一名年輕女士：「這是蕭麗。」

「我們代表人民政府爲你在文革時期被捕下獄一事致歉。同時也向你女兒的死表示哀悼之意。」韓導演一副官僚口吻。

他們入座後，蕭麗拿出本子，像一般官員說話時，記錄官方聲明。

「謝謝你們今天來訪，但不需要道歉，我對人民政府沒有恨意，因爲這一切都是四人幫的罪過。我關心的是，殺我女兒的兇手還逍遙法外。」我說道。

「你必須信任人民政府和公安局。」第一個男人說道。

「今天我們來是討論有關你復職的事。」韓道。「我們看過你在一號拘留所時的審問記錄，你為前主席劉少奇挺身說話時，非常勇敢，在那個時候，即使是高級幹部也不敢那樣說話。你應該很高興聽到，不久，劉少奇的名字又會被黨給重提。」

「我很高興，我們政府的領導人又回去執行毛主席的正確路線了。」我圓滑的說道。

第一個人從袋子裏取出一張紙放在桌上，「這是有關你復職的草稿文件，你看看，我們想聽聽你的意見。」

文件上寫著我的名字、年齡及我在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七日被逮捕入獄之前的其他事情，並述及入獄一事全屬錯誤，負責重審文革案件的委員們一致認為我無罪，因此根據人民政府的政策，我可以獲准復職，我告訴他們我很滿意文件上的敍述。

「那麼，我們就把它寫成正式公文，並交給居民委員會在會議上公佈。」韓導演說。

「你被凍結的銀行存款也將在近日連本帶利的還給你。」第一個男人說道。

「我只要原來的本金就好了。我知道政府的財務最近有點困難。」我回答。

「你必須全部接受，這是黨的政策。」韓告訴我，然後笑著改變話題：「你知道嗎？我也是幾個月前才復職的。我被關了三年，並不像你在一號拘留所受到特別的伙食待遇。」

「就像我告訴過你的，我對我所遭受過的事並無恨意，在拘留所六年半裏，我有很多時間來學習、思考，我學了很多，但對於公安局不能盡力調查我女兒的死因，深感遺憾。」

我面對韓說話，但他拒絕與我進一步討論。他只說：「你在拘留所受到特別禮遇，你是

知道的，有好的伙食、藥物治療等等，假如那時你在外面，恐怕活不過文革。」

眞是個大笑話！這個人竟要我對被捕入獄一事表示感謝，所有的共黨幹部似乎都認爲即使事情搞得一團糟，黨的政治體系仍是對的，而人民必須爲此感謝。假如我圓滑一點，我會照韓所希望的道謝，但想到過去所受的苦及女兒的寃死，我沒有辦法，因此我不作聲。

他尶尬的望了我一會，希望我開口說話，最後，他們終於起身道別。陪他們走到門前，當打開門時，我說：「再次謝謝你們來訪，我會靜候正式的復職公文抵達。此外，我要爲我女兒的案件說一句話：希望你們能將兇手繩之於法。」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在我被捕後十二年又兩個月，我被宣佈爲文革的犧牲者，並正式恢復原職，居民委員會在開會時宣佈此事，同時，銀行的存款也還回來了，上海影片攝影場並爲無辜死亡的二十九位工作同志舉辦追悼會，這二十九個人當中除了我女兒以外，有一些人知道江青過去只是一個上海小角色的老演員，有得罪她的導演，更有些是與她有過緋聞的男人。

梅萍的追悼會在龍華火葬場舉行。有兩百多個朋友、同事以及一些上海文化事務部門及電影局的代表參加，他們並以導演或公司的名義送上花圈，王昆及一些梅萍的同學則負責佈置禮堂。雖然上海近郊的花季還未正式開始，他們仍設法弄來許多鮮花佈置前廊，在那裏放置一張梅萍放大的照片，相片是用黑框框起來的，其餘則擺放由紙花紮成的花圈或長青藤盆栽。

儀式簡單而隆重。梅萍的老師，就是那位退休的女演員，在台上致了簡單的悼念辭。演

講中引述梅萍在她短短二十四歲人生中，對其他人做了許多傑出的貢獻及服務，言語間流露著誠摯的眞情，使得許多人聞言掉淚。整個儀式中，在輓歌的伴奏下常可聽到低泣聲。演講完畢後，全體肅立向梅萍的遺像敬禮，爾後一一與我握手，並表達個人的弔慰之意。

追悼會很快結束了。王昆開著事前接我去會場的車子載我回家。他說火葬場所有的廳堂都已被訂下做為悼念會場，已經排到一九八〇年了，因此使用時間只能一次兩小時。事實上，據我所知，有許多人還是合併使用一個廳堂來當悼念會場的。

王昆將梅萍的遺照帶入我的房間後就離去了。阿姨為我泡了一杯茶，我告訴她，我想一個人靜一靜，要她先回去。

那夜，我根本睡不著，躺在漆黑的房裏，往事歷歷如在眼前。我不斷想到我的女兒：在澳洲坎培拉時，梅萍，一個圓圓胖胖的小女孩一直到她在上海長成一個美麗的少女。我為我無法找出殺死她的兇手而感到痛心，我也為她的死自責，要不是一九四九年我將她從香港帶回大陸，她也不會在人生的黃金時期就這樣結束了一生。我責問自己：為何讀了那麼多史達林統治蘇俄人民的報導，仍不能看清共產主義的本質？

翌晨，報紙刊登了影片攝影場的追悼會，梅萍的名字在其中，而我復職的消息也傳開了。接下來的十二月及農曆年，家裏來了許多訪客，以往與我保持距離的親戚們現在都宣稱我是他們最親愛、親近的家人，並為我和梅萍的死感到難過。有些人提議搬進我家以便就近照顧我，有些人則要將他們的兒女過繼給我，以免我身後無子嗣，却沒有一個人解釋，為什麼在最需要他們的時候，伸出援手。或許他們那時也有困難，反正，絕大多數都認為我會諒解

他們的不聞不問，因爲這是大陸人民在毛澤東統治的陰影下明哲保身的唯一方法。

雖然大部份的錢在文革時被紅衞兵搶走，但銀行的存款供我一人花費仍綽綽有餘。經由居民委員會黨書記那兒，我知道婦盟會要計畫重建文革時被紅衞兵摧毀的育幼院及托兒中心，因此，我決定捐出六萬元人民幣（以一九七八年的滙率算法，約美金四萬元）來贊助，此外，我又將現款分送給我和外子的親戚朋友、那對當我剛出獄時幫助我的年輕夫婦、我的老傭人們，及死於文革的蜆殼石油公司員工的遺族們。爲了回收發還給人民的大量金額，政府在市場提供許多日本進口的電器用品，例如電冰箱、電視機，並組成旅行社讓人民可到國內各處名勝古蹟參觀旅行。費用當然很高，一度，日本的日立電視機一台可賣到兩千美金，但上海人民仍一窩蜂去搶購，對那些收回大量存款的人們而言，似乎視瘋狂的購物行動爲一種補償！

一九七九年的農曆年，中共和美國建交，更造成國內學英文的熱潮。當我去公園打太極拳時，看見許多年輕人或坐在板凳上、或坐在草地上，拿著英文課本大聲朗讀。由美國之音廣播的每日英文課程大受歡迎，年輕人都大膽的買收音機來聽。事實上，他們在聽完英語課程後，也同時收聽英文播報的新聞。政府當局沒有採取任何阻止的行動，因此一些不學英文的人也漸漸敢公開收聽美國之音，甚至公開討論他們所聽到的世界局勢。學校裏，英文成了最熱門的第一外國語言，甚至小孩子從八歲起，就開始學英文，那些以往辱駡我爲「帝國主義間諜」的小孩，現在見到我也都用英文向我道早安或午安。

農曆年一大早，外文學院英語系的黨書記來拜訪我，並提供我一個當英文老師的工作。

他說明時下需要大量的英文師資，並高興的說到他的部門正如何迅速的擴大編組。我早聽說前任蜆殼石油公司的醫生已在這部門服務，但却無意加入任何會阻止我離開上海的事。沒有職業，我比較容易獲得護照，免得上級長官藉口需要我服務而不易獲准，因此我決定拒絕他的要求，於是，我先謝謝他的請求，並指出由他這樣日理萬機的重要幹部來邀請我實在是一大榮幸，但以我過去的牢獄之災及動過手術之後健康欠佳婉拒了他。

「你難道不想爲人民服務？」他問道。

「爲人民服務」這句話是共產黨家喻戶曉的口號，這是毛澤東在一九四四年紀念張西鐵之死所寫文章中的一句話。當黨要某人做某件事而遭拒絕時，黨就會問他：「難道你不想爲人民服務嗎？」

我不能說不，但我委婉的答道：「你是否同意讓我在家教授一些學生？」

「你是說個別指導？」

「是的。」

「我們沒有這類安排，何況我們該如何計算你的薪資呢？」

「我願意義務教學，爲人民服務，像你說的。」

他想了想，說道：「我得先跟其他幹部商量一下，等決定一出來，會立刻通知你。」

他離開了，但從此沒有回音，我提供一個無法接受的辦法給他，因此他拒絕我，而不是我拒絕了他，這替他保住面子，對一個無法接受拒絕的人，這是最好的方法。

離我清晨打太極拳的公園不遠的懷海路上，有新近成立的美國領事館。每天清晨我經過

時，都看到許多人在排隊等著簽證，以前的學生也告訴我有許多親朋都拿到獲准出國的護照。年輕人的熱門話題不再是江青的桃色韻事和文革時期死了多少無辜的人，而是黨的重要官員如何將他們的子女以交換學生的名義送去美國留學。由於大陸對外開放觀光，許多海外的中國人都一窩蜂返回大陸探親，他們帶來許多資本主義的用品做爲禮物，並花錢將文革時期失學的子弟送入大學讀書。出國，尤其是到美國，已經成爲男女老少最流行的事了。

一九七九年的大陸政局很好。華國鋒仍是黨與政府的主席，而鄧小平的權勢日益擴張中，將四人幫餘黨一個個剔出高級官職，整個國家處於輕鬆，希望的氣氛中，充滿對五十年代在毛澤東「反右傾翻案風」運動前的懷舊心態。

在共產黨緊收之前，我得趕快設法弄到護照，問題是我得找個出國的好理由，因爲一次申請不准的記錄將會造成再次申請的困難。一天晚上，我打開收音機收聽美國之音的國際新聞，聽到中共向美國要求支援。我知道美國國會那時正通過一項裁決——阻止家庭團圓的國家將不能得到美援，因此蘇聯境內有許多猶太人等著回到他們的祖國以色列。當我關上收音機時，不禁感謝上帝讓我聽到這則消息。我猜想中共當局一定也注意過這點。

一九四九年前，我的兩個妹妹在美國大學讀書，而今她們已在美國成家立業，較小的那個妹妹在我一九三五年去英國時，還只是個孩子，算一算，我和她也已經有四十多年沒見面了。另一個妹妹海倫，在幾年前曾和她的丈夫回上海停留過一段時間，從那時起，我偶爾寫信與她連繫，因此我馬上寫信要求她和另一個妹妹從美國寄信，以家人團聚爲理由邀我到加州見她們，而海倫也馬上回信給我。

三月初，當南太平洋的暖流吹醒上海街旁凍了一冬的樹木，我滿懷希望的走向蘇州懷區的公安局，那裏專門發給護照等旅行申請。我早到了一小時，但八點才上班的辦公大樓前，卻集聚了一大羣等待的民衆，當鐵門在七點半打開時，我發現自己正排在繞街而成的第三列長龍中。隊伍緩緩移動著，前面的人湧進了會客室，我擠在門口，其他人則多半在天井等待。偌大的會客室擠滿了人，走廊也排滿了許多板凳供人休息。每個人都耐心等著，八點，辦公室的門打開後，人潮擠來擠去的佔位子，一個個魚貫而進辦公室，有的人面帶微笑拿了張空表格走出來，有的則空著手滿臉不高興，一會兒，站在我前面的女士佔到一個位子，我在她身旁坐下。

「你要出國？」她問道。

我點點頭。

「去那裏？」

「美國。」我低聲道。

她抬起臉，微笑的說：「我也要去那裏，去看我從未謀面的父親。一九四九年，他在我出生前的一個月離開大陸。」

「他要你去的？」

「是啊！他在那兒有個餐廳。他說假如我願意在他店裏幫忙，他會接我去美國。」

「你在上海有沒有工作？」

「沒有，我一直在找。文革時期，因爲我父母沒有離婚，紅衞兵指控我媽是個美國間諜

，所以她死在學校。日子實在不好過。」她眼中閃著淚光。

「我希望你到了美國會快樂起來。」

「我很害怕，因爲後媽可能會不喜歡我，你認爲政府會讓我走嗎？」

「會的，應該沒什麼問題。」

「你去過美國嗎？」

「去過，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你想我去那邊生活，該準備些什麼？」

「學好英文，假如有可能，最好找個好老師。」

她點頭說：「我正在努力學英文。」

交談時，我們不停的移動。過了一會兒，輪到她進去了，不久，她微笑的走了出來，彎下腰，她對我低語：「我拿到了。」並伸出手讓我看那份申請表。

「下一位！」房裏傳來叫聲，我走了進去。

一位結實的中年女士坐在桌子後面，她的前面放著一張椅子，桌上則擺著一張墊板和一支鉛筆，除了這些，沒別的了。她一臉的晚娘像，大概是因爲這麼好的早晨，她却得坐在這裏做這些煩人的事。

「什麼事？」她對著我大叫。

我坐下來，面對著她：「我想申請到美國探望我的兩位妹妹。」

「爲什麼？」

「家人團聚。我們都已經老了，想團聚團聚。」

「她們不能來上海嗎？現在有許多人都來上海探親。」她說道。

「我一個妹妹曾經和她丈夫來過，但另一個四十多年沒見面的妹妹却抽不出空！」

「你在什麼單位工作？」

「我沒有工作。」

「那你以前工作的單位呢？」

「文革前，我在一家電影公司工作過。」

「你的名字？還有那家公司是什麼名字？」

我告訴她，並說道：「文革期間，我受到誤審而被捕入獄，但我現在已經復職了。」

她蹙著眉頭打量我，似乎在想該如何處理我這類人，她自然不願犯下任何錯誤。爲了避免被她拒絕——而這很可能是不可避免的結果，我迅速補充道：「公安局一些高級幹部知道我，像韓導演及其他幹部就曾經到過我家，或許你只要給我一張申請表，至於獲准問題可以讓那些幹部依據黨的政策來決定？」

她思考了一會，說：「好吧，我給你一張申請表。但當你交出來時，要記得帶齊所有必備的資料。」她告訴我。

「我有妹妹的邀請函。」

「還要帶你的復職文件及戶口名簿。」她說道，兩眼仍盯著我，其實，當她聽到我提及韓導演時，口氣已緩和了許多，她一定懷疑我怎麼會認識她的上司，並想到她剛才是否對我

太兇了。拉開抽屜，她拿出一張表格給我。

我向她道謝，起身離開辦公室。走進會客室時，每個人都注視著我，似乎想知道我是否拿到表格了。他們關切的神情稍後由一位有同樣經驗的學生向我解釋，他說，每天只有限額的申請表發給人民，前面的人拿了一張，那些等待的人來說，機會也就少了一分。

我回到家裏，發現那個女人拿錯申請表給我，我手上這一張是到香港的申請表，而不是到美國，我必須回去換回對的表格。在我解釋過再來的原因後，在會客室等候的羣衆好心的讓我排在隊伍前頭。

當我進去向那名女人表明來意後，她顯得很不高興，但她沒作聲，只是換了一張到美國的申請表給我。

翌晨，我謹慎的塡好表格，並附上所有需要的文件。一九七九年申請的護照至少得等上一年才拿得到，因此我並不期望很快的就能從公安局那邊得到進一步的消息，文革之前，人民要申請去香港，至少得花上好幾年才可能獲准，總之，我已經夠幸運了，那位女幹部並沒拒絕我，假如一開始就拒絕，那麼我可能會完全放棄這個申請出境的念頭了，雖然她在公安局的職位不高，但她掌握的權力對中國人民來講，卻令人害怕。

第十八章　告別上海

我交出美國的護照申請書沒幾天，阿姨交給我一封像是官方的信件。那是一封來自「掠奪貨物分類局」的信，我想這可能是政府某個組織中的一個特殊單位，信上要我去面談，朱太太和她丈夫也曾收到類似的要求，退還給她一些演戲用的假珠寶，而她先生則被告知去一間堆滿書籍的倉庫中看看有沒有他的書。在封閉了十年的舊倉庫裏，他找到一些早已被蛀蝕的書本，每本書一拿起來就紙張紛散，而且有股奇怪的味道，最後，朱先生只好回到「掠奪貨物分類局」簽一張宣稱他已拿回被掠奪財產的公文。朱太太也一樣，簽上一張寫著「三個戒指，一枚胸針……」的公文，但公文上沒有記載退還她的是假珠寶，當朱太太向那位負責幹部詢問她那些眞的鑽石及翠玉首飾時，那位幹部却要她提出證明，指出文革時期紅衞兵從她家中搶走的是眞的珠寶。

看來那些從民家刼走的財產，並沒有好好收藏，在文革進行的十年裏，一定有許多人想法子偸走，現在政府要求退回人民的財產，於是地方幹部不得不做個樣子，才成立這個分類局，並要我們簽上回收函做給政府看，收集這些表，他們就可以交差了。

因此我對能拿回有價值東西並不抱著希望，但仍照信上規定的時間到達那裏，接待我的

是位女幹部，她問我要不要去倉庫裏看看有沒有我的書本。

「我確定我的書全被燒了，根據記錄上寫的，我只剩下一些，但我並不想要回來，我會在證明文件上簽字的。」我告訴她。

「我有一些好消息給你。」她故意在「好消息」及「你」這兩個字上加重音調。

從滿桌的檔案堆裏翻出一張紙，她說道：「倉庫裏的一個箱子寫著你的名字，裏頭有你的瓷器，上海博物館對你的十幾件瓷器有蒐藏的興趣，現在那些瓷器就擺在博物館裏，你可以拿這張公文去找倉庫的管理員。」

那是一張證明，說明寫有我名字的箱子是屬於我的。

「我還有一些沒裝箱的瓷器，那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紅衛兵搶走的，它們呢？」

「假如沒有標明你的名字，恐怕很難找到。」

「那麼我的一些白玉呢？」

「寶石和半寶石類和珠寶首飾收在一起，我們還在整理。」她不耐煩的說道，似乎很不高興我提起它們，或許她認為我該為那些瓷器的歸還感到滿意。

「我之所以會問，是因為它們有的是在那些寫有名字的箱子裏。」我解釋道。

「那麼可能有些在那個瓷器箱裏吧？」

「謝謝你幫我找回那箱瓷器，你們一定很辛苦。」

「上海博物館幫我們的，他們為了買瓷器一直想和你聯絡。」

我很高興找回那箱瓷器，當我回家時，我連絡小馮要他幫我運回它們。看來在一九六六

年紅衞兵搶奪我家時，我辛苦打包成箱的功夫沒有白費。
幾天後，小馮開著他電力公司的卡車到城市另一方向的地下倉庫，我拿出證明給安全警衞看後，就獲准進入那陰暗的洞穴，管理員要我們在積滿灰塵的桌旁等待。燈光很暗，我們在通風不良的室內不耐的踱步。
他拿來一大堆箱子放在桌上，要我們自己找。書卷、扇子及大大小小的紙箱上都蒙上一層灰，有個人拿起一把老舊的扇子時，嘆了一口氣，因爲那把扇子是古董，上頭還有明朝名家畫的畫，但已蛀得體無完膚。站在她身後的女人似乎是他太太，正低聲要他丟掉那把破扇子，但他却拿起手帕小心翼翼的包起來。
回到家，小馮幫我把箱子搬到樓上然後離去，箱子發出一股霉味，我打開所有的箱子，拿出裏頭的瓷器，然後把舊的箱子丢到陽台外。一些花瓶、瓷碗及碟子都已經碎了，所有的瓷器上面都被標上鑑別號碼，有些則寫著一些辨識不出的句子，在一個明朝的大碟盤上面，有個革命分子爲了表示對富有者的恨意，竟在上面寫著：「收藏此物者是吸血鬼」等字樣。看到這些美麗的器皿被如此折騰，不是碎了就是被亂塗，我好心疼。但我知道若不是有人勸阻，恐怕這些東西早被紅衞兵給搗碎了。
我用溫水泡了肥皀粉來清洗它們，並用濕布設法將上面的胡言亂語拭掉。清洗過後，我將它們放在地板上的一張床單上，等我完成這些工作時，天都黑了。我知道只剩一半不到的器皿完好無缺，其中一座觀音塑像上面雖有墨漬，幸好沒被打破。洗淨後，它看來跟以前一樣光亮照人，我將它放在桌上像看一位久違的老朋友一樣，仔細欣賞著。

我看了看上海博物館要買的清單，包括軒田藍白及蘋果綠（汎青）永慶年間的花瓶（我特別喜歡的一只），上面有隻栩栩如生的浮雕蜥蜴，此外還有一些宋朝名瓷，我不知該拒絕或接受博物館的搜購。在文革前，我曾和我的女兒擬定遺囑，她建議我將所有收藏品都贈送給博物館，但他的寃死及文革時破壞文化遺產的舉動令我心寒，我不曉得是否要將它們送給或賣給政府組織，另一方面，我又想到即將離開大陸，而這些東西都不可能運出國，那麼要不要將它們留給博物館，似乎已很肯定了，畢竟賣給博物館比最後落入那些不知珍惜它們的官員手中要好得多。我決定交給博物館，但要求館方做些黑木展架做爲交換，有了展示的木架，我就可以先在家裏將它們一一展出，在離開上海前好好看顧它們。

稍後不久，上海博物館的人邀我至館面談，接待我的男子非常有禮，他們將十五件瓷器拿出來讓我一一審視，在一番禮遇之後，他們談到收購的話題上。

「由於目前財力有限，我們只能有選擇性的選購，你這十五件物品我們非常重意。」

「當然，這總比擺在我家裏好，擺在這裏可以讓更多人參觀、欣賞。」

他們都點頭表示贊成，然後我提出要求——答應負擔那些架子的木頭錢及工錢，他們似乎很訝異我這種異常的要求，但彼此却又開心的答應下來，並定下時間來量各件器皿的尺寸以便做木架，最後，我交出那十五件瓷器的讓渡書，於是他們迫不及待的找來一位老木匠。老木匠抱怨工作已經排滿了，沒有空幫我做架子，我說可以等他有空時再做，但博物館的幹部們却要他暫緩館裏的工作，其中一人解釋道：

「下週我們要開個展覽會，順便向你提一下，所有捐贈或賣物品給我們的人，都應邀參

加這次展覽會及稍後的晚宴，我們希望你能來。」

說罷，他拿出一張燙金的邀請卡，上面早已寫上我的名字，看來這些人似乎很有把握我會賣給他們這些瓷器，想來是仗著政府機構，但其中一人後來懊惱的告訴我，有一個醫生拒絕將他收藏的唐朝瓷枕賣給博物館。

展示會在一樓舉行，除了一些捐賣的私人收藏家及他們的妻子外，還有許多政府官員、館方的工作人員，穿梭在展示櫥櫃間。每件展示品前貼了一張紙片，上面寫著物品名稱、時代等資料及捐贈者姓名，我只看見其中四件瓷皿被陳列出來，館方的工作人員告訴我，由於受到場地限制故只能展示部份捐贈品。

參加的長官中，最高職位的是副市長張慶宗，他同時也是文化遺產保存協會的首領，身邊跟著一大堆隨從及一些館方的工作人員，以便隨時回答問題，大家參觀完後，我們被請到大廳中央早已排好的椅子上坐下，張副市長發表一場演講，讚揚那些捐賣者，他更提到一對來自美國代表他祖父的年輕夫婦，他祖父死於文革故未能親眼見到自己的收藏品在博物館展覽，演講完後，館方要求捐賣者站到前面，當每個人走過張副市長的位子時，他便起身贈給每人一面獎狀，金框的獎狀封著一張紅信封，上面寫著收購的金額。大家列隊前進，一位館方人員溜到我身旁，低聲說稍後會爲我舉辦一項特別的典禮，（因爲我捐出十五件名貴瓷器），稍後，我們乘公車到華山路新開的飯店參加晚宴。

那對來自美國的年輕夫婦，以及一些與香港有生意來往的收藏家被安排與副市長同桌，由於黨的政策傾向吸引外國投資，因此這些人的重要性在人民政府的幹部們眼中益趨顯要，

透過這些人，政府可以跟香港和其他地方的華僑有所連繫，藉此穩固政府與海外的生意。我們這一羣人則隨意坐著，每張桌子都有一個館方人員做招待，與我同桌的，我一個也不認識，進餐時，我這一桌並沒互相介紹或交談事情，只是表情僵硬而有禮的等待晚宴結束，但館方人員則興緻十足，拿著酒杯，一桌接著一桌的向每一個人敬酒致謝。

那些收藏家似乎對他們的收藏品依依不捨，每個人的臉上都有點感傷，整個宴會進行中，我也想著我那幾件名貴的瓷器，雖然我並不後悔把它們捐給館方，但仍覺得有點難過，我想別人也與我一樣，畢竟，每一件古董都曾花費了不少心力及金錢，何況他們並不是想賣錢才將它們出售給博物館的，而且那些售價根本不能與市價相比。

當我們看到張慶宗預備離去時，我們也都靜靜的放下筷子，他和他的隨從走出門口之後我們也紛紛起身，和每張桌子的館方人員握手道別，直等到我們步出飯店，遠離那些官僚後，我們才彼此道別各自回家。

一個禮拜以後，兩個博物館幹部帶我坐上公家車子去上海公寓。這是一棟供外國訪客住宿的公寓，在一間官方使用的房間裏，為我舉辦頒獎典禮。被領到一張桌子前，在來賓禮簿上用毛筆簽下名字，當我彎腰簽名時，一個攝影師照下很多照片，而後那些官員也在我之後簽上名字，接待人員這才打開門引我進入會客室。我被一一介紹給許多官員，同時也看到我的鄰居古大夫和他的太太，古大夫是一個醫術高明的外科醫師，而他太太則是婦產科醫生，他們都在六號人民醫院服務，也捐出一筆家傳的青銅古董。

一會兒，副市長張慶宗到了，他在一張為他保留的長沙發中間坐了下來。當我們彼此問

候身體健康狀況之後，便談論起天氣及政治狀況，這時服務人員送上青茶。當應酬話說完了之後，一位館方的次級幹部，將一面鑲框的獎牌放在張副市長的桌前，張簡短的讚美我的捐贈行爲，然後拿起那面獎牌，雙手呈給我。我起身接過來，並彎身致意，然後他又送我一幅畫卷，以表示館方對我捐贈的謝意，收下後我又再度彎身致謝。

我打開畫卷，驚喜的看到那是一幅明朝大師鄧揚名畫「仕女與牡丹」的複製品，眞品當然保存在上海博物館內，但這幅長二呎、寬二十八吋的畫捲，却複製得維妙維肖，與原版所差無幾。（現在這幅畫正掛在我華盛頓特區的家中牆上，供我的好友們欣賞。）

頒贈完畢，張坐下，我簡短的致詞，表示我很樂意能豐富館方的收藏。演講時，那個攝影師又照了好幾張相片，事後，那些照片和簽名簿都送給我做紀念。

一會兒，服務人員宣佈可以用午膳，在張的引領下，我們步入餐廳坐下，那是我在中國大陸吃過最豐盛的一餐飯，有酒、水果及甜點，每個人，包括張副市長都很愉快有禮。進餐時，副市長告訴我他也曾被捕入獄，我驚訝的表示我很難過，他却說：「你是不相信像我這樣資深的革命分子也會被別的革命分子給送進牢裏吧？政治是很複雜的，這你應該知道。」

在張的敍述後，很多人也告訴我有關他們在牢裏的事，我算一算，大約每十個人就有七個人在文革時期曾被捕入獄。

「不管怎樣，我們現在都又恢復原職了。」一位幹部說道。

於是在張的帶動下，我們站起身來舉杯祝福中國共產黨——因爲是它「促使」復職的。

看來上海的人民政府根本是要洗我的腦，他們根本不必爲我單獨舉辦頒獎典禮及午宴的

，但他們却像外國人一樣待我，我想這是因爲他們知道我將要出國，希望在我走前留下一個好印象，以免到海外後，破壞政府的形象，即使連張的坦言入獄一事，也不過是勸我把自己的入獄經歷看成一件小事，畢竟那時有更多的高級幹部同時也被捕入獄。

翌晨，在上海解放日報的一個角落，刊登我因捐贈而受獎的事，報上稱它爲愛國擧動，並強調我沒有接受任何金錢事項，上海解放日報是由政府控制的，因此這件消息當然是由政府決定刊登的，我想那些幹部們極想留給我一個美好的印象。

報紙刊登消息後不久，我馬上就成了大受歡迎的人物，左鄰右舍包括居民委員會的書記都來向我道賀，並觀賞那張獎牌，建議我將它掛在牆上，以往見到我避之不及的人，現在都走過街道來向我致賀，幾年前才批評我的衣著不當的陸英也大聲讚美我淸爽的打扮，並詢問我的衣服都向何處購買，過去那段備受凌虐的日子似乎已經遠離了，但我知道黨的本質並沒有變，變的只不過是現在的政策。

當恭賀人潮漸漸退去時，上海婦盟會的代表胡同志來邀請我參加知靑婦女的硏究會議，我馬上答應她，因爲這樣一來我日後將不必再參加居民委員會擧辦的無聊會議了，而且我希望那裏的知靑婦女會議能比較有趣、愉快。

根據中共憲法，婦女享有和男人一樣平等的權力，但事實上，仍有很大的差距，雖然在城市裏做著和男人相同工作的婦女可以享有相同的薪資及福利，但絕大多數的女人仍是從事傳統的婦女工作，像紡織員工、店員、護士以及教員，婦女的地位仍視其配偶的地位來定。國家婦盟會的會長就是朱德的遺孀，而地方上的會長及副會長也是其他黨內高級幹部、退休黨

員的妻子或遺孀。從事實際的行政工作却是像胡同志這類黨員，婦盟會就像其他中共的組織一樣，負責婦女運動的監督指導。

「我們有兩個研究組。」胡同志道：「一組包括解放前的女廠長和資本主義者的妻子，另一組則是對社會主義有貢獻的名科學家，你被放在後面這組，你將發覺這組很有趣。」

「麻煩你代我向婦盟會的領導幹部表示謝意，我很榮幸被你們邀請參加這次會議，而且期待會議趕快到來。」我禮貌的回答她。

「下禮拜三下午兩點，我們將聯合召開就職會議，地點在北平西路的上海政治協商會議廳，以後每禮拜都在那兒開會。那裏還有附屬的商店及餐廳，對我們來說實在太優厚了。」

「我一定準時到。」

我隨她走到前門，送她離去，當我關上門時看到朱太太在花園裏。

「那是婦盟會的胡同志嗎？」她問道。

「是的。」

「她來邀你參加他們的研究小組會議嗎？」

「是的，你怎麼知道？」

「我也被邀請了，但我要去地區盟會，你是去市盟會，對吧？」

「我不曉得。」

「假如你是去北平西路的上海政治協商會議廳開會，那就是市盟會了。」

「反正，只是個研究小組罷了，區、市沒什麼差別。」

「差別可大啦，在市的婦盟會裏，你可以知道很多婦盟會不會知道的事情，而且，你可以去附屬的商店及餐廳買到一些市面上沒有的東西，例如雪茄。」她說道。

我快要走進我的屋子時，她又補充道：「你被邀去市婦盟會是因爲你捐贈給育幼院的錢是全市第二多的。」

「你的消息眞靈通。」我乾澀的說道。

「現在你是我們這裏的話題人物，大家都說你是爲了買護照才這麼做的。」她注視著我的臉，似乎想看出我的反應。

「你是說，你認識一些以爲人民政府在賣護照給人嗎？」我故意裝出一副難以置信的樣子，但事實上，我却很高興聽到她告訴我這些話。(中國大陸的人民非常尖酸刻薄，他們總認爲那些做好事的人都居心叵測。)

朱太太嚇了一跳，連忙道：「沒有人說政府在賣護照啊！」

「那就好，你剛剛不該說『買』，不是嗎？」我不等她回答，逕自走入屋內。

我想朱太太是因爲我受到較好的待遇，而嫉妬我。

政治協商會議是國家統一運動的一組聯合陣線，並不眞正參與政治，實際上，他們只是對黨既定的政策重申他們的肯定及支持而已。在上海，這種組織座落在以前「張家花園」的一棟住宅，上海其他「宮殿住宅」都在外國人侵佔中國時被損毀，只有這座花園，由於曾是孫中山先生開秘密會議的場所，所以得以倖存，偌大的花園中有一個湖，原本在湖上的涼亭不見了，一樓變成聚會廳，樓上則變成會議室，穿廊的入口是附屬商店，餐廳則在花園的另

一角落，二者都是服務會員們的非營利組織。

我離開中國大陸後，遇到許多歐洲人及美國人，他們都認爲中國大陸是一個平等的社。這不是眞的！事實上，中共控制全國的貨物、就業機會等，並且不平等的「分配」給人，這種「內部」組織提供的物品只給某種階級的幹部，或爲了某些政治因素政府必須討好外國人。我更聽說過一個名稱爲「內部中內部」的單位，它專門提供高級幹部（尤其是軍中的重要幹部）一些特別的物品供應。因此，雖然一般幹部的薪水沒有超過普通勞工的八十倍，但他們的家人却能免費享用這些「內部」或「內部中內部」的機構提供的一流貨品就好像以前的大地主，而這種特權，即使在他們死後仍能延續給下一代。

婦盟會研究小組的婦女們，在政府眼中並沒有什麼重要地位，我們之所以能嚐點「甜」，只是因爲新國家統一的政策，這包括資產階級和對外公開的四個現代化。我們這些人乎都與海外的華僑有所連繫，因此政府希望經我們贏得海外親友的支持，以便在西方的民政治中樹立容忍的形象。對於這些政府的「甜頭」，我嚐到的只是一小部份，但却足夠使的親友們羨慕死了，他們毫不猶豫的要求我從那「內部」的商店及餐廳幫他們買一些特別貨物或食物。我發現其他的會員也有同樣的困擾，我很高興在我離開上海後，能將這些搶的尷尬場面拋諸腦後。

阿姨對我參加婦盟會感到很驕傲，她認爲我終於得到別人的尊敬了，不但復職甚至還級哩！在參加會議那天，她提前伺候我吃完午餐，便一直在我身旁嘀咕著要如何穿著得體

「就這件淺灰色，你穿看起來很好看。」她提議道。

「這件深藍色不好嗎？」我從衣櫃裏拿出一件深藍色的褲裝。

「不，淺灰色這件比較好，穿起來比較年輕，你應該去染髮，假如你有一頭黑髮，看起來更年輕。」

我將深藍色那套放囘去，拿出那件淺灰的，她滿意的笑著往廚房走：「明天告訴我會議的事。」

就職典禮上，我們這組除了我之外有七位中年婦女，我們坐在一間乾淨的大會議室裏，桌上奉有茶水。其中一位婦盟會副會長對我們致歡迎辭，並向我們說明周恩來在十中全會提出並經毛主席同意的「四個現代化」，她讚揚「英明的領導」華主席逮捕四人幫的事蹟，並宣稱華正努力使大陸步入四個現代化。就像一般幹部一樣，她幾乎一字不漏的重覆那些北平政府領導者的標語。

當這位五十出頭，身穿黑色褲裝的副會長在寥寥可數的掌聲中下台後，一位和她那資本主義分子的先生一同自美國囘來的婦女上台演講，她向我們道歉，因爲她的聲音已經因四處演講而沙啞，她的演說中不斷描述美國的生活，同時還提及美國社會有著搶劫、吸毒、酗酒等犯罪風氣，此外她更指出，雖然美國政府提供她丈夫一個優渥的工作機會，她丈夫仍拒絕了，她丈夫寧願囘到以前移交給政府的工廠擔任總工程師，爲偉大的四個現代化貢獻出他的力量，使中國更強大，她說完後，我們都熱烈的鼓掌。

她的演說明擺著是政府授意說給人民聽，而不是爲了毀謗美國政府，中共政府對那些在美國領事館大排長龍，等候簽證的人大感困窘，而她的說辭或許能使那些人減少去美國的熱

情。事實上，報紙也登過幾篇有關美國移民的故事，那些人到了美國由於找不到工作，而被美國社會排斥，在失望之餘囘到上海，「發現」祖國不但有好的就業機會等著他們，更有黨書記爲他們準備的「英雄式」歡迎典禮，故事的結尾往往是：那些囘來的人正爲祖國實現四個現代化而努力。

我在婦盟會待了一年多，研讀黨發給全國各地研究小組討論的課題，聽著政治協商會議的委員們朗誦高級指導幹部發下的文件，當然我們也享受到那些「內部」機構的特權。

我這一組有三十二個婦女，平均年齡接近六十歲，組長是一位七十歲的副市長太太，胡同志是兩位黨幹部之一，負責監督我們進行會議，並將討論導入黨已設定好的結論，我們組長是個有經驗的主席，而組員們各個都很聰明，因此配合得很好，使得會議進行從未發生任何令胡同志難堪或憤怒的事。

其中有一位年紀五十的年輕作家，負責宣讀討論提案，坐在會議桌旁的我們便提出問題，但說得太快的人怕說錯話；說得最慢的人又怕發言時已經沒有正確的言論可講，所以在宣讀時，我們都得裝做非常專心，而組長在討論前也會暗示我們如何發言，比較大膽的女士就啜了一口茶，抬起頭來發言，大家就跟著發言。偶爾我會在討論中故意加入一些無關痛癢的話題，但有時不能成功，不過胡同志總會問我：「你覺得如何？」在研究小組中，人們不可能完全坦白直言，而且說的大都是陳腔濫調。

當對胡同志認識愈深，愈加發現她不像一般有階級成見的幹部，因此我就試著請她幫忙找出殺害梅萍的兇手。聽到這件事，除了表示難過與同情外，她還介紹一位在上海黨書記處重

新設立的聯合陣線組織的馬同志，後者聽完我女兒的案情後，答應回去詢問上級。幾天後，她和胡同志來我家，告訴我組織裏正在承辦許多類似梅萍的案子，就連她的前上級也是在文革時以自殺結案，但他的家人已提出證據指出他是被謀殺的，並解釋案子已經這麼久，既沒有證據，也沒有人敢出來檢擧，即使有，可信度多少也有待確定。我承認這些，但仍堅持政府有心查清這些案子，應該不成問題，她要我耐心等待四人幫的審判完結，黨自會提出那些犯罪的名單。從她的意思，我知道黨和政府不願承認文革時期幹部們的行爲是有錯的，畢竟他們是在執行黨的政策，何況批鬥自己的同志要比批鬥普通人民來得困難。

我送她們出去時，答應馬同志我會耐心等待，我送走她們之後，回頭看見朱太太站在黑暗的台階上，她問我們談的是否有關我女兒的死，由於我曾爲她買「內部」的雪茄，因此她的語氣聽起來比較友善。我點頭，她却說出令我驚訝的話：「我兒子告訴我，殺死你女兒的兇手已經被關起來了，那個人似乎涉及許多樁殺人案。」

我請她兒子證實他母親的話，但他否認了。其實，如果兇手眞的被捉起來，公安局或胡同志應該會通知我，但他們沒有，因此我就把朱太太的話擱在一旁，不去採信。（但離開上海一週後，香港左派的「大公報」却刋登那個兇手受到審判後，於文化廣場前，在受害者家屬的注視下判處死刑，朱太太的話是眞的！只是這項判決已是兩年之後了。）

那天早晨，在我打開報紙看到被害者名單中有梅萍的名字後，我瞭解公安局是故意等我出國後才審判此人的，他們不希望我出席法庭，因他們知道我不能容忍延緩兩年的判刑—在中國，殺人罪犯是就地正法的。

一九七九是鄧小平及中共的關鍵年，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全體中共委員出席開會，通過鄧提出的「實踐是試驗眞理的唯一標準」，爲重整和改革全國經濟舖路，他拜訪美國時受到的熱烈招待更使他成爲國際政局中知名領導之一。他對越南大膽入侵所採取的「懲罰越南」戰爭贏得人民對黨的信心，也使大多數的軍方領導相信中國的國防必須現代化，而鄧的地位也因清除四人幫的餘黨更趨穩固，雖然當時華國鋒仍是黨的主席及總理，但鄧的權勢早已超越其前。

鄧的經濟改革政策之一就是對外開放貿易，我在上海解放日報讀到蜆殼石油公司及其他石油公司都已加入外海採油工作，那時我相信申請出國一事將指日可待。（但我離開上海仍是在九個月之後。）

一九八〇年農曆年，我決定舉行盛大宴會來慶祝可能是我在上海度過的最後一個新年，於是邀請一些朋友，我準備了一些「外國食物」如漢堡、冰淇淋、馬鈴薯湯、甜點蛋糕招待他們。房裏擠滿人，我的床甚至得搬走才有足夠的空間讓大夥兒坐在地板上吃東西，餐後我們到花園去，許多人，尤其是小孩們將我買來的爆竹烟火點綴得整個天空五彩繽紛，鄰居們（包括朱家）也坐在陽台上欣賞炫麗的烟火。公安局的老李跑來告訴我，有人抱怨聲音太大了，影響他們的睡眠，我只好藉口除了過年，也順帶慶祝越南一戰的成功，等老李走後，一位年輕女友告訴我，越南一役是鄧小平爲諂媚美國而替美國報仇的，而且是鄧在美國時和卡特總統商量好的，我要她別對別人說這些話，事實上，到今天，那些反對鄧的人一直以此攻擊鄧。

我的年輕朋友問我有沒有看「甲午海戰」這部電影，我搖頭。她告訴我這部片子充分顯露人民對鄧的擁戴，我決定親自去看，果然如她所說。飾演鄧指揮官出現在螢幕上時，戲院的觀衆都起身鼓掌。

在過年前，我接到一張燙金的邀請函，毛派控制下的上海革委會，邀請我參加在上海展覽廳舉行的農曆年慶祝大會。這棟建築是中蘇友誼高漲時期，蘇俄送給中共以示友好的禮物。一張邀請函可以多帶一位，因此我邀請那位年輕朋友一起參加。雖然那時候的氣溫在零度以下，但由於過年時交通阻塞，我們決定走路過去。

展覽廳外的停車場停滿許多私人轎車，看來上海有頭有臉的人今天全到齊了，在人羣中我看到一些婦聯會的會員。進場之後，我感覺格外溫暖，因爲裏頭設有中央暖氣系統，這對我們這些家裏沒有暖氣設備的人而言，眞無法忍受，很快的我們和別人一樣紛紛脫下大衣、夾克及毛衣，我的朋友迫不及待想去看看上海聞名的「內部」商店。她告訴我在她吹噓自己要來這裏時，朋友及鄰人都託她買一些普通商店買不到的物品，我本來建議她至少先參觀一下裏頭的活動，但人實在太多了，於是我們決定溜去商店購買。

我們很失望，商店前不但擠了人，而且店員要檢查過每個人以後才准進去，等我們好不容易排隊進去了，她想要買的物品幾乎有一半賣光了。我們不甘心白跑一趟，所以仍花了幾千塊人民幣買了不少東西。我們兩人手上拎滿大大小小的袋子加上脫下的毛衣、外套，最後只得叫計程車回家，但却叫不到計程車，好友只好打電話叫她兩個弟弟騎脚踏車過來幫忙。當我們站在冰冷的室外等待時，看見許多人也是大包小包的，倒是那些開車來的高幹一臉輕

鬆，因爲他們有自己的「內部」來源。

過年後，許多臨時搭建的小木屋竟如雨後的春筍般出現在我們這條街上，沒有洗衣、盥洗設備，全家老小擠在一間小屋子。起初居民委員會要我們打開前門，供他們使用水龍頭，但在許多戶報失竊後，居民委員會才在街上裝水龍頭，每天晚上會有一個年輕的女清潔工到各個小木屋收集糞袋，結果街上到處充滿屎臭味。

朱太太告訴我，這是由一個區政府的女幹部一手造成的，她認爲我們這條街有太多資產階級和階級敵人，「太安靜、太乾淨」了，所以放一些無家可歸的無產階級來混亂我們的生活。我訝異竟沒人反駁她，朱太太說這是因爲大家都害怕政局又會變動的緣故。起初每家前門都只有一個小木屋，還有路可進出，但不久木屋的東西都堆到外頭來，最後通道窄得只能側身而過，此外小孩的吵鬧聲，女人的尖叫聲及收音機傳來的聲音更使我們原本「太安靜、太乾淨」的街道變得又吵又髒。我們知道這是「黨階級鬥爭」下的結果，即使在鄧派權勢高漲的今天，毛派仍認爲鄧派背叛毛思想，因此在各地反抗鄧的指示。事實上，這種權力傾軋的鬥爭一天不消除，中國的政局就隨時會發生巨變，因此我們只好容忍這些新鄰居，並盡力幫忙他們，畢竟那位女幹部沒要他們搬到我家裏就已經是夠幸運了，後來陸英告訴我們居民委員會將爲這些人蓋一棟新公寓，這問題才算解決了。

一九七八年海倫來大陸與我會面後，我活著的消息迅速在歐洲或北美的朋友間傳開來，並開始收到他們的來信。一九八〇年七月，我收到一位老朋友約翰・愛迪的信，信中說他將到上海並來看我。約翰對中國文化有很深的瞭解和喜愛，我和先夫從四十年代就認識他了，

五十年代他在北平英國代辦處服務時是家中常客，當他奉命擔任寮國、菲律賓的英國大使期間，我們仍保持連繫，而且一九六五年他也曾利用假期來上海探望我。他還是一位資深的中國瓷器收藏家，他的收藏最後都捐給大英博物館。在每收藏一件瓷器時，我總會聆聽他的意見。一九七二年在牢裏，我獲悉他出任北平的第一英國大使。一九七三年出獄後，政局使我無法和他取得連繫，而到一九七四年，我從報紙知道他已退休離開北平了。現在，我當然很樂意見到他，但他是個政治人物，且我不希望做出使政府誤會而妨礙出國的事，因此在回信給約翰之前，我決定去詢問公安局的老李對這件事的看法。

我拿著信去找老李，當他聽完後，一句話也不說。我問他的意見，他却說這是我的私事。為了安全，我告訴他我決定寫信拒絕約翰的拜訪，但他却這麼回答：「我又沒告訴你不要見他！」

「那麼我可以見他了？」

「那是你的事。」老李又這樣回答。

我意識到自己正讓老李陷入進退兩難的尷尬局面，我知道他贊成我接受約翰的拜訪，但不願為這事負任何責任。

「好吧，我決定接受他的拜訪。」

老李笑著說道：「這完全由你自己決定。」

然後我問他是否可以邀這位朋友來家中便飯？老李暗示我，約翰以前既然去過我家，那麼他可能會比較我現在和過去的居住環境。我會意的點頭同意：「我就帶他去餐廳吃飯。」

待我起身道謝時，老李連忙補上一句：「我沒有給你任何建議，這是你的私事。」

「無論如何，謝謝你聽我說這麼多話，八月約翰來時，我會通知你的。」說完我便轉身離去，回到家中覆信給約翰。

七月底一個炎熱的午後，我收到公安局的面談通知，那是有關我護照的事，我到達後，看到會客室只有一名年輕男子，他看來頗爲激動，當看到我時，他問：「你是不是爲了護照來面試的？」我點點頭，坐在板櫈上。他站起來，神情緊張地說：「你想他們會不會拒絕你？」

「我想很快就會知道了。」

「假如被拒絕過一次，還能再申請嗎？」

「請坐下來，靜靜的等，我也不太淸楚，或許等你進去時，可以問裏頭的人。」

他坐了下來，兩眼緊盯著房門，當門被打開時，他跳了起來，但叫的是我，想必他比原定時間早到許多。等關上門坐下時，我交出那張通知。

「你是申請到美國的護照嗎？」一位幹部問我。

「是的！」

「什麼理由？」

「和我妹妹們團聚。」

「你是否要到別的國家？」

「是的，我會順道到加拿大、歐洲看一些朋友。」

「你在國外認識很多人？」

「有一些。」

他打開抽屜拿出我期待以久的護照，並說道：「你的申請已經獲准了，這是你的護照。人民政府希望幫助人民與家人團聚，你可以去美國看妹妹，也可到處拜訪朋友。見到他們時要鼓勵他們回來看看祖國，告訴他們這裏的情形，還有，我們如何建造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尤其告訴那些台灣的朋友回歸祖國，他們可以來此參觀並可以自由離去。」

「我不認識台灣的任何人。」

「那麼告訴你在香港的朋友們，鼓勵他們回來祖國投資建設。總之，鼓勵你認識的人回來祖國參觀就是了！」

我點點頭，拿起護照，偷偷看了一眼上面的照片，確定他沒有拿錯後我正要出去，他又告訴我到達美國後得向中共大使館登記，我說，加州沒有中共的大使館，便匆忙走出去，差點與外面等候的那個年輕人撞在一起。

下一步驟就是去美國領事館申請簽證，爲了避免加入領事館外的長龍，我決定冒險拜訪查爾德銀行經理。由於先夫和我自四十年代初期就和這家銀行在香港及倫敦的分行有來往。而上海的幾任經理也曾是家中的座上客，因此彼此都很熟。當那位年輕的英國經理看見我時，大吃一驚，他告訴我，他跟一些香港、倫敦的分行同事以爲我早死於文革了。我說明簽證一事，並要他迅速幫我聯絡兩地的分行，撤銷我的死亡登記，他答應幫我跟他住在同一棟公寓的美國官員提一提我的出國簽證，兩天後，我從美國領事館順利的拿到了它。

八月初，約翰來上海時，我告知他今年秋天我將離開大陸，但我並未提及入獄及女兒被害之事，我只告訴他有關復職、梅萍的追悼會、捐贈瓷器給上海博物館等事。他要求到我住處觀賞我其餘的瓷器，記起老李的「建議」，我將話題轉開，邀請他在參加中午官方爲他舉辦的歡迎會後，到東風餐廳吃晚飯，這是以前的上海俱樂部，有「東方最長的酒吧」之稱，待吃完飯再去看我家的那些瓷皿。

「我很想知道過去這幾年來，你過得如何？」約翰是這麼說的。

當我告訴老李有關約翰一事時，他緊張的問我有沒有告訴他我在文革時的遭遇及我女兒的死亡，我告訴老李，約翰本人在大陸有許多朋友，有的是高級幹部，因此即使我沒有告訴他全部，他也會知道發生在大陸的一些事情，並一再向老李保證約翰是「中國之友」，老李的神情才放鬆許多。然後我又提及要找那位英國經理及兩位中國朋友爲約翰開個宴會，老李點頭贊成。我提到約翰要來我家一事，老李本來要我拒絕，但討論了半天也想不出好的理由，加上約翰又曾在南京與北京待過，或許早已看過更糟的場面，因此我們決定讓他來我家。

「你什麼時候帶他回來？」老李問道。

「九點多，或許更晚一點。」我告訴他。

那晚，當我帶約翰回來時，整條街道安靜異常，沒有四處晾晒的衣服，而走道上的雜物也清走了，當約翰坐在陽台俯視時，他說：「你住的比我想像中好，這裏很安靜，也很乾淨。」但我却沒告訴他，這些都是老李的安排。

我會在此提及約翰來訪，主要是因爲老李是個有趣的人，當他控制我的生活時，總是一

臉「實際上不願意這麼做」的表情，而我每每得預測他對我的「期望」，並俟機行事；所有中共幹部都這樣對待人民，但並不是所有人都像老李那麼善良。

在得知我會得到各國的簽證後，我便在山上租了一棟房子，靜養二週，遭遇過這麼多事，許多人都說我不會再回大陸了。通常中國人不論在多遠的異邦旅行或離開祖國多久，都希望能落葉歸根，但我絕不願回到這塊土地，而寧願客死他鄉，我知道到異地展開新的生活前，我必須先將心中的矛盾與衝突，經由禱告與內省化解一番。

下山回到上海，婦聯會為我舉辦餞行茶會，在領導致辭後，我上台發表簡短謝詞，我讚揚她們的智慧、忠貞及他們對社會主義的貢獻，並宣稱我自她們身上獲益良多，她們也很有禮的要我代她們向我的國外親友問好，並希望我鼓勵親友們回祖國參觀。

一九八〇年九月二十日，胡同志和五位婦聯會組員以官方名義為我送行。由於海關的嚴格限制，我只帶著一個箱子、一個手提包及相當於二十塊美金的港幣離開，我的銀行存款及其他所有財物都沒帶出來。到了碼頭，天空正飄著毛毛細雨，胡同志他們不准進入旅客室，於是在檢查完行李後，我就與她們揮手告別，我想她們應該知道我不可能再回到這塊不堪回首的土地上了。瞬間，細雨變成傾盆大雨，還伴隨著閃電及隆隆雷聲，我沒帶任何雨具，只好搖搖晃晃跑向滑溜的甲板。這艘舊船是中共向英國政府買來的，經過改裝後在香港與上海之間航行，頭等艙裏有熱水浴，我洗完澡後換上乾衣服，身體才溫暖許多，然後我走回甲板向上海做最後的巡禮。

船起錨了，在迷濛的雨中，我看見蜆殼石油公司的建築物及我原來的辦公室窗子，過去

似乎是一場夢魘。船加速駛離黃浦江，當船抵達長江的入海口時，風雨停了，陽光從雲層中射出光芒。

過去我曾經好幾次坐船離開上海到國外去，就像現在這樣，站在甲板上，讓風吹拂髮絲，望著大陸的海岸線漸漸遠去，但沒有一次，像我此刻這般悲傷；是我在亡夫的要求下，於一九四九年帶著梅萍從香港回到大陸，她的死，我相信是因爲我和我丈夫當時留在祖國的一項錯誤決定而造成的，我爲自己的苟存感到自責，我多麼希望站在這甲板上的是梅萍，她離開這兒去異邦重新開始新生活，但這一切全是空想，畢竟，自然的定律應是「黑髮人送白髮人」而不是「白髮人送黑髮人」啊！永離這塊土生土長的土地使我感到痛心，天知道我曾多麼努力的想對我的國家盡忠，但却徹底的失敗了——沒有犯下任何錯誤的徹底失敗了！



後記

我花了一年的時間拜訪親友，並尋找棲身之處，加拿大是第一個提供我居留的國家，我在渥太華住了兩年，但長冬和冰雪與勁風使我的關節疼痛不已。一九八三年我南遷至華盛頓特區，那裏的天氣比較像上海，我買了一棟公寓定居下來。

在華盛頓，我每天做我喜歡做的事：我可以四處旅行，不需別人的批准；貨品、食物隨手可得；和別人說話，我可以坦率直言，而不必擔心是否合乎規定或遭別人誤解；我的新家附近也沒有像陸英或老李那樣的人在監視我，在這樣自由與輕鬆的氣氛下，我的精神鬆弛了不少。

我最大的享受是隨處可見的書籍、雜誌、報紙等新聞媒體能讓我恣意吸收各地資訊。我很忙碌，卻很充實，只是偶爾，過去的悲傷會再重現腦海。黃昏時分，當一日的興奮漸逝而我的體力也消耗殆盡，我才會鬱鬱寡歡的想起家鄉，但初見曙光，我又樂觀的迎接新的一天。

描述我在文革時的痛苦記憶及我女兒的慘死，對我是個折磨，我常常在思及心痛處，不能自主的放下筆直到心境恢復平靜，但我仍堅持執筆完成此書，一股內心的衝動要我說出一切，讓那些在自由世界的人們知道，中國大陸的人民如何生活，我的朋友們也鼓勵我這麼做。我要感謝貝姬・杜丁，一位退休的雜誌作家，與我有四十四年深厚友誼的好友，我一九八

〇年去拜訪她時，她提議我寫下這活生生的見證，她給我許多諍言並賜我繼續寫下去的勇氣。

我的護照早已過期，美國移民局發給我一張通行全國的證件，我希望自己能成爲這個偉大國家的公民。在這廣大的國度裏有許多熱情的人們，而我也在此找到自己的新生活，美國有許多與我同病相憐的人，像受德國迫害的猶太人、越南難民，以及許多逃離鐵幕的政治難民，有這些人與我爲伴，我不會感到孤單的，而且我相信，上帝會爲梅萍這樣無辜的犧牲者安排一個極樂世界，像我的餘生一樣，我的女兒在天上也不會孤單。

我仍然關心祖國及中國人民的未來，我饑渴的讀著那些刋有大陸新聞的報章雜誌，許多朋友及我的鄰居爲我蒐集一些額外的報導，上海的朋友也會寄些官方文件給我。在一九八四年的十二月，我在香港停留一段時間，並探視那些獲准出來做短期訪問的親友們。當我聽到大陸新的經濟政策促成經濟成長，我很高興。我常常回想那段由毛澤東控制以及文革時期瘋狂暴動浪擲的歲月，想到那些無辜慘死的生命，我深深的感到悲哀，我很高興聽到中共承認文革是全國的災難，但却對中共領導者不敢也不能明示唾棄毛的政策而感到惋惜。對中共而言，文革造成的最大傷害是使其喪失了黨的威望及統治的能力，當毛澤東利用紅衞兵及革命派來打倒他的敵人時，他同時也讓全國人民目睹並加入這場他與走資派之間的權力鬥爭，領導者一個接一個被批鬥，使得人民對統治者的野心及整椿事情的眞相害怕、不信任。一九七六年毛死後，整個中國大陸的政局早已分崩離析，除非當政者能改變政治路線，黨才能繼續統治人民。

對赤貧的大陸人民而言，共產主義天堂的諾言早已毫無意義，革命的口號平淡得不再能激發民心。爲了激起人民的熱情，中共利用他們的愛國情操，爲祖國的現代化努力，以達到它的壯大及提升國際上的地位，回報人民的代價則是中共允諾人民有較好的生活水準並保證不再有政治傾覆的鬥爭事件。

鄧小平統治大陸五年多以來，他的「對外公開，對內搞活經濟」的新經濟政策已獲得極大的成果，國外投資不斷的流入大陸，已達幾億美金，而聚集百分之七十人口的大陸農村生活也獲得改善，農產量驚人的提高，自一九八四年起，大城市也實施改革措施。中共幹部宣稱再過三年將會出現新的經濟結構，它將包括外國資本、技術與中國勞力的合作，國有工業將較以往更重視市場的調節，而如餐飲業及服裝店服務業，將准許有小規模的個體經營企業存在。而這新的體系，也就是鄧小平及其同僚所標榜的「中國式社會主義」，包括中外資本技術合作，以及以計畫經濟爲主，以市場經濟爲輔。

但在一些老幹部的眼中，鄧是個馬克斯主義及共產黨主義革命的叛徒，新的改革政策剝奪他們原有的地位及既得利益，有時那些企圖破壞鄧的陰謀只化成批評，而鄧就是在這種氣氛下來達成他的目標。當他在權勢穩固後，他陸續除去他的敵人，像一九八二年，「十二中全會」他說服了一百萬個中級黨幹退休，加上黨內的修正運動又幫他除去基層幹部中的頑固派；而一九八五年初，他以汰舊換新整頓省長或黨書記；一九八五年八月他甚至把軍中對他批評甚多的指揮將領換掉；九月召開一連串的中全會及中央委員會議，他使年邁高幹「自動」退休，而以忠於他的年輕黨員取代。

雖然毛派領導幹部三緘其口，但却有另一股反抗的勢力：這些人和毛派分子不同，他們贊成經濟改革但不願擁護鄧小平，他們對改革可能帶來的問題感到恐慌，而認爲若把中國大陸的鐵門做得太開，結果反而會使中央的計畫失控；他們認爲和外國交換的只是資金、技術原理及設備，而不是西方的觀念與習俗，他們尤其害怕西方的民主思想及性泛濫風氣會破壞黨的專制統治及人民的道德風範。這些人在黨的組織內佔有一席之地，並以資深幹部陳雲爲首，因此鄧小平那幫人無法忽視他們的警告，雖然新的經濟改革及對外開放政策在許多方面有減縮及撤退的現象，但門戶開放的政策仍未被放棄，卽使在這過程中會有許多掙扎與轉折。

「中國式的社會主義」事實上只不過是那些不敢公開承認社會主義在中國行不通的中共黨員，爲了面子而創造的另一個名詞罷了！他們希望利用資本國家的管理方法來使他們的國有工業復甦，並以市場調節代替國有企業保有的中央性計畫。他們希望那些由黨任命享有一定薪水的幹部管理人能夠達到和西方一樣的專業管理及策畫。他們希望工人爲了利潤及些微的加薪努力工作，以提高生產力及利益，但仍保持誠實、不奢靡。企業改革計畫並沒達到農村改革所帶來的正面效果，遲早，中共領導者必須面對一個難以選擇的抉擇：是要完全放棄社會主義，讓中國的經濟脫離官僚的控制？抑或是退回老路線？

反覆無常是共產主義哲學的要素之一，中共領導人希望人民能一頭栽進黨的新實驗（不論是自由化或是集中化），在中共統治的三十六年中，黨的政策就像鐘擺一樣，反覆不停的擺動。今天，在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大陸在某方面已改變，中國大陸不再是與其他開發國家隔離

的鐵幕，世界輿論以及中共對那些提供投資與貿易國家的政策，必然可能或確實會影響中共境內的發展，一九八四年的反精神污染運動就是對外力不友善的回應。隨著對外愈多的接觸及對世界各地更多的瞭解，中共領導者已漸漸放棄他們的妄想，許多在西方留學後回大陸的學者們將在未來的大陸政局佔有一席之地，中國大陸已經從世界的觀點瞭解自己的形象，並渴望追尋一個更好的中國，那些希望中國進步穩定的人們將會很快得到迴響。